

学校的理想装备

电子图书·学校专集

校园网上的最佳资源

毛泽东入主中南海

 **eBOOK**  
网络资料 非卖品

毛泽东入主中南海前后

原非 张庆 编著

中国文史出版社

## 毛泽东入主中南海前后

## 开 篇

### 1949：中国历史在这里拐弯

1949年，全世界的目光都注视着东方，注视着中国政局发生的巨大改变。

1949年在中国发生的事情，无可逆转地改变了整个四分之一人类的命运，对中国历史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摇摇晃晃、步履蹒跚行进了几千年的中国历史，在1949年拐了一个大弯——农民出身的革命家毛泽东带着浓重的湖南口音宣布：“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

这一年，那面飘扬了22个年头的青天白日旗，无可奈何地从南京总统府飘落下来，恹然坠地。新的中国、古老的民族，从此开启了振兴之门。

1949年10月1日那天，30万军民齐聚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按动电钮，升起那面浸透了革命先烈鲜血同时又燃烧着金色希望的五星红旗，向全中国全世界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

在此之前的1949年1月，蒋介石黯然神伤地离开了石头城，但他却并不甘愿认输。当他在元旦率文武官员拜谒国父孙中山陵寝时，还慷慨激昂地致训词：“回想过去三十年之革命、历史，总理在世时领导我们党员作多年艰苦奋斗之精神，吾人觉得非常惭愧；并非常感奋。现在，我们不得不委屈求全。但我们还有很大的战斗力，可战可和任共党选择……”但此时蒋介石的自信已经明显的底气不足，他自己也明白，靠大话已经不能挽救残酷的现实。蒋介石已经被逼到墙角，没有多少选择余地了。战场上节节败退，桂系步步进逼，美国人落井下石……一切的一切，逼得蒋介石第三次选择“下野”——而这一次的下野，已经不是前两次以退为进的策略了！

正当蒋介石在故乡溪口反省和等待奇迹出现的时候，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们正意气风发地向北平进发。毛泽东以一览众山小的气魄站在历史的峰巅，他是那么自信，那么踌躇满志，当他从西柏坡这个小山村出发的时候，他以带有诗人韵味的特有诙谐揶揄口吻将进入北京城称作“进京赶考”。非常有趣的是，毛泽东在进京路上想到的不是斗了几十年的老对手蒋介石，而是明末的农民起义领袖李自成。

“我们不要学李自成。”毛泽东意味深长他说。

然后，毛泽东穿着宽大的、土里土气的大棉衣进了北平，住进了中南海。

1948年4月30日，中共中央发布公告，庆祝“五一”劳动节，提出了“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主张。中国共产党的这一主张获得了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无党派民主人士及海外华侨的热烈响应。

从1948年8月开始，在中共中央有关部门和中共华北局、上海局、香港分局的组织安排下，一批又一批民主人士从香港、北平、天津等地和海外秘密来到解放区，参加新政协的筹备工作。

1949年4月21日，人民解放军胜利渡过长江，南京和其他江南大城市随后相继解放，国民党政府在大陆的统治宣告覆灭。几天后，蒋介石在溪口神情怆然地拜谒了祖宗墓庐。他知道，在他有生之年，是不可能再回来了。

1949年9月21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北平隆重

开幕。会议通过了《共同纲领》和其他各项决议案，选出 63 人组成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毛泽东当选为中央人民政府主席。

天安门广场的 28 响礼炮是一个象征，它表示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经过 28 年奋斗赢得了胜利。

1949 年 12 月 10 日，蒋介石从成都起飞，永远告别了大陆。他选中了与大陆隔海相望的台湾岛，去经营他的“复兴基地”。从此，一个并不宽阔的海峡，造成了两岸的分离。

20 世纪即将从我们面前消失，但它在四五十年代的凝重足音和辙迹，仍是那么铿锵和清晰。

毛泽东入主中南海，牵动着世纪风云的变幻。放在旧世界格局崩溃、新世界格局的开篇的大背景下，去回望当年瑰丽壮观的开国风云，人们不能不对历史的变迁产生深深的思考，并从中得到深刻的启示。

新中国这幕大戏的序幕，是从西柏坡拉开的。

## 第一章 毛泽东“进京赶考”

离开西柏坡前夕，雄才大略的毛泽东想了一夜李自成。“我们决不当李自成，我们希望考个好成绩。”毛泽东把大本营建在西柏坡，使这个普通的小村庄名扬天下。但他又说：“为了新中国，我们应该到北平。”滚滚烟尘中，中共最高领导人踏上了通往北平之路。

### 中共五大书记会聚西柏坡

有些没有任何特色的小地方，因为伟人的降临而出了名，甚至成了圣地，有些差不多被神话的伟人，他们每一指手、每一踏足都可能使一件普通的物件、普通的地方罩上神圣的光环。

毛泽东正是这样一位伟人，西柏坡也正是这样一个地方。

西柏坡是位于太行山东麓的小山庄，因多生柏树而得名。毛泽东把大本营建在这里，从而使这个村庄名扬天下，为世界所瞩目。

当时，这是华北大平原上的一个不足百户人家，景色清幽秀丽的普通的小村庄。

1948年3月21日，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率转战陕北的中央机关，从陕北杨家沟出发，东渡黄河，向晋察冀解放区转移。沿途他们听取了晋绥、晋察冀解放区领导人的工作汇报，并同部分县、区委书记座谈，调查了解各方面的情况。4月13日晚，中央机关到达河北阜平县城南庄。

5月27日，太阳快落山的时候，毛泽东从花山到了西柏坡。

1947年3月，胡宗南大举进攻陕甘宁边区时，朱德与刘少奇就率领中央工委来到了西柏坡。不久，董必武等人也来了这里。1948年4月下旬城南庄会议后，周恩来和任弼时等也到了西柏坡，与朱德、刘少奇会合。而今，毛泽东又来到此地。至此，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刘少奇、任弼时5位书记，全部会聚于西柏坡。

毛泽东还没有到达西柏坡之前，周恩来就已经把他住的地方安排好了，并察看了毛泽东的住房与周围的环境。当毛泽东乘汽车进入西柏坡村的大院，当时担任中央机关办公处副处长的叶子龙便把毛泽东径直领到了住处。

这个院里有两间北房，一间约16平方米，是卧室，里面有一张双人木板床，一个小沙发，一个茶几，一个小衣柜。相通的一间房子约20平方米，是办公室，里面有一套沙发，还有圆桌、茶几以及一张藤躺椅，墙上还挂满了地图。

此外，院里的两间西屋与两小间南屋，是毛泽东的书房和江青以及李的住的地方。前院还有水房及卫士值班的两个房间。周恩来和任弼时住在毛泽东住处的北面，朱德和刘少奇则住在南面。几位中央书记离毛泽东的住处都很近。

毛泽东等人安顿好后，叶子龙说：“这一带有好几个村子，每个村子里都住着中央机关的工作人员。这儿的老百姓非常好，为了给中央机关解决住房问题，老百姓都想尽办法，宁肯自己挤着住，也要把房子腾出来。这一带老百姓的觉悟很高，如果有什么事情，只要我们一提出来，他们就坚决去办。他们知道，现在离全国解放的日子不远了，个个都非常高兴，都愿意为最后彻底打败国民党反动派贡献力量。”

毛泽东听后，十分高兴他说：“我们在陕北的时候，陕北的老百姓非常好。我们到了河北，河北的老百姓也非常好，越是这样，我们越要努力工作，争取解放战争早日胜利。等革命成功了，让老百姓都过上好日子。”

## 通向北平之路

在西柏坡，毛泽东指挥了三大战役，和战友们一道迎来了新中国的曙光。中央认为，胜利已成定局，中央机关应当离开西柏坡，迁往古都北平。浩浩荡荡的队伍准备启程，长长的车队发出一片轰鸣。

这些日子，中央机关连日搬家，华北军区专门调来了一个汽车团日夜运输。这些大卡车全是美国造的十轮大卡，把简陋的乡村公路压得一个坑接一个坑，有的坑还又宽又深。

1949年3月23日，凌晨三四点钟，刚刚结束工作的毛泽东在上床睡觉前告诉值班卫士李银桥：“9点钟以前叫我起床。”而周恩来则悄悄嘱咐李银桥：“让他多睡会儿，没有关系。”

第二天上午近10点钟，李银桥才把毛泽东叫醒。毛泽东起床后问道：“几点啦？”

“快10点了。”

“让你们9点以前叫我，为什么现在才叫我？”毛泽东似有愠色。

“周副主席想让你多睡会儿，说休息不好，怕你路上太疲劳。”于是毛泽东不再说话，开始看一张新报。

这一天，中共七届二中全会的新闻公报要由新华社向全国发表。

这是一个晴朗的好日子，此时，屋外已是万道霞光，阳光灿烂。

11辆吉普及小卧车，10辆卡车停放在党中央的驻地，出发的一切都准备就序。

毛泽东吃过早饭，中共中央副主席刘少奇、周恩来及中共中央秘书长任弼时来到毛泽东的住处。

三个人边走边聊。刘少奇神情严肃、文静慈善，眼里常露出哲人般的沉思。他话不多，偶尔插几句，但他说的每一个字都显示出机敏和政治家的深思熟虑。

而周恩来则是另一种风格的领袖。他英俊潇洒，身材挺拔，他的智慧与魅力在他那个时代是难有人匹敌的。据说，在西安事变期间，宋美龄与周恩来晤谈后，曾感叹说，处于执政地位的国民党内无人能出周公之右。在国共两党的“楚汉之争”中，周恩来确实有着举足轻重的位置。

任弼时敦厚朴实，当时肩负中共中央秘书长的职务，实则是中共中央的大总管，这就决定了他是党内最忙的一位领袖。叶剑英曾说过：“他是我们党的骆驼，中国人民的骆驼，担负着沉重的担子，走着漫长的艰苦的道路，没有休息，没有享受，没有个人的任何计较。”任弼时是中央五大书记中最年轻的，又是身体最差的一个，脸上时常带着倦容。1928年、1929年，他曾两次被捕入狱，狱中非人的酷刑，严重损害了他的健康。

在他们身后，不声不响地跟着朱德。他个子不高，身体结实，一副平凡而和蔼可亲的相貌，额角布满皱纹。当那一对大大的眼睛专注地望着什么的时候，会闪动出非凡的智慧及果决的判断力。这位有着“红军之父”美誉的敦厚长者，已经为人民的解放事业奋斗了大半生。

五大书记之后是陈云、王稼祥、张闻天、李富春、李立三、杨尚昆、陆定一等，他们也先后从几个院落里走出来，说说笑笑地陆续登上了汽车。

毛泽东一只脚踏在吉普车上，风趣他说：“今天是进京的日子，不睡觉也高兴啊。今天是进京‘赶考’嘛。进京‘赶考’去，精神不好怎么行呀？”

周恩来笑着接过话题：“我们都应当考试及格，不要退回来。”

毛泽东语调沉了下来：“退回来就失败了。我们决不当李自成，我们都希望考个好成绩。”

吉普车徐徐启动，送行的群众依依不舍。毛泽东转过身大声地跟送行的干部及老乡话别：“同志们，老乡们，别难过，我们是胜利了啊！北平是个好地方，我们会在那里见面的。我们忘不了西柏坡人民的深情厚意。为了新中国，我们应该到北平，再见了！”

车队出发了，第一辆车坐着警卫员。毛泽东坐在第二辆美国产的军用吉普车上。同车的卫士有警卫排长阎长林、卫士王振海、李德华、李银桥、金武森、司机周西林。

第四辆小卧车上坐着刘少奇一家，第六辆中吉普里坐着周恩来一家，第六辆车上坐春朱德一家。

车队向着东北方向风驰电掣，在山间公路上扬起一片烟尘。

渐渐地，汽车扬起的尘土小了，毛泽东摘下挡风眼镜以及挡尘上的口罩，眺望着无垠的原野，陷入了沉思：

此时的蒋介石已经退居溪口老家，他在那里肯定呆不长，他会跑到台湾去的。广州，他没资格呆，西南，也没他的份，咱们呢，要进北平了！北平可不是准愿去就能去的地方。蒋介石可是有美国给撑腰呀，什么都是美国的，轮船、飞机、汽车、枪炮，就连我们坐的汽车也是美国的呢，通过蒋介石的手运给了我们。可是我们呢，什么都没有，连小米都吃不饱，可我们胜利了，小米加步枪硬是打败了飞机加大炮……民心向背呀，民心不可逆呀！想到这里，毛泽东高声地问卫士：“你们说，咱们走到这一步靠什么呀？”

卫士大声回答：“还不是靠民心，靠主席的领导。”

毛泽东点了点头：“对呀，靠民心！仗打完了就要开始建设了，八年抗战，三年解放战争，老百姓再也耐不住连年征战了。进了北平就得搞建设，才能争取民心啊！”

经毛泽东一引导，大家的情绪活跃起来了。

“现在又是3月份，为什么老在3月份咱们有所行动呢？你们记得这几次行动的时间吗？你们说说。”毛泽东又问卫士们。

“1947年3月18号我们撤离了延安！”一位卫士说。

“去年3月份呢？”

“去年3月21号，由陕西米脂县的杨家沟出发，向华北前进啊！”

“今天是3月23号，与去年3月21号只差2天，我们又出发向北平前进了。”毛泽东说，“3年3次大行动都是3月份。明年3月份应该解放全中国了。等全中国解放了，我们再也不搬家了。”最后一句，毛泽东说得特别认真，全车人都笑了起来。

毛泽东又问大家：“北平是要进的，但是没有想到这么快。你们想想，这是什么原因？”

阎长林说：“主席讲过，3年到5年打败蒋介石，5年以后打败蒋介石也很好啊，我们也没有想到，撤离延安两年就进北平了。”



毛泽东点燃一支香烟一边抽边对警卫战士们说：“咱们没想到，蒋介石更没想到。他天天想消灭我们，反而被我们消灭了。他向他的主子美国要钱，要物，要新式武器，把抗日战争时期留在大后方的军队拉出来，用美国武器装备起来，又用美国海上的轮船、陆地的汽车和火车、空中的飞机，把军队送到前线。蒋介石向美国夸下海口，要3至6个月消灭我们。他们人多武器好，又有物资保证，我们人少武器差，又缺吃少穿，什么都没有保证。但是，他没有能消灭我们，反而被我们打败了。这是什么原因呢？有什么奥妙呢？道理很简单。这就是因为蒋介石发动的战争是反人民的，是非正义的。人民反对蒋介石发动内战，人民也反对他再继续残酷剥削人民，压迫人民。人心向背，这就决定了我们必定胜利，蒋介石必定失败。”

汽车在高低不平的路上继续前进着，村庄、小河、果园不断地被抛在身后。车队经过的地方。所看到的人，要么是妇女和老人，要么是小孩儿，很少能看到青壮年男子。

阎长林看到这种情况，就对毛泽东说：“主席，你看，农村里几乎没有青壮年男劳力了，干活的都是妇女、上岁数的人和小孩子。”

毛泽东叹了一口气，说：“是呀，为了战争的胜利，农民们付出了巨大的代价。整个解放战争如果没有广大人民的积极支援，要想取得胜利是不可能的。所以在革命胜利后，我们的首要任务就是要恢复和发展生产，要让人民群众过上好日子。”

车上的卫士大多是河北人，他们不由自主地夸起平原来。说平原风光好，路也平坦，看得也远，打起仗来没有鞋穿也可走几天几夜。

毛泽东开头兴味盎然地听着，后来才慢悠悠他说：“你们讲平原的优点是事实，讲到山区的缺陷也是事实。但是你们忽略了重要的一条事实，那就是我们的革命是从山区发展起来的。你们想想嘛，中国革命战争的胜利是靠军队打出来的。我们的军队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弱到强，直到取得今天的胜利，这一切都是在山区和边远地区敌人不注意的地方，敌人不愿意去的或去不了的地方发展壮大的。山区对革命的贡献了不起呀！”

卫士们若有所思地点着头。

正说着，有名士兵前来报告，说陆定一和家人坐的车翻到了路坎下。

“人怎么样？”毛主席问。

前来报信的人说不上详情，毛泽东叫车上的警卫员跑步去看看。

还好，没有人受伤，只是大人孩子受了场惊吓，脸色发白。不过，还算平安。

翻下去的吉普车也被几个年轻人合力拉了上来。

毛泽东这才放了心。

周恩来对司机们说：“千万不要出问题，平地上开车更要注意安全。”

然后，周恩来上前，对站在路边的毛泽东说：“咱们现在休息一下，吃点东西吧？”

毛泽东诙谐地说：“我早就想休息了。你们要走，我一个人休息不是脱离群众吗？”

大家一起笑了起来。

于是，警卫员提来清凉的井水，给汽车擦了擦“脸”，然后在地上铺开绿色的雨布，开始了热热闹闹的野餐。

饭后继续上路时，车速却明显慢了。

华北平原上大沟小沟的黄土路确实不好走，原想当天可以到保定，但是却没有赶到目的地。

天黑之前，车队在唐县附近的一个村子宿营。

## 我们不当李自成

毛泽东睡在村民李大明家的用门板搭成的铺上。前半夜同村里的干部谈话，后半夜就坐在小凳子上，以门板当桌，写开了文章，直到东方发白。

车轮又开始转动，毛泽东的脑子也在转动。他转身问卫士：“知道历史上有李自成吗？”

一个卫士回答：“知道。”

毛泽东又问：“为什么他进了北京，又失败了，被人家赶了出来呢？”

卫士摇头。

1944年3月19日至22日，重庆《新华日报》第一次刊载了郭沫若的警世之作《甲申三百年祭》。这正是抗日战争最艰苦的岁月，胜利的曙光被敏锐的毛泽东看见了，同时，他也敏锐地意识到了郭沫若文章的深层内涵。

正当国民党顽固派在重庆“围剿”《甲申三百年祭》之时，延安却印发了这部著作，并大张旗鼓地进行宣传。毛泽东于4月12日在延安向党的高级干部作了报告：“近日我们印了郭沫若论李自成的文章，就是要叫同志们引以为鉴戒，不复犯胜利时的骄傲错误。”

和李自成一样，毛泽东和他的大多数战友也是从农舍里开始“造反”生涯的。而今，革命即将成功之际，会不会和李自成一样呢？这成为时常萦绕在毛泽东脑海里的问题。

许多年后，毛泽东看了老作家姚雪垠寄给他的长篇历史小说《李自成》第一部后，专门给湖北省的领导人打招呼，嘱咐给姚提供好的环境，让他安心写好这部书。

毛泽东的卫士们大多文化不高，读过高小能写信就是很不错的了。他们对李自成不了解，所以渴望知道李自成的故事。

毛泽东来了兴致，招呼大家坐下，然后讲起了李自成。

“李自成打进了北京，住进了皇帝的金銮殿，忙着做皇帝了。他的丞相牛金星张罗着登极大典，将军刘宗敏忙着刮地皮，严刑杀人，不讲政策了。当官的只知道享受，当兵的也吃喝玩乐。他们骄傲了，完全不顾北边还有清兵入关。明朝的将军吴三桂投降了清朝，领着清兵打进关来，他们还不赶紧抵抗。牛金星还在那里讲排场摆阔气，他是大轿门轱辘，洒金扇上贴内阁字，玉带蓝袍圆领，往来拜客，遍请同乡。刘宗敏也是一味蛮干，弄得北京城鸡飞狗跳。那还不失败？”进北京没多久，就被吴三桂赶出来了，一路被迫得屁滚尿流，连李自成也受了伤，最后被清兵追杀死了。李自成是农民领袖哩，好不容易取得了胜利，一骄傲就失败了，你们说，我们要不要当李自成呢？”

警卫们异口同声他说：“不当李自成，我们是共产党领导的队伍，还有主席亲自掌舵。”

毛泽东满意地点点头，又换个角度考他们：“北平可厉害呀，什么人都有，还有人哄你，给吃糖皮的炮弹，吃到肚子里才炸开呢。你不当李自成，人家会逼你当呢。”

警卫们响亮地回答：“我们时刻防着呢！”

毛泽东听了很高兴。他早在六届二中全会上就告诫全党：“可能有这样一些共产党人，他们是不曾被拿枪的敌人征服过的，他们在这些敌人面前不愧英雄的称号；但是经不起人们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他们在糖弹面前要打败仗。我们必须预防这种情况。”

他又鼓励战士们：“对，必须时刻防着，自己不变坏，别人也不能使你变坏。”

他又问身边的一个年轻战士：“你进了城想干什么工作呢？”

战士答：“我学开汽车，把汽车开得飞快，送大家上路。”

毛泽东笑了：“可不能开得飞快，街上人可多啦！”

战士憨厚地笑了：“那就听首长的，首长叫开多快就开多快，反正不能伤着人！”

“对喽！要时刻为群众着想。”毛泽东说，“进了城，我们就正式管理这个国家了，更要多为人民着想。李自成胜利了就忘记了人民，不然他是不会失败的。”

### 毛泽东反对净街

第二天上午，毛泽东一行到了河北省委所在地保定市。

汽车进入省委机关大院，省委书记林铁带领一班人迎候。午饭时，毛泽东坐在了上席的位于上。河北省委的领导干部都请毛主席讲话。朱德总司令也拿起筷子说：“说几句嘛。”毛泽东放下筷子说：“吃完这顿饭就进北平了。我们要再打硬仗，建设一个新中国……”他看了一眼桌上的饭菜，指着一盘清蒸鲤鱼说：“不错嘛，这鱼是哪弄来的？”

“白洋淀。”坐在毛泽东旁边的林铁回答，他把盘子朝毛泽东身边拉了拉。

毛泽东吃了一口清蒸鲤鱼说：“白洋淀大哟，有条府河通向那里，九河下梢嘛，有句话叫鱼过千层网，网网都有鱼。”

林铁十分钦佩他说：“主席知识渊博，无所不知啊！”

毛泽东笑了：“哪能无所不知呀，我这是从地理书上现炒现卖的。从前来过保定，也吃过白洋淀的鱼，只是鱼有千条，不如这条香呀！”

大家边吃边谈，突然一个人神色紧张地来到林铁身旁耳语了几句。林铁神色也紧张起来，拉着来人走向屋子一角。首长们马上意识到出现了情况，都停下筷子朝屋角望去。

“什么事呀？”毛泽东很平静地问。

“主席，没有什么大事。”来人敷衍他说。

林铁忙走到周恩来面前汇报：“周副主席，刚才毛主席被街上的人认出来了，现在满街都是人，要等着看主席和首长一眼。省公安厅怕出事故，提出是否净一会街。这里刚解放，情况复杂，我也怕出事。”

汽车进城前，毛泽东本来戴着眼镜和口罩，看到欢迎的群众，毛泽东兴奋得摘下眼镜向人群招手致意，被一位眼尖的行人认了出来。于是一传十，十传百，只一顿饭功夫，就引来了几万人围观。

毛泽东不主张驱赶群众，他轻松他说：“净街？净街干什么！看一看死不了人嘛。”

反应敏捷的周恩来把话题接了过去：“走，我们去看看去！”

周恩来与林铁及公安厅的人走出餐厅，朝院外一望，只见几万人安安静静地等待着，人头攒动，踮脚引颈朝院内张望，期待着见到自己的领袖。净街，毛主席不同意，但请毛主席出来见群众，又担心一时脱不了身，因为当晚必须赶到北平。

老练的周恩来拿出了折衷方案：“不要净街，那样会脱离群众，不能和国民党一样。你们对老百姓讲清楚，安排好一点，比如让主席的车改在第四辆，分散点注意力，另外多派点人维持秩序，不要让人群往前涌，这样行吧？”

公安厅的同志出门开始做群众工作，饭后听取省委汇报的议程照常进行。林铁在会上汇报了保定解放后几个月内省委所做的工作。

午饭小憩后，在几万群众的目送下，车队缓缓地驰出了保定城。

看到老百姓们欢呼雀跃的情形，毛泽东很高兴。刚才如果“净街”，就大拂了他的心意。他虽然要治理这个国家，但他不把自己当作“皇帝”，从没有高居于人民群众之上的思想感情；置身于人民群众之中，他有一种如鱼得水的欢欣。一路上，他不止一次触景生情地发出“人民伟大”的感叹。

### 毛泽东静悄悄地进了北平

毛泽东从保定出发到达涿县的时候，天已经黑透了。中央机关打前站的同志和涿县县委的同志打开了城门。

3月24日，新北平市市长叶剑英从北平城打来电话，说请毛主席与中央首长当晚乘火车进北平；第二天下午安排了西苑机场阅兵式，并邀请了各界人士。叶剑英说：“这也算我们对各界的欢迎吧。”

叶剑英与滕代远乘坐给毛主席准备的专列来到涿县，准备接毛主席进城。

叶剑英到时，坐吉普车从西柏坡到达涿县的毛泽东正在与河北的领导同志研究如何接管城市的问题。

叶剑英一进门，便把进北平的具体安排报告了毛泽东——坐火车进北平，经过丰台，停在清华园火车站。下火车后，坐汽车去颐和园，睡个午觉。下午在西苑机场阅兵。

毛泽东点头对这个计划表示同意。

之后，周恩来又与叶剑英具体研究了从涿县出发的问题。因为到达北平的当天下午要阅兵，并要与民主人士见面，时间太紧，火车必须于凌晨开出。

最后商定3月25日凌晨2点钟，毛主席等人先乘火车进入北平。中共中央进北平的整体行动由周恩来主管。

早在1949年的2月，进入北平的准备工作就已开始。中央五大书记之一的任弼时协助周恩来统筹，具体负责是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当时，还专门成立了中央转移委员会。毛泽东说：“党中央进北平，这是一桩大事，政治意义十分重大，是在党和军队胜利的历史上最有意义的事情，一定要计划好。”

毛泽东平时是不太过问这类具体事务的，它们都被周恩来安排得非常周密。而这一次，他强调了一句，是因为这是一件非做好不可的大事。他经常回忆过去，那些置于死地而后生的岁月已经刻骨铭心，难以忘怀。经历了那么多血雨腥风，马上就要从辗转几十年的农村搬到大城市去，这是要载入史册的历史瞬间。当然要计划好。而对警卫部队和执行转移行动的人们来说，

心里只有一个念头：豁出命去，也要保证毛主席和党中央的安全。

于是，中共中央、华北局、北平市委、北平市政府和北平驻军联合行动，为党中央搬家全力以赴。

这是中国共产党以主人公的身份从农村正式进入城市。中央社会部的同志传达了周恩来关于搬家的具体指示，成立了以北平市市长叶剑英为首的组织委员会。这个组织委员会除了叶剑英外，还有平津卫戍司令员聂荣臻、北平警备司令员程子华、第四野战军参谋长刘亚楼、中央社会部部长李克农。他们对党中央来北平的沿途警卫、对空警戒、阅兵以及城市庆祝等等都作了周密部署。

从唐县到涿县，由华北军区负责；涿县到长辛店，由四野的第四十二军负责；长辛店到西直门，由四野的第四十一军负责；西直门到香山，由李克农的社会部负责；对空警戒，包括西苑机场、香山等处的对空警戒，由刘亚楼负责。

当天，叶剑英、聂荣臻与李克农联名将转移计划电告西柏坡，并建议，为了保证中央首长的安全和休息，中共中央从西柏坡到涿县后改乘火车。

周恩来在请示了毛泽东后，于次日傍晚给北平市委发来电报：“同意来电所提的各项布置，我们预定24日晚宿涿县，请派一负责干部到涿县等候我们。由涿县到北平的专车可作准备。是坐汽车还是坐火车，等我们到涿县后再作决定。请你们仍作两种情况的准备。”

3月22日，叶剑英和李克农就铁路布置致电周恩来、任弼时、杨尚昆并报中央：“从涿县到北平清华园，共有12个站，约60公里，两小时内即可到达。现每站派负责人两名，一守电话，一盯道叉并监视车辆通过。在中央首长从涿县换乘火车进北平时，为保证安全，编为3个列车，每列车8个车皮。第一列车挂8个客车，载警卫部队和少数干部，警卫人员为压道车，到西直门站下车，然后用卡车将他们送至香山。第二列车挂8个卧车和一辆餐车，直开到清华园车站。第三列车挂5个客车和3个行李车，开到前门车站。”

在这个电报中，叶剑英和李克农强调，如要从长辛店乘汽车到西苑机场，必须从广安门穿过城区，经西直门后才能到达飞机场，别无更好的路线，所以拟乘火车为妥。

周恩来复电表示同意此方案。

3月25日凌晨，一列专车在涿县火车站引人待发。车厢里灯火通明，两条平行的铁轨平静地向北平延伸，等待着中央首长乘坐的火车安全通过。

凌晨2时，各位中央领导精神焕发地跨上了去北平的专列。

汽笛发出“呜”的一声长鸣，接着车轮滚动，火车呼啸，载着中国革命的司令部，载着中华民族的希望，风驰电掣地向前奔去……

火车上，陪行的叶剑英向毛泽东等领导人介绍说，北平所有的名胜古迹，都得到了保护，没受到任何损失和破坏，城市里的生产和生活一切照常，北平的男女老少都称赞北平的和平解放，说共产党伟大，解放军英勇。叶剑英还说，北平和平解放后，不少民主人士来到了北平。也有不少民主人士来信来电，表示拥护共产党，要与共产党更好地合作，希望共产党在北平成立全国性政府，更好地宣传争取更多的爱国进步人士。

他还介绍了北平解放时，老百姓兴高采烈、欢天喜地迎接人民解放军进城的情景。他激动他说到，部队从前门大街行进到东交民巷时，队伍雄壮、整齐、威严。过去，东交民巷是外国人的租界地，中国人是不能随便进入的。

人民解放军却开进去了，它向所有帝国主义和各国政府表明，中国是中国人民的中国，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再也不受外国人的欺侮和侵略了。

毛泽东听了很高兴他说：“工厂照常生产，商店照常营业，学生照常上课，和平解放的城市一切都照常，这就好了。要对我们参加军事管制的人员讲清楚，我们不但能解放大城市，我们还要能管理好大城市。我们人民解放军和全体党政干部，学会管理城市工作和学会做经济工作，在当前来说非常重要。”

周恩来说道：“我们在延安山沟里的时候，既没有大城市，也没有大工业生产，许多外国朋友，包括美国朋友和国民党统治区的民主人士，直到蒋介石政府里的高级官员，像张治中将军这类人，都称赞我们不仅能打仗，将来胜利了，也完全能管理好大城市，管理好国家经济。因为他们看透蒋介石集团大腐败了，离开了外国人就活不下去。我们没有管理过大城市，但是我们看到蒋介石管理大城市那一套办法不行，我们如果管理大城市，我想一定比他们管理得好。”

几个人正在谈论着，叶剑英往外一看，说：“卢沟桥快到了。”

听叶剑英这么一说，毛泽东、周恩来等都忙往窗外看。由于天色已暗，只模模糊糊看了个大概。

列车飞奔，一会儿便驶过了卢沟桥。毛泽东等人又继续交谈起来。

火车过了丰台车站之后，叶剑英又对大家说：“再过不远就能看到北平的城墙了，我们就算到了北平城了。”

听说快到北平城了，大家都高兴地往外看，果然看到了高大巍峨的北平城墙。

叶剑英感慨他说：“我过去到过北平，那还是在军调部工作的时候。那时在北平，和国民党的代表面对面地斗争了一年多。这一回，我是比你们先到了北平。这一次到北平，和以前到北平可大不一样啊，心情也不一样，环境也下一样，所担负的工作也完全不同了。”

毛泽东说：“我以前也到过北平，到现在整整30年了……”

对毛泽东来说，他这是第三次到北平。第一次是1918年。那时的毛泽东还是一个孜孜以求探寻真理的25岁的青年。第二年他又进北平。当他56岁三进北平时，已是一代人民领袖，受到万民的欢呼：他不能不对此感慨万端。

对党中央进北平，《人民日报》发表了它的第一个号外：“毛主席已到达北平”。

“毛主席到北平啰！”“看号外，毛主席来了！”路人纷纷抢购，仅4分钟的时间，号外被一抢而空。北平城看到号外的、没有看到号外的，都在争议毛泽东，从大学教授到人力车夫，都谈起了毛泽东的传奇、性格以及爱好。

在北京大学，一位姓郭的门房与一位姓王的图书管理员拿着号外回忆道：“他曾经在这间屋子里工作，就坐在那张桌子旁边，整理报纸和杂志……”

王管理员盯着那张桌子兴奋他说：“是的，是的，我想起来了。我最后一次见到他已有30年了，从他的照片上看，他是胖了一点，那时可瘦啦。”

二人又一起上楼，去观看当年毛泽东下班后读书的阅览室。郭门房说：“就在这里。30年前他就坐在这把椅子上，埋头读报，看书，读呀读呀，一读就是一整天。”

王管理员感慨道：“当时谁知道啊……毛先生现在是全国最了不得的人

物！”

郭门房激动他说：“莫说全中国，他的姓名全世界都是响的啰！”

3月25日晚，新华社向全国播发了毛泽东和党中央胜利到达北平的消息。

在溪口老家的蒋介石听到这个消息，沉重地叹了一口气，无奈他说：“我们的情报都干什么去了啊？”

### 西苑阅兵，毛泽东仍穿着老棉裤和布棉鞋

按照计划，毛泽东到北京后要参加阅兵。说来令人难以置信，当时他和其他中央领导人却没有适合在这时穿的衣服，大家仍然穿着老棉裤和布棉鞋，外面披着在延安时穿的皮大衣，显得臃肿而土气。好在这些领袖们已经过惯了延安时期的艰苦日子，没有任何人为将要参加阅兵而埋怨身上衣服的土气。

周恩来到西苑机场察看之后回到颐和园，决定下午3点半从颐和园出发，到西苑机场阅兵。他说，这段路一般要不了一个半小时，但路窄人多，马车也多，路上可能耽误时间。但不管怎样，我们一定要按时到达。城里人一般时间概念强。我们这次是进城的第一天，一走要按时到达。

按照周恩来的安排，下午2时过吃午饭，之后休息一会儿，然后准备出发。出发前，周恩来说，检阅部队之后，再会见各界群众代表及各党派的领导人，因为时间的关系，加上人数大多，不多谈话，只是问候一下各党派领导人和知名的民主人士，以后有机会再与他们详谈。

下午3点，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乘车出发。

到达西苑机场时还不到5点。大家先进休息室休息了一会儿，然后在叶剑英和聂荣臻陪同下，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和任弼时，乘敞篷吉普车开始检阅部队。

受检阅的有一个炮兵师、一个装甲坦克师、一个步兵师，共3万人。战士们顶着寒风，站立在西苑机场上，内心非常激动，等待着他们敬爱的领袖的检阅。

当领袖们的汽车从受阅部队前面缓缓通过时，战士们激动地高呼：“毛主席万岁！”“共产党万岁！”

面对这些从枪林弹雨中冲杀出来的士兵，面对这些为中国的解放不惜抛头洒血的人们，无论是毛泽东、朱德还是周恩来，都显得分外激动。毛泽东频频向战士们挥动手臂，朱总司令则抬臂还礼，久久没有放下。

毛泽东等检阅部队之后，又接见了北平市民代表。机场上万人头攒动，人声如潮。当毛泽东走下吉普车时，人们齐声高喊：“毛主席万岁！”

面对如此热烈的欢呼，毛泽东神情激动，但他没有说话，他还不习惯这种场面和欢呼。他习惯地举起右手挥了又挥，眼睛却已湿润。

“人民万岁！”毛泽东用只有他周围的人才能听到的声音喊了一声。

在离市民代表很远的地方站着100多名民主党派及民主人士的代表，他们有的身着长袍，有的留着长胡子，更多的人戴着眼镜，穿着朴素，如同私塾老先生。

毛泽东笑着朝他们走去。

“主席好。”《甲申三百年祭》的作者，被毛泽东称为“沫若兄”的郭

沫若，首先迎上来问候。

“都好，都好。”毛泽东十分随和。

“这是谭平山先生。”郭沫若介绍他身边的人。

“认识，认识。”毛泽东握着谭平山的手说。第一次国共合作时他俩在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担任要职，谭平山任组织部长，毛泽东任宣传部代部长。

“这是许德珩先生。”

“也认识，也认识。”

“那李济深先生更认识了？”郭沫若说。

毛泽东上前一步握住李济深的手说：“当然，李老先生一生为国奔走，也为共产党帮了不少忙，老朋友了。”

李济深低头行礼。毛泽东轻轻拍了拍他的肩膀说：“都是老朋友了，就免了罢。”

“毛主席、朱总司令好。”沈钧儒也走上前来与毛泽东、朱德分别握了手。

一位老先生也是毛泽东的老朋友，他说：“主席，你胖了！”

毛泽东风趣他说：“反动派让我变瘦了。现在他们被打跑了，我又长胖了。”

“主席，请站好，还要拍一段电影记录一下呢。”郭沫若张罗着。

毛泽东拉住郭沫若的手让他站在自己的右边，又拉住黄炎培的手让他站在左边。一阵“咔嚓”声中，许多动人的镜头被拍了下来。

接着毛泽东发表了简短演说：“我们已经获得了基本的胜利，过几天南京政府将派和平代表团来北平。我们的意见是国民党必须答应我们的八项条件。

“现在，虽然国民党已经做好了打的准备，我们也迟早要渡过长江去，但只要接受八项条件，我们还愿意坐下来谈判。不管和也好，打也好，我们今后的主要任务将是建立一个怎样的政府。各位老先生和我们肝胆相照，风雨同舟，今后，共产党还将和以前一样，和诸位一起建设新中国。”

民主党派的领袖们听了这些肺腑之言，纷纷夸耀毛主席“真伟大！”“是无敌于天下的英雄！”

毛泽东挥挥手，不安地打断这些称颂，说：“我不是什么英雄，真正的英雄是人民。”他指了指远处的一万多市民代表。

半个多小时过去了，周恩来看了看表，大声说：“朋友们，先生们，谢谢大家到这里来欢迎毛主席、党中央和人民解放军总部进驻北平。天快黑了，请诸位先生早些回去休息吧，以后有机会再谈，以后见面的机会多得很，我们将在一起共事……”

毛泽东、中共中央机关进入北平的消息，如同和煦春风，迅速吹遍神州大地。

远在瑶岗的渡江战役总前委指挥部里，此时正是一派紧张纷忙的景象，参谋人员们进进出出，电话声不绝于耳。邓小平坐在桌旁，专心致志地处理着一封封电报文件，嘈杂之声并不能使他分神。他面容消瘦，眼窝深陷，刚刚结束的淮海战役，严重消瘦了他的身体。

邓小平拿起一封电报，一下子扬起眉梢，嘴角漾起笑容。他高声说：“好嘛，毛主席、党中央昨天下午进北京了！”



北京与北平，一字之差，其意义尽在不言中。

邓小平悄悄走出指挥部，独自一人来到村陌田畴，身后只有一个警卫员远远跟着。这位度过了血雨腥风岁月，饱经政治风云变幻的革命家解开衣扣，任春风吹拂着他的胸膛。

他是一个性格内向的人，平日里沉默寡言。那封通报毛泽东、党中央机关进入北平的电报，在他心中掀起了感憎的巨澜，但他宁愿用冷静、理智的思索代替感情的宣泄。

他从未到过北京，但数月后他到北京参加了开国大典。在指挥他的部队进军西南，并主政南京数年后，邓小平再一次到了北京，并进入了共产党的最高决策圈子。

又经过数十年的风风雨雨之后，他导演了中国的改革开放，和毛泽东一样，再一次让世界对中国刮目相看。

## 第二章 蒋介石梦断金陵

战场的节节失利和李宗仁桂系的“逼宫”，蒋介石陷入四面楚歌的境地。毛泽东豪迈进入北平之际，蒋介石黯然宣布下野。然后他当起了“搬家总管”。

### 杜鲁门总统希望中国走马换将

到1948年底，中国的战局已经非常明朗——国民党山穷水尽，共产党则意气风发，乘胜追击。多年来一直充当蒋介石后台的美国，终于意识到这位中国的独裁者已经失去了人民的信任，同时也将失去江山，于是暗中玩起了“走子换将”的把戏；以李宗仁为首、长期与蒋介石面和心不和的桂系的将领们，认为丢失江山的责任均在蒋介石，他必须对国民党的失败负责，因此公开和私下里都在对蒋“逼宫”。在此情形下，蒋介石迫不得已宣布“下野”。“我的下野，并不是因共产党，而是由于本党中的某一派系！”

得意和失意，总是交替上演。

正当毛泽东和他们战友们满怀胜利的喜悦，风驰电掣地向北平进发的时候，那位几十年的对手，曾经不可一世的“委员长”蒋介石，却带着儿子和一群铁杆心腹，凄凄凉凉地呆在奉化溪口——那个他政治上失意时总要回去的避风港。

1949年1月1日，20世纪40年代的最后一个元旦，对共产党和国民党来说，都具有非凡的意义。

太阳升得老高时，才从云缝中射出几道柔弱无力的光线，给南京这座古城抹上一层暗黄色，而空气却沉闷得让人感到压抑。街上一群报童边跑边发出叫卖声：“喂，卖报！卖报！报上有好消息啦！总统发布了新年文告，大家快看啦！”

坐在汽车里经过街头的蒋介石，心中一阵酸楚。

“咳，内外交困至此，命乎？运乎？”

蒋介石面对的，一是共产党强大的军事压力，二是桂系的“逼宫”，三是美国人的见死不救，落井下石。

一想到可恶的美国人，蒋介石忍不住在心里骂了一声：“娘籍匹！”

长期援助国民党的美国人早就对蒋介石不满。1947年夏天，美国总统特使魏德迈来华调查了一个月。在他离华前夕，蒋介石于8月24日在南京黄埔路官邸设茶会欢送，却没想到魏德迈在茶会上宣读了一篇声明，给蒋介石浇了一盆冷水。

魏德迈在讲话中不无傲慢，甚至无礼地讽刺南京政府“腐败”，官员们“麻木不仁”，“贪污无能”。

蒋介石听得冷汗直冒，可魏德迈还没有打住，他直截了当地说：“中国的复兴，有待于富有感召力的领袖。”明显透露了杜鲁门总统要走马换将！

听到这句话，蒋介石心头不觉一凉，但一想到中国有感召力的领袖非他莫属，他又放下心来。却没想到美国方面还确实如魏德迈所言，在期待“富有感召力的领袖”，而非他蒋介石。这个人就是桂系的头领李宗仁。美国大使司徒雷登在给国务卿马歇尔的秘密报告中说：“象征国民党统治的蒋介石，资望已日趋式微，甚至被目为过去的人物，……李宗仁的资望日高。”

蒋介石得知美国要扶植李宗仁代替他，十分恼怒，却又无可奈何，于是

又使起“夫人外交”，于1948年11月28日派夫人宋美龄去美国走动。然而宋美龄的这一趟却受到了冷落，美国既不派军队，也不给钱，气得蒋介石暴跳如雷。恰在这时，传来了他的军队在淮海战役惨败的凶讯，于是，内外交困的蒋介石作出了下野的决定。

12月4日晚，蒋介石召见亲信吴忠信，要他担任总统府秘书长，由他“辅助”李宗仁。他说：“观察最近内外形势，我干不下去了。我走开后，势必由李德邻来维持。你就帮德邻上轿吧？等他上了轿，去留由你自己决定。”

12月16日，蒋介石派张群、张治中、吴忠信到李宗仁住处，与李商谈蒋介石下野之事。经两次会谈，蒋介石提出下野与和谈方案：1、蒋总统为便于政策的转变，主动下野；2、李副总统代行总统职权，宣布和平主张；3、和谈由行政院主持。

桂系的实力派白崇禧反对这个方案，他在武汉打电话告诉李宗仁的秘书长，蒋介石必须辞职，由李德邻正式就任总统，不能用代理名义。

桂系步步紧逼。12月24日，白崇禧发通电致张群、张治中转蒋介石，提出与中共和谈的建议，呼吁和平。

李宗仁也紧抓和平旗帜，宣布五项和平主张：1、蒋总统下野；2、释放政治犯；3、言论集会自由；4、两军各自撤退三十里；5、划上海为自由市，政府撤军，由各党派派人组织联合政府。建议在上海进行和谈。

程潜也发通电要求蒋介石下野。

而白崇禧趁热打铁，又于12月30日再次通电呼吁和谈，还发动湖北省参议会通电助威。河南省主席张轸也通电主和。

四面楚歌，风霜刀剑严相逼，气得蒋介石直骂娘。此时，他最痛恨的人是白崇禧，当着张群、吴忠信、阎锡山的面骂道：“白健生这个狗头军师，在湘鄂豫三省勾结一气，要我好看。好！我下野，看他们的！”余怒未消之际，他又用手指了指世界地图上北美洲地区，说：“这一切的根子是在那一边！”

张群、吴忠信、阎锡山全部沉默不语，蒋介石看了看他们，摇摇头，瘫坐在沙发上。

12月31日晚，蒋介石召集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等40多人便餐。饭后，蒋介石以低沉的语调，冷冷地说道：“现在局势严重，党内有人主张和谈。我对于这样一个重大问题不能不有所表示。现已拟好一篇文告，准备在元旦发表。现在请岳军朗读一遍，征求大家意见。”

文告是总统府政务局长陈方主笔的。自“文胆”陈布雷自杀后，蒋介石的一些讲话和文告便由陈方执笔。

张群站起来，开始念文告。厅里一片寂静。

副总统李宗仁坐在蒋介石的右边。文告念完后，蒋介石侧目问李宗仁：“德邻兄对文告有什么意见？”

李宗仁平静地回答：“我与总统并无不同意见。”

突然，有人嚎陶大哭：“总统不能下野呀！总统啊，你不能走！”

大家的眼光一扫，原来是国民党中央常委谷正纲，此人乃是CC派的核心人物、蒋介石的忠实追随者。

谷正纲的哭声还未止住，另一个中常委张道藩也站起来大声嚷嚷：“现在是非常时期，总统无论如何也不能下野……”

宴会厅里的气氛变得紧张起来。有人私下谈论：“总统下野谋和，倒也

孚众望呀！”“下野求和，也不妨试试看！”……

这时，谷正纲止住哭泣，说：“我反对发表这个文告。因为在这严重的局势面前，这种文告会对士气民心产生极不利的影响。”

张道藩也接着说：“如果文告一定要发布，也要把文告中关于总统引退的字样去掉，以免引起外界误解，涣散人心。”

蒋介石见有人哭诉着反对自己下野，心中十分感动。他尖刻他说：“我并不想下野，也并不愿离开！是你们党员要我离开！我的下野，并不是因共产党，而是由于本党中的某一派系！”

李宗仁知道蒋介石是在发泄对桂系的不满，但他依然保持着沉默。

蒋介石又侧过头看了李宗仁一眼，说：“就当前局势的严重性看，我不能再这样干下去了，由你任总统一职。但我走以前，必须把一些事交待一下。”

接着，他又不高兴他说：“告诉白健生，以后不要再发什么通电了，以免动摇民心军心。”

李宗仁表示：“还是总裁英断，我怕难以应付目前的局势。”

蒋介石没有对李宗仁再说什么，而转头对张群说：“这份文告明天发布出去。”

总统府的宴会在一派惶然中终场。

蒋介石说，他5年之内不干预政治。

临离开南京之前，蒋介石来到中山陵拜谒孙中山的陵墓。

汽车已到了紫金山下，而蒋介石还在闭目沉思，蒋经国把头伸过去，轻声说：“父亲，该下车了。”

蒋介石“嗯”了一下，睁开双眼。

俞济时打开车门，蒋介石一步跨出来，独自走在前面，一步一步地向中山陵爬去。

严冬季节，寒气逼人。

陪同的人群跟着蒋介石默默地走着。大家到了中山陵，行了礼，又默默地向山下走去。

在蒋介石谒拜中山陵时，李宗仁正在南京傅厚岗69号副总统官邸同前来拜访的张治中及总统府秘书长吴忠信谈话。

吴忠信说：“昨晚在总统官邸的宴会上，CC派人物气势很嚣张，谷正纲话中带刺，对文白兄（即张治中）有所影射，会场秩序很乱，连总裁都几乎压制不住。这意味着CC派以后仍要捣乱，请德公对此要特别留意。”

李宗仁听吴忠信这么说，心底掠过一丝感动。他笑着说：“CC派人物是不会赞成蒋先生‘引退’的。”

元旦节的黄昏，蒋介石不顾一天奔波的疲劳，召见俞济时，向他口述发给武汉白崇禧的电报：

亥敬、亥全两电均悉。中正元旦文告，谅荷阅及，披肝沥胆而出，自问耿耿此心，可质天日。今日吾人既已而吐精诚，重后和平之门，假令共党确能幡然悔悟，保国家之命脉，顾民生之涂炭，对当前国是能共商合理合法之解决，则中正决无他求；即个人之进退出处，均惟全国人民与全体袍泽之公意是从。惟言和之难，卓已见谭。如何乃可化除共党赤祸全国之野心，以达成保国保民之利；如何乃可防止共党翻云覆雨之阴谋，以免战祸再起之害。

想兄熟虑深筹，必已有所策划，甚冀惠示其详，俾资借镜。今大计虽已昭明，而前途演变尚极微妙。望兄激励华中军民，持以宁静，借期齐一步骤，巩固基础，然后可战可和，乃可运用自如，而不为共党所算，则幸矣！

蒋中正  
民国三十八年元旦

没想到白崇禧读了蒋介石的文告和蒋介石的电报后，却并未罢休，他继续逼蒋介石下野。

1949年1月2日，白崇禧派韦永成从汉口飞到南京，与李宗仁联络，指出蒋介石在新年文告中提出的五个条件实际上为和谈故设障碍，施以缓兵之计。白崇禧要李宗仁到汉口去商谈和平大计。

之后，河南、湖北两省参议会继续发电通电，要求停战言和。河南省议长刘积学在通电中明确提出“敢请即日引退，以谢国人；国事听国人自决”的要求，在各地传诵一时。

蒋介石看到形势对自己越来越不利，便于1月4日上午破例“御驾”傅厚岗李宗仁的官邸。

一见面，蒋介石就直率地问：“你看现在这局面怎么办？”

李宗仁平静地回答，“我以前就向总统建议过，武汉和徐州应划为一个单位，统一指挥。今日挫败的原因虽多，而最大的毛病是出在指挥不统一之上。”

蒋介石摆摆手说：“过去的事情就不必再提了。徐、蚌失败后，共军立即就要到江北，你看怎么办？”

李宗仁答：“我们现在样样都占下风，但是也只有和共产党周旋到底，走一步算一步！”

蒋介石摇摇头说：“这样下去可不是一回事！我看我退休，由你顶起这局面，和共产党讲和。”

李宗仁故意说：“你尚且不能讲和，那我就更不行了！”

听了这句话，蒋介石表示：“你担当起局面，情形马上就不同了。我看你还是出来，你这姿态一出，共军的进军就可缓和一下。”

李宗仁仍然拒绝道：“总统，这局面如你支持不了，我就更支持不了。无论如何，我是不能承当此事的。”

这时，蒋介石露出一副诚恳的样子说：“我全力支持你。你出来之后，共产党至少不会逼得我们这么紧！”

但李宗仁仍没答应，蒋介石只好打道回府。次日，他又派张群和吴忠信来找李宗仁，劝李继任总统。

李宗仁明确表示：“如今的局势不是民国16年那时的情况了。我看，蒋先生下野，未必就能解决问题。”

谈了一上午，张群、吴忠信也未得到结果，只好无功而返。

几天过后，蒋介石又召见李宗仁。李宗仁仍表示拒绝出来继任总统，蒋介石搬出“宪法”说：“我以前劝你不要竞选副总统，你一定要竞选。现在我不干了，按宪法程序，便是你继任。你既是副总统，不干也得干！”

李宗仁见蒋介石用“宪法”条文压自己，态度立时软了下来，他说：“按宪法，我是无法推辞。但是现在的局面，你尚且干不了，我如何撑得住？”

“共产党是绝对不同我讲和的，”蒋介石说，“你出来，最低限度可以变一下。”

“我出来，共产党要我无条件投降！”李宗仁一副无可奈何的样子。

蒋介石表示：“你谈谈看，我支持你，做你的后盾！我做你的后盾！”

李宗仁不是不愿做总统，而是不愿做无职无权的总统。蒋介石也看出了这一点，他故意说：

“你放心地出来干吧，我保证五年之内不干预政治！”

此语一出，李宗仁被感动了。

### “美龄号”凄怆地告别南京

中国的一代枭雄，此时已经处于惶然和惊惧之中。曾经是恣意妄为的蒋介石，现在却神情黯然，忧心忡忡，常常闭目沉思，有时甚至一整天不说不一句话。

蒋介石在千方百计“劝”李宗仁继任总统时，也密切关注着外界对他发表的元旦文告的反应。

1月5日，张群向蒋介石报告说：“总统，中共对你的文告有反应了。”蒋介石忙问：“反应如何？”

张群呈上电稿：“请总统过目。”

蒋介石接过一看，是新华社发表的一篇评论，标题为《评战犯求和》。

“为了保存中国反动势力和美国在华侵略势力，中国第一号战争罪犯国民党匪帮首领蒋介石在今年元旦发表了一篇求和的声明。……人们不要以为战犯求和未免滑稽，也不要以为这样的求和声明实在可恶。须知由第一号战犯国民党匪首出面求和，并且发表这样的声明，对于中国人民认识国民党匪帮和美国帝国主义的阴谋计划，有一种显然的利益……”

蒋介石看到最后几行文字时，长长地叹了一口气，有气无力地靠在沙发上。那几行文字说：

“蒋介石已经失了灵魂，只是一具僵尸，什么人也不相信他了。”

蒋介石又长叹了口气，问起了美国的反映。现在的蒋介石，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关注美国对他的态度，而美国方面更是注视着蒋介石的一举一动。

1月3日，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在给美国国务院的报告中，转报了蒋的文告，并评论说：

“对此文告之初步印象甚佳。文告内容庄严，且有和解之倾向，对共产党之侮辱亦较平时少……但经研究后，该文告是显露严重之缺点。该文告为一过于冠冕堂皇之文章，含有一个强大的统治者以仁慈口吻对待其厌烦叛徒之意味，是以忽略若干不愉快之现实：即军事力量几已全部崩溃，最近经济措施之失败，几乎举国一致对和平之祈求，与在蒋氏执政期内此种和平之不可能。另一缺点则更为严重，即在某一意义上，彼已表示让步，但并未给予充分之退让。”

1月5日，司徒雷登派私人顾问傅泾波拜访李宗仁，对他说：“美国驻华军事代表团团长巴大维将军闻悉蒋总统有放弃大陆经营台湾的计划，巴大维为此事曾与司徒大使商议。司徒大使想知道李将军的意思。”

李宗仁听了这活大吃了一惊。蒋介石要放弃大陆经营台湾，自己怎么一点也不知道？

其实，在李宗仁和白崇禧等人为蒋下野奔忙的时候，蒋介石已在为撤守台湾做准备了。

1月5日，蒋介石在黄埔路官邸召开宣传工作会议，参加的人有蒋经国、陶希圣、黄少谷、李俊龙、李惟果等。

在会上，蒋介石把白崇禧的“亥敬”、“亥全”两电及他答复的“子东”电交各人传阅，并就和谈问题征询意见。

有人建议：最近湖北、河南两省民意机关连续发出通电，对和平有所主张，中央最好派一大员赴汉口同白崇禧就和谈问题以诚相商。

蒋介石表示：“这个意见行，就劳驾岳军先生跑一趟。”

1月6日，张治中受命来见李宗仁。

张治中说：“蒋先生将于9日派张岳军赴汉会晤白健生，就当前局势问题进行洽商。”

“蒋总统还有其他打算没有？”李宗仁问。

张治中回答：“蒋先生现在对内对外都进行了一番部署，比如电邀刘文辉来京，告以经营四川的必要，还打算派张岳军人川主持一切。在外交方面，蒋先生接纳白健生上月24日提出的建议，请美、英、法、苏四国政府‘调解’国共战争。看他的想法，似乎还想继续坐在总统的位置上。但一般观察家，甚至包括CC派谷正纲之流，也认为蒋下野只是个时间问题。”

在武汉的白崇禧很快得到张群即将赴汉的消息。1月7日晚，他连续4次打长途电话到南京找程思远，让他找到隐居在上海的桂系将领黄绍竑，请他与张群一同赴汉。

1月9日凌晨，黄绍竑抵达南京，立即与张群飞武汉。

白崇禧见到张群后说：“我于上月发两电所待的主张，都是备战谋和，并不是无原则的妥协投降。”

张群说：“蒋先生也就是强调这样一个意思，我们可和而不可降，能战而后能和。看来中央和地方并无意见分歧。”

11日，张群从汉口飞抵长沙，见到也是桂系的程潜，征求谋和的意见。12日，张群回南京。

可是这时候，战场上的形势对国民党一方越来越不利，甚至可以说是灾难性的。

1月上旬，被围在陈官庄地区的杜聿明集团，被人民解放军全部歼灭。

蒋介石听到这个消息后，十分忧伤。他在日记中写道：“杜聿明部今晨似已大半被匪消灭，闻尚有3万人自陈官庄西南突围，未知能否安全出险，忧念无已。我前之所以不能为他人强逼下野者，为此杜部待援，我责未尽耳。”

蒋介石知道杜聿明被歼后，他的下野问题又会重新成为人们议论中心，于是加紧了活动。

1月8日下午，蒋介石在黄埔路官邸召集孙科、张群、张治中开会，商量如何运用外交促成和谈的问题。

会后，孙科按蒋的意旨，派行政院副院长兼外交部长吴铁城出面，照会美、苏、英、法四国，希望四国政府施加压力，促成国共和谈的实现。

晚上，程恩远受托把白崇禧的“亥敬”电抄给孙科一阅。

孙科阅后表示：“国共之间的武装冲突，系中国内政问题，不便请外国参加干涉。此次给四国政府照会，只是请他们从旁边赞助，以使国共双方代表能够聚首一堂，进行谈判。”

1月2日，美国驻华使馆把美国政府的答复转交吴铁城。美方答复是：“在当前憎势下，由美国政府出作调停人，实难相信可达到任何有益的结果。”

苏、英、法三国政府对国民党政府外交部的照会请求，也婉转地拒绝了。三国一致表示：这是一个由中国人自己去解决的问题。

外交努力失败后，蒋介石真的慌了。强使自己镇定下来后，他开始走他的第二步棋。

10日，蒋介石派蒋经国持他的亲笔函去上海找中央银行总裁俞鸿钧，令俞马上把中央银行所存的黄金、白银和外汇全部转存台湾。

12日，蒋介石又派蒋经国和总统府第三局局长俞济时、警卫组主任石祖德、参军施觉民、警卫部队长任世桂及通讯总队长等人，一同赶到奉化溪口镇，布置警卫网和通讯网，为蒋介石“退居”溪口、实行幕后操纵作准备。

针对蒋介石将上海中央银行存款移送台湾的做法，白崇禧大为不满，于1月13日将汉口中央银行由粤汉路运往广州的银元中途截回。

消息传到南京，蒋介石大骂不休，可是又无可奈何。

1月14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发表关于时局的声明，提出国共谈判的八项条件：

- (一) 惩办战争罪犯；
- (二) 废除伪宪法；
- (三) 废除伪法统；
- (四) 依据民主原则改编一切反动军队；
- (五) 没收官僚资本；
- (六) 改革土地制度；
- (七) 废除卖国条约；

(八) 召开没有反动分子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接收南京国民党反动政府及其所属各级政府的一切权力。

1月15日下午，蒋介石在南京黄埔路官邸召集张群、张治中和吴铁城举行会议，讨论中共方面提出的八项条件。

蒋介石在会上宣布：为求内部团结起见，对中共的八项条件暂不表示态度，首先征求各省党政人员的意见。

晚上，蒋介石接见司徒雷登，告之中共提出的和谈条件以及南京政府的打算。

可此刻司徒雷登关心的，是蒋介石的个人进退和是否下野的问题，而蒋介石对这个问题却保持沉默。

16日下午，蒋介石召见中央银行总裁俞鸿钧和中国银行总经理席德懋，命令他们把两行存在美国的外汇，化整为零，存入私人户头，以免将来和谈成功，民主联合政府成立时予以接收。

于是，国家一笔巨大的外汇款项，装入个人腰包。

晚上，蒋介石约张君勱、左舜生、张群、吴铁城、张治中、邵力子、陈立夫、王世杰等人来黄埔路官邸赴宴，交换对中共八项和平条件的意见。

邵力子说：“中共提出的八项和平条件，国民党可以接受。也只有接受，才能开始国共谈判。”

CC派头子陈立夫听了邵力子的发言后，立即站起来指责道：“我反对。我认为接受中共八项条件，就是主张向中共无条件投降。”



张治中赶忙打圆场：“今晚我们主要是向党外人士垂询意见，不要相互指责。”

张君勱言说：“局势已到今天这个步骤，蒋先生还是应考虑考虑下野引退的问题。”

蒋介石听了邵力子、张君勱的话后，板着脸孔一句话也没说。

17日，李宗仁决定赴汉口与白崇禧商议搞一个和平运动，逼蒋介石下野。次日，程思远乘一架军用飞机去汉口通知白崇禧做准备工作。

18日，蒋介石命令把京沪警备司令部扩编为京沪杭警备司令部，并委任汤恩伯为总司令。

19日，蒋介石发布命令，任命张群为重庆绥靖公署主任，朱绍良为福州绥靖公署主任，余汉谋为广东绥靖公署主任、陈诚为台湾省主席兼任台湾警备总司令。同时宣布改组广东省政府，由薛岳代替宋子文任广东省主席。

经过一番紧张布置，蒋介石可以放心“引退”了。

19日上午，蒋介石召见李宗仁商谈时局，表示了“引退”之意。

李宗仁心里暗暗高兴，他以很和善的态度说：“我会根据总统的意旨办事，接任时间，由总统自行决定就是了。”

下午，蒋介石在黄埔路召开“御前会议”。

会上，蒋介石冷冰冰他说：“毛泽东发表的关于时局的声明，想必大家都已看到了。他提出要以八项条件为基础进行谈判，实在太苛刻了一点。我是决定下野了。现在有两个方案请大家研究：一个是请李德邻出来谈判，谈妥了我才下野；另一个方案是我现在就下野，一切由李德邻来主持。”

这番话的目的，是想询问各人的意见。但大家都保持着沉默。

最后，外交部长吴铁城打破了沉闷的气氛，他提议道：“这件事关系重大，是不是召开中常委会讨论一下？”

一提起中常委会，蒋介石发火了。他气愤地嚷道：“不必！什么中常委会！我如今不是被共产党打倒，而是被国民党打倒的！”

陈立夫这时已是眼泪汪汪。他叫了一声：“总统……”

他正想把心里话说出来，蒋介石却不耐烦地连连摆手说：“好了！好了！我主意已定，决心采取第二个方案。下野的文告如何措词，请大家研究。主要意思是：我下野既不能贯彻戡乱主张，又何忍再为和平之障碍。”

最后，蒋介石宣布：他于1月21日下野“引退”。

同日，南京政府外交部举行记者招待会，发表声明：“四强已先后答复我方本月八日所发出之照会。咸称：‘甚愿中国早日恢复和平，但在目前情况下，碍难出任媒介。’我政府对于和谈问题，在外交上亦表示了最高度之诚意与最大的努力。”

蒋介石的座机“美龄号”在南京绕空一周，残阳如血。“永别了，南京！”蒋介石痛苦地闭上了眼睛。

1949年1月21日，南京黄埔路总统府外，华盖云集，车马辐辏，在京的文武大员几乎全部齐集总统府。

上午10时过，总统府内百官齐集，人人脸色阴郁，神情呆滞。

寂静中，只听一声“总统到！”众人垂手肃立，目光一齐朝大厅的门口望去。

蒋介石出现了。他今天穿一身玄色绸长袍。他步履缓慢地走到众人前，向全场扫视一眼，示意大家坐下。此刻的蒋介石，眼睑浮肿，神情木然地望

着他的官员们，一时不知从何说起。沉默良久，他才颤抖地说：“我，这个，这个，我同李副总统交换了三次意见。事情既然这样，我今天要发表引退文告。”

蒋介石声音低沉，无限悲伤。已有人黯然垂泪。

“目前军事、政治、财政、外交皆濒于绝境，人民所受痛苦亦达顶点。我有意息兵言和，无奈中共一意孤行到底。在目前情况下，我个人非引退不可，让德邻兄依法执行总统职权，与中共进行和谈。我于五年之内绝不干预政治，但愿从旁协助。希望各同志以后同心合力支持德邻兄，挽救党国危机。”

蒋介石话音刚落，谷正纲、陈立夫、张道藩等失声痛哭，谷正纲含泪大声疾呼：“总裁不应退休，应继续领导，和共产党作战到底！”

蒋介石语调低沉地说：“事实已不可能，我已做此决定了。”

在一片如丧考妣的哀痛气氛之中，蒋介石从衣袋里掏出拟好的文件，对李宗仁说：“我今天就离开南京，你立即就职视事，这里是一项我替你拟好的文告，你就来签个字罢。”

李宗仁在文告上匆匆扫了几眼，签上了自己的名字。事后他曾回忆说：“在那样哀伤的气氛之中，四周一片呜咽之声，不容许我来研究，甚或细读这一拟好的文稿。那气氛更使我不得不慷慨赴义似的，不假思索地在这文件上签了名字。”

诸事完毕，李宗仁问蒋介石：“总统今天什么时候动身，我们到机场送行。”

“料理公务要紧，送行就不必了。”说完，蒋介石尽量挺直身躯，目光不看任何人，顾自朝门外走去。

这时有人高叫道：“总统！总统！”蒋介石略为一停，见于右任踉踉跄跄追了上来。蒋介石问：“什么事？”

于右任气喘吁吁地说：“为和谈起见，可否请总统在离京之前，下个手令把张学良、杨虎城放出来？”

蒋介石冷漠地把手一挥：“你找德邻办去！”说完，快步朝外走去。

于右任悲愤难尽，却又无可奈何。

大员们目送蒋介石的背影，一个个悲戚无语，默默散去。

蒋介石离开总统府，驱车前往中山陵做最后拜谒。当他沿着有392级花岗石阶的漫漫墓道拾级而上，仰望高耸云天的祭堂时，不禁愁肠寸断。三年前，抗战胜利后还都的盛景恍如昨日，可转眼便江山易手了。世事沉浮，苍苍钟山无语，祭堂肃然无声。蒋介石禁不住鼻子一酸，怆然泪下。

蒋介石默立许久，不胜悲伤，蒋经国侍立一侧，几次欲言又止。

蒋介石拉拉披肩大氅，转身向外走去，他迈下石阶，又停下脚步，回眸凝望。

下午4点10分，“美龄号”从南京明故宫机场起飞，把空寞冷清的机场撇在下方。

转瞬间，南京城在机翼下不断缩小。蒋介石侧过头，从舷窗往下看，残阳如血，总统府、国防部大院、中山陵……在夕阳下尽收眼底，蒋介石吩咐飞机绕空一周，此一去，今生今世怕是再难回来了。蒋介石痛苦地闭上了眼睛。

## 蒋介石大搬家

1949年上半年，蒋介石命蒋经国重点操办的两件事是：抢运黄金和抢修定海机场。

“下野”后的蒋介石当上了“搬家”总管，亲自策划把大量的黄金、美钞、文物珍宝、机器物资和其它一些物资运往台湾，同时还胁迫大批科学家和专门人才迁台，这成为以后台湾经济发展的重要基础。对此，李宗仁无可奈何，只得开动机器大量印发金圆券以代现金，加剧了经济的崩溃。

这一时期，长子蒋经国成为蒋介石最得力的助手，可以说是“搬家”的前线指挥官。

从国民党控制的中央银行取走库存黄金，将国家存在外国银行的资金转入私人户头，这是蒋介石自有了“下野”念头之后就一直在操办的事。现在，下野已既成事实，他的资金转移计划也加大了步伐。

1月10日，解放军取得淮海战役胜利的这一天，蒋介石命蒋经国再次持他的手谕找到上海的中央银行总裁俞鸿钧，要他把库存的全部黄金、白银、美钞运到台湾。

1月16日，蒋介石亲自召见俞鸿钧、席德懋，下令中央、中国两大银行，将全部库存资金化整为零，存入私人户头，以防共产党接收。

自从1948年8月实行币制改革发行金圆券后，民间所藏金银美钞被搜刮殆尽，全部存于国库。运送一批数量巨大的现金，既要保密，又要防止李宗仁代总统的南京政府的阻挡，还需要说服主管财经金融的当事者，促其合作，蒋介石为此费尽了心思。在定海机场修成前，黄金和物资的转移主要是用军舰运送，动用了海军部队和毛人凤的军统特务参与此事，由蒋经国负总责。

1949年上半年，常有神秘的兵舰在夜幕降临后停泊在国民政府中央银行前面不远的黄浦海滩上，马达一刻不停地运转，以备随时开走。岸上实行戒严。从外滩、南京东路直到外白渡桥，凡是中央银行邻近的路口，都有荷枪实弹的士兵警戒，任何行人车辆不得通行。身强力壮的军统特务伪装成“苦力”，把一个个沉重的木箱抬上军舰。

据国民党监财委秘密会议报告和《李宗仁回忆录》中的统计数字，去台湾前，蒋介石从国库偷运走黄金390万盎司，外汇7000万美元和价值7000万美元的银元，总计价值在5亿美元以上。

李宗仁发现后，撤换了中央银行总裁，但偷运活动仍瞒着新任银行总裁持续不停。李宗仁曾致电台湾省主席陈诚，令其将运往台湾的黄金、白银、美钞等再运返福州的财政部仓库，但蒋介石的得意门生哪里会听李宗仁的，陈诚拒不执行。李宗仁无可奈何，只得开动机器，大量印发金圆券以代现金，加剧了经济的崩溃。

蒋介石转移资金可谓是处心积虑，它至少造成了三点影响：

一是对李宗仁政府无异于釜底抽薪；

二是对台湾经济的稳定、“反共基地”的巩固输了充足的血液；

三是对即将成立的人民政权来说，失去了本应属于人民的财富，增加了恢复经济的难度。

为了顺利实现他转移的计划，蒋介石下野后，立即派蒋经国去上海，督促空军总部，迅速修建定海机场，蒋经国曾回忆说：

“那时，我们还不明白父亲的用意，只能遵照命令去做。父亲对这件事显得很关心，差不多每星期都要问，机场的工程已进行到何种程度了？后

来催得更紧，几乎三天一催，两天一催，直到机场全部竣工为止。到了淞沪弃守，才知道汤恩伯的部队就是靠了由定海起飞的空军的掩护，才能完全地经过舟山撤退到台湾。”

在上海解放前的4个月内，是国民党抢运金银、机器设备、车辆、纸张、棉纱、布匹的高潮时期。这期间，仅从上海一地就抢运走1500只船的物资。抢到香港的一小分布匹、棉纱就价值400多万港币。

5月22日，解放军打到市郊临近市区，蒋介石还电令留在马公岛的儿子，要他立即飞回上海再抢物资。可是，当蒋经国飞临上海上空的时候，机场上已弥漫着解放军炮弹的烟尘，他眼睁睁地看着几辆满载银元的大卡车成为解放军的战利品。他哀戚地致电其父：“上海已经陷入共军之手，再抢运物资已不可能了。”

蒋介石不得不缩回了伸往上海的手，他对没有来得及完成的“抢运”很有些痛心疾首。

其实，他的“抢运”计划一年以前就已经开始执行，只是没有这么大张旗鼓而已。

1948年12月，国民党内要求蒋介石下野的呼声越响越密。蒋介石单独召见了地质学家翁文灏。此人一度担任过国民政府的行政院长，后任资源委员会委员长。

蒋介石对翁文灏说，他打算将南京的5个大厂的人员连同设备，一起迁到台湾。

翁文灏将蒋介石的话转告了正当任的资源委员会委员长孙越崎，但孙越崎却找了个借口：“经费奇缺，没法拆迁转运，如要迁走这5个厂，至少需要100亿元的搬迁费。”孙越崎想来个狮子大张口，婉拒蒋介石。

但没料到蒋介石却说：“没有经费好说，拨给他130亿元。”

资源委员会一直经办全国的煤、石油、有色金属、机械制造、化工、电力、水泥、制糖、造纸等“国营企业”，拥有职员3万余人，技术人员及工人共70余万人。其中技术人员里留学生及国内大学毕业的工程技术人员占40%，可说是全国工程行业的精华所在。蒋介石花大价钱搬厂，一为设备，二为人才，决不能留给共产党。

他选中第一批搬的5个大厂是：南京电照厂、有线电厂、无线电厂、高压电瓷厂、马鞍山钢铁厂。

在蒋介石的相逼下，孙越崎只有无奈地执行命令。他调了一艘800吨的大船——新华轮，停泊在下关码头，先拆了一部分设备装船。正当设备装到一半时，蒋介石宣布下野，装船的行动便停了下来。

当时，李宗仁一再派张治中、陈仪等人去奉化溪口催蒋出国，报纸广播竞相转发消息，大造蒋介石出国的舆论。孙越崎认为，蒋介石已不管事，于是自作主张把已装船的设备卸下来又运回厂子。

蒋介石接到密报后，暴跳如雷。立即电示淞沪警备司令汤恩伯催孙拆运。

这天，孙越崎接到汤恩伯电报：“奉上峰命令，南京5厂速迁台湾。”

“上峰是谁呢？”孙越崎感到莫名其妙：“既然蒋介石已经下野，那么必然是代总统李宗仁罗！”

于是，孙越崎去请示代“总统”李宗仁，并痛哭流涕地说：

“报告代总统，这5个厂千万不能搬啊。如今和谈有望，民心稍稍安定，如果听到这个风声，什么都完了。”

李宗仁愕然道：“什么搬厂？运往台湾？上峰命令？”他根本不知道这事。转念之间，他立即明白过来，咬牙骂了句：“这死老头子，真叫阴险！”他果断地对孙越崎说：“5个厂不要迁！”

孙越崎兴奋而去。

心情本来就极其不悦的蒋介石得知此事，暴跳如雷，顿足大骂：“娘希匹！孙越崎真拆烂污，他不搬厂，还骗了我的钱！”但此事既已被李宗仁知道，硬来肯定不行，于是只好另想办法。

退台之前，蒋介石还把南京故宫博物院的大量珍宝古玩等稀世珍宝偷运到台湾。其中有铜器、瓷器、玉器、漆器、珐琅、古字画等共1424箱，图片画册1334箱，历史文献204箱，共计文物231910件。这些文物运到台湾时无处安放，只得藏在一个天然大山洞里。后建成台北故宫博物院，这才陆续清理展示出一批。

溃灭前的疯狂抢掠是不择手段的。蒋介石千方百计要把更多的东西搬到台湾，不能搬的就加以破坏，决不让他眼中有价值的东西留给共产党。

解放前后，国共两党展开了人才“争夺战”。蒋介石国民党不择手段地裹胁原南京中央研究院的大批科学家去了台湾。而共产党方面视这批人才为建设未来新国家的宝贵财富，千方百计予以挽留，而他们中间有许多人本来就不愿意舍弃故土，于是立即得到了我党的保护和以后的重用。

著名历史学家顾颉刚就是被周恩来“抢”到的。还有竺可桢、吴有训等人也是这样留下来的。

1948年2月，著名地质学家李四光去伦敦参加18届国际地质学会，脱离了国民党的控制。会议结束后，他和夫人没有回国，而是迁到海滨公寓，静养身体，观察国内时局的发展。

1949年4月，郭沫若去布拉格出席世界维护和平大会，受周恩来的委托专程送信给李四光，劝他早日回国。李四光答应了，并预订了到香港的船票，随即踏上了归国之路。

许多科学家和学者，就这样留在了大陆，承担起了建设新中国的大任。

### 第三章 毛泽东要送他一枚天坛大的奖章

共产党对平津“先打两头，后取中间”，傅作义看出毛泽东有意逼和。大兵压境，无奈中傅作义支出北平。毛泽东说：“你是北京的大功臣，应该给你一枚天坛一样大的奖章。”24年后，周恩来对弥留之际的傅作义说：“毛主席叫我来看看你啦！说你对人民立了很大的功！”

#### 毛泽东决定给傅作义点颜色看看

1974年4月中旬的一天，一辆红旗牌小轿车从中南海驶出，在一家医院的大门口停下来。中华人民共和国总理周恩来专程来这里看望一位病人。

病房里，一位病危的老人静躺在病床上。看见来人后，他激动地动了动眼珠，眼里放出异样的光亮。这位弥留之际的老人便是傅作义。

周恩来靠近病床，俯身挨近傅作义的耳朵说：“毛主席叫我来看看你啦！说你对人民立了很大的功！”

傅作义听了周恩来的话，动了动嘴唇。他想说什么，但已经说不出来了。

次日下午，傅作义带着人生的坦然和满足，离开了人世。

建国后，北京第一届体育运动会在天坛举行。那一天，毛泽东去了。看了一会儿，对旁边的傅作义说：“宜生，出去转转如何？”

“行呵，我正坐不住了呢。”傅作义回答。

二人一前一后走出来，漫步到回音壁处。

“宜生，你看我们把这一块补得如何？”毛泽东意味深长地指春回音壁上的一块补疤问道。

“不错不错，不仔细看，看不出来。”傅作义称赞道。

“如果我们兵戎相见，这墙补也补不得喽。”毛泽东又说，“你是北京的大功臣，应该给你一枚天坛一样大的奖章，怎么样？”

“哪里哪里，毛主席不抓我的罪过，我已经感激不尽了。”傅作义连连感激地回答。

毛泽东与傅作义原是两个阵营的对手，后来却握手言和，一战一和，对中国历史，对古都北京，有着巨大的意义。

毛泽东从西柏坡到北京的半年内，连续7次接见傅作义，其中有一次谈话长达一天一夜。

昔日的战场对手，而今像老朋友一样促膝谈心。毛泽东每次谈话，都赞扬傅作义是北京的大功臣，是人民的大功臣。

论起来，傅作义算是毛泽东的老对手了。

傅作义是从战场上一枪一刀地拼上来的国民党地方实力派，内战爆发以后随蒋介石投入对解放军作战。

1946年6月，国民党撕毁《停战协定》、《政协决议》，向解放军发动全面进攻，作为第十二战区司令长官的傅作义十分得意，他的军队连克集宁、大同，特别是攻占解放区最大城市张家口，大有不可一世之慨。傅作义的喉舌《奋斗日报》登出了《致毛泽东的公开电》，文说：“……被包围、被击溃、被消灭不是国军，而是你们自夸的所谓参加‘二万五千里长征’的贺龙所部、聂荣臻所部……的全部主力。”这时候的傅作义，口气十分狂妄。

朱德看到这个《公开电》，命令把这个《公开电》向西北解放军连以上

干部宣读。“这叫激将法。人家骂我们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也不过如此。”后来延安的《解放日报》也刊登《公开电》，说是奇文共欣赏。

1948年8月，担任国民党华北“剿总”总司令的傅作义，率大军从北平、保定出发南进，扬言要夺回早已被解放了的石家庄，袭击我党中央和解放军总部所在地西柏坡。

北平以南至石家庄，中共从没有部署主力部队，傅作义的骑兵部队又行动迅猛，一时间形势变得非常险峻。

周恩来立即派汪东兴与中央警卫团干部带两个步兵连和一个骑兵排赴东北方向行唐一带警戒，掩护毛泽东和党中央安全转移；同时安排中央各机关准备疏散。

毛泽东当时的主要精力放在如何对付东北之敌上，对傅作义的袭击似乎没放在心上。当形势已相当危急时，他才叫卫士李银桥收起东北地图，备好纸笔。

“给他点颜色看看。”毛泽东拿起笔说。

他为新华社写了一庸述评，命令电台全文广播。

毛泽东在述评里幽默地警告敌方：我们已经有了充分准备，你来对你没有好处，你还是老实一点为好。

毛泽东又用尖锐辛辣的语气讥讽道：“这里发生一个问题，究竟他们要不要北平？现在北平是这样的空虚，只有一个青年军二八师在那里。通州也空了，平津东段也只有稀稀拉拉几个兵了。总之，整个蒋介石的北方战线，整个傅作义系统，大概只有几个月就要完蛋，他们却还在那里做石家庄的梦！……”

述评广播以后，傅作义部队一枪未放便仓惶撤回北平。不久，保定驻军也撤回北平。

一纸书吓住傅作义的大军，毛泽东唱了一出《空城计》：“我正在城楼观山景，忽听得城外乱纷纷，旌旗招展空翻影，原来是司马发来的兵……”

唱完，意犹未尽的他又加上一段《三顾茅庐》中诸葛亮的唱段：“我本是卧龙岗……”

## 林彪不相信能和平解放北平

在中共高级将领中，最早考虑用和平方式解放北平的，是聂荣臻。聂荣臻与傅作义是两军对垒的老对手了。一个是解放军晋察冀军区司令，一个是晋绥的国民党将领，战场上兵刃相见，知己知彼。在积极备战之时，聂荣臻看到了傅作义的另一面：为人正直机智，深明道理，更重要的是有爱国之心。抗日战争中，傅作义作战积极，与八路军共产党的关系搞得不错。

聂荣臻认为，傅作义虽然被蒋介石拉上了内战的战车，但他是“杂牌”，在走投无路之际，经过争取，有可能放下武器。聂荣臻首先取得罗荣桓的支持，然后又去找林彪，向他谈了和平解放北平的设想，并详细介绍了北平地下党所提供的关于傅作义的情报。

林彪以惯常的冷静听完聂荣臻的话，他摇摇头说：“想法固然不错，便恐怕只是一厢情愿，是幻想。人家手里有那么多军队，怎能白白交给你？还是要战争解决问题。”

林彪想起了长春、太原，在他看来，打北平可能比长春、太原还要难。

“我们当然不放弃战争解决，而且要打北平也很容易。北平的城墙虽很厚，但工事不强，敌人又是惊弓之鸟，兵无斗志。以我军的力量，打下北平不成问题。不过，我们最好不把一个打得稀巴烂的城市交给党中央。北平是座历史古都，如果名胜古迹被打坏，你我都不好对历史做交代，”聂荣臻耐心地说。

但林彪仍固执地说：“还是战争解决问题，傅作义这个人傲气得很，他不大可能不战而降。你和他在华北斗了多年还不了解这个人？你说的和平解决，弄不好会松懈我军的斗志，到头来还得靠打，贻误时间。打起来固然会有损失，但是不打我们什么也得不到。”

聂荣臻陷入了沉默。他深知林彪的固执，既然说不过，就没有硬争下去的必要。于是，他以自己的名义，给毛泽东发了一封电报。

聂荣臻关于和平解放北平的想法同毛泽东不谋而合。毛泽东读完前线来的这封电报，对周恩来说，聂荣臻这个人有眼光。

毛泽东立即回电，同意聂荣臻的意见。接着指示平津前线总部：只要傅作义让我们和平接收平津，允许他编两个军，可以赦免他的战犯罪，他的私人财产可以保全，其部属的安全和财产也有保障。

和平的曙光，照在了古城楼上。

平津战役结束后，林彪指挥的第四野战军奉命离开华北，南下作战。担任平津卫戍司令的聂荣臻在华北军区司令部庆王府小礼堂，召开送别会，林彪出席了这个会。聂荣臻作为东道主说：“平津战役的胜利，四野的部队是出了大力的。当然，首先是毛主席指挥得好，但是，四野的同志们不开进来，光靠华北的部队是没有那么大的胃口吃掉傅作义的60万军队的。四野主力一进关，就实现了把敌人滞留在华北就地歼灭的计划。在此，我代替华北部队感谢你们。”

这时主席台上的林彪笑着打断聂荣臻的话说：“一家人不要说两家话嘛。”

林彪坦言道：“北平和平解放，在当时可是不认识的。我们能在一定条件下促使傅作义就范，这是聂老总的功劳，是聂老总首先看到的……”

这算是林彪对自己战略上眼光短浅的承认。

平津战役开始前，局势其实已经非常明朗了，但傅作义方面却仗着自己拥有数十万大军和美式装备，决心与中共决一死战。

直到东北野战军进关，傅作义才醒悟到自己犯了致命的战略错误。他原来估计，东北林彪部队刚刚打过大战役，至少要休整三四个月才能入关。这几个月，有美国提供武器，扩充50万大军不成问题，加上原有的50万人马，这百万大军，纵使林彪进关，又能奈何？守城又是他的拿手戏，他可以以逸待劳轻松而战，却没料想，共军分秒必争，东北大战刚定，毛泽东就命令林彪火速秘密进关，打他个措手不及。

把50多万人马摆成一字长蛇阵，布防在500公里长的战线上，是他的又一大错误。东北野战军一进关，便同华北军区主力兵团汇合，立即将他的防区切成数段，分割包围，他的部属个个岌岌可危，彼此不能相顾。这种分散兵力的布防实为下策，但他也无可奈何。蒋介石让他从塘沽下海，往南撤退，但他心里想的却是万一平津呆不住，就向西退回绥远老家。但蒋介石的命令他也得应付，于是为了让蒋介石放心，他把蒋系的“中央军”布防在平津塘，表示随时可以南撤，而他自己的嫡系部队则布防在北平以西到张家口一线。



他的障眼法瞒过了蒋介石，却怎么也瞒不了毛泽东。毛泽东利用他对平津弃守不定之际，急速出兵，“先打两头，后取中间”，使他南撤西逃计划，均成泡影。“

**林彪是我的晚辈，聂荣臻比我小4岁，叫我向他们投降”**

困在北平城里的傅作义独自关在屋里，神情痛苦，不断划着火柴杆。中南海金碧辉煌的宫殿，画栋雕梁的楼台对他来说已索然无味，那一泓湖水也难洗去他心中的忧愁和烦恼。

“傅作义呀傅作义，你枉带了几十年兵，到底不是毛泽东的对手呀！”他在内心喊道。

聪明的傅作义从共军“先打两头，后取中间”的战略中揣摸出，毛泽东有意逼和。

民心思和，北平城内日益高涨的和平反战运动，对傅作义也是极大的压力。一大群市民在北平市政府前请愿，喊出了“要求和平！”“保卫文物古迹！”“保卫人民的生命财产！”“不能再打内战！”的口号。

大学教授、文化名人，甚至前市长何思源也在为和平奔走。和平已是大势所趋。

1948年春的一天，在北平以“荣军中校”的身份负责敌军工作的王苏同志，奉命到解放区的泊镇城工部接受新任务。刘仁同志接见了她。在场的还有一位叫曾常宁的女青年，她是天津市南开大学哲学系学生，中共地下党员。刘仁介绍他们相识后，交给王苏一项任务：通过曾常宁做父亲曾延毅的工作，再通过曾延毅作傅作义的工作。

原来，曾延毅与傅作义是保定军校的同学，又是结拜兄弟，曾与傅作义一起守过涿州，有患难之交。自抗日战争初期的太原保卫战后，曾延毅便脱离戎马，赴天津赋闲。在泊镇分手时，曾常宁把她家的住址交给了王苏。几天后，曾常宁告知王苏，她已与她父亲讲好，说“有个中共朋友要见见”，父亲欣然允诺。

此后，王苏每月都去天津会曾延毅两三次，讨论国内时局。谈得相当投机时，王苏便劝曾延毅到北平向傅作义要个军长当，有了兵权，事情就好办。曾延毅为此专程去北平与傅作义会面，但傅作义只同意给他华北“剿总”副总司令的虚衔，曾延毅扫兴而归。但他却并未失去信心，他对王苏表示，他不能直接做傅作义的工作，也可以做刘厚同的工作，通过刘厚同做傅作义的工作。

刘厚同是辛亥革命的前辈，任过甘肃军政部长，有军事学识，也有政治眼光。他是傅作义和曾延毅的老师，与傅关系更深。抗日战争爆发前，傅军的百灵庙大战，便是刘先生运筹帷幄决胜疆场的。傅作义对刘厚同历来是言听计从，而现在刘又是傅的高级政治顾问。刘厚同的女儿刘杭生，在天津耀华中学上学，也是党的外围组织民主青年联盟盟员，她在天津地下党嘱咐下，也开始做她父亲的工作，并通过她父亲去做傅作义的工作。

然而，第一个向傅作义试探和平解放北平的却是华北学院教授兼政治系主任杜任之。杜任之早年留学德国，是知名学者，跟傅作义是同乡。1946年傅作义占领张家口以后，曾通电全国，说如共产党能胜利，傅某甘愿为其执鞭。杜任之得知，立即写信告之傅作义：“通电措词张狂，执鞭之说可能实

现，且看战局的演变吧。”傅作义对此不予理睬。

济南解放，杜任之想趁此试探傅作义的态度。

杜任之说：“解放军打下济南，已进入全面夺取城市的阶段。济南的解放，守将吴化文与解放军的合作起了很大的作用。”接着他便望着傅作义，问：“你对战争发展前途如何看法？”

傅作义回答：济南一城一地的得失，还不能决定战局；东北各大城市，除四平以外都在国军手里；华北除石家庄以外，大城市也都在国军手里。我现在就控制着战局。

杜任之一听话不投机，只好告辞。其胞弟杜敬之建议会傅总部联谊处即高级招待所，找已经抵达北平的刘厚同老先生谈谈，请刘厚同劝劝傅作义。杜任之与刘厚同谈过几次，二人见解基本一致。于是，杜任之即把北平地下党负责人崔月犁介绍给刘老先生。此后他们三人便经常磋商，如何促使傅作义同意和谈。

1948年1月初，北平地下党学生工作委员会书记余涤清，奉令到泊镇城工部。刘仁按聂荣臻的指示，要余涤清立即把傅冬菊派到傅作义身边，以加强对傅作义的工作。

傅冬菊是傅作义的长女，抗战期间在西南联大就读，表现进步，参加了党的外围组织民主青年同盟。1946年毕业后，分配在天津《大公报》工作，地下党的一些宣传品，常由她带回北平傅总部的印刷厂印制。有关负责人固然怕傅总司令降下罪来吃不消，但又怕大小姐到总司令那里告状同样吃不消，所以傅冬菊每次都如愿以偿。当刘仁提出傅冬菊的问题时，余涤清表示：她提出入党的要求很久了，如让她回去，以先吸收她入党为好。刘仁表示同意。之后，他们把傅冬菊调到北平，余涤清委托学委委员王汉斌，发展傅冬菊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傅冬菊回到北平，住进了傅作义的总部中南海。平日里，她除以父女之情对其父晓以大义外，还将她能接触到的情况，包括她父亲每天的情绪变化，隔一天向崔月犁汇报一次，再由崔通过地下电台发向中共平津前线司令部。

傅作义对女儿突然出现在身边，十分惊奇：

“你是军统还是共产党？”傅作义开门见山地问。

“共产党。”傅冬菊毫不含糊地回答。

“你是毛泽东派来的还是聂荣臻派来的？”傅作义知道指挥平津地下党的是聂荣臻创建并领导的晋察冀城工部，女儿既是北平地下党的党员，最多是受聂荣臻的委派；而长期养成的旧军人作风使他认为，只有与对方最高领导人打交道才不失自己的身份。傅冬菊深知其父心理，脱口而出：“毛泽东派我来的。”

“派你来干什么？”

“劝您停止抵抗，和平解决北平问题。”

“林彪是我的晚辈，聂荣臻还经我小4岁，叫我向他们投降……”

### 傅作义迈出和谈第一步

傅冬菊的情况报告，使我军对敌方最高指挥官一切活动，包括情绪变化的一些细节，了如指掌。与此同时，地下党依靠3000多党员，5000民青、民联盟员，联系数万革命群众，广泛开展了要求和平解放北平的群众运动，

新华门前的游行队伍天天不断；大学教授及知名人士，也都行动起来，奔走呼号，直接对傅作义施加压力。

余涤清回北平后，立即召集各区地下党负责人传达刘仁指示，成立了迎接北平解放指挥部，由余涤清负责。同时，还确定各区成立分指挥部，并研究了武装解放北平的各项准备工作，包括防特、防火、护厂、护校、护店、给攻城的部队带路、以及搜集各种军事设施的情报，等等；

其中最大最重的任务就是花大力气策动傅总部的下属部队战场起义。

和平解放北平的道路是极为艰难而曲折的。

傅作义对亲信说，如果他走和谈这条路，将冒三个死。一是被蒋介石处死，二是被部属打死，三是被共产党当作战犯处死。

1948年秋，东北解放战争的最后一仗开始后，蒋介石坐镇北平亲自指挥。此时，傅作义对国民党必败，共产党必胜已有顶感，曾对几个亲信流露出“罢战求和”的思想。但他清楚，要使自己头脑中设想的“和”成为事实，将面临许多困难和诸多阻力。他顾虑重重。

在蒋介石挑起全面内战后，傅作义先任第十二战区长官司令部司令长官、绥靖公署主任，后任华北“剿总”总司令。他坚决执行蒋介石的“戡乱”、“剿共”政策，率领自己的部队进攻华北解放区。1946年10月，傅作义部乘虚进占晋察冀解放区中心城市张家口，把国民党在华北地区的军事进攻推上巅峰。若与共产党和谈，他们能原谅他吗？共产党会不会以战争罪来处置他？

傅作义坚决执行蒋介石的内战政策，创下了累累“战绩”，颇受蒋的赏识、重用。如果自己背着蒋介石同共产党和谈，蒋介石一定不会放过他。不是被“中央军”打死，也会被蒋介石手下的特务暗杀。

再说，多年来，傅作义给自己的部属灌输的是反共思想，如果自己来个转弯，同共产党讲和，部属们弄不好会开枪打死自己。

但是，此时的傅作义对国民党政府已经是信心全失。国民党政府依靠美帝国主义，出卖国家主权，在东北战局危急之际，蒋介石居然为宋美龄、孔令侃囤积居奇、扰乱金融的丑闻亲自飞往上海庇护。国民党已不得人心，一向富于谋略的傅作义，以战略的长远眼光，审时度势，开始在亲信、智囊中酝酿罢战求和之事。

1948年10月25日深夜，傅作义召见政工处长王克俊，直接同王进行了深层次的交谈。

作为傅作义身边工作多年的处长，王克俊对傅作义在此时召见自己的心里已有预感，但还是试探地问：“是不是谈咱们几次谈到却未深谈但还需深谈的那件事？”

傅作义点头默认。他希望王克俊有什么想法，能实话实说。

就在王克俊小心翼翼地考虑着该如何启齿时，傅作义急不可待地先开口了：“一些很要好的朋友，例如邓宝珊、马占山、刘厚同等；一些学者、教授，例如张东荪、杜任之、王之相等人，现在都主张和平谈判。一些比我有学问、有才干的人，像抗战前在绥远狱中的王若飞，抗战初期和咱们合作共事的潘纪文、王一然、景昌之等，咱们很敬重他们，可是咱留不住他们，他们或者是回到、或者是千方百计地加入到共产党那边去了。最近九十四军军长郑挺锋，借口母亲病重，坚决辞职不干，飞离北平去南方了。还有一些众叛亲离的事，影响着官兵的士气。就是蒋总统本人，不也是为了宋美龄大发

“戡乱财”，竟然匆匆忙忙地飞往上海吗？”

稍停片刻，他又说：“1945年以前，抗战还没有胜利的时候，蒋介石要缩编咱们的部队，近来却慷慨地给咱们扩编队伍，还一再让咱们把察绥、平津的干部家属安到福建后方基地去，前不久，他还让我率部去江甫，就任东南军政长官，指挥一方国民党军队。可是，他对曾经竭忠报效于他的张学良、卫立煌，是何等的心狠手辣！”

他长叹一声：“我们不能再盲目地信赖他了！”

最后，他们的话题集中到一个问题上：“前途何在？”两人得出的结论是：共产党必胜，国民党必败。既然古人有“识时务者为俊杰”之说，那么事到如今，他们也该认清形势，走自己的路了。

傅作义和王克俊商定：鉴于环境极为复杂，必须有明有暗，有真有假，施展纵横捭阖的全部解数，才能实现大转变。

促使傅作义走上和谈之路的还有一个重要原因，那就是他和蒋介石之间日益尖锐的矛盾。

蒋、傅矛盾由来已久，它是嫡系与非嫡系、“中央军”与地方势力、正规军与“杂牌军”之间矛盾的必然显现。傅作义对蒋介石的独裁专制、排除异己、出卖民族利益等作为早就心怀不满，时常予以抨击。

1946年秋冬，蒋介石命令傅作义派他的暂三军等部赴东北作战；派第三十五军等部向保定一带南下捕捉解放军的有生力量。结果是：暂三军军长安春山出关不久缩回关内；第三十五军在冀中涞水以东被围。由于蒋介石嫡系部队十六军、九十四军不积极配合，以致三十五军的新三十二师被歼。第三十五军是傅作义起家的老本，遭此重创，使他神情恍惚，对蒋介石的调遣令和“中央军”的行为很是不满。

1948年2月，傅作义主持召开“华北剿总”会议，研究军事行动。会上，他提出总司令有权调遣使用整个战区序列的部队。本来这属于不成问题的问题，但“华北剿总”副司令兼北平警备总司令、国民党军统特务头子陈继承，自恃是蒋介石派出的“监军”，对傅作义的说法表示反对。他说，对“中央军”的调遣要通过他，凡属他的部队，只有他一人才能调动使用，任何人不得染指。

陈继承的态度骄横跋扈，把“副总司令”的权力凌驾于“总司令”之上，连“中央军”的李文、石觉等高级将领也都感到过分。身为总司令的傅作义岂能容忍，当即表示决不同意陈对自己的限制。

会后，傅作义向蒋介石连发三封电报，坚决要求辞职。蒋介石复电竭力挽留，并给予安慰。

后来，蒋介石看傅作义继续请辞，便对傅说：“如能推荐一位像你一样的优秀将才，作为对你的替代，方可接受辞呈。”

傅作义回答：“陈继承副总司令可以替代，他已掌握军事、警备、人事、调动等方面的大权，完全可以胜任。”

到这时，蒋介石才意识到，傅作义的辞职是由陈继承引起的。鉴于在华北地区只有傅作义能支撑起局面，蒋介石只得撤掉陈继承。于是，蒋介石致电傅作义，除表示安抚外，还允许傅作义推荐副总司令人选。

为表示自己出于“公心”，并无排斥“中央军”之意，傅作义提名“中央军”李文兵团的副司令官周体仁接任。无奈之下，蒋介石只好批准，并将陈继承调离“华北剿总”。

不久，傅作义又以坚决的态度，迫使蒋介石撤换北平市政府民政局长、军统另一特务头目马汉三，社会局局长、中统特务温崇信等，削弱了国民党在北平的特务势力。

但他对国民党、对蒋介石已经明显缺乏信心了。现在他要实实在在面对的，是打下去还是举起和平的旗帜。

作为国民党华北“剿总”总司令的傅作义，内心矛盾重重。反复思虑之后，他采取了打谈结合的两手策略。

傅作义首次派人出城谋求和谈的时间是1948年12月4日。此次行动十分机密，从酝酿到行动，只有傅作义和他的心腹王克俊、李腾九共3个人知道。

12月12日，傅作义把李腾九找到办公室。这时傅作义已知道前些天求见的客人李炳泉的真实身份，便通过李腾九打听李炳泉的近况。李腾九明白总司令的意思是要知道中共方面对和谈的最新情况。

当李腾九第一次将李炳泉的北平地下党代表身份透露给傅作义时，傅微露吃惊之色，对李炳泉希望同他会晤一事未作正面答复，但关照李腾九：“和谈的事要妥善研究，你可以继续联系，无论如何要注意李炳泉的安全，必要时可让他住到你那里去。”

这天，傅作义特向李腾九问起李炳泉。李腾九回答说：“李炳泉希望和总司令面谈，他早言明，他可以作为正式的中共北平地下党代表，向总司令述明中共的政策和具体要求。他还说我方也可以派代表随同他去解放区，与中共有关领导直接会谈。”

听后，傅作义沉默一会，让人找来王克俊，对王说：“上次咱们谈的那件事，现在马上就可以进行了，联系、出城人员的接送等一切事项由你负责。这事除咱们3人外不得让别人知道。”他伸手指了指李、王和他自己，然后对李腾九说：“你让李炳泉到我这来一趟，我有话对他说。”

不久，李腾九就领着李炳泉来见傅作义，傅作义老远就伸出手迎上去：“欢迎你！”

李炳泉知道，既然傅作义肯见自己，说明他的态度已经有了转变，对和谈心有向往。于是，他开门见山地告知傅作义，他是受中共北平地下党的派遣而来的并欢迎傅先生做出决断，进行和平谈判。他对傅作义询问能否由他的代表与李一起到解放区去见中共方面的领导，作出了肯定的答复。

傅作义很快就与王克俊、李腾九商定，《平民日报》社社长崔载之为和谈代表，加上随员、译电员和司机共4人组成和谈小组。

12月14日，和谈小组及李炳泉一行5人乘坐吉普车，由王克俊、李腾九把他们从傅系部队孙英年的防地送出城外，驶往河北平山。

和谈小组出发后，傅作义让李腾九假装生病，携带电台住进医院，与各方隔绝，专门同崔、李所携电台联络。

然而，沿途到处是哨兵，处处受阻拦，汽车开到涿县境内时，被当地解放军驻军拦截，后经过商量及请示，才让他们去蓟县同解放军平津前线司令部联系。结果，他们还没到平山就只得折回北平。

12月15日晨，王克俊亲自乘车来到西直门外，将崔、李送上汽车，并祝愿他们能顺利到达目的地。直到汽车驶出很远，王克俊还在望着被雾气吞没的汽车背影。

和谈小组的汽车在东北野战军第十一纵队的驻地受到阻拦。纵队司令员

贺晋年、政委陈仁麒接待了崔载之与李炳泉。崔、李以急切的心情告诉两位将军，傅作义急于要与解放军和谈，希望他们放行。贺、陈当即将此情况电报平津前线司令部。前线司令部接电后，一面转报中央军委，一面电令十一纵队派人护送崔、李到司令部来。

崔载之、李炳泉到达前线指挥部后，罗荣桓政委让参谋处长苏静负责。为了不暴露前线司令部的位置，会面地点选在附近的蓟县八里庄村西头的一座房子。

16日下午，苏静和傅方代表进行了初步接触、交谈。这不是正式谈判，双方都在试探，需要摸底。

12月19日，刘亚楼参谋长来到八里庄，与傅方代表进行了交谈。刘亚楼说明了全国形势与平津前线司令部的意图，明确表示，不能同意傅作义提出的建立华北联合政府的主张；只能给傅作义留两个军：傅作义必须把蒋系部队的军师级头目逮捕起来，然后宣布起义。

崔载之对此没有表态，只是传达了傅作义的一些想法：

（一）傅作义对谈判很重视，早有考虑，确有诚意。但也有顾虑，他要求在绝对保密中进行，以不使“中统”、“军统”特务闻讯进行干扰破坏。

（二）傅要求解放军放弃对南苑机场的控制，这样他可以得到蒋介石的一些飞机。

（三）傅还希望解放军放回被围困在新保安的傅第三十五军，以加强在北平城内的军事力量，制约城内的蒋系军队，必要时，可搀杂解放军一块进城。

（四）傅提出通电全国，宣布实现和平解决，尔后成立华北联合政府，他参加联合政府，军队归联合政府。

双方的条件距离很大，谈判搁浅。

### 傅作义被中共宣布为战犯，他很不理解

崔载之用电台向傅作义报告了中共方面的要求。傅作义回电：城内中央军的兵力比我的部队多几十倍，逮捕蒋系军师两级军官没有把握，实行此方案困难。别的傅作义未作答复。

此时，傅作义的命根子三十五军在新保安全军覆没，军长郭景云战死。形势急转直下，崔载之给傅作义连发几个电报，劝傅要考虑解放军的条件，放下武器。

12月23日，崔载之从电台中收到傅作义要他转致毛泽东的电报：

毛先生：

（一）今后治华建国之道，应交由贵方任之，以达成共同政治目的。

（二）为求人民迅即得救，拟即通电全国，停止战斗，促进全面和平统一。

（三）余绝不保持军队，亦无任何政治企图。

（四）在过渡阶段，为避免破坏事件和糜烂地方，通电发出后，国军即停止任何攻击行动，暂维现状。贵方军队亦请稍向后撤，恢复交通、安全秩序。细节问题请指派人员商谈解决。在此转圜时期，盼勿以缴械方式责余为难。过此阶段之后，军队如何处理，均由先生决定。望能顾及事实，妥善处理。余相信先生之政治主张及政治风度，谅能大有助于全国之安定。

同日，前线司令部将此电文发给毛泽东。

12月25日，中共中央宣布蒋介石等43名罪大恶极的头等战犯名单，傅作义的名字被列在其中。在宣布战犯的同时，中共还发表了一篇短文，指出：“像傅作义这样的战犯不惩罚不可能，减轻惩罚是可能的，其出路是缴械投降，立功赎罪。”

傅作义难以理解：为什么在这时候把我置于这样的地位？他对其同僚们感叹：“这样做不违背中共的宽大政策吗？这一定是中共一批青年干部干的，毛先生一定不知道。”

次日，他叫李腾九发急电，命崔载之立即返回北平。电文内容如下：

“总座能为国家为人民及保全平津文物与工商业基础，毫无任何政治企图，其意亦即帮助成功者速成，而不是依附成功者求自己发展。因之，如果缴械亦可先从自身缴起，吾兄迭次来电意见均甚好，希即返平面谈。”

苏静得知此讯，即刻将情况报告前线司令部。司令部立即以林彪名义同时发出两个电报，一个是发给苏静的“望嘱傅之代表稍待，然后再返北平。”

另一电发给中央军委：

“傅之来电转上，该电似非真意，似另有企图，我们拟准其回去，并告以傅作义战犯，现如能下令缴械，则对其本人及其部属可以优待，军委有何指示，盼复之。”

但一切还未来得及，崔载之就走了。李炳泉和报务员、译电员仍留在八里庄。

这次和谈没有成果，只能算是一次接触，彼此时对方的要求和意图，有了一些了解。

## 第二次接触

1949年1月6日上午8时许，一辆吉普车缓缓驶出西直门，守城部队拦车盘查，一个军官礼貌地打开车门，见车上坐着两个教授模样的人。这位军官忽然叫道：“主任，还认识我吗？”

车内的人一愣，少顷，一人含糊地说：“面熟得很。”

那个军官自我介绍起来：“我叫魏树槐，在河曲军官团受训时，您是我们的政治主任。现在我在第一一师当团长，今天奉命在此迎候你们出城。”

被称作主任的人热情地握住军官的手，连连说：“哎呀，原来是你……你看看我的记性，实在是……”

原来车上的人是傅作义派出与解放军和谈的代表，一个叫张东荪，燕京大学教授，民盟华北地区负责人；而被称作主任的叫周北峰，傅作义的少将处长，是傅作义的全权代表。周、张二人是傅作义第二次派出的和谈代表。

军官往西一指，说：“前边一切都安排好了，放心吧。”

周北峰和军官握手告别。

吉普车缓缓启动，很快来到白石桥，路旁立着一个军官，吉普车在道边停住。军官看看车牌，打开车门说：“汽车不能朝前开了，请下车吧。”

周北峰、张东荪下了车，茫然地朝西北望去。军官说：“这是第二道防线，距前沿战壕不过300多米，你们步行到那里后，有人指给你们穿过火线的路线和办法。”停了一下，又说：“这样吧，我给你们写张纸条，交给前边那个军官，他是个连长。”

军官写好字条交给周北峰、张东荪，最后说：“请吧，注意要走马路中间，不要走马路旁的土路，小心土路上埋有地雷。”

周北峰、张东荪各自拎着皮包，拄着手杖，一前一后离开了白石桥。

周北峰原是个大学教授，从1937年起就作为傅作义的代表专门与中共打交道。傅作义与中共的接触，几乎都由周北峰经办。只有这一次的使命使周北峰有一种不胜重负之感。身后的这座古都和二百万市民的生命财产，以及二十几万兵马的安危，都系于这次谈判上。但周北峰有一种感觉，中共对和谈是有诚意的。传闻中共要定都北平，中共当然愿意得到一完整的北平。至于傅作义，自从傅部嫡系主力三十五军、暂三军、暂四军等部被歼后，从北平以西直至张家口，全被解放军控制，退守绥远已不可能。至于下海南逃，由于天津被围，指日可下，这条路也被堵死了。傅作义虽说是一代名将，到此时无路可走，只得甘拜下风，被迫求和。

走不多远，周北峰扯了一下张东荪的衣襟，二人一齐站住了。前边不远的路边有间破草房，房顶的枯草在凌晨的寒风中瑟瑟颤抖，烟囱里冒出青烟一缕。草房四周垛着沙袋。一个军官，正上下打量着他们。周北峰忙把字条递了过去。

连长向前指了指，说：“你们过去吧，从昨天到今天，这里没有枪声，不过还是小心点好，如果听到枪声就卧倒，等那边招手再过去。”

周北峰、张东荪点点头，继续向前，他们小心翼翼、精神高度紧张；这里毕竟是火线。他们谨慎小心地走了100米左右，忽然前方传来喊声：

“站住！”

二人停住脚步，只见前边不远有一座石桥，石桥上站着六七个荷枪实弹的解放军战士，周北峰立即从皮包里取出一面小白旗，这是临行前，中共地下党员崔月犁特意交代的联络工具。周北峰把小白旗摇了几下，对方戒备之态有所松弛，一个战士喊了一句：“可以过来！”

周北峰、张东荪走到战士跟前，一个班长模样的战士说：“跟我来！”

他们很快走进一个大镇子，周北峰认出这是海淀镇。两位教授被带到镇西南角的大屋子里，一个解放军干部出面接待他们。这时周北峰说出联络暗语：“我们找王东。”

那个干部和善地笑了笑：“知道你们要来，首长命令好好接待你们。”

到此时，周北峰紧绷的神经才松弛下来。

之后，他们又到了西山脚下的东北野战军第十三兵团司令部。

程子华热情地接待了他们，并告诉他们：“本来准备请你们今天从海淀去平津前线总部的，可时间已经不早了，还要绕道西山脚下，路也不大好走，今天就请你们在这里休息一晚，明天一早上路，下午即可到总部。”

张东荪、周北峰表示同意，在西山脚下住了一晚。次日早饭后，便与程子华握别，下午4点到了蓟县东南的八里庄。

李炳泉这时以中共工作人员的身份接待了他们。华北军区司令部聂荣臻也特地队平津前线司令部乘车前来欢迎。

谈判前夕，中共中央、毛泽东又电示平津前线指挥部，再次明确谈判的基本方针：只要傅作义让我们和平接收平津，允许他编两个军，可以赦免他的战犯罪，他的私人财产可以保全，其部属的安全和财产也有保障。

饭后，聂荣臻向张、周讲了全国及平津前线的形势。张东荪因年事已高提前休息了，周北峰与聂荣臻进行了单独交谈。



谈话中，周北峰看出中共对傅作义仍有些不信任，便态度诚恳地解释道：“这次傅先生叫我出城商谈，我看是有诚意的。和平解决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的事情，这是一条别无选择的唯一道路了。当然，在具体问题上，还有些周折。”并说：“傅先生也还有不少顾虑，希我们谈得具体些才好。”

次日上午，林彪、聂荣臻和刘亚楼前往张东荪、周北峰的住处，开始正式会谈。

林彪说：“张、周两位先生，你们昨天和聂司令谈的，我们都知道了。今天我们谈一谈傅作义将军的打算、要求和具体意见吧！”

张东荪请周北峰先谈，周说：“昨天夜间，我已给傅先生去了电报，告知我们已顺利到达，今天将正式商谈。复电很简单，只有‘谈后即报’四个字。”

林彪说：“咱们今天先作一次初步会谈。请周先生再告傅作义将军，希望他这次下定决心，放下武器，接受和平解决，才有光明的出路。我们的意见是：所有傅作义将军指挥的军队一律解放军化，所有他管辖的地方一律解放区化。按照这一总的原则，首先解决平津两市的问题，由傅作义将军下令把军队调出平津两城，开赴指定地点。采取整编方式，改编为人民解放军。对傅作义将军不作战犯对待；保全他及其部属的私有财产，并在政治上给他们一定的地位；对在新保安、张家口战役中被俘人员一律释放；对傅作义的部属，一律不咎既往，凡愿参加工作者，都可留下安排适当的工作，愿还乡者，发足路费，填发证明，资遣返乡，并通知地方政府不予歧视。”

接着，聂荣臻着重讲了形势和傅作义的出路问题。他说：“傅作义将军除了按此办法解决平、津的国民党军队，还有可能为人民做件好事外，别无出路。希望傅作义将军早下决心。”

初次会谈后，林彪、聂荣臻叮嘱张、周两位先生多住几天，劳逸结合，过两天再谈。

对这次会谈的情况，周北峰及时向傅作义作了汇报，傅复电希望谈得具体些。两天后的晚上，林彪、聂荣臻又来到张、周住处，进行第二次会谈。会谈内容是：如何改编，使傅作义总部所属军队如何解放军化，所属地方如何解放区化，行政机关如何改组，军政人员如何安排，如何使他们都能很好地为革命工作，等。

周北峰详细谈了傅作义的有关意见，他说：“关于军队的改编，我来时带了个草拟的意见：军队以团为单位出城整编；对新保安、怀来、张家口作战俘虏的人员一律释放，不作战俘对待，对文职人员，也都吸收到新的工作单位继续使用；傅先生所属的军队、行政及文教等人员都予安排，给以生活出路。傅先生说，他追随蒋介石做了些不利于国家、不利于民族的事情，在他率领下跟随他工作的人员或多或少地都犯有不同程度的错误甚至罪行，这一切都由他一个人承担，对于他的所属军政人员的以往罪过，应当请不要追究！”

林彪回答：“你刚才所谈的各地作战被俘人员，前天已经说过，现在我再简单地复述一遍：对在新保安、怀来、张家口战役中被俘人员，都可以一律释放，不再对他们追究以往的责任，用一句成语说，就是‘不咎既往’。凡愿继续工作的都可留下安排适当的工作。不愿工作而要还乡的人员，都要发给资遣费及证明书，还乡后也不会受地方政府歧视。至于傅作义将军，不但不作战犯对待，还要在政治上给以一定的地位，请他放心。”

1月10日上午，双方继续会谈。刘亚楼先宣读了上次会议的记录，征求大家的意见。然后，具体商谈了傅作义所指挥的几十万军队和一些文职人员的安置问题，双方代表达成共识。最后，由刘亚楼负责整理出“会议纪要”，一式两份。双方代表均表示认可。其中在“附记”里规定：各项条款务必在14日午夜前做出答复。张东荪自认为是民盟成员，只在中间当个调解人和见证人，代表不了傅作义将军。因此，只有周北峰以傅作义方面的代表身份，在“纪要”上签名。

这次会议，双方态度诚恳，气氛融洽。林彪兴致勃勃地想送点纪念品给周北峰、张东荪。聂荣臻提议送战利品。苏静突然想起锦州战役时缴获的高筒皮靴，便送给两位和平使者每人一双以作纪念。

周北峰一返回北平，就去中南海傅作义处，向他详细汇报。傅作义看完“会议纪要”后，摇着头说：“谈的问题还不够具体。”周北峰提醒道：“这个文件是我们会谈后归纳整理的，改变各项必须在1月14日答复，还请总司令及早决定。”

傅作义一时难以决定，中共方面又一再催促，无奈之下，他决定再派代表进行会谈。

### 林彪根本没有把打天津放在眼里

第三次出城时间为1月14日。此行代表团由邓宝珊、周北峰、刁可成及邓宝珊一名随从，共4人组成。此次由王克俊亲自从德胜门送出城外，然后他们骑马到解放军联络站，再转道去平津前线指挥部。

邓宝珊乃华北“剿总”副司令官兼陕绥边区总司令。他是傅作义特地派飞机从包头接来北平，出任和谈代表的。

在关键时刻，请出邓宝珊做和谈代表，主要是因为邓宝珊与共产党以至毛泽东多年来有频繁交往。早在抗战时期，邓宝珊就三次途经延安，每次都受到毛泽东、周恩来、朱德、贺龙等人的热情接待，毛泽东曾几次与邓长谈，彼此关系根深。

傅作义刚把他的和谈代表派出，就收到了天津警备司令陈长捷十万火急的电报，说解放军已于上午10点向天津发起总攻。

傅作义给陈长捷的命令还是那句话：“坚决守住。”

其实中共方面原来也希望和平解放天津。解放军在发动总攻前于1月11日致信陈长捷，要求天津守军“和平放下武器”。那封信的副本就放在傅作义的办公桌上——陈长捷、林伟俦、刘云瀚将军：

我即将开始天津战役了，郑洞国是榜样，将军如仿效将为人民立大功，如抵抗只能使自己遭受杀身之祸。希望你们在我们总攻之前，派代表来谈判，在任何地点都可以找到司令部，然后护送你们与我们商谈。

林彪  
罗荣桓

傅作义让参谋长李世杰向陈长捷传达命令：“坚决守住，就有办法。”

陈长捷是傅作义的至交好友，他当然明白所谓“就有办法”，就是把天津当做向中共和谈时讲价还价的筹码。陈长捷自恃天津守备工事坚固，支撑些时日应当无问题，拒绝了解放军的最后通牒。

天津，是有着 200 万人口的华北最大商埠，经过长期经营，它已成为国民党坚固无比的军事要塞。天津素有九河下梢之称，四郊地势低洼，水网密布，不利大兵团作战，子牙河、北运河、南运河、金钟河、墙子河等，成为扼守天津的天然屏障。天津的城防历经日本人和国民党的连年整修加固，碉堡林立，市区内外共有 380 余座大碉堡，小碉堡无计其数。以大碉堡为核心，四周布设地堡群，构成坚固防御体系。此外，环绕全城挖掘了深 3 米、宽 10 米、长近 50 公里的护城河，引进运河、海河水，使护城河水经常保持在 1 米半至 2 米左右。护城河外侧还筑有碉堡群、鹿砦和地雷区以及 20 余处外围据点；内侧修有 5 米高的土墙，墙上没有铁丝网、电网，每 30 米就有一个碉堡；墙的内侧有环市公路，便于调动部队；通往市中心的重要街道，路口均修有碉堡，并埋有了美国造的触发抛射地雷。市中心高大建筑物如中原公司、海光寺等为制高点，配置了强大火力，在守军眼中可谓是固若金汤，坚不可摧。

可是，林彪根本没把打天津放在眼里，只派出了他的年轻的参谋长刘亚楼担任指挥。

刘亚楼的司令部在距天津市区 20 华里的杨柳青，他的计划是指挥 22 个师的大军，拿下天津。刘亚楼心里清楚，敌军工事虽坚，但士气低落，斗志不强，而且敌军虽号称 13 万，真正能战斗的，不到一半。傅作义对这笔赌注期望很高，下的本钱却有限，真正是心有余而力不足。

刘亚楼针对天津地形地貌及国民党军守备的特点，制定了攻击部署：东西并进，拦腰截断。先南后北，分割围歼。

“我的布置是先吃肉，后啃骨头。”刘亚楼诙谐的语言引得他的将领们开怀大笑。

吉普车在坑洼不平的路面上飞奔，车上的周北峰不断地催促着，不断地问：“天黑前能到吗？”

负责接待的解放军王科长安慰他：“天黑前保证能到。”

但周北峰还是心焦。他似乎有一种预感，在这关键时刻，可能会发生什么事。

邓宝珊理解周北峰的心情，但没有做声。

这一次，他们要到通往通县的解放军前线总部。大约一个小时后，汽车来到通县以西五里的五里桥村，这里距解放军平津前线总部所在地的宋庄只有五里。汽车开进一座宽敞的大院停住，邓宝珊、周北峰下了车，看见林彪、罗荣恒、聂荣臻三位将军已经站在大门外迎候。

大家握手问候完毕，中共将领决定休息一夜再说，而周北峰却说：“不累，不累，我们还是现在就谈吧？”

于是，在周北峰的坚决要求下，双方立即开始了会谈。

聂荣臻先发言：“周先生，我们上次说得很清楚，1 月 14 日午夜是答复的最后期限。我们普通过北平城内的同志多次催促，贵方迟迟不做答复，我们只好下达攻打天津的命令了，这次谈判就不包括天津了。你们有什么意见？”

周北峰有些怅然，他想到了来时的预感。此时他才注意到中共将领中刘亚楼将军一直未露面，估计是和攻打天津的战事有关。他用征询的目光望着邓宝珊，问：“怎么办？”

这是一个新情况，涉及到被围攻的天津的命运。邓宝珊回答：“用你的

电台发个电报，请总司令指示。”

周北峰外出发电。邓宝珊问中共将领：“你们计划打多久？”

“三天。”林彪不动声色地回答。

邓宝珊不以为然地说：“三天？恐怕三十天也打不下来。”

这时，聂荣臻以高亢的四川口音火爆地说：“三十天打不下来，那就打半年、一年，反正一定要打下来！”

### 蒋介石希望把校级以上军官接出北平

因要等傅作义回电，14日下午的会谈中断了。

当夜，北平中南海居仁堂内的傅作义彻夜未眠。他给周北峰的回电仍是那句话：“请和邓先生相商，酌情办理。”

战报不断传来。刘亚楼指挥下的四野部队，只用40分钟就突破了国民党军号称固若金汤的天津城防，战斗很快发展到市区。到傍晚时分，天津守军被截成数段，彼此不能相顾，陈长捷不断告急，天津已守不住了，而傅作义仍处在矛盾中。

傅作义的矛盾在于，他想和，却又想为他自己、为追随他多年的部属争取一个更好的出路，为此他要迫使共产党在谈判桌上做出更大的让步。

历史的悲剧，往往在于一念之差。

天津。14日深夜。

陈长捷见大势已去，把林伟俦、刘云瀚、杜建时几位高级军官召集到警备司令部地下室，做最后会商。四个人一致同意放下武器，停止抵抗。在这最后一刻，陈长捷还没有忘记向上峰请示，他要通了北平总部的电话，向参谋长李世杰询问“和谈”的情况，但李世杰一无所知，仍旧说：“再坚持两天就有办法。”陈长捷气得脸色铁青。两天？哪还有两天？他把电话摔在桌上，骂道：“让我们牺牲，作他们讨价还价的资本！”

杜建时说：“管不了那么多了，我们自己发表个‘和平宣言’吧？”

其余三人默默无语。杜建时于深夜邀请天津工业界名士李烛尘、参议会会长杨亦周，商议写了份放下武器的“和平宣言”，由杨亦周在电台广播。

当这个“和平宣言”在战火纷飞的城市上空响起时，已是15日凌晨。解放军正在扫荡残敌，战斗接近尾声。

深藏在警备司令部地下室里的陈长捷忐忑不安，他的“和平宣言”还没有向傅总司令报告。

15日清晨，在他的指挥部外边响着激烈的枪声的时候，陈长捷再次要通北平总部的电话。这次接电话的是傅作义，陈长捷报告了战况和夜间会商和平的情况。傅作义在电话中略为沉吟，答道：“那就接洽和平吧。”语气无可奈何。

陈长捷手捏着话筒还想说什么，解放军战士已冲进地下室，几支枪口同时逼住他：“不许动！”

陈长捷对着话筒本能地喊了一声：“他们来啦……”

但他已经不可能再多说什么了，一位解放军战士劈手夺下了他的话筒。

“他们来啦……”这是陈长捷作为军人，向他的长官报告的最后军情。

电话的另一端，傅作义像被雷击倒的大树，跌坐在沙发里，话筒掉在地板上。他痛苦地闭上眼睛，眼角渗出两粒泪珠……

当海河两岸的枪炮声渐渐止息的时候，后来在历史上著名的“通县谈判”正式开始了。

16日上午9时，几辆吉普车停在邓宝珊、周北峰的下榻处。林彪、罗荣桓、聂荣臻以及解放军平津前线司令部作战处处长苏静、华北军区作战处处长唐永健鱼贯而入。邓宝珊、周北峰与中共将领一一握手。周北峰等人注意到，挂在中共将领脸上的笑容比以前少了，会议室的气氛比往日凝重了许多。

邓宝珊、周北峰已知道天津被解放的消息。邓宝珊强作镇静，谈笑依旧，周北峰的限里却蒙上一层阴影。天津失陷，傅作义手中的资本更少了。

上午的谈判，双方进行意向性的发言。林彪复述了中共对和平解放北平的各项政策，但措辞较以前严厉：“我们希望傅作义先生真正拿出和平的诚意。可以坦率地讲，留给他的时间已经不多。”

邓宝珊依然吸着香烟，一副成竹在胸的样子。他发言说：“我相信傅先生是有和平诚意的，否则就不会派我们出城了。但也希望贵军能谅解他的苦衷。现在北平城内大部分是国民党嫡系部队，傅先生自己的部队不多，一旦稳不住局面，就会出大问题。其次，有一个情况你们可能不了解，故宫城墙里藏了几万吨黄色炸药，国民党特务又多，要搞个爆炸，全城都完了。这些情况，傅先生不可不虑。时间拖得是长了些，情有可原嘛。”

中共将领们详细询问了城内情况。

聂荣臻最后发言说：“我们双方立场基本一致，下午可以开始进行实质性谈判了。”

双方没有异议。

下午继续谈判，就对傅部军队的改编原则与具体办法，以及“华北剿总”和部队中团级以上人员的安排等问题交换了意见。会谈一直进行到深夜，整理归纳出10项条款。周北峰认为，这些条款傅作义是能够接受的，原先他还担心中共会因天津战役而抬高要价，看来他多心了。一块石头落地，他变得轻松起来。

谁知会谈就要结束时，双方发生了激烈争执：何时正式公布《和平协定》？

林彪浓眉紧锁，语调中透出不可动摇的威严，他说：“我认为，协定签署后，应在三天之内公开发表，北平城内形势很复杂，以免夜长梦多！”他的意见得到罗荣桓、聂荣臻的支持。

但邓宝珊却坚持一周后发表。他说：“正因北平城内形势复杂，所以应给傅先生多留一些时间做好准备。你们应该相信傅先生，他有能力控制局势，但你们不要对他逼得太急！”

争论的结果，双方谁也说服不了谁。最后邓宝珊提议，把两种意见一齐电报中共中央，请毛泽东主席定夺。

17日上午无事，等待中共中央的回电。下午，中共将领来到邓、周住处。

一见面，林彪便满面笑容地说：“邓先生，毛主席复电，指示我们尊重你的意见。那么，我们之间的分歧便圆满解决了。”

邓宝珊笑得很开心，附和道：“对，现在我们的意见完全一致。”

聂荣臻又对邓宝珊说：“关于绥远问题，党中央指示留待以后解决。如果北平的和平解放能够顺利完成，绥远的问题就好解决了。毛主席的指示是，将采取一切更缓和的方式解决。”

聂荣臻的话给会议室带来欢乐的气氛。会谈至此告一段落，随即双方代表签署了北平和平解放的初步协定。最后决定由邓宝珊陪同解放军苏静处长

进城，与傅作义做进一步会商，周北峰则留在通县联络。

当夜，聂荣臻设宴为邓宝珊饯行。中共将领中除了林、罗两位首长外，还有刘亚楼、陶铸出席作陪。刘亚楼的露面，使聂荣臻的客人感到一些小小的不舒服。对一位凯旋的将军，本应献上赞美之词，可是这种话无论是邓宝珊还是周北峰都难以启齿，他们极有分寸又合乎礼仪地与刘亚楼寒暄几句。刘亚楼当时只有38岁，英姿勃发，热情奔放，虽然战功赫赫，却不曾有丝毫骄矜傲慢之态。他的彬彬有礼，使邓宝珊、周北峰暗暗钦佩，深感中共人才济济，战胜国民党绝非偶然。

南京政府和美国一直注视着平津方面的动向，国民党的特务更是注视着傅作义的一举一动。

解放军和傅作义的代表在和谈期间，国民党南京政府及美国政府先后4次派人来到北平，对傅作义进行劝说，希望他从速率部南撤。

第一次是1948年12月15日，蒋介石派他的军令部长、原晋绥军高级将领徐永昌飞到北平，劝老朋友傅作义部队分两路南撤：一路是海路，由塘沽新港撤到青岛；一路是陆路，由天津、河北，经山东半岛的胶东到青岛，而后待命南撤。

傅作义盘算着，率领“中央军”和自己苦心经营了20多年的晋察绥嫡系部队南撤，走海路比较安全，走陆路要通过解放军层层包围，沿途伤亡将会很大，而且北方官兵到南方去，生活不习惯，何况自己又非蒋介石嫡系，把军队送给他以后，将来的状况很难预卜。

傅作义不能不想到卫立煌。东北是由蒋介石自己瞎指挥，断送给共产党的。东北“剿总”总司令卫立煌追随老蒋多年，已是他的嫡系高级将领，最后还是成为老蒋的替罪羊，被撤职查办，软禁在南京。而傅作义是被视为杂牌队伍的，去年到了万不得已时，蒋介石才把指挥华北几十万军队的大权交给他，南撤必无好结果。

于是，傅作义对徐永昌说，从今天实际情况看，已不可能冲出共军的包围，只有像苦守涿州那样固守平、津、察、绥了。

徐永昌对于傅作义的婉言回绝，没有办法，只有从天坛临时机场起飞，回南京复命。

第二次是1948年12月23日，即徐永昌回南京后的一个星期。蒋介石催促傅作义南撤之心未死，又派其子蒋纬国带着他的亲笔信飞北平。信的内容为：“双十二事变”上了中国共产党的当，第二次国共合作，是生平的一大教训。现在，你因处境又主张和共产党合作，我要借此一劝，特派次子纬国前来面陈，请亲自检查面陈之事项。

蒋纬国当面陈述了蒋介石的意见：只要傅作义由海陆两路撤至青岛，就可由美军援助南撤。蒋介石表示，“千军易得，一将难求”，一定正式任命傅作义为东南军政长官，统帅所有国民党军队。

傅作义先表示感谢“委座一番好意”，然后无可奈何地叹道：“现在已是四面楚歌，南下不可能了，只有与古城共存亡，以报委座厚爱。”

蒋纬国无奈地空着双手，飞回南京。

第三次是1949年1月6日，蒋介石又派了他的国防部次长、军统特务头子郑介民飞北平。郑介民除重弹徐永昌、蒋纬国的老调外，又补充说明，在北平的军统人员可密切配合南撤行动，并保证所属的军统人员，绝对服从傅总司令的指挥，就像服从蒋委员长的指挥一样。但傅作义仍以南撤已不可能，

惟有固守北平古城相答。

第四次是由美国亲自出面。就在国民党军队难保平津之际，美国派西太平洋舰队司令白吉尔匆匆飞到北平，做傅作义的工作。白吉尔向傅保证：“我们美国今后将绕开蒋介石，直接支持阁下。美国海军还将在中国的渤海、黄海、东海沿岸，直接帮助您的部队南撤。”

值此解放军大兵压境之际，美国援助已难解燃眉之急。傅作义微笑着说：“我是南京‘国民政府’领导下的地方军政长官，怎好直接接受贵国援助？”

白吉尔意识到，对这位华北“剿总”总司令已不能再抱什么希望了，只好哀叹美国行将失去其在平津及华北的利益。

就在山穷水尽、无计可施的时候，蒋介石于1月17日晚给傅作义发来电报，内容大致如下：

你我相处多年，彼此相知甚深。你现在厄于形势，自有主张，无可奈何。现只求一事，即于18日起派机至平，接李文、石觉部少校以上军官和必要之武器，约需一周时间，望念多年契好，务予协助，并希即复。

傅作义拟了给蒋介石的复电后，立即找来王克俊商量对策。王灵机一动，拟了个致解放军平津前线司令部的电报，告知蒋介石电报的内容，希望围城部队的炮兵，能阻止飞机着陆。

傅作义也觉得此法很妙，但为了保密起见，他要王克俊先发电给周北峰，再让周转给林彪、罗荣桓、聂荣臻3位将军。

1月18日，南京派来的飞机飞临北平上空时，北平城外的解放军炮兵严密封锁了天坛机场的空域，使飞机无法着陆。蒋介石企图空运嫡系部队将校级军官及部分装备的计划落空了。

### “和平协议”与北平守军的混乱

经过双方和谈代表的通力协作，协议终于在1949年1月19日达成，具体协议共18条。平津前线司令部的代表苏静，傅作义方的代表王克俊、崔载之，分别在《协议》上签了字。

签完字，崔载之十分兴奋地说：“我们草拟协议的这个地方，就是当年袁世凯外交次长曹汝霖与日本公使签订丧权辱国‘二十一条’的地点。‘二十一条’签订的消息传开后，全国民怨沸腾，一片抗议之声。今天，我们这18条公布于众，人民一定会欢呼庆祝的！”

苏静笑答说：“一个卖国，一个爱国，人民群众当然是会区别对待的。”

《协议》全文如下：

为迅速缩短战争，获致人民公意的和平，保全工商业基础与文物古迹，以期促成全国彻底和平之早日实现，使国家元气不再受损伤，经双方协议公布下列各项：

- 1、自本月22日上午10时双方休战。
- 2、过渡期间，双方派员成立联合办事机构，处理有关军政事宜。组织与人选详见附件。
- 3、城内部队兵团以下（含兵团）原建制、原番号自22日开始移驻城外，于到达指定驻地约1月后实行整编。
- 4、移驻城外之部队可携带一星期之补给量，而后由联合办事机构负责补给。

5、华北总部成立结束办事处，其工作为对出城部队之管理约束，并与联合机构联合办理出城部队之补给事项，其结束之时间俟以上工作已逐步移交予人民解放军前线司令部及其补给机构接管完毕时为止。

6、城内秩序之维持，除原有警察及看护仓库部队外，根据需要暂留必要部队维持治安，俟解放军警卫部队入城后，逐次接替之。但傅先生仍停留必要之警卫部队。

7、北平行政之所有中央、地方在平之公营公用企业、银行、仓库、文化机关、学校等暂维现状，不得损坏遗失，听候前述联合办事机构处理，并保障其办事人员之安全。

8、河北省政府及所属机构暂维现状，不得损坏遗失，听候前述联合办事机构处理，并保障其办事人员之安全。

9、金圆券照常使用，听候另定兑换办法。

10、军统、中统情报人员停止活动，听候处理，除违背此项命令别有所图，从事破坏有确凿证明者依法处理外，一律不究既往。

11、一切军事工程一律停止。

12、在不违背国家法令下，保护在平各国领事馆、外交官员及外侨生命财产之安全。

13、联合办事机构成立后，即释放政治犯，原战场被俘高级军官于北平接管后一律释放（中下级军官可随时释放）。

14、原华北区伤患官兵之医疗、伤亡者之安葬、遗族之抚恤、军眷之安置，在双方协助下，仍由华北总部结束办事处分别妥为办理。

15、邮政电讯不停，继续保持对外联系（派军事代表检查）。

16、各种新闻报纸仍继续出刊，俟后重新审查登记。

17、保护文物古迹及各种宗教之自由与安全。

18、人民各安生从业，勿相惊扰。

东北野战军前线司令部代表 苏 静

华北总部代表 王克俊 崔载之

随后，苏静又将上述和平解放北平问题的实施方案写成 14 条要点，电报请示平津前线司令部林彪、罗荣桓、聂荣臻 3 位首长。林、罗、聂立即将苏静的电报及自己对 14 条的有关意见，电报请示中央军委和北平市委书记彭真、北平军管会主任叶剑英。

中央军委于 1 月 21 日凌晨复电，同意和平解决北平问题的实施方案。同日，林、罗、聂联名给苏静发出指示信，就 14 条要点中的有关问题作出明确答复：同意成立联合办事机构处理过渡期间的军政事宜。此机构由 7 人组成，我方为主任，傅方为副主任；我方 4 人，傅方 3 人；我方以叶剑英、陶铸、戎子和、徐冰参加；傅方之 3 人由傅指定。德胜门外由杨得志部队与守城部队联系，西直门外由程子华部队与守城部队联系。一切干部必须经过我们同意及任命的原则下，同意来电所提意见。联合办事处系临时性质，接收完毕后，就一切归军事管制委员会。邮电不停，由我们派军事代表检查，各种报纸仍可继续刊出，但同时须重新登记审查。

就此，中共方面已经正式批准了和平解放北平的协议。

人们的注意力转向了派系机构复杂的北平城。

1 月 21 日，傅作义决定召开高级将领会议，宣布和平解放北平的决定。



一大早，傅作义就早早来到勤政殿，在殿门外遇到正在忙着的王克俊，他低声问：“都准备好了吗？”

王克俊对傅作义的早到，有点意外，但从总司令的眼神中，他捕捉到一种亢奋与沉重交织的复杂目光，他宽慰傅作义说：“请总司令放心，这里一切有我。总司令还是歇会儿吧，今天的会，大概挺费神的。”

傅作义点点头。他对这位聪明干练的部属一向倚重，此时，他用眼睛扫巡一下四周，语重心长地说：“你办事，我一向放心。不过，今天的事，关系重大，成败在此一举了，出不得半点岔子。”

王克俊笑道：“就那几个人，谅他们也拉不出硬屎了，您尽管放心好了。”

傅作义笑了笑，回到自己的办公室。

刚签字的《关于解决北平问题的协议》今天要向兵团师以上将领传达。王克俊按傅作义的指示，做了周密的准备，前天夜里，故宫午门前的两厢朝房里，已悄悄调进一个团，随时待命。在勤政殿四周，埋下了伏兵。早几天，在解放军代表苏静进城之前，傅作义就已命令警备司令安春山在全城加强戒备，严密监视中央军动态。

9点50分，前来开会的将领陆续到达，傅系将领有郭宗汾、梁述哉、张濯清等人，蒋介石嫡系将领李文、石觉最后走进会场。李文平日为人还较随和，这两天却脸色发青；身材矮小的石觉更是满脸杀气。二人走进大殿，目不斜视。

10点正，傅作义在李世杰、王克俊等亲信幕僚的簇拥下，走进会场。全体将领起立，行注目礼。傅作义还礼后，说：“请坐。诸位将军，今天有一件事向大家宣布。我军与共军接洽和谈已有多日了，因一直未有结果，所以未向大家公布。前天，19日，我军与共军达成了《关于和平解决北平问题的协议》，和谈总算有了一个结果。……”

话音未落，李文、石觉一起跳起来，高声叫喊：“当降将，我们不干！”“决不投降共产党！”

会场气氛顿时紧张起来，所有的目光都集中到傅作义身上。傅作义泰然自若，面带微笑地说：“二位将军，且莫性急，等听听这个协议不迟，现在请王克俊将军宣读。”

王克俊打开公文夹，高声宣读。读完，会场鸦雀无声。沉寂片刻，傅作义的目光扫视所有在场人员，开口道：“大家都听清楚了？有什么意见，可以发表。”

郭宗汾等傅系将领一一发言，说是和平解决，顺从民意，大势所趋，这是唯一的出路云云。

而李文、石觉却一言不发。

傅作义点名道：“李将军、石将军，你们有什么意见？”

李文沉着脸，说：“我说不出什么意见来。”

石觉冷眼扫视四周，傲然问道：“你们这样做，对得起领袖蒋总裁吗？”

傅作义冷笑道：“这个不忠的恶名，由我一人承担好了。我现在宁肯负他，不能负北平二百万黎民百姓，不能负追随我多年的弟兄。”

李文哼了一声，说：“可是，我们的弟兄怕是不会同意投降共军的。”

傅作义面带讥讽地调侃道：“噢？中央军里会有这样的人吗？”李文似乎受到了侮辱，他涨红着脸说道：“怎么会没有，就是克俊的部下，我们两个兵团的政工处长，他们有意见。”

石觉附和道：“他们不同意，我也没办法。”

李文乘机起身道：“此事关系到生死存亡、军人的荣誉，我们还要和部队从容商议。”说完，拉起石觉就往外走。

傅作义把手一招，叫道：“二位将军且慢走，会还没有开完嘛。”

李文、石觉头也不回地往外走，但在殿门口，就被两名警卫挡住了去路。王克俊笑吟吟地走过来，说：“没有总司令的命令，谁也不能离开会场。”

石觉大声呼叫：“卫兵！卫兵！”

可他随身带来的卫兵已不见踪影，只见大殿四周全是傅作义的士兵。李文、石觉只得快快回到座位。

李文问：“傅总司令，你莫非要扣留我们？”

傅作义没有理他，说：“时间不早了，快到吃午饭时间了，休息会儿吃饭，饭后再议。今天请大家吃曲园菜馆的清蒸甲鱼。”众将领纷纷起身向饭厅走去，李文、石觉六神无主，只得尾随着众人而去。

傅作义与王克俊交换了一个会心的眼色，王克俊趁大家去饭厅吃饭的功夫，匆匆离开勤政殿，来到自己的办公室，命令值班人员，火速通知师以上政工处长，15分钟内到中南海开会。

政工处长们风风火火地赶到。点完名，王克俊气势威严地说：“奉总司令的命令，有一个文件，即刻要向部队传达，在传达之前，要听听各位处长的意见。”然后他宣读《关于和平解决北平问题的协议》的条文。读完，王克俊目光烁烁，说：“大家都说说。”各处长们逐一表态。除李、石两兵团的政工处处长外，大家都表态赞成协议。

王克俊双手抱胸，居高临下地望着这两位处长，说：“二位处长，有什么话请直说吧。”

在周围气氛的无形压力下，两个处长显得惶惶不安，彼此看了一眼：“是战是和，该由主管们决定。事已至此，我们要求走。”

王克俊神色缓和下来，干脆地说：“可以，愿意走的，可以走。但有一条，由你们向部队传达这个协议，还要保证你们的部队不出事情，把工作做好，不响一枪，不伤一人，不毁一物，遵守纪律，圆满实施‘18条’以后，我保证请傅总司令把你们送上南京来接的飞机，保证你们的安全。否则……”

两个处长如释重负地说：“这点我们可以保证，说实在的，当兵的早不想打了……”

王克俊办完事，来到餐厅，附耳向傅作义汇报毕，傅笑着点点头。

饭后继续开会，李文、石觉仍坚持要同政工处长商量。傅作义莞尔一笑，轻松地说：“不必了，刚才在你们吃饭的时候，克俊已经召集了师以上政工处长会议，政工处长们对协议没有异议，只是你们俩的处长，提出要走。克俊已做了答复，在保证实施协议的前提下，可以走，他们已做了保证。是不是这样，克俊？”

王克俊点点头道说：“如果你们不相信，可以打电话问问你们的处长。”

李文、石觉的脸都楞黑了。此时，他们方寸已乱，只得说：“既是如此，不必打电话了。我们要求走。”

傅作义慷慨地说：“走可以，我保证各位的安全，保证各位顺利地去南京，但条件是：你们的部队不能出问题。”略一停顿，他语气变了，“我傅某说话算数，但如果有人要捣乱……”

李文、石觉的心理防线已全线崩溃，他们连声说：“我们保证，部队不

会出问题……”

傅作义的嘴角露出一丝笑容。

三天后，李文、石觉和“中央军”愿走的高级将领及北平中统、军统特务头子，从东单机场飞离北平。

北平实现和平解放的最后障碍被消除了。

### 傅作义向毛泽东敬礼，说“我有罪”

1月21日当天，傅作义宣布北平城内的国民党军队接受和平改编，并颁布《关于全部守城部队开出城外听候改编的通告》。双方达成的协议，由傅作义交国民党北平中央通讯社向国内外公开发表。次日，新闻界及各报纸就抢先发表了傅作义的文告及北平和平解放的实施条文。国民党中央社也发表了傅的文告。

北平大街小巷，大家争看公告，都在探询解放军入城的消息。男女老幼都洋溢着喜悦的心情。

1月22日，北平《平民日报》刊登了和平协议的主要条文。

北平市民看到协议后，纷纷奔走相告。人们欢呼：“北平解放了！”

大街小巷，人们围着一张张公告。凡是登有协议条文的报纸，一上街即被抢购一空。

压在人们心头的恐惧、苦闷似乎一下子消失了。

古都北平，呈现出一片和平景象。

同一天，国民党华北“剿总”的部队和人民解放军的攻平部队正式休战，国民党部队开始移驻城外。驻守南城陶然亭、先农坛一带的傅系骑兵四师师长刘春方，在部队出城开赴改编地点时，要求官兵一定要遵守纪律，出好城，保证不放一枪，不毁一物，不伤一人，给北平市民留下好印象。

到1月30日中午12点，除留守的一〇四军一部和三十五军十七师担负各城门的警卫外，其余各部已陆续开赴城外，共计25个师，20余万人。

30日下午，傅作义率领他的华北总部，乘车离开中南海，回到北平西郊罗道庄的总部旧址。

1月31日下午，莫文骅将军率领人民解放军接防部队首先进入北平城区。

西直门的城门口，4名解放军战士在班长的口令下出列接岗。国民党的卫兵和解放军战士互敬军礼后，撤下岗哨。

人们围观着进城的解放军队伍，一片欢腾。

2月1日，北平出版的《人民日报》全文刊登了东北野战军司令员林彪、政治委员罗荣桓1月6日给傅作义将军的书面通牒。

通牒一一列举了傅部在进攻解放区时所犯下的罪行，指出：

“北平被围变更已月余，人民痛苦日益增重。本军一再推迟攻击时间，希望和平解决，至今未获结果。贵将军身为战争罪犯，如果尚欲获得人民谅解，减轻由战犯身份所应得的罪责，即在最后时机，遵照本军指示，以求自赎。”

……如果贵将军及贵属竟敢悍然不顾本军的提议，欲以此文化古城及二百万市民生命财产为牺牲，坚决抵抗到底，则本军为挽救此古城免受贵将军及贵属毁灭起见，则实施攻城。……城破之日，贵将军及贵属诸反动首领，

必将从严惩办，决不宽恕，勿谓言之不预。”

傅作义以前没看到过这份通牒，现在在报纸上看到通牒语气强硬，感到十分突然。他越看越气，愤怒、怀疑和担心袭上心头。

他的情绪变化很快被反映到人民解放军平津前线司令部，接着又反映到毛泽东那里。

2月3日下午，林彪、聂荣臻等与傅作义见面畅谈。傅作义得知了事情的原由，听到林彪说今后断然不会再有不利于将军的行为，并拟请他参加中央政府工作后，他心中的不满和疑虑消失了。

2月22日，傅作义和邓宝珊从北平乘一架民用飞机赴石家庄，再乘车转西柏坡见毛泽东。

毛泽东身穿粗布灰色棉制服，与朱德一起来到接待室。

傅作义见到毛泽东后，急忙走上去，先举手行了个军礼，然后与毛泽东紧紧握手。

“我有罪！”这是傅作义说出的第一句话。

毛泽东态度温和地说：“傅将军，你做了一件大好事，人民是不会忘记你的。”

当晚，毛泽东在与傅作义谈话时，又风趣地说：“过去，我们在战场上见面，清清楚楚，现在，我们是姑舅亲戚，难舍难分。蒋介石一辈子耍滑头，最后还是你把他耍掉了！”

听了毛泽东的这番话，傅作义心中疑虑完全消失了。毛泽东和共产党已经把他当亲戚朋友对待了。

24日，傅作义、邓宝珊回到北平。

1949年3月25日，毛泽东、朱德在北平西苑机场检阅人民解放军，特地邀请傅作义与邓宝珊参加检阅仪式。当看到受阅部队威武雄壮，清一色的美式装备，傅作义内心感受很深。几天后，在松柏常青的香山，傅作义、邓宝珊等人又一次受到了毛泽东的接见和宴请。令他感动的是，在3月下旬，中共军队释放了在张家口、新保安等战役中被俘的人员，对他们一律予以宽大处理，并送回北平。

1949年4月1日，傅作义向全国发出北平和平解放的通电：

中共中央毛主席、全国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民主人士及国民党中的爱国朋友们：

北平的和平工作，自1月22日开始，现已圆满完成。地方未曾遭受破坏，人民的生命财产，没有遭受损失，文物、古迹、工商、建筑，也都得到保全。北平的和平解决，蒙全国各方所称许，认为是实现全国和平的开端。现在当全国和平商谈之际，在这个时候，我愿把我的认识和意见，向全国各方说明。

两年半的内战，我个人内心和行动，主观和客观，是在极端矛盾中，痛苦的斗争着。北平和平的实现，就是由认识到行动，自我痛苦斗争的结果。现在回忆既往，我感觉我最大的错误，就是执行了反动的戡乱政策。我们在实行所谓戡乱的时候，每天说的虽是为人民，而事实上一切问题，都是处处摧残和压迫人民。我们的部队，在乡村是给大地主看家，在城市是替特权、豪门、贪官、污吏保镳。我们不仅保护了这些乡村和城市的恶势力，而且还不断地在制造和助长这些恶势力。种种错误的恶因，反映在政治上，就是糜烂；反映在经济上，就是崩溃；反映在文化教育上，就是控制和镇压青年学

生的反抗；反映在社会上，就是劳苦大众的生活，一天一天的贫困，上层剥削阶级奢侈淫糜的享受，一天一天的增高；反映在外交上，就是依附美国；反映在军事上，就是由优势变劣势。所有这些都是因为违反了人民的利益，所以得不到人民的支持，最后为人民所抛弃。中国共产党为什么成功呢？这是因为共产党以工农大众和全国人民的利益为基础，在乡镇彻底解决了土地问题，得到了广大农民的拥护；对城市工商业，实行公私兼顾、劳资两利，铲除官僚资本，保护民族工商业的发展。共产党的民族联合政府的主张，已经得到全国各民主党派和人民的拥护。新民主主义不但科学的解释了革命的三民主义内容，而且正确的说明中国革命的去、现在和将来。新时代的民主革命，已经不是属于旧的范畴，而是属于新的范畴，必须有工农阶级和代表工农阶级的共产党领导，才能保证革命政策的彻底执行和革命任务的彻底完成。共产党人既然对于历史有了正确的认识，又有为人民服务的艰苦奋斗的精神，所以一天一天的得到成功。正确的政策是真正和平的前提，也是真正和平的保障。所谓戡乱政策，既然完全错误，共产党的新民主主义既然完全正确，我们就必须公开反对所谓戡乱政策，真诚的实现和平，不应该再三徘徊，违背人民的愿望。北平的和平，就是遵从人民的意志与愿望，勇于自责，勇于负责的认识和行动，符合于正确的政策，符合于毛泽东先生所提出的八项和平条件，这种和平是真正的和平。一切有爱国心的国民党军政人员，都应该深切检讨，勇于认错，以此和平为开端，努力促使全国和平迅速实现。然后国家才能开始建设。今天，中国人民民主事业，是以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工农联盟为基础，团结全国各民主党派、国民党的进步人士和全国各民主阶层，共同奋斗。这已经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作义本此认识，今后拥护中共毛主席的领导，实行新民主主义，和平建设新中国。

傅作义

1949年4月1日

第二天，毛泽东欣然提笔给傅作义写了复信：

傅作义将军：

4月1日通电读悉。南京国民党反动政府发动反革命内战的政策，是完全错误的。数年来中国人民由于这种反革命内战所遭受的浩大灾难，这个政府必须负责。但是执行这个政策的国民党反动政府的文武官员，只要他们认清是非，幡然悔悟，出于真心实意，确有事实表现，因而有利于人民解放事业之推进，有利于用和平方法解决国内问题者，不问何人，我们均表欢迎。北平问题的和平解决，贵将军大有劳绩。贵将军愿意今后站在人民方面，参加新民主主义的建设事业，我们认为这是很好的，这是应当欢迎的。

毛泽东

1949年4月2月

傅作义的通电与毛泽东的复信，经新闻媒介传播，跨过长江，飞越天山，对敌人营垒的分化瓦解，对湖南、云南、绥远、新疆等地的和平解放，乃至对全国的解放都有着极为重大的影响。

鉴于傅作义将军的这一贡献，1955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决定授予他一级解放勋章，而且由毛泽东亲自给他佩戴到胸前。

傅作义由此成为千古功臣。

## 第四章 中南海易主

解放军的入城式令北平万人空巷，洋人躲在使馆区玻璃窗后偷偷窥看。旧北平市长交出大印，听候新政府处置。北平潜伏敌特电台多达 300 多部，毛泽东只得暂住香山双清别墅。傅作义警卫部队连续冲击中共首脑机关，被解放军强行缴械。数月后，毛泽东搬进中南海，一住 27 年。

### 接管北平万事齐备

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对北平的接管工作极为重视。中共北平市的组织机构和主要负责人确定以后，彭真、叶剑英等抓紧进行接管的准备工作。

北平，地处华北平原的北端，在春秋战国时代，是燕国的都邑，称为“蓟”。以后，金、元、明、清都建都于此。明朝洪武元年，改名为北平；明永乐元年，北平又改为北京。1928 年，国民党政府把北京又改为北平。

经历了一代又一代王朝的治乱兴衰之后，北平即将开始一个新的时代。

为了接管好这座世界名城，中共中央、中共中央华北局、中共北平市委早就开始进行各种准备工作。从 1948 年 11 月开始，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就对北平的接管问题发出了一系列指示。

河北保定城于 11 月下旬解放后，彭真等人就按照中央关于接管北平的有关指示，赶到保定，着手各项准备工作。一批奉命到保定集结的接管干部很快从各解放区来到保定，短短几天内，保定便云集了一支 1100 人的接管大军。

经过紧张筹备，12 月 17 日，中共北平市委在保定召开了第一次会议。会上宣布了中共中央、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华北人民政府批准和任命的北平市的组织机构及主要负责人名单：

彭真任中共北平市委书记，叶剑英任第一副书记，李葆华任第二副书记，刘仁、徐冰、赵毅民、谭政、萧明、韩钧等为委员。其中，刘仁为组织部长、赵毅民为宣传部长，叶剑英为市长，谭政为军管会副主任，徐冰为副市长，韩钧兼军管会秘书长；程子华为北平市警备司令部司令员兼政委，彭明治、吴克华为副司令员、莫文骅为副政委。

根据中共中央和华北局的指示，这次会议主要讨论了几个问题：

（一）军管会的组织机构和人选。

（二）进城后急需解决的思想问题。例如如何保持发扬无产阶级思想作风的问题；如何正确地地区别对徐旧的国家机器与产业机构的问题；如何紧紧地依靠人民群众管理建设好城市的问题等。

（三）进城后要做的几项具体任务：第一，要消除混乱，安定秩序；第二，要按系统全面进行接管；第三，要肃清潜藏的敌特分子；第四，要注意已接管到的物资，尽先满足军队的物资需要；第五，要千方百计地解决城市居民灯、粮等主要生活必需品的供应。

（四）入城工作人员要遵守的纪律：第一，生活一切照旧，保持原来朴素整洁的习惯；第二，缴获接收的一切物资，全部归公，不得私用一草一木；第三，凡涉及人民人权、财权的问题，非经上级批准，任何人无权处理；第四，有关外侨问题具体之处理，由军管会主任负责，重大者须经市委讨论并

报告和请示中央批准，任何人不得擅自处理；第五，对外发表主张，如不是属于党的既定政策，党已有原则确定者，须事先请示批准；第六，任何地区、任何建制的人员，入城后均须服从军管会统一领导与约束，不得有违。

当天晚上，北平市委率接管人员从保定启程，于 18 日凌晨到达涿县，在这里同中共中央统一调配陆续前来准备接管北平的部分干部汇合。在涿县，市委继续召开会议，具体讨论金融和北平市委机关报问题，初步决定报纸命名为《人民日报（北平版）》，报请中共中央批准。

19 日，北平市委将两次会议的精神向到达涿县的全体干部做了传达。

20 日凌晨 6 时，市委又率接管人员赶到长辛店。21 日，中共北平市委发出了成立后的第一个文件——《关于如何进行接管北平工作的通告》。《通告》把两次市委会议的精神以文件的形式确定下来，发给北平各级党组织。

由于长辛店离北平太近，敌人尚未放下武器，为保证安全，接管队伍于 21 日晚移住房山良乡。

接管队伍在良乡停留约 1 个月，又有一些干部陆续前来报到，良乡周围的村子里也住满了人。叶剑英、彭真抓紧时间训练干部，做入城的各种准备工作，同时还抓紧时间，领导制定关于接管工作的各种文件、规定、纪律、守则，成立各种机构。

1949 年 1 月 1 日，北平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发布成立公告。根据北平市军事管制委员会组织条例，军管会下设：（一）警备司令部兼防空司令部。（二）市政府。其下设有民政局、财政局、教育局、卫生局、公安局、公用局、工务局、工商局、外侨管理处、贸易公司、人民法院及银行等机构。（三）物资接管委员会。其下设有财经部、交通部、卫生部、军政部、房土地产部。（四）文化接管委员会。其下设教育部、文艺部、文物部、新闻出版部。（五）在秘书长领导下设秘书处、供给部、行政处。

同日，北平市人民政府发布成立布告。

1949 年 1 月下旬，接管北平的各项准备工作基本完成。

### 万人空巷的解放军入城式

北平和平解放协议签订后，叶剑英和参加接管北平的主要负责人移驻颐和园，开始北平的接管工作。

1 月 28 日，叶剑英按协议的有关条款，致函傅作义：

宜生先生勋鉴：

联合接交机关拟于明日（二十九日）下午二时在城郊开筹备会，请转告贵方参加人适时到会为荷！

傅作义收到信后，于 29 日上午复信叶剑英：

剑英先生勋鉴：

一月二十八日大函敬悉，兹派郭宗汾、焦实斋、周北峰前往参加，即请查照并颂

时祺



傅作义  
一月二十九日

1月29日，解放军代表叶剑英、陶铸、徐冰、戎子和等与傅作义的代表在颐和园举行了第一次会议。

双方经过商讨，最后做出以下几项决定：（一）议决此次会议即为联合机构之成立会议；（二）议决在本月31日上午（12时前）北平城中所有之国民党军一律撤出，开至规定地点，当日由人民解放军入城接防；（三）钞票问题，入城后废止金圆券之使用，在就地印钞厂印人民银行流通券，印刷机器、工人等由郭宗汾负责；（四）决定联合机构设在东交民巷旧日本大使馆内，并即规定办公时间，依时上班办公。

2月1日，联合办事机构在颐和园景福阁举行第二次会议。叶剑英、陶铸、徐冰、戎子和、谭政和郭宗汾、焦实斋、周北峰等8人参加了会议。

此次会议决定：（一）本机构名称定为：北平联合办事处；（二）办事处组织机构：军事、财经、文教行政等组，另设正副秘书长，下设秘书若干人；（三）北平联合办事处主任为叶剑英、副主任为郭宗汾。军事组由陶铸、郭宗汾负责；财经组由戎子和、周北峰负责；文教行政组由徐冰、焦实斋负责。

北平东交民巷御河桥2号，挂上了“北平联合办事处”的大牌子。

2月2日，中共北平市委和北平军管会入城办公，并向全市发布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北平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入城办公布告》：

本会前奉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电令成立，为全区军事管制时期的权力机关，统一全区的军事和民政管理事宜，剑英等业于一月一日在郊区布告就职视事。现因北平全市已告解放，本会于本月二日移入城内办公，继续遵照中国人民解放军平津前线司令部约法八章，保障全体人民的生命财产，维护社会治安，确立革命秩序，仰我全市人民同心协力，为彻底完成军事管制时期的紧急任务及人民民主建设事业而奋斗。

特此布告周知。

主任 叶剑英  
副主任 谭政

同日，北平市人民政府也向北平人民发布了入城办公布告：

本府前奉华北人民政府电令成立，剑英等已于一月一日在郊区布告就职启印视事。现因北平全市已告解放，本府于本月二日移入城内办公，当遵照中国人民解放军平津前线司令部所颁布之约法八章，为本市人民服务，仰各界人民同心协力，为建设新民主主义的新北平而奋斗。

此布。

市长 叶剑英  
副市长 徐冰

北平市警备司令部也在2月2日成立，并发布了成立布告：

本部奉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令：“为确保北平治安，保障革命秩序，着即成立北平市警备司令部，并任命程子华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彭明治、吴克华为副司令员，莫文骅为副政治委员，随令颁发‘北平市警备司令部关防’一颗”，等等。子华等遵令于即日就职视事，在北平市军事管制委员会的领导下执行任务。

特此布告周知。

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程子华  
副司令员 彭明治  
吴克华  
副政治委员 莫文骅

平津前线司令部也于2月2日移驻城内。上午10点过，位于王府井大街南端路西口的北京饭店门前，十分热闹。平津区卫戍司令聂荣臻及林彪、罗荣桓、彭真、叶剑英在北京饭店下榻。

当天下午，林、罗、聂、彭、叶等开了一个碰头会，商谈人民解放军入城式的有关事项。担任入城式总指挥的刘亚楼，向各位首长汇报了准备情况。

2月3日，这是一个在历史上留下深刻印迹的日子。中国人民解放军决定在这天举行入城式，从此宣告中国共产党对这座历史名城的领导。

北平市民们不顾天气寒冷，纷纷涌向前门广场，欢迎自己的子弟兵入城。

上午9点半，林彪、罗荣桓、聂荣臻，叶剑英、彭真、刘仁、刘亚楼等，以及北平联合办事处的傅方代表郭宗汾、周北峰、焦实斋等，登上前门箭楼，检阅入城队伍。

10时，四颗信号弹升上天空，庄严隆重的入城式开始了。当装甲车队行进到前门时，人群沸腾了。他们挥动着小旗子，高举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的巨幅画像，高呼：“毛主席万岁！”“共产党万岁！”“解放军万岁！”……

12点，人民解放军炮兵部队出现了。学生们爬到大炮上贴标语。标语贴完了，又用粉笔在大炮上写上：“庆祝北平解放！”“欢迎解放军！”“解放全中国！”人们和解放军战士握手、拥抱，表达对子弟兵的爱戴与欢迎。

最后入城的是步兵。他们高举着一面面红旗，整齐、威武。战士们向欢呼的人群敬礼，以示他们对人民的热爱。

入城部队进入前门后，向右转弯进入东交民巷。这个从1901年《辛丑和约》签订以来一直为帝国主义盘踞的使馆区，在旧中国是不许中国军队和警察进入的。如今，中国的军队和人民在这里扬眉吐气，自由出入。外国使、领馆，大门紧闭，里面的人躲在玻璃窗后偷偷地向外看。

中国人民解放军浩浩荡荡通过使馆区，大煞了帝国主义的威风。2月3日，北平到处是欢乐的海洋。人们放开歌喉，高唱《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团结就是力量》、《跟着共产党走》等革命歌曲，庆祝古城北平跨入新的时代。

在悠扬的军乐声中，叶剑英市长庄严宣布接管北平市政府，古都历史翻开了新一页。

旧政权终于交出了大印

2月4日，原国民党北平市政府会议厅，人民政府接管旧北平市政府的仪式在举行。

下午2点半，在悠扬的军乐声中，北平市人民政府市长叶剑英、副市长徐冰，迈着稳健的步子进入会议厅。

原国民党北平市市长刘瑶章率高级官员站在门口两侧，迎候叶剑英、徐冰。

仪式开始后，刘瑶章手捧原北平市政府大印，交给叶剑英，他说：“叶先生、徐先生，我代表旧北平市政府，把旧北平市政府的大印奉交人民政府。旧北平市政府所有一切官员、职员，听候人民政府处理。”

叶剑英接过大印，发表了讲话。他说：“人民政府对旧北平市政府的接管，虽然是用和平的方式实现的，但我们对旧政府的接管，不同于过去的改朝换代。我们共产党人是代表劳动人民利益的，人民政府是人民民主专政的新政权。旧的政权机构，是代表少数剥削阶级利益的，一向剥削和镇压人民，为反动统治阶级服务。因此，旧的统治机构，必须整个地加以打碎。把北平从反动政权的手里转移到人民的手里，是一场革命。旧政府的各级负责人，要配合人民政府，把接交工作做好，有功者赏，有过者罚，好坏分明，决不含糊。服务于旧政府的职员们，要坚守岗位，听候处理……”

叶剑英态度诚恳，平易近人，没有官架子和官腔，使在场的旧市府职员耳目一新。

接着，叶剑英又风趣地说：“蒋介石把自己抬得至高无上，要做‘最高领袖’。你们诸位听到‘蒋总统’，都要马上立正。我现在叫他‘蒋介石’你们听不惯吧。不要紧的，以后就习惯了。他本来就叫蒋介石嘛！”

在场的人全都哈哈大笑，气氛活跃起来。

听了叶剑英的一番话，在场的旧政府人员，消除了顾虑。刘瑶章等人表示，要努力配合人民政府的接管工作。接着他又向叶剑英介绍了北平市内的有关经济机构的名称、地址和负责人。

叶剑英、徐冰还详细地询问了北平市政府各局、处、所的组织、人事情况。刘瑶章等一一做了回答。

整个接管仪式庄严肃穆，历时两个多小时。

接管旧市政府后，叶剑英紧接着又领导接管了各区政权，并先后建立了各区人民政府。区以下原国民党基层政权实行的是保甲制。在保甲制度下，保甲人员为国民党政府要粮、要丁，摊派勒索。人民对保甲制度和保甲人员十分痛恨，这种旧制度必须废除。叶剑英根据解放区管理城市的经验，又考察了北平历史上各级政权组织的设置情况，制定了建立街乡政府的初步草案。

草案规定：过渡时期的政权组织采取如下系统：

甲、城区：区政府——街政府——间（或居民小组代表）。

乙、郊区：区政府——乡政府——自然村（或间）。

草案实行以后，北平市新生的人民政权组织建设便系统化了。

北平新的时代由此开始。

## 毛泽东住进了香山双清别墅

1949年3月25日，中共中央迁入北平。

由于地面空中的种种不安全因素，毛泽东进北平没进北平城。

西苑入城式结束后，毛泽东乘车来到香山，住进双清别墅。

北平西郊，距西直门 20 多公里的西山东麓，有一片历史悠久的风景区。这里峰峦叠翠，松柏参天，风景秀丽，环境优雅。这便是香山。

香山的自然风光，随四季节令的交替不断变换。如火如荼，曾使无数游人醉倒。

香山脚下南端，有两股清泉从山石中潺潺流下，清代乾隆皇帝题“双清”二字于石壁之上。

1920 年，曾任北洋军阀政府国务总理的熊希龄，在香山“静宜园”创办“香山慈幼院”，并在“双清”处修建了一座漂亮的别墅，叫“双清别墅”。这是一座极为幽静的庭院，院内有苍松翠竹，还有一池清澈见底的泉水，池边还有六角亭。

从双清别墅西侧北门出去，有一条小路通向来青轩，这里住着毛泽东的战友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

香山成为中共中央、毛泽东迁驻北平后的最早居住地及办公地点，成为中共中央指挥人民解放军向全国进军、解放全中国和筹建人民共和国的指挥部。

在毛泽东入住香山双清别墅前，为了保证他的安全，李克农指挥的社会部便衣队指导员焦万友和便衣队员们多次扛着扫雷器赶到香山，对香山进行彻底的大清扫，然后，又把房子看起。

焦万友后来曾说：“我们那时也知道香山不是久留之地，是临时的。但是，什么时候搬家那是另外一回事。当天晚上总结汇报时我们管的香山那一段没出问题，可以说是顺利的。”

队长高富有带便衣队进城后，天天在北平转。主要是熟悉地形。

李克农叫来高富有，告诉他说：“毛主席来住在香山。”

于是，忠实的卫士们又爬上了香山。香山一带的洞子印满了便衣队的脚印，他们要从安全的角度对香山进行大检查。

1949 年 3 月 25 日，毛泽东坐车去香山。

香山的路是临时抢修的，小轿车爬坡十分吃力，虽然司机猛踩油门，也不顶事。进香山大门不久，又遇上一个大斜坡，汽车哇哇直响，车轮原地打滑。

这时，毛泽东说：“上不去吧？我们下来走好了。”

司机说：“好，主席你先下车，我把汽车倒回去，再往前冲一下，这样出不了事。”

毛泽东和周恩来等人徒步顺公路到了香山慈幼院的后门。

一辆吉普车已经停在那里。这是毛泽东从西柏坡到北平坐的吉普车，司机周西林正在等候。

毛泽东问：“不是到了吗？为什么还要上车？”

周恩来说：“这路太陡，小汽车爬不上去，必须换越野吉普，前面还有好长一段呢。”

果然，越野吉普又开了一阵，才开到双清别墅。

毛泽东住在双清别墅的时候，里面的泉水有碗大的两股，呼呼直涌。

毛泽东仔细望了望写有双清别墅的大门，走进去。院子很大，有一个古色古香的六角凉亭，还有不少松柏自由自在地生长在院子里。更使毛泽东兴

奋的是院子里还有一个人工砌的大池塘，月光下闪着粼粼波光。

“这个院子不错呀，比我们在西柏坡的院子还大还漂亮。”毛泽东由衷地赞叹道。

警卫们直点头，说这里环境不错。

双清别墅院子大，房子也不少。是一排坐北朝南的平房，从西头起，有卫生间卧室办公室，中间正厅是会客厅，能容纳 20 多人。从正厅往东走，还有办公室和会客厅，过了会客厅是小餐厅。小餐厅通过一个走廊和厨房相连。

工作人员专备了一个竹提篮，每天给毛泽东送饭。

这排房子中，除毛泽东使用的房间外，还有工作人员的办公室、储藏室和小厨房。

从此，毛泽东住在这里，一直到 6 月份进城。1961 年，周恩来在香山双清别墅接见全国电影界人士时，曾对他们说：“你们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吗？这是毛主席发布渡江作战命令的地方。大家要记住这个地方，中国革命只有在毛主席的领导下，才走上了正确的道路，从胜利走向胜利。”

周恩来明确指示香山一定要保护好这一重要的革命遗址。

“文革”中，北京市把双清别墅拆了，想重修一下，汪东兴为此去请示毛泽东。

毛泽东说：“修它干什么？”

汪东兴说：“那已经拆掉了。”

“拆就拆了吧，不用再修。”

因为毛泽东不同意，双清别墅一直没再建。直到 1974 年北京市政府拨专款，才又按原样把双清别墅恢复起来，并派专人保护。1987 年，才正式作为革命遗址供人们参观。

## 谁能保证蒋介石没有重金收买人暗杀傅作义

入城之初，毛泽东住在香山双清别墅，而把位于北平中心点上的中南海作为临时的办公地点。

中共中央进城以后，不住进城里，而选择西郊的香山的原因很多。

1948 年 8 月 22 日，国民党昼夜三次出动飞机轰炸石家庄。那时，敌人认为中国共产党的首脑机关在石家庄。党中央进驻北平之时，青岛还未解放，青岛外面的海面上停着美国的第七舰队，飞机飞北平很容易。因此，北平市区随时面临敌机轰炸的危险。而且城里的社会秩序也未恢复正常，光潜伏下来的特务电台就达 300 多部。

因此，石家庄和北平城都是不能住的。只能选择西边的山里。而地处西山的香山，有很多的别墅，足够中央机关住宿。香山从唐代开始，就建有房子，尤其是清代的几个皇帝在这里大兴土木修建行宫。虽经八国联军焚烧，但仍有为数众多的房子可供居住。1920 年，熊希龄又在香山静宜园创办了慈幼院。数下来，约有 3000 多间房子。这些房子，稍加修理就可以住人。

周恩来看过号房子的单子后，从保卫的观点出发，同意让毛泽东先住香山。

为了最后确定党中央的驻地，2 月 3 日，社会部李克农部长又率领一行 13 人来到北平进行全面调查。2 月 7 日，李克农和北平市警备区司令员程子华一起去香山踏勘，确定了香山为党中央暂时的最佳驻地，并给了这里一个

代号，叫“劳动大学”。

2月8日，李克农交给杨尚昆有一个来北平后各项情况的报告，说林彪已允调吴烈师为警卫部队，最近即可调至香山一带驻守，另调工兵二连帮助修理工作。

党中央进驻香山以后，香山的最高峰鬼见愁设置了一个高射炮阵地。

但是，香山离城较远，路不好走，到中南海办公不方便。党中央决定在西郊新北京一带盖房子。在平山的时候，中央办公地点就没有放在城里，而是放在一个防空条件比较好的小山村里。到北平，中央机关也没打算安在城里，位于北平中心点上的中南海只能是临时办公点。

后来，新北京建了新六所，为中央五大书记一人修一栋小楼。还有一栋小楼供工作人员居住，因此叫新六所。毛泽东从1952年到1959年，常住在那里，后来来的次数才逐渐稀少。

这一天，华北军区司令员聂荣臻正在吃饭，周恩来急匆匆赶来，开门见山：“赶快调一支部队去执行任务。”

聂荣臻有些纳闷儿，今天怎么回事？

周恩来三言两语说明了来龙去脉。

原来，北平和平解放时，尊重傅作义的意见，给他留了整整一个团的兵力保护他。

而党中央刚刚搬上香山，傅作义的两个营就连续两次去冲击中共中央的首脑机关。

听周恩来一说，聂荣臻也急了。他对站在台阶下的作训处长唐永健说：“你带一个团去支援，动作要快。”

第二天，傅作义得悉他的一个加强团几乎全被缴械，只剩下一个连了。他脾气大发，气呼呼地敲开北平市市长叶剑英的屋门，拍桌子大叫。

叶剑英也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他好言劝走了这位有大功的将军。

上午10点，傅作义的秘书长王克俊找到华北军区。

聂荣臻叫政治部副主任蔡树藩和司令部作训处长唐永健一起接待这位不速之客。

“傅将军说，你们共产党人不讲信义，过河拆桥。”王克俊一脸怒气。

“你先别急，咱们慢慢谈。”蔡树藩着依重的湖北口音说。

“枪都下了，还有什么可谈的！”王克俊“腾”地从椅子上蹦起来。

“傅先生几十万军队都交出来了，决不会在乎一个团一个营。他为保护文化古都立了大功，我们决不会亏待他，这你放心。”

曾经当过中学语文教员的唐永健十分明白事情的始末，那一个加强团的枪是他处理的。

“傅先生留下全副武装的部队，干什么用呢？无非是保证他自己的安全。”

“对呀，既然如此，为什么要卸掉警卫部队的枪？”王克俊愤愤然，“这样，安全有什么保证？”

“说句实话，要保证傅先生的安全，我们比你们顾虑还大。”唐永健说，“我们更怕蒋介石来暗杀他，然后再满世界造谣说共产党叫他起义是骗局，是不是这样呢？”

王克俊没有说话。

“退一步说，谁能保证目前留下的四个大排中没有被蒋介石重金收买去

暗杀傅先生的人？”唐永健问。

“呵，我没这个把握。”王克俊的口气软下来了。

“当然，我们也不为难傅先生。你回去，挑三五十最为可靠的士兵，给钱也买不走的，其余的全部把武器收上来，如何？”

王克俊铁青的脸色淡了一些，脑袋动了动，说不上是摇头还是点头。

后来听说，傅作义听了王克俊的汇报，怒气退了一半。他亲自挑选了35名贴身卫士，每人3件长短武器：卡宾枪、驳壳枪和左轮枪。

### 毛泽东说：人民伟大，包括你，也包括我

毛泽东在香山双清别墅，频频会见各民主党派领导人和民主人士，共商建国大计。

这些民主党派的领导人和民主人士，大多是早年就追随孙中山参加反清革命的，经过曲折痛苦的摸索后，才逐渐认识到，旧民主主义的道路在中国是走不通的，只有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才是正确之路。因此，他们拥护共产党的领导，成为共产党的朋友，走上了新民主主义的道路。毛泽东对他们十分尊重，每次客人到时，他总是走出房间，到院里迎接，有时还走到大门口去迎接。对于年迈的老人，毛泽东还亲自到车前搀扶他们下车。

民盟主席张澜，早在1911年就参加四川保路运动，后来担任过国会议员、四川省省长、成都大学及成都师范大学校长。抗战时期任国民参政员，主张坚持抗战和反对投降，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爱国民主运动的参加者和支持者。他在各民主党派、民主人士中，有很高的威望。

毛泽东和张澜第一次见面是在1945年8月他到重庆谈判之时。毛泽东下了飞机之后，在欢迎的人群中认出银髯飘拂的张澜。不待别人介绍，他便迈步走过去，同张澜握手，一见如故地说：“您是张表老吧？您好！”

张澜赶忙说：“润之先生好！您奔走国事，欢迎光临重庆！”

毛泽东拉住张澜的手，久久不放，说：“大热天，表老亲自到机场来，实在不敢当，不敢当！”

毛泽东对张澜从领导保路运动起，坚持为民主事业而斗争十分推崇；张澜早在五四运动时期，就听少年中国学会的王光祈介绍过毛泽东。二人不约而同地声称：“神交已久。”

在重庆，毛泽东数度与张澜晤谈，共同为和平、民主、团结而与国民党斗争。毛泽东曾称赞张澜“老成谋国”。

重庆一别几年过去了，毛泽东在香山筹划建国，当然忘不了“老成谋国”的人士。6月1日，毛泽东、朱德、周恩来、董必武等电邀张澜北上，共商建国大计：

表方先生：

报电敬悉。革命战争迅速发展，残敌就歼为期不远。今后工作重心在于建设，亟盼各方友好共同致力。先生及罗先生准备来平，极表欢迎。

毛泽东、朱德、周恩来、董必武  
六月一日

张澜接到电报，立即由上海乘车到北平，下榻北京饭店。

毛泽东得知张澜到北平后，决定亲自去拜访。事前，他嘱咐卫士长李银桥：“张澜先生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作了不少贡献，在民主人士当中享有很高的威望，我们要尊重老先生，你帮我找件好些的衣服换换。”

毛泽东素来生活俭朴，身上穿的衣服都补着补丁。李银桥从毛泽东仅有的几件衣服里挑选了一番，竟没找到一件无补丁的衣服。

李银桥向毛泽东诉苦说：“主席，咱们真是穷秀才进京赶考，一件好衣服都没有。”

毛泽东笑着安慰李银桥说：“历来纨绔子弟考不出好成绩，安贫者能成事，嚼得菜根百事可做，我们会考出好成绩！”

李银桥建议：“现在找人做衣服也来不及了，要不先借一件穿？”

毛泽东不同意：“不要借了，有补丁不要紧，整齐干净就行，张老先生是贤达之士，不会怪我们的。”

毛泽东就这样穿着补丁衣服，带着歉意去北京饭店看望张澜。张澜对毛泽东亲自来看望他十分感动，要求到香山回拜。张澜已77岁的高龄，毛泽东派车去接他的时候，特意交待工作人员，说张澜先生年事已高，行走不便，要好好照顾他。并嘱咐司机，开车爬坡时，要慢一些。

张澜乘坐的汽车回到香山后，毛泽东亲自在双清别墅的门口迎接。张澜一下车，毛泽东就马上伸出手去搀扶他。

张澜虽然走路不那么稳健了，但精神很好，他边走边高兴他说：“盼望多年的胜利终于来到了。毛主席这么健康，这真是全国人民的幸福啊！”

毛泽东说：“张表老，您也要多保重身体，咱们要共同努力，建设伟大的新中国。”

张澜说：“当然，当然。我年纪大了，但是我很高兴能看到今天的胜利。看到了今天的胜利，我也能多活10年。”

在会客室里，毛泽东与张澜交谈了很长时间。

沈钧儒也是双清别墅的座上客。

毛泽东一见到沈钧儒就说：“沈老先生，我们向你这个法律专家请教。咱们打败了蒋介石，要建立人民共和国，要建立人民的法律，在这方面，还需要沈老先生多出力呀。”

沈钧儒当年虽已74岁了，但他身板硬朗，耳聪目明，脑子反应敏捷。他说：“蒋介石政府践踏法律，草菅人命，进行独裁统治，人民活不下去了，必须起来反对他。这是蒋介石失败的主要原因。中国人民在毛主席和共产党的领导下，取得了伟大的胜利，要建立人民政府，也要建立人民的法律。我年纪大了，但一定要在毛主席和共产党的领导下，做一点力所能及的工作。”

毛泽东和柳亚子相交很深，在政治上、诗词上有着共同的语言。柳亚子是国民党元老，著名爱国诗人。1926年在广州召开的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毛泽东与柳亚子初次会晤。柳亚子拥护孙中山的三大政策，是国民党左派。初次相见，柳亚子便认为毛泽东是中华英才，他在以后的诗中多次提到“珠江粤海惊初见”，“粤海难忘共品茶”。

1945年毛泽东赴重庆谈判的大智大勇的气魄，使柳亚子佩服得五体投地，称毛泽东此行是“弥天大勇”。应柳亚子的请求，毛泽东把自己的旧作《沁园春·雪》抄送给他。柳亚子得此词，推崇备至，“展读之余，叹为中国有词以来第一作手，虽苏、辛犹未能抗乎”，即撰词次韵和之。



柳亚子的和词和毛泽东的原词在重庆《新华日报》、《新民晚报》等报刊上发表，在国统区引起了很大反响。

1949年3月，柳亚子和其他民主人士一起，应毛泽东邀请北上参加新政协。3月28日，柳亚子撰写了《感事呈毛主席》的诗：

“开天辟地君真健，说项依刘我大难。  
夺席谈经非五鹿，无车弹铗怨冯驩。  
头颅早悔平生贱，肝胆宁忘一寸丹！  
安得南征驰捷报，分湖便是子陵滩。”

诗中流露出他不满足于自己当时的待遇，准备步严子陵的后尘回江南故乡隐居的消极情绪。

4月29日，毛泽东在《七律·和柳亚子先生》中写道：

“饮茶粤海未能忘，索句渝州叶正黄。  
三十一年还旧国，落花时节读华章。  
牢骚太盛防肠断，风物长宜放眼量。  
莫道昆明池水浅，观鱼胜过富春江。”

诗中婉言劝阻柳亚子不要回乡隐居，继续为人民做工作。

不久，毛泽东又关照让柳亚子从六国饭店移居颐和园谐趣园。此处有楼台亭榭，风景优美。柳亚子十分高兴地说：“这是享受帝王之乐！”

五一节时，毛泽东从双清别墅来到颐和园，看望柳亚子。

当时正值人民解放军解放江南大片土地，柳亚子见到毛泽东后，高兴地说，“共产党伟大！毛主席伟大！人民解放军伟大！”毛泽东说：“人民伟大！包括你，也包括我。”

两人并肩穿过大院，到柳亚子住的谐趣园游览了一圈。然后，爬坡上益寿堂。柳亚子比毛泽东大6岁，身体也不好，爬了几步，便气喘嘘嘘，他便把右手搭在毛泽东的左肩上，两人慢慢往上爬。

在益寿堂喝过茶后，毛泽东提议游园，柳亚子欣然应允。于是他们步入长廊，边走边聊。

柳亚子望着雕梁画栋的长廊，感叹道：“慈禧太后腐败无能，屈服于帝国主义的巨大压力，签订了许多不平等条约，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极大的痛苦和灾难。她把中国人民的血汗搜刮起来，奉献给帝国主义，建造她的乐园，真可耻。”

毛泽东说：“她用建海军的钱，建了一个颐和园，当时来说，这是犯罪。现在看来，就是建立了海军，也还是要送给帝国主义的。建了颐和园，帝国主义拿不走，今天人民也可以享受，总比她们挥霍了好！”

柳亚子点点头，认为毛泽东说得极有道理。他们继续往前走，在慈禧太后买的小火轮前停下。

柳亚子用手抚摸着小火轮，说：“那时中国相当落后，慈禧太后能买到这个小火轮，能看到这样的火轮，也算大开眼界了。”毛泽东说：“事物总是要发展的，社会总是要前进的。中国再也不能继续落后下去了，全国胜利以后，我们要奋发图强，一定要改变落后的面貌！”

毛泽东的热情照顾，坦诚相交，使柳亚子放弃了回乡隐居的念头，决定留下来继续工作。建国后，柳亚子担任了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华东军政委员会副主席、中央文史馆副馆长、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等职。

### 毛泽东拒绝搬进中南海，说“我不做皇帝”

搬到双清别墅住不久，毛泽东便开始进城办公了。

毛泽东一般在下午进城，晚上 12 点多钟返回香山住处。

经过几个月的清理，中南海里里外外焕然一新，北平市市长叶剑英打了一个报告，请党中央和毛泽东迁入中南海。

中南海在紫禁城的西侧，所以清朝时称为西苑。当时的中海和北海形成的葫芦腰很细，只有一座东西走向的小桥架在上面，供行人及车辆通行。后来才修了宽阔的桥面。

中南海是一片时而开阔时而曲折却连成一片的淡蓝色水域，曾被称为太液池，后又改名金海，是燕京八景之一，乾隆皇帝还特意题写了“太液秋风”四个大字。

过去，中南海是慈禧太后独揽国家大权的地方，也是光绪皇帝因变法维新遭囚禁的地方。而窃国大盗袁世凯也将此作为大总统府，在此筹划复辟阴谋。

可当共产党军队在 40 多年前进入中南海时，展现在面前的是一幅萧条破败的图景。太液池尚未开化的冰地呈现一片黑紫色；各种杂树东扭西歪；枯叶和废纸遍地都是。

第一次来到中南海的齐燕铭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他长长地叹了一口气。

太液池，陈集着百多年来无人动过的淤泥。中南海被一团腥臭的空气笼罩着，污水呈不透明的灰黑状。

刚住进中南海的小伙子们放干污水，抬来电网，捕捞鲜活的各种食用鱼。

中南海紫黑的底被大自然风干后，华北军区派了几百名壮实的士兵去挖淤泥，挖了整整三个月。

中南海怀仁堂，曾是慈禧太后的寝宫，曾被称为仪銮殿。八国联军攻入北京期间，慈禧强制光绪皇帝随她逃往西安，寝宫成为联军统帅瓦德西的统帅部。一天，仪銮殿燃起大火，瓦德西倒侥幸逃了性命。第二年，慈禧回京花了五百万两白银重建仪銮殿，改为西式洋楼，先起名叫佛照楼，后更名叫怀仁堂。

辛亥革命爆发后，宣统皇帝退位，袁世凯在此办公。死后，他的灵堂也设在这里。

人民解放军进入北平后，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也在这里召开，新中国定都北京的决议同样在这里通过。40 多年来，怀仁堂一直是党中央和国务院的大礼堂。

40 多年后，中南海以它独秀的亭台殿堂和美丽的湖光闻名世界。而那时，呈现在人们眼前的是年久失修、摇摇欲坠的古旧建筑。

延安俱乐部主任钟灵随部队从西直门入城后，来到中南海，成为中南海俱乐部主任。钟灵接手的第一个任务是画中南海的详图，以便组织人力物力加以修缮。

他把中南海的里里外外部跑遍了。

怀仁堂修缮成为重点中的重点。

不久，中南海布置科成立，28岁的钟灵任科长。

当时，北平城内没有合适的礼堂可以作为政协会场，只有这座怀仁堂了。不但要翻修，还要改建扩建，在院子上搭起铁皮屋顶，与四周的长廊连在一起。这样，既保存了古建筑格局，又增加了使用面积。

钟灵刚忙完政协筹备会的布置工作，又开始进行布置怀仁堂的工作。

怀仁堂装饰设计图很快放到周恩来的办公桌上。当天，周恩来就用毛笔批复同意。

钟灵和东北来的美术家张汀按这份设计图的原理又设计了一套中南海各个大门的立体效果图，染上实际颜色。由周恩来拍板投入施工。

怀仁堂内外都装饰起来。院里的大门、二门及垂花门都显得气派而喜气洋洋。

在政协筹备会开会的几天里，住在香山的毛泽东感到来回跑路很耽误时间。

但他不愿进中南海，他不搬。

叶剑英建议党中央进驻中南海的报告得到周恩来的赞同。

可是几天后，没有一点动静，叶剑英便专门跑到香山的双清别墅去催。

“我不搬，我不做皇帝，这个叶剑英真固执。”叶剑英走后，毛泽东严肃地对周恩来说。

“我们还是应该听‘父母官’的。”周恩来笑着说。他同意叶剑英的意见但又不便直说。

“我偏不听，这是原则问题。”

“剑英坚持你进中南海也是原则，我们现在住的这个地方连围墙也没有。”

“不谈不谈。”毛泽东摆摆手打断了周恩来的话。

“不谈就不谈。”周恩来当然明白毛泽东忌讳皇帝住过的地方。进城前，毛泽东特意号召全党看了郭沫若写的《甲申三百年祭》。这本书说李自成攻入北京后如何骄傲又如何失败。

而周恩来则希望毛泽东搬入中南海，因为从安全的角度考虑，中南海四周的高墙是很好的屏障。

“毛主席住进去，我们才好高枕无忧呵。”周恩来对坐在一边的朱总司令说。

最后由政治局讨论做出决议，少数服从多数，毛泽东才搬进了中南海。

周恩来把丰泽园的菊香书屋让给毛泽东住，自己搬到中院居住和办公。

不久，江青要搬来，周恩来又让出房子，迁到前院的东厢房。可这里屋少人多，长住下去也不是办法，得另寻地方。一天，周恩来来到中南海的最西北角，院前的匾上写着“西花厅”3个字，一进院内，正是海棠花盛开，周恩来为之精神一振。他非常喜欢海棠花，称它们为“群花”。以后，周恩来就住到了“西花厅”。

而毛泽东在菊香书屋一住就是27年。

毛泽东搬进中南海以后，很喜欢这里的自然景致，院中的遍野小草给了他幽静恬淡的心境。有一次，周子建安排工作人员打扫院中杂草。忽然，毛泽东操着浓重的湖南口音说：“莫拔莫拔，莫伤了无数生命。”

就这样，被毛泽东保护下来的小草日夜簇拥在菊香书屋的四周，为彻夜操劳的领袖置换新鲜的氧气。

初夏时节，这座古旧的四合小院门口摆放了许多色彩斑斓的盆花。

“过去这里是公园，由他们随意美化，我们不干涉。可现在我住在这里，就不要摆了吧，摆一点松柏怎么样？”毛泽东与工作人员商量。

工作人员点点头，但却露出了不解之色。

“你们知道，到我这里来的人很多，以后会有工人农民来。”毛泽东解释道，“他们来了，就是为了看看我，看看我住的地方。如果我这里摆了那么多的花，那他们也会上行下效向我看齐，养成这种虚荣的风气就不好了。”

工作人员立即同花工商量，挪走花盆，只在院内十字路口处，摆了一棵常绿的棕树和一对无花果木，走廊上摆的也是两盆绿草。

毛泽东十分满意这绿色的世界。

## 第五章 和平失之交臂

张治中的“和谈腹案”被中共否决，艰苦谈出了个“和平协议”，却遭到国民党拒绝。李宗仁想做“皇帝”，但却什么主也作不了。蒋介石溪口遥控局势，代总统两个手令被抛到一边。国民党元老于右任声泪俱下：我活到今天，没想到碰上这种日子。周恩来巧计留客，国民党和谈代表团全部留下来参加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张治中自我反省，声明拥护共产党。

### 艰苦的和谈

就在中共中央入进北平的前一天，即1949年3月24日，南京国民党政府宣布由张治中、邵力子、黄绍竑、章士钊、李蒸等组成和平谈判代表团（29日增加刘斐为代表），以张治中为首席代表。

3月26日，中共中央正式通知国民党政府：谈判从4月1日开始，地点在北平，中国共产党的代表是周恩来、林伯渠、林彪、李维汉（4月1日又增加聂荣臻），以周恩来为首席代表。

在与国民党的历次重大谈判中，周恩来几乎都唱主角，他机智、幽默、雄辩、果断、冷静、坚决、灵活，成为共产党的谈判专家。

4月1日，张治中、邵力子、章士钊、黄绍竑、刘斐、李蒸等及随员20几人，乘“空中行宫”号飞机飞抵北平，下榻六国饭店。

周恩来和张治中，早在大革命时期就相交相知，有着很深的友谊。

张治中后来曾回忆说：“周恩来为人很热情，谈吐、风度、修养都具有很大的吸引力。”受周恩来等人的影响，张治中曾一度想加入中共。周恩来告诉他，请示组织后才能答复。后来，周恩来说：“你的目标大，两党曾有约，中共不吸收国民党高级干部入党，此时恐有不便，不如稍待适当时机为宜。”

1945年10月，张治中到新疆省任主席。此时在新疆有100多名被盛世才关押的共产党员，处境很危险。行前，周恩来要求张治中设法释放被关押的共产党员并护送他们到延安。张治中爽快地答应。1946年夏，张治中释放了这批中共党员，派专人护送他们到达延安。

对此，周恩来和共产党当然不会忘记。

在张治中等人抵平后的当晚6时，周恩来、林伯渠、林彪、叶剑英、李维汉、聂荣臻等人设宴招待。晚上，周恩来、林伯渠邀请张治中和邵力子谈话。

在谈到和平问题时，周恩来问：“我们的广播你们收听到了，已经带来了为实施八项条件所必需的材料吗？对和谈有没有具体的意见？”

张治中回答：“我们没有具体的意见，想听听你们的——当然是以八项原则为基础。”

周恩来说：“这是前提，是没有疑义的。我们设想，采取今天这样的个别对话的形式，充分听取你方的意见，如果可能，经过三四天的商谈后，在5日左右提出成熟的东西，供双方讨论。当然，你们也已认识到，形势发展得很快，全国人民渴望和平，国际上除美帝及其追随者外，也都希望中国出现和平，这是不能拖延的。”

在谈话中，张治中提出外交政策问题，主张“平时美苏并重，战时善意

中立”，说“如果亲苏反美，则美必武装日本和用经济封锁来对付中国。”

4月2日，双方代表按商定的办法，进行个别交谈。周恩来与张治中谈，叶剑英与黄绍竑谈，林伯渠与章士钊谈，李维汉与邵力子谈，聂荣臻与李蒸谈，林彪与刘斐谈。

4月8日，在周恩来的陪同下，张治中到香山双清别墅与毛泽东见面。

毛泽东一见到张治中，就满面笑容地握住他的双手说：“谢谢你 1945年到重庆时的热情接待。”然后又问到张的身体和家人。张治中就“和谈腹案”及在溪口与蒋介石谈话的内容说了一些意见：

(1) 关于战犯问题，张一再说蒋介石已经下台，一切交由李宗仁主持，并且明确表示愿意和平，愿意终老故乡，终身不担任国家职务，为了便于和谈进行，希望战犯问题不要写入和平协定条文。毛泽东表示可予考虑宽大处理。

(2) 关于组建联合政府问题，张提到重庆政协的政治民主化原则及当时达成协议的具体方案，如按此办理，国民政府当特权力移交给新政府。毛泽东表示：联合政府还不知何时成立，或许要两三个月都说不定。在这段时间，南京政府应当照常行使职权，不要散掉了，不要大家都跑了。

(3) 关于今后建设问题，张表示国民党执政 20 多年，没能遵循孙中山先生遗教进行建设，我们愧对国家人民。今后是你们执政了，你们怎样做，责任是重大的。毛泽东说：“今后，我们大家来做的，大家合作做的。当然最重要的是共同一致来结束战争，恢复和平，以利在全国范围开展伟大的生产建设，使国家人民稳定地进入富强康乐之境。”

最后，毛泽东问张治中对今后建国有何意见。张详细地阐述了他的关于外交政策上的美苏并重主张：

1、抗日战争胜利后，在国民党政权中占统治地位的是亲美派反动集团。他们的一面倒亲美、死硬反苏的错误外交政策，是一个致命的赌注，给国家民族带来严重的灾难，不仅危及国家民族的命运，而且影响到远东的和平。因此，我坚决反对一面倒亲美，主张美苏并重，就是亲美也亲苏，不反苏也不反美，平时美苏并重，战时善意中立。概括他说，就是国共合作，美苏协调。实现国共团结以促成美苏协调，通过美苏协调以促成国共合作。中国在东方处在很好的地位，我们要善于利用这种地位来促进美苏在远东的合作关系，来保证远东和平，促进世界和平。

2、中国大大了，在未来国家建设中，光靠苏联不够，还得从美英等回去争取援助。光靠任何一个国家都不行。

3、现在世界交通日益发达，各国人民贸易往来，有无相通，是正常的事，我们要和所有国家做生意，而不能像明清时代那样闭关自守，一律排斥外来的东西。

张治中所谈的外交上平时美苏并重，战时善意中立，不愿因中国关系使美苏关系复杂，拖美苏下水，并通过中国的缓冲，使美苏关系缓和，以促进远东和平以至世界和平的主张，是一种独立自主的外交主张。他主张外交上美苏并重，与政治上美苏并重有显著区别。

毛泽东不同意张治中的这种主张。后来，他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批驳的六种错误论调中，有四种是这次谈话中提过的。

### 周恩来说：中共提出的“和平协定” 可以理解为最后通牒

双方代表经过广泛、具体地交换意见，基本上摸清了对方的底，而中共方面起草的“和平协定”草案也准备就绪，并认为按前方的军情，谈判应加快步伐。

毛泽东铺开信纸开始给周恩来写信：

恩来同志：

今日下午双方代表团应举行一次正式会议。在此会议上，宣布从今日起，结束非正式谈判阶段，进入正式谈判阶段，其时间为13日至17日，共五天。在此会议上，大略解释协定草案要点，并征求他们的意见。另向张治中表示，4月17日必须决定问题。18日以后，不论谈判成败，人民解放军必须渡江。他们派回南京的人，14日上午回去，15日下午必须回来。南京四要员（李宗仁、于右任、居正、童冠贤，不要张群）如愿来平，15日至迟16日必须到达，17日必须举行签字式。应争取南京代表团六人都同意签字，只要他自己愿意，亦可签字。签字后他们不能回去，设法将他们全体留平。如他们因南京不同意签字而不敢签，并有些人要回去，则必须争取张（治中）、邵（力子）、章（士钊）三代表及四个顾问留北平。

毛泽东  
4月13日

毛泽东写完信，立即吩咐机要秘书立即将信送给周恩来。

在同一天，周恩来派人将《国内和平协定草案》送交国民党方面，并通知当晚9时开正式会议。

会议的地点在中南海勤政殿。

勤政殿大厅中间横放着一排长桌，两边分坐双方代表。双方代表后边各放三张小桌子，坐着双方列席人员和记录人员。

会场布置简朴，气氛严肃。

中共首席代表周恩来宣布开会，然后对《国内和平协定草案》作了说明。

最后，他说，如果和平协定的条款都能实现，我们相信国内的和平就有了永久的保证，南京政府代表团及南京政府中的爱国分子，努力于这个全国人民共同希求的和平事业，当然可以得到人民的谅解，也可以得到人民的赞许。在这种情形之下，中共代表团愿意在这里提出保证，当新的政治协商会议召开时，以及在筹备开幕时，接受南京爱国分子的参加，同时也参加联合政府。

周恩来讲完之后，由张治中发言。

他说，对国共的错误，有诚意承认；对国民党的失败，也有勇气接受。张治中把《国内和平协定草案》中不同意接受的各点一一提出。

最后他说，我今天固然代表我们政府和中共商谈和平，同时个人一向是中国共产党的朋友，至少不是中国共产党的反对者。我今天在中共代表团诸位先生面前，不想说什么恭维的话，今后国家的责任，是落到了你们身上。

希望中共从此领导国家，达到独立、自由和民主的目标，并建设国家，臻于富强康乐之境。张治中表示，愿就中共所提草案加以研究，提出修正案。

张治中发言后，双方同意再作会外协商，然后定期举行第二次会议。

次日，南京代表团经过一天研究，提出了40处修改意见，写成了一个修正案。修正案用词力求和缓，同时对军队改编、联合政府两项进行了若干修正。当晚，张治中把这个修正案交给周恩来，二人进行了长时间交谈。

4月15日早晨，双方代表分别进行了交谈。晚上7点，中共代表团送交南京代表团最后定稿的《国内和平协定》，周恩来表示，这是最后的文件。

张治中注意到这份文件已删去“草案”字样，他明白了一切，但他还是问道：“所谓最后的文件，是不是解释为最后的通牒？是不是只许我们说一个对或者不对？”

周恩来严肃地点点头，说：“可以这样理解。这是我们的最后的态度。”

张治中如释重负地长吁一口气，说：“也好，干脆！”

接着周恩来要求双方代表团两个小时的时间研究最后定案。

9点整，会谈开始了。中共首席代表周恩来首先发言，对协定修正案作了详尽说明。

周恩来最后正式宣布说，这个协定是走稿，是不能改变的，南京政府同意就签，但无论签或不签，到本月20日为止，人民解放军百万大军将立即渡江。

周恩来最后的宣布，令国民党代表团个个心旌震荡。

张治中缓缓站起身，说：“刚才恩来先生说这是最后的文件，那就意味着同意就签字，不同意就拉倒，如果是这样，我们代表团同人现在就没有再发表意见的理由和必要了。我们将把这个文件迅速报告我们的政府，请示它作最后的决定，然后再答复中共代表团。”说到此，他略为停顿一下，又继续说道：“不过我想略为提出一点个人的意见或感想。我要再说明，这是我个人的意见和感想，而不是代表团的意见和感想。

“国共两党的斗争，到今可以说是告一个结束了。谁胜谁败，谁得谁失，谁是谁非，当然有事实作证明，将来也自有历史作评判。不过要打个比方来说，我想国共两党之争，好比是兄弟之争，我们同是中国人，同是一个民族，俗语说‘便宜不出外’，今天谁吃了亏，谁讨了便宜，那是不必太认真的。国共两党等于兄弟一样，大哥管家管不好，让给弟弟管，没有关系，‘便宜不出外’。做大哥的人，不但对于弟弟的能干，有这个能耐来担当重责大任，表示敬重、表示高兴，而且要格外的帮助他，使他做得好，做得比哥哥好。表示我当不好，你来当，希望你当得好，一定当得好。这不仅是站在兄弟立场应该如此，就光是基于人类之爱，同胞之爱，民族之爱，也应该如此。

“今天的中国，是不是一个独立的国家？孙中山先生去世二十四年了，我们还没有把中国弄成自由、平等、独立的国家，我们的同胞，在国外受到人家的鄙视轻视，我们实在感到惭愧和耻辱！

“近几年来，国民党以国内第一大党的地位，对待中共实在太狭隘一点，胸襟和态度都狭隘。老实他说，是有很多对不起人家的地方，应该首先作一个自我反省，认识错误，感到惭愧，转变过来。我们国民党虽然失败了，但是今后还有它的新生和改造的机会；我们还是愿意重新团结合作，来共同担负复兴中华民族的历史责任。我们应当把眼光放大些，胸襟开阔些，重新合作，这才是国家民族之福！在国民党方面，今后应该有这个眼光，有这个胸



襟，有这个态度。这是我个人在自我反省之余的一点感想，愿意提出来请大家指教。

“最后，我们没有别的，只有祝愿两党过去的一切芥蒂、一切误会，一切恩怨，永远结束：过去的让他过去。在我们方面，当然首先做一个自我反省，同时希望中共也保持着这种远大的眼光，开阔的胸襟，明朗的态度，来领导未来的历史性的新的政权。中国共产党基于过去的努力奋斗，到今天已经接近——最少可以说接近——到它当政的理想。也有了成功的把握，用不着我们恭维。

“对于其他方面，没有任何意见。以上只是我个人的意见与感想，假使有不对的地方，希望恩来先生和诸位代表先生们加以原谅。”

张治中不囿于一党一派之利，而是站在国家和民族的立场上对待国民党的失败，真是难能可贵。但是，他的关于“兄弟之争”的一段话，模糊了国共争战的实质，与共产党人的立场格格不入。

对此，中共首席代表周恩来立即起身反驳。他说：“刚才文白先生说的几句活，我不能不辩白一下。就是对于兄弟的比喻。假使文白先生说双方的关系等于兄弟一样，是指两个代表团的立场，那么我们都是为和平而努力的，我们很愿意接受。过去大家虽有不对，今后大家仍可以一道合作。但是如果拿过去国民党二十多年来，尤其最近两年又九个半月的蒋介石的朝廷来说，这就不是兄弟之争，而是革命与反革命之争！孙中山先生当年革命的时候，对清那拉氏进行的斗争，就不是兄弟之争；对袁世凯的讨伐，就不是兄弟之争。如果说是兄弟之争，孙中山先生是不会同意的。对于这一点，中国共产党不能不表示它的严肃性。说是兄弟之争，如果把蒋介石朝廷和一切死硬派也包括进去，就失掉了它的严肃性。”

会议于当晚 10 时 20 分结束。

### 李宗仁做“假皇帝”，什么主也作不了

南京代表团回到住处后，连夜对协定研究。经过充分讨论后认为：这个协定定稿已接受所提修正意见的 40 余处的大半数，让步是大的。最后，一致表示接受这个《国内和平协定》，并推黄绍竑和屈武携文件回南京，劝李宗仁、何应钦接受。

李宗仁当的是“代理皇帝”，什么主也做不了。越是作不了主，就越想作主，于是陷入尴尬的境地。

黄绍竑一下飞机，便驱车至李宗仁的官邸。

黄绍竑对一筹莫展的李宗仁说：“蒋先生已经没有前途了，广西人士应该清醒一些，另辟求生之道，再也不该替蒋效犬马之劳了。”

李宗仁一脸苦笑：“我这个代总统，有其名，无其实，处处受人制约，像签订《国内和平协定》这样大事，没有姓蒋的点头还是不成啊，何谈另辟求生之道！”

黄绍竑急道：“德公，反正政府以促进和平为目标，管它条件怎么样，和平总比不和平好。况且人家也做了许多让步，与其打下去不免一败，不如这样收兵算了。”

李宗仁看着黄绍竑带来的周恩来声明是最后通牒的《国内和平协定》副本，大摇其头。这样的协定他能签字吗？如此“收兵”他收得了吗？不签字

和谈就破裂，他也只能落得“飘泊”的下场。李宗仁是打着和谈的旗帜上台的，如今和谈破裂，他就必须下台。代总统宝座还没坐热，眼看又要让给它的原主人。他像做了一场恶梦，而这场恶梦是从明故宫做起的。

蒋介石离开南京时，李宗仁率文武百官去明故宫机场为他送行，当浩浩荡荡车队来到机场时，却已人去楼空。

李宗仁回到黄埔路总统府二楼办公室，心头如掀开了一块大石头似的轻松。

他本是来自偏远省份广西临桂县的农家子弟，祖上世代务农。他六岁读私塾，后来进新创立的临桂县立高等小学。初到城里，有几分上气，加上一些新式学科如数学、英语跟不上，被人讥笑为“乡下傻瓜”，他只读了两个学期便辍学。以后他弃文习武，考入广西陆军小学，步步升迁，没有想到在中国历史上他居然会有这么一个位置，做起了代总统。

李宗仁正有些醺醺然，这时，办公桌上电话铃声响起，把他从沉思中拉回。

“代总统，我是张群……”话筒里传来张群的声音。

代总统？李宗仁的眉头拧紧了。

“总裁有一个文告，要您过目后发表，能否一晤？”

李宗仁客气他说：“岳军兄，不必客气，我立刻到府上去。”

李宗仁来到张群宅邪。张群迎出门外，说：“代总统降尊光临，张群实在不敢当。”

李宗仁连声道：“哪里哪里，不必客气。”

李宗仁在客厅刚一落座，张群便取出文告，说：“代总统，这是总裁的一份文告和他为您代拟的文告，请代总统过目。”

张群一口一个“代总统”，叫得李宗仁十分恼火。他接过文告细读起来，脸色越来越严峻。

他抬起头，眼睛直盯张群，说：“岳军兄，这文告颇有些不妥。”

张群淡淡他说：“怎么不妥，愿闻其详。”

李宗仁有些激动他说：“文告上说”于本月21日起，由李副总统代行其职权’，那么今后蒋先生是什么身份？没说。应该加上‘引退’字样，如‘决身先引退’：第二，依宪法，蒋先生辞职，我就不是‘代行’，而应该是‘继任’，应该写‘由李副总统继任执行总统职权’。”

张群沉吟道：“怕不好更改吧？”

李宗仁沉下脸来：“名不正，言不顺，与其顶一块空招牌，倒不如还是蒋先生自己干的好。”

张群面带难色他说：“文告是总裁亲自定的稿，不好改呀。”李宗仁气愤他说：“在这危急存亡之秋，我不是斤斤计较名位，只是我深知蒋先生的个性，他分明是在文告中预留伏笔，好把我当作他的挡箭牌，而他在幕后操纵，必要时又可东山再起。这样的事，我不干！”

张群见李宗仁态度强硬，便放缓口气说：“德公息怒，容我与总裁再联系一下如何？”

李宗仁起身告辞，等他回到总统府，张群的电话也打过来了，张群在电话中说：“总裁说‘遵照李副总统的意思修改文告，直到李副总统满意为止。’德公，文告可否明日发表？”

李宗仁一块石头落地，慨然答道：“可以。”

次日一早，李宗仁一到办公室，便吩咐秘书拿来当天报纸。李宗仁摊开报纸，只气得浑身颤抖，原来报纸刊载的文告一字未改。

更让李宗仁难受的是，吴忠信已以政府秘书长的名义，于昨日将文告通令全国各级军政机关，通令盖有总统的大印，而李宗仁毫无所知。

李宗仁立即传来吴忠信，他拍着通令大声责问：“礼卿兄，这份通令发出去，我为什么事前毫无所闻？”

吴忠信自知理亏，他面带歉疚他说：“这是蒋先生的意思，要我发出后再通知你。”

李宗仁难过地摇摇头说：“蒋先生已经下野了，连发道通令这样的事他还要管，他说要瞒着我，你就瞒着我，你眼里还有老朋友吗？”

吴忠信委屈地诉苦道：“你是知道蒋先生的，蒋先生要我这样办，我又怎能不办？”

李宗仁仰天长叹道：“礼卿兄，不管怎么说，你这样做未免太不够朋友了！你看我如何能干下去？他也欺人太甚了，我不就职就是了！”

李宗仁的一席话，也引出了吴忠信的心里话，只听他诚恳地说：“德公，我们是老朋友，我愿以老朋友的名义劝劝你。你是知道蒋先生的为人的，你应该知道你自己现在的处境。南京现在特务横行，你身边的卫士都是蒋先生的人，你还在争些什么呢？争得不好，在这种局面下，任何事皆可发生，甚至连你自己的安全，可能都没有保证。”

李宗仁冷笑着说：“谢谢你直言相告，他蒋先生如此欺人，我是无法干下去的！”

实际李宗仁的处境比“假皇帝”还惨，蒋介石飞溪口前的一番精心布置，使李宗仁的一举一动都处于蒋介石耳目的监视之下，权力不得实施，行动毫无自由。

李宗仁上台后，面对的是一个烂摊子，正如他自己回忆所说：“在就任代总统之后，我立刻面临三大要务，急待处理：第一、我要与中共谋和，结束内战；第二、我要谋求内部团结，加强民主改革，收拾民心，并阻止共军渡江，求取光荣和平；第三、我要争取美援，制止比共军威胁更大的通货膨胀。”

但他三件大事了件也干不成。莫说大事，就是小事也干不成，因为蒋先生在溪口紧盯着他。

李宗仁一开始对自己的使命还想得天真，他刚上台，就签发了两个手令：  
行政院院长孙科：立即自国库提款，代总统亲赴武汉前线犒赏三军；  
参谋总长顾祝同：立即释放张学良、杨虎城。

李宗仁采取的这两个行动，有很大的宣传价值，前者是为了振奋日益衰落的军心，后者是为了在国人、特别是共产党面前，表示和平诚意。

然而，他的两个手令很快落空，孙科板起面孔告诉他，国库已空，无款可拨。顾祝同则向他报告说，代总统的手令已分别转给台湾省主席陈诚和重庆市长兼警备司令杨森。

李宗仁不甘心，马上派程思远飞到台湾，向陈诚交涉释放张学良一事。却不料陈诚毫不客气地对程思远说：“张学良幽居新竹，受到很好的照顾，你就转告德公，不要再坚持了。”

程恩远回到南京，把陈诚的话如实向李宗仁报告，李宗仁听了竟半晌没有说出话来。

程思远心灰意冷他说：“凡是了解老蒋为人的，都知道他宁饶敌人，不饶朋友。局势如此危急，在生死存亡关头，国民党仍不能团结起来一致对外。德公，恕我直言，这个党是没有指望了，我们既然回天乏术，不如……”

“不如什么？”李宗仁打断程恩远的话，态度严厉他说：“现在局势还没有糟到那一步，我们手里现在还有牌可打。人家要看我们的笑话，我们自己不能先乱了自己的阵脚。”

程恩远沉默了。李宗仁沉思良久又吩咐他：“你起草一份给毛泽东的电报，就说我接受他们提出的和谈条件，我希望尽快开始和谈，电报写好后立即发出去。”

程思远迟疑地说：“和中共谈，这样重大的事情，按正常程序，应该先经过……”

李宗仁把手一挥，十分愤慨他说：“全免！要是和中常委、行政院商议，就什么事也办不成，我是总统，就以我的名义，给毛泽东发电！”

李宗仁致电毛泽东开启国共和谈，选中张治中为国民党首席代表。

1月27日，李宗仁致电毛泽东，称“弭战谋和，已成为今日全国一致之呼声。故自弟主政之日起，即决心以最高之诚意，尽最大之努力，务期促成和平之实现。”“务望先生号召贵党同志，共同迅速促成和谈，即日派遣代表商定地点，开始谈判。……贵方所提八项条件，政府方面已承认可以作为基础，进行和谈，各项问题，自均可在谈判中商讨决定。”

电文发出，李宗仁心里很是快慰，因为这可以视为是桂系对老蒋的一个报复。共产党不以蒋介石为谈判对象，因此，才有桂系的上台，因为共产党把蒋介石打败了，才有桂系的生存，乃至有桂系地位的上升。如果战败的是共产党，那么桂系便是第二个龙云。

此刻，李宗仁所追求的最大的战略目标，就是共产党不要过江，国共双方以长江为界，划江而治，但能不能实现这个目标，他心中没底，原因有两方面：一是不知道共产党的胃口多大；二是怀疑自己有无力量守住长江。

## 要和平，蒋介石必须出国

1944年2月22日，李宗仁的座机“空中行宫”号降落在南京明故宫机场。

坐在飞机上的不是李宗仁，而是李宗仁千呼万唤请出来主持和共产党和谈大计的张治中。

一向痴情于实现国内和平的“和平将军”在国民党内和谈的空气愈来愈浓之时，却萌生退意。蒋介石下野后，他由南京飞回兰州，此时正担任西北军政长官公署长官。张治中一回兰州，便决心不再离开西北。不料李宗仁一个电报一个电话地催他赴京，担当和谈重任。一些朋友也以大义相劝。于是，他心头本不曾熄灭的希望之火又燃烧起来。他想，此时实现和平的可能性虽小，但如果置身外，也不是对国家对人民应采取的态度。当李宗仁派他的座机来接的时候，一生充满矛盾的张治中怀着从未有过的矛盾心情，登机启程飞赴南京。

张治中精神抖擞地走下舷梯，欢迎的人群立即迎上来。何应钦笑道：“文白，你是福星高照呀，那么低的云，居然让你平安降落。”

白崇禧说：“我听到半空中飞机盘旋了半个小时之久，一直在替你祷告

平安哩。”

张治中苦笑着说一句双关他说：“南京的气候如此恶劣，每走一步，都会冒很大风险。”

白崇禧会意地笑了：“文白，你就多辛苦吧，我们做你的后盾嘛。”

张治中只有苦笑而已。

接着，张治中立刻从机场驱车会见李宗仁，见面头一句便问：“德公对和谈是否拿出具体方案了？”

李宗仁回答：“具体方案尚未制定，但是原则是明确的，就是他们不要过江。”

张治中摇摇头说：“中共的八条，意在取而代之，绝不会同意平分天下，枪杆子挡不住人家，嘴皮子能挡住人家？”

白崇禧不以为然地说：“我军主力虽然部分被歼，但是还有强大的空军和海军，这是中共所没有的，陆军还有百万，这是 we 和谈的实力。如果共产党硬要过江，恐怕也未必有取胜的把握，现在就和，对双方都有利。”

何应钦模棱两可地说：“中共已于上月 31 日占领北平，可是还没有表示同意谈判的确定消息，看来他们全部精力在消化新地盘。”

白崇禧说：“谈还是会谈的，不战而屈人兵，何乐不为。问题是我们内部的混乱，蒋先生虽然下野，却仍在溪口指挥一切，和各方面的联络不断。德公在台上，令不出门，这个样子怎能办事？总统不过是代理的，实在干不下去，还不如交还给蒋先生。”

李宗仁无可奈何地说：“在蒋先生身边，主战者居多，和谈不易推动。我这个挂名总统，又要对付共产党，又要应付蒋先生两边的掣肘，太难办了，所以非得请文白兄出山不可。”

李宗仁、白崇禧一唱一和，目的明确，请张治中出山，不但要他担当和谈重任，还要拿他当挡箭牌，抵挡蒋介石的幕后干预。

南京的情形，张治中早就清清楚楚，彻底的解决办法只有劝蒋介石出国。

蒋介石出国，此事非同小可，张治中虽然动了这个念头，却并没有马上表示出来。

1949 年 3 月 3 日，一架小型军用飞机降落在宁波市郊的栎社机场。自从蒋介石隐居溪口以来，这个机场便忙碌起来。溪口没有机场，前来朝拜的大员都要在此降落，转车再去溪口。

张治中和吴忠信走出舱门，便看见蒋经国正微笑着向他们招手。

蒋介石得知张治中来溪口，特派长子前往迎接。

汽车驶进武岭门，在蒋介石的老宅“丰镐房”前停下，这时蒋经国告诉来客，蒋介石住在雪窦山雪窦寺妙高台。天色已晚，只好次日上山。张治中对吴忠信说：“礼卿，你我去行个礼，今夜就住在山下吧。”

原来，在国民党大员中、有一条不成文的规矩，到蒋宅必须对蒋介石祖先的牌位行三鞠躬礼。

蒋经国谦让一番，说是不必多礼，而张治中和吴忠信一再坚持。于是几人一起到“报本堂”，在蒋家祖宗牌位前，鞠了三个躬。

次日，张治中、吴忠信便去雪窦山妙高台拜望蒋介石，未见蒋之前，先到白岩山鱼鳞吞拜谒蒋母墓。

来到妙高台，蒋介石亲迎于阶下，对张治中一行极尽礼遇。宾主在会客厅落座。

寒暄过后，张治中刚要说明来意，却不料蒋介石脸色陡变，从茶几上拿起一张报纸，像挥舞一面旗帜似地扬了扬，说：“你们的来意是要劝我出国的，昨天的报纸已经登出来了！”

张治中怔住了。几个人小圈子里的事，怎么会捅到报纸上去了呢？

张治中哪里知道，这是白崇禧的鬼点子，是他指使李宗仁的政治顾问甘介侯向报界透露张治中溪口之行的计划。白崇禧的用意，是利用舆论的压力，配合张治中的游说，迫使蒋介石出国。

但白崇禧错了，他完全不明白对于蒋介石来说，舆论的作用几乎等于零，甚至适得其反。结果反而使张治中窘迫异常，一见面便被封住了嘴。

蒋介石把报纸往茶几上一扔，忿忿他说：“他们逼我下野是可以的，要逼我‘亡命’，就不行！下野后我就是个普通国民，哪里都可以自由居住，何况是在我的家乡！”

蒋介石振振有词。蒋介石骂的是桂系，张治中不好再说下去，只得转而谈其他问题。

“总裁，我们这次来是想听听你关于和谈的意见的。”

但蒋介石缄口不语。

“总裁，关于中共所提的八项和谈条件，我与德邻、敬之、健生等人商议后认为，其中第一项是不能接受的，这一点大家意见是一致的。”

张治中先提出这个问题，意在通融感情，缓和气氛。果然，蒋介石的脸色不再那么严峻地说：“当然啦，李德邻现在负的责任也就是我的责任，德邻的成败也是我的成败。文白，你可以告诉德邻：我一定竭尽全力支持他，我愿意终老回乡，绝不再度执政。”

张治中对蒋介石的表白不信，却不敢表示出来，只好说：“总裁的话，我一定向德邻转达。”

蒋介石接着又说：“你告诉李德邻，还是要备战求和，想以和谈谈出个划江而治，只怕是他的一厢情愿罢。”

停了停，蒋介石又说：“形势严峻，我们也只能尽力而为，问题是在我们内部。共产党能够上下一心对付我们，我们却做不到这点。李德邻上台后走了三步棋，招招都是冲着我来，第一步通过傅径波、司徒雷登向美国要军火，武装自己桂系的军队；第二步派人拉拢苏联武官罗申；第三步与共产党谈判，甚至不惜接受共产党的八条，李德邻胃口大得很，他要联美、联苏、联共压我蒋某人。哼！我还不至于糊涂到看不出他的打算。”

蒋介石的这番话是在告诉张治中，要他与桂系划清界限。

张治中听着不是滋味，蒋桂的矛盾已到无法调合的地步，自己身处夹缝之中，左右不是人。桂系认为他是蒋的人，对他敬而远之，蒋介石又认为他要投靠桂系，不满之情溢于言表。他感到国民党的情形如同一条漏船，水已经漫上舱面，可是船上的人还在你争我夺，扭打厮杀，张治中不由悲从中来。

这正如他给蒋介石上的万言书中所说：“由中央以至地方，党之内部仍为政治奔竞角逐之场所。”

接下来的谈话已无关宏旨，在谈到和谈代表的人选时，置身局外的吴忠信，表示坚决不做和谈代表，因为报纸上有传闻增加张群、吴忠信为和谈代表。

“不干也好。”蒋介石赞许道。

“总裁，我也不要参加了吧？”张治中脱口而出。

而蒋介石却高深莫测地笑道：“这是值得考虑的。”停了片刻他又补充道：“你恐怕是摆脱不了了。”

张治中在溪口盘桓几天，失望而归。蒋介石却相当满意，他下野后，逼他出国的最强劲的冲击波，轻而易举地平静下来。

临别时，蒋介石出人意料地亲自送行，他把张治中一行从雪窦寺一直送到宁波栎社机场。

蒋介石目送着飞机升入万里晴空，对站在身边的儿子阴沉他说：“文白不是过去的文白了，我看他是下会跟我们到底的。”言语中透出一丝悲哀。

蒋经国忿忿他说：“这个人是个投机家，一向脚踩两只船，父亲过去对他太宽容了。”

蒋介石调头往回走，走了几步，对身后的儿子说：“你不懂，我手下的这些人，各有各的用处嘛。清一色是不行的，这一点你要记好。”

蒋介石拒不出国，他坚决不肯退出政治舞台。而对李宗仁来说，和谈如弦上之箭，已是不得不发了。

### 蒋介石说，他愿意终老家乡

3月12日，何应钦的行政院院长的任命正式发表，孙科内阁的下台，为和谈扫清了一个障碍。

李宗仁于新政府成立后，立即授权行政院组织正式的和谈代表团。

国共双方拟定：4月1日在北平开始谈判。

张治中于3月29日再次到达溪口，这次同行的是屈武。

和前些天不一样，张治中一到溪口，就立刻感到气氛异常。张治中猜度着，这种气氛大约与即将开始的和谈有关。张治中得知蒋介石在蒋母墓庐，便立即驱车前往。

张治中、屈武在蒋经国引导下，走进书房，坐了片刻，蒋介石出来了。张治中、屈武行礼问候后，张治中递上和谈腹案的文稿。这个以行政院名义拟定的和谈腹案，只供代表团在谈判过程中掌握，不是提出的讨论方案，其主要内容，是针对中共提出的八条，把蒋介石新年文告的内容具体化了。蒋介石事前已知其内容，但他还是认真阅读起来：

#### 预拟与中共商谈之腹案

一、双方既确认以和平商谈解决国是为全国人民之要求，则双方所应商谈者，重在国家元气之如何保存，人民痛苦之如何解除，国家政策之如何拟订，及政治制度之如何建立，以谋长治久安，是以关于战争责任问题，不应再提。

二、同意重订新宪法，此新宪法之起草，我方应有相当比例之人数参加。

三、关于法统问题，与前项有连带关系，可合并商讨。

四、双方军队应分期分年各就驻在区域自行整编，并应树立健全的军事制度，傅达成军队国家化之目的，至分期整编时双方应保留之军队数字，另作商讨。

五、“没收官僚资本”一节，原则同意，但须另行商讨施行条例办理。

六、“改革土地制度”一节，原则同意，但须另行商讨施行条例办理。

七、关于“废除卖国条约”一事，将来由政府根据国家独立自主之精神，

平等互惠之原则，就过去对外签订条约加以审查，如有损害国家领土主权者，应予修改或废止。

八、同意召开政治协调会议，并由该会产生联合政府，惟在该协议与联合政府中，我方与共方应以同等名额参加，其属于第三方面人士之名额，亦于双方区域中各占其半。

九、代表团抵京后，即向中共提出双方应于正式商谈开始之前，就地停战，并参酌国防部所拟停战意见（附后）进行商谈。

张治中在一旁默默地等候，不发一言，内心却波澜起伏。他瞥一眼屈武，只见他一副无所谓的神情，正目光投向窗外。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代表团能否如期启程，就看蒋介石审阅完文稿说什么了。张治中拿定主意，如果蒋介石对这个和谈的腹案不满意，他就坚辞和谈代表。

终于，蒋介石推开文稿，抬起头，毫无表情他说：“嗯，我没有什么意见。文白，你这次担当的是一件最艰苦的任务，一切要当心哪！”

张治中还想摸摸蒋介石对和谈的看法，但蒋介石已起身表示送客了。

这一次蒋介石仍然是优礼有加。他陪着张治中顺着蒋母墓道，从山径上走下来，沿着公路慢慢走去，一直把张治中、屈武送到溪口。临别又表白道：“文白，我是愿意和平的，愿意终老家乡的。”

张治中闻之十分高兴，觉得蒋介石对和谈总算明确表了态。他说：“总裁这句话对和谈很有帮助，也可以消除党内的分裂。不知愿意在报端发表否？”

蒋介石想了想，很油滑他说：“你斟酌吧。”

张治中回到南京，立即发表了蒋介石的讲话。和谈空气迅速升温。第二天，张治中应邀到立法院讲演，他的和平演说博得全场不断的掌声。面对听众的热烈情绪，张治中感到一阵苦涩。这些人赞同和谈，是因为他们对和谈抱着不切实际的奢望，那就是：此次和谈能谈成个划江而治的局面。张治中深深感到国民党内极大多数人对时局缺乏冷静客观的认识。他们不明白，不愿相信，国民党已到风烛残年。战也罢，和也罢，要想挽回颓势已是不可能的。

张治中的苦闷，时时流露出来。一方面，他对国民党的失败有着清醒的认识，另一方面，他对这个为之服务了二十几年的党仍怀着一往深情，对蒋介石也仍怀着感恩知遇之情，他的这种矛盾与痛苦，可以从他在1948年秋给蒋介石上的万言书中表现出来。

在这份万言书中，张治中把批评的矛头直指蒋介石：“钧座重视谋略与技巧而忽略基本政策，甚至有察之未明之嫌。”

据说蒋介石看了这个万言书，勃然大怒，而冷静下来后又觉得所言切中要害，他长叹一声，回电说：“吾兄所言甚是，待详细研究后复。”

国民党内敢如此犯颜直谏的，只有张治中。他奔赴新营垒后，对毛泽东也是敢于直谏。

此时，极端的苦闷使得张治中的内心时常发出这样的呼声：“既然一定失败，便快些失败吧！”因此，当蒋介石企图用和谈获得喘息时间，以便卷土重来之时，当李宗仁、白崇禧企图用和谈实现“划江而治”，以造成民族的大分裂的时候，张治中算是“知其不可为而为之”。



4月1日，张治中率代表团前赴北平，临行前在机场发表谈话说：

“我们此次奉政府之命到北平和中共进行和平商谈，深感责任重大，实有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的心情。我们也知道在和谈进程中，当不免遭遇若干困难，但是我们双方商谈，似无不可克服的难题。我们当谨慎地秉承政府旨意，以最大诚意和中共方面进行商谈。希望能够获得协议，使真正的永久的和平得以早日实现，以慰全国同胞殷切的期望。甚望爱好和平的各界人士，随时给我们指导、督促和支持。”

尽管历史注定，这是一次徒劳无功的谈判，然而由于各方的需要，仍如期举行了。

坐到谈判桌旁的国民党人，虽被战败的失落感和耻辱所淹没，却仍放不下架子，怀着万一的希望，指望他们的舌剑唇枪能在谈判桌上设起一条防线。

### 毛泽东告诫没有第三条路，李宗仁哀叹：完了

坐在北平谈判桌旁的国民党人，被南京的“和谈指导委员会”紧紧地掣肘着，南京“和谈指导委员会”又被远在溪口的蒋介石掣肘着。

4月10日，李宗仁召集“和谈指导委员会”会议，他的机要秘书梁升俊的会议记录中记录着：李宗仁暨与会大员，“于何应钦氏报告面蒋的经过及陈述蒋氏的态度后，一致同意拒绝中共的条件，但仍与中共商谈，主张：一、就地停战；二、国共划江而治。对中共和平渡江占领京、沪的要求，断然拒绝。”

1949年4月8日，被李宗仁派到北平与中共接触和谈的秘密代表刘仲容等人抵达南京。

刘仲容当晚即单独来到傅厚岗李宗仁官邸。他是毛泽东点名邀请北上的特殊人物。

当刘仲容走进客厅的时候，李宗仁正急切地等待他的到来。李宗仁显得憔悴疲惫，他招呼刘仲容坐下，便问：“那边情况怎么样？见到毛泽东了吗？”

刘仲容从容不迫地坐下，神色庄重他说：“是的，毛先生还有话让我亲口转告德公和健公。”

李宗仁精神一震，急忙问道：“什么话？快讲！”

刘仲容说：“毛先生让我转告：一、关于德公的政治地位，可以暂时不动，还是代总统，还可以在南京发号施令。二、关于桂系部队，只要不出击，解放军也不进行攻击，等到将来再具体商谈。至于蒋介石系统的部队，也是这样，如果他们不出击，由德公作主，可以暂时保留他们的番号，听候协商处理。三、关于国家的统一，国共双方正式商谈时，如果德公出席，毛先生也亲自出席，如果是何应钦或白崇禧出席，则中共方面派周恩来、叶剑英、董必武为代表，但谈判地点应在北平，不能在南京。双方达成协议后，成立中央人民政府，毛先生说到那时南京政府的牌子就不要挂了。毛先生还说，美国和蒋介石是反对和谈的，希望德公和健公要拿定主意，不要上美国人和蒋介石的当。”

李宗仁默默地听着，呆板的脸上没有一丝表情。

刘仲容继续说：“毛先生还特别提到健公，毛先生说白先生不是喜欢带兵么？他的桂系部队不过十来万人，将来和谈成功，成立中央人民政府，建立国防军的时候，可以请他继续带兵，请他指挥三十万军队，人尽其才，于

国家也有好处嘛。毛先生强调，白先生要我们的军队不过江，这办不到。解放军过江后，如果健公感到孤立，可以退到长沙看看情况，也可以退到广西，毛先生的意思可以来个君子协定，只要我们不出击，中共三年不进广西。毛先生最后说，中共方面如此煞费苦心，并不是没有力量打败我们，而是让人民少受点损失。”

李宗仁一声长叹，接下来便是长久的沉默。早在和谈开始之前，李宗仁便派黄启汉设法在北平设了一个电台，目的是迅速掌握中共的动态。和谈开始后，更是三天两头来电询问有关和谈的消息，他急切地想要摸到中共关于和谈的底牌。听了刘仲容转达的毛泽东的话，他想大概这是中共所能开列的最宽大的条件了，但是其基本立场不曾有丝毫松动。

刘仲容的声音把他从沉思中唤醒：“周恩来先生说，人民解放军即将向长江以南推进，这次和谈，签订和平协定也好，不签订也好，他们是一定要过江的，这是一个原则问题。周先生说如果我们同意他们过江，什么都好谈，要抵抗，那是不行的。周先生强调解放军过江一定会得到全国人民的拥护。”

李宗仁摆手示意他不必再说，刘仲容也不再讲什么，却从皮包里取出一份4月4日出版的《人民日报》，放在李宗仁面前，说：“这上有一篇重要文章，是毛先生亲自撰写的，请德公过目。”

李宗仁翻开了报纸，上面是毛泽东亲笔写的《南京政府向何处去》一文：

……摆在南京国民党政府及其军政人员的面前有两条路：一条是向蒋介石战犯集团及其主人美帝国主义靠拢，这就是继续与人民为敌，而在这场解放战争中和蒋介石战犯集团同归于尽；一条是向人民靠拢，这就是与蒋介石战犯集团和美帝国主义决裂，而在这场解放战争中立功赎罪，以求得人民的宽恕和谅解。第三条路是没有的。并正告南京政府：人民解放军就要向江南进军了。这不是拿空话吓你们，无论你们签订接受八项条件的协定也好，不签订这个协定也好，人民解放军总是要向前进的。选择的时间没有很多了，人民解放军就要进军了，一点游移的余地也没有了。

李宗仁看完报纸，十分激动，却欲言又止，身子向后一仰，头靠在沙发背上，闭上了双眼。

许久，他才从心底发出一声痛苦的呻吟：“完了！”到此时，李宗仁对和谈彻底绝望了。

他吩咐秘书电话通知何应钦，叫他来一趟，又对刘仲容说：“待会儿他来了，你再对他说说。”

刘仲容不满他说：“德公，刚才那番话是中共领导人对你和健公讲的，对他讲合适么？”

李宗仁平静他说：“无妨，他是行政院长，应该让他听听。”

何应钦一接到电话立即赶来，见到刘仲容即用审视的目光盯着他，劈头便说：“我知道你去北平了，你带回什么消息？”

李宗仁说：“他见到了毛泽东，毛先生让他捎话来了。”

何应钦吃惊地问：“噢？毛先生怎么说？”

刘仲容字斟句酌他说：“毛先生说，和总比打好，希望和平解决问题，不是共产党没有力量，而是为了早日结束内战，使地方和人民少受损失。毛先生还欢迎你 and 德公到北平去谈谈。”

何应钦警惕地看了李宗仁一眼，说：“我们的代表不是正和他们谈吗？关于过江，他们怎么说？”

刘仲容说：“毛先生和周先生一再明确表示，不管谈得成谈不成，他们一定要过江，至于其他问题，一切好商量。”

何应钦十分恼怒他说：“他们坚持要过江，这样还有什么好谈的！德公什么意见？”

李宗仁不痛不痒他说：“商议商议再说吧。”

### 毛泽东打算让白崇禧指挥国防军

4月9日，白崇禧听说刘仲容回来了，风风火火地从汉口飞到南京，他还把桂系的大将夏威、李品仙也叫到南京。

一见面白崇禧便问：“你没事吧？老蒋的特务没找你的麻烦？”刘仲容笑道：“他们还没有这么大的胆子到这里找麻烦，不过这几天我也没敢出门。”

说完两人哈哈大笑起来。

白崇禧又问：“那边的情况怎么样？听说你见到了毛泽东，他对你说了些什么？”

刘仲容说：“我到达北平的当晚，毛先生就接见了，在座的还有周恩来，我把你给他们二位的信当面递交了，你要我向中共方面转达的关于‘划江而治’、‘政治可以过江，军事不要过江’的要求，我都如实地转达了，但是中共方面不同意这个要求，毛先生说解放军一定要过江，这一点他们的态度是坚决的，我看没有商量的余地了。”

白崇禧勃然变色：“既然如此，还有什么好谈的，准备打仗就是了！”

刘仲容诚恳他说：“健公，毛先生和周先生很理解你和德公的处境，也充分考虑了和谈成功后你们二位的前途，毛先生说，你很能带兵，将来成立中央人民政府，人尽其才，请你指挥国防军。”

白崇禧冷笑道：“哼，叫我当降将，这是不可能的！他们真有和平诚意，就不应该过江，这是一切问题的前提，这一点无论如何不能退让，只要不过江，什么部好谈，要过江就不可避免地发生战斗。”

刘仲容又恳切他说：“健公，恕我直言，我们要是能打，也就不会有这次谈判了，要是不能打，共产党所开列的条件不能说不优厚。说句实在话，中共此次同意会谈，完全是以德公和你为对象，因此才会有这样的条件。现在共产党是战胜者，战败求和实属不易，愚意千万要把握住这难得的机会，不可错过。”

白崇禧则大声责问道：“你怎么给共产党当起说客来了？我们怎么不能打了？我方几十万大军沿江而防，还有中共所没有的海军和空军，中共想凭凡只破木船在天堑长江上突破我军的主体防线，简直是异想天开。我可以告诉你，美国方面已经答应支持德公，有十几艘军火已经启运来中国，这次再打起来，美国是不会袖手旁观的，中共一定要过江，势必引起第三次世界大战。所以在和谈中，我们不应该气短，他们不过江可以达成协议，对双方都有利，要过江只能兵戎相见！”

刘仲容终于沉默了。他在白崇禧身边工作多年，深知他一向刚愎自用，野心勃勃。他现在手握重兵，李宗仁上台后，颇能左右中枢，虽然国民党如风雨中的漏船，但在白崇禧看来，却是实现他个人野心的良机。桂系的实权

在他手上，所以桂系的天下就是他的天下，要实现其野心，根本前提是实现“划江而治”。因此白崇禧，自然对中共伸出的橄榄枝不屑一顾。此外，美国为牵制李宗仁的和谈，也开始以军火接济国民党部队，蒋介石也不失时机地命财政部从上海拨给“华中军政长官”白崇禧一批黄金。

白崇禧稍稍缓和一下语气，又问：“德公和敬之什么意见？”

刘仲容答：“他们没表示什么意见，说是要同你商量商量。”

“没什么好商量的了。”白崇禧断然道，“你再跑一趟，把我的意思跟他们讲清楚，就这样。”

“可以，我马上就走。”这正中刘仲容下怀。

4月12日下午2时许，“天王号”客机从明故宫机场腾空而去。

刘仲容一下飞机，便立即被汽车接送到香山双清别墅。毛泽东正埋头批阅文件。毛泽东放下文件起身笑道：“我给你打过保票，你现在不是平安回来了吗？”

刘仲容也笑道：“有毛主席的关心，来去都很顺利。”

毛泽东又关切地问：“李宗仁、白崇禧两位先生的态度有无转变？”

刘仲容说：“主席的话我原原本本向他们转达了，但是白崇禧仍顽固地反对解放军过江，这是他最后的态度。”

毛泽东点了点头，又问：“李宗仁呢？”

刘仲容道：“他基本上没有表态，可能还在犹豫观望吧。”

毛泽东说：“中央已经决定，解放军很快就要渡江，你转告李先生，解放军过江时，请他呆在南京不要动，如果认为南京不安全，也可以飞到北平来，共产党将把他当贵宾款待，那时和谈仍可以进行。总之，我们是有足够的耐心等待他的转变。”

4月上旬，解放军渡江南进万事俱备，只待毛泽东一声令下。为了做到在政治上仁至义尽，毛泽东从容地接见国民党和谈代表。从4月8日起，每天一批，分别接见了张治中、邵力子、章士钊、黄绍竑、刘斐、李蒸和卢郁文，作竟日长谈。

在接见老乡刘斐时，毛泽东问道：“刘斐先生，你是湖南人吧？”

刘斐拘谨答道：“我是醴陵人，与主席邻县，是老乡。”

毛泽东幽默起来：“噢，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哩！”

听着毛泽东亲切的乡音和幽默的话语，刘斐的心情顿时轻松下来，他说：“蒋介石打不下去了，让李宗仁出来搞和谈，人民需要休养生息，和平是大势所趋。”

毛泽东说：“人民的要求，我们最了解。我们共产党是主张和平的，否则也不会请你们来。我们是不愿意打仗的，发动内战的是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反动派嘛，只要李宗仁诚心和谈，我们是欢迎的。”

刘斐说：“据我观察，李宗仁还是有诚意的，他是以和谈上台的，和谈不成也就断了他的前程。”

毛泽东一语惊人：“李宗仁现在是六亲无靠哩！”刘斐一愣，只听毛泽东又接着说：“第一，蒋介石靠不住；第二，美帝国主义靠不住；第三，蒋介石那些被打得残破不全的军队靠不住；第四，桂系军队虽然还没有残破，但那点子力量也靠不住；第五，现在南京一些人士支持他是为了和平，他不搞和谈，这些人士也靠不住；第六，他不诚心和谈，共产党也靠不住，也要跟他奉陪到底哩！”

在座的刘斐、黄绍竑听了直点头。

毛泽东又说：“我看六亲中最靠得住的还是共产党，只要你们真心和谈，我们共产党人说话是算数的，是守信用的，绝不会亏待李宗仁先生。”

稍停片刻，毛泽东又问道：“这个协定你们同意吗？”

刘斐斟酌道：“总的我们是同意的，只有前言中说蒋介石是挑动内战的罪魁祸首，有些刺激，虽然实际情况确实如此，就怕李宗仁签字有难处。因为他是个空架子，蒋介石背后捣鬼他吃不消。”

毛泽东笑着说：“好，看你们的面子不写罪魁祸首，那就写上个元凶巨恶，你们看怎么样？”

说得大家哈哈大笑起来，很显然在蒋介石问题上，毛泽东是不会让步的。

在用餐的时候，刘斐机智自然地试探毛泽东：“主席，您会打麻将吗？”

毛泽东回答：“晓得些，晓得些。”

刘斐又点题问：“您喜欢打清一色呢，还是喜欢打平和？”

毛泽东笑得差点喷饭，他机敏地回答：“平和，平和，只要和了就行了。”

### 蒋介石决定和共产党作最后较量

1949年4月17日，自感无力作主的李宗仁派张群乘专机去溪口，将《国内和平协定》交给蒋介石过国。

蒋介石看了协定，拍案大骂：“文白无能，丧权辱国！”

当天晚上，在京的桂系集团要员聚集在傅厚岗李宗仁官邸，听取黄绍竑的报告，商讨对策。

黄绍竑坦率他说：“打开天窗说亮话，我们是兵败求和，军事上不能保持均势，政治上也就没有平等地位可言，这是摆在我们面前的现实。在此严峻局面下，只有和局才能自保。蒋介石是靠不住的，他最后可以退守台湾，偏安一隅，绝不会有我们的容身之地，我想诸位也会与我有同感。如果我们及早下决心，德公出面与中共签订和平协定，德公可以担任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我们广西的子弟兵可以保存下来，两广在两年内不实行土改。这些条件，表现了中共方面对我们广西人士的一番好意，说句难听话，现在就看我们知不知趣了。”

黄绍竑话音刚落，李宗仁立即说：“我对个人出处并不计较，我是力求和平上台的，所谋所作当是为国家，为大多数人利益。如果求和不成，我将毫不犹豫卸职归田，以谢国人。所以今晚开会，我们还是从国家和大局出发来商讨。”

李宗仁千方百计避免扮演决策人物的角色。

白崇禧忿忿他说：“什么广西部队可以保留，两年不搞土改，讲得好听罢了，人家要钓我们上钩，能不洒下些鱼饵吗？分而治之，各个击破，这都是用烂的老套子！当前最大的危险，就是中了共产党的离间计！”

白崇禧愈说愈气，用手一指黄绍竑，责问道：“季宽，你们走时，明明带着行政院讨论过的‘腹案’，你们在与共产党谈判时，为什么要背离这个基本立场？这哪里是和平协定，简直是投降协定！张文白怎么这样糊涂！这个协定没什么好讨论的，他们要过江，就打！”

说到这里他倏地站起身，用力抻了抻笔挺的军装的下摆，狠狠地说：“我就不信，共产党能插翅飞过长江！”言完怒气冲冲地扬长而去。

黄绍竑瞅了瞅李宗仁，只见李宗仁僵坐着，脸上露出凄苦与无奈。

白崇禧一走，会议不了了之。

18日晚，桂系头头们继续在李宗仁官邸密商，仍是白崇禧与黄绍竑交锋，仍来得出任何结论。最后，李宗仁提出，将协定交“和谈指导委员会”讨论。

黄绍竑一阵冷笑，李宗仁尽管可以推掉拒签和平协定的责任，然而一旦和平的大门关死，将玉石俱毁！

桂系圈子里讨论不出名堂来，蒋介石也不把他们的意见当回事，他让蒋经国打电话给南京的何应钦和广州的吴铁城，让他们组织国民党中常委讨论讨论，尽快拿主意。于是，国民党中常委在南京连续召开两天会议，进行紧张的讨论。

4月19日，中常委在国防部召开的秘密会议，将对和平协定做最后的决定。会议由何应钦主持，代总统李宗仁列席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在南京的中常委，有中央党部秘书长吴铁城、参谋总长顾祝同、行政院秘书长黄少谷与几位部长，此外，刚从太原逃出来的阎锡山也应邀出席会议。但，白崇禧却缺席了。

黄绍竑首先做和谈情况介绍的报告，话刚讲到一半，吴铁城就拍案怒吼，反对签订和平协定。

他慷慨激昂他说：“这个协定是绝对不能接受的。中常委从未承认过中共1月14日提出的和平条件。要和谈不能离开中常委那个和谈的五项原则。代表团离开五项原则，擅自和对方讨价还价，这是不应该的。”接着他又气势汹汹地质问道：“宪法乃国家的根本大法，法统是实行宪法的保证，如果都废止了，中国将成为什么样的国家？”

国民党元老、屈武的老丈人于右任声泪俱下地说：“我活到如今，想不到会碰到这种日子，真是欲哭无泪！我觉得我们自己的努力太不够，太不够了！多少年来，一个革命的政党反而变成被革命，这已经使人痛心！而今日之下，面临紧要关头，受到共方绝大的压力，承认固然不可以，不承认又没有这个力量，到了这个地步，上下上，下不下，进退维谷，简直使我痛心之极！”

于右任一番话引起与会者强烈共鸣，秘密会议乱成一团。

这时外交部长、CC干将朱家骅站起来说：“各位，事到如今，还是请多动动脑筋吧！签字吧，蒋先生不会同意，我们这里人也不赞成，不签字吧，北平方面也没讨价还价的余地。这个不同意，那个又反对，唯一的结果就是再拼一下。然而，再拼的结果又将如何呢？”

朱家骅悲他的发问，使会议陷入沉默，而尴尬的代总统李宗仁，在四个多小时内，他一直一言不发。

主持会议的何应钦最后总结说：“各位已经发表了很好的意见。中共的八条二十四款，实在叫人难以接受。我是赞成中常委关于和谈声明的。共方协定的前言，全属对政府和本党的低毁之词，等于对罪犯的判决，难道我等全是罪犯？就以改编军队一项而论，双方军队罢战言和，自应同时改编，以实现军队国家化的原则。而该协定把属于政府的一切武装力量均改编为人民解放军，这是对民主原则的背叛！对于这个协定，我的意见不能签，看李代总统有何高见？”

李宗仁被问得目瞪口呆，可他又不能不表态，他硬着头说：“我没有回

天之力。是战是和，我无能为力。如果广州和溪口的意思，是要和共产党决一死战，那我也没有办法。”

历时两天的讨论草草了事，并按蒋介石的意见发表了《对当前和谈的声明》。声明除重申蒋介石《元旦文告》的基本论调外，同时还对南京的李宗仁政府训话：今日李代总统与何院长对国家所负之任务，实基于中华民国之宪法，而对本党所负之任务，则为执行党之决议。倘不能实现此五项原则，“则牺牲奋斗，万死而无辞。”

4月19日，南京广播了国民党中宣部长的答记者问：“和平的希望黯淡，如果共产党过江，国民党不会投降，而是抵抗。是成功还是失败，要靠我们的努力，反对渡江是国民党决策者一个月前就决定了的，这一立场今天才宣布，盖因在此以前发表恐危害和谈。”

这是从和谈开始以来，国民党当局最强硬的讲话。

憋了几个月的蒋介石，终于强硬地开始行动了。他把南京的李宗仁撇在一边，指令蒋经国传达他的一系列手谕，给前方各个将领打电话，部署最后一拚：

“告诉汤恩伯，让他给我好好打，一定守住长江天险！”

“告诉白崇禧，和谈已经破裂，华中地区全靠他了！”

“告诉胡宗南、宋希濂，西南半壁河山就靠他们支撑了！”

“告诉孙立人，新兵训练加紧进行，准备打一场艰苦的持久战！”

……

黄绍竑早知会有这样的结果。在北平临南下时，他就在机场对前来送行的周恩来说，和平的希望只占50%，或许更小。他还表示，如果和平不成功，无论如何他是要回来的。

当天下午，黄绍竑搭便机飞往广州，然后转赴香港。临行前，他与李宗仁话别，李宗仁送给他150万元金圆券，什么话也没说。

在李宗仁官邸，黄绍竑给张治中挂了一个电话，只简单他说：“行政院今天晚上或明天会有书面答复，我打算今天下午就飞去香港。”

### 周恩来巧计留下国民党和谈代表

张治中焦急地盼望的行政院的答复4月20日深夜才到，电文说：综观协定全文，不啻为征服看对被征服者之处置。解除兄弟阅墙之争端，竟甚于敌国受降之形式，且复限期答复，形同最后通牒。军队整编之所谓民主原则，竟成共军独占之制度。政府虽被允许暂时行使职权，实则是奉共军总部之命办事。总之，协定全文，充满中共武力控制全国之意味。如果照此协定行事，势必激起军民之愤怒和抗拒，则谋和适以制造乱源，弭战反成扩战，岂忠于谋国爱护人民者所宜出此，所忍出此？因此，希望先达成临时停战协定，培育祥和空气，再从长计议云云。

张治中看罢电文，绝望和痛苦，一起涌上心头。事已至此，何需多言！张治中吩咐秘书将复电抄送中共代表团。

4月21日晨，南京的复电还没到中共代表团手中，北平城内满街是“号外”的叫卖声，毛泽东、朱德已命令人民解放军渡江了。

代表团的工作人员跑到街上买了几份“号外”，大家围上来传阅，不禁心潮起伏。张治中更是激动不已，倒背着手，绕屋踱步。

整整一天，代表团所在楼层寂静得如同空楼。

当夜 12 时，南京代表团接到李宗仁、何应钦电报：

张文白兄并转行严、力子、云亭、为章诸兄暨代表团全体同志：

共方本日广播毛朱对共军之使命全文已悉，此间迎代表团之专机应子何日飞平，请洽妥电告。兄等此行劳苦，事虽未诸，俯仰无愧，谨先奉慰，诸事容面详。

李宗仁、何应钦卯马印

收到南京电报后，国民党的六位和谈代表悬在心上的主要问题只有一个：留在北平还是回到南京？

大多数人认为：和谈失败回去，不会有好结果，毫无意义。还是认清形势，明辨是非，留在北平，静待形势发展，再为和平努力。首席代表张治中却天真地认为，代表团是为和谈而来的，和谈既已破裂，无继续留在北平的必要。同时，代表团是南京政府派遣的，任务终了，理应回去复命。

4 月 22 日，张治中复电南京，请于 23 日派机来北平，预定 24 日回去，同时通知中共方面。

周恩来闻讯，立即赶到六国饭店，同来的还有李立三、林伯渠。周恩来情真意切他说：“这次商谈，活动紧张，大家都辛苦了，应该好好休息。双方代表团同意的《国内和平协定》竟为南京方面所拒绝，彼此都感到十分遗憾。目前形势发展很迅速，国民党内部四分五裂，已陷于全面崩溃，我们估计随着形势的转移，仍有恢复和谈的可能；即使退一步说，全面的和平办不到，但出现部分地区的局部和谈还是可能的。这个协定还是有用的，请大家留下来吧。”

周恩来眼中布满血丝，声音暗哑，显然，周恩来是从繁重的指挥渡江战役的岗位上直接来到此地的。

张治中是一个不易被说服的人，周恩来的盛情挽留虽使他感动，但他仍坚持说：“治中受命于政府，不复命情理不容呀。”

周恩来神态中带着焦虑，言辞更为恳切：“现在的形势，你们无论回南京、上海或广州，国民党的特务都会不利于你们的。西安事变时，我们已经对不起一个姓张的朋友，今天再不能对不起你了！”

张治中不会忘记，3 月底的溪口之行，蒋经国对屈武说的那句话：“文白先生太天真了！现在还讲和平，将来是没有好结果的，我看他会死无葬身之地的。”不难看出蒋氏父子对主张和谈的人是何居心。

23 日，张治中正做着归程准备，周恩来又来到六国饭店，见到张治中便说：“文白先生，我们一起去接一个客人吧？”

张治中被搞糊涂了，诧异地问：“什么客人？”

周恩来神秘地笑道：“走吧，到时候你就知道了。”

到达西苑机场不一阵，天空传来飞机轰鸣声。当一架飞机在停机坪停稳之后，周恩来做了个邀请的手式，让张治中在前，向飞机走去。走近飞机时周恩来又有意落后一步。

舱门打开，一位中年妇女和一群孩子步下舷梯。张治中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原来那正是他的夫人洪希厚和孩子们！

张治中又惊又喜，刹那间，他的眼睛湿润了，他转过头，感动地说：“恩



来先生，你真会留客啊！”

周恩来很开心地笑了，并且有几分得意。张治中也笑了。他当然不会知道周恩来为这戏剧性的一幕，操了多少心。

原来，国共北平和谈破裂后，周恩来就指示有关部门：“马上通知南京地下党的同志，一定要千方百计把张文白先生的夫人洪希厚女士及其子女安全送来北平。”

任务交给了南京地下党的沈世猷。

沈世猷早与张治中一家有因缘。抗日战争时期，沈世猷投笔从戎，报考桂林军校。1941年，他经人推荐，参加了张治中之弟张文心任师长的国民党八十五军二十三师，在河南密县一带与日军作战。1944年夏，升任第十五军副军长的张文心奉命去重庆国民党军委会政治部政工研究班高级组受训。沈世猷随同前往，并随张文心住在桂园张公馆，认识了张治中及其家人。1946年，沈世猷随张治中一家迁到南京。沈世猷于1948年10月和上海地下党的王月英取得了联系，按照党组织的决定，打入汤恩伯的京沪杭警备总司令部作战处，搞情报及策反工作。

1948年12月，淮海战役期间，沈世猷向王月英介绍了自己与张家的关系。王月英在请示了上级领导后，指示他与张家两弟兄的夫人保持密切联系，全力保证她们的安全。1948年年底，在南京各界大撤退的混乱中，沈世猷将张治中夫人洪希厚和张文心夫人郑淑华及其子女送上海居住。1949年3月中旬，沈世猷转往南京从事党的地下工作。临行，党组织指示他一定要配合上海地下党完成保护张治中家属安全的任务，因党中央了解到张治中内定为国共谈判的首席代表，是事关时局变化的关键人物。

1949年4月1日，张治中赴北平谈判，洪希厚、郑淑华感觉时局和缓，便从上海返回南京。后来，南京政府拒绝接受《国内和平协定》，形势突变。汤恩伯决定成立上海指挥所，准备江防撤退，派沈世猷等先遣人员赶赴上海。沈考虑到解放军攻南京之际，国民党特务会下毒手，便将洪希厚、郑淑华转移到上海。

到上海的洪希厚等人依然处在危险之中，最后在上海地下党员、张治中的一位老部下、上海机场基地指挥官邓士章夫妇帮助下，才得以顺利登机，飞赴北平。

从妻儿那儿得知这一切的张治中心中盛满了感激。

张治中就这样被既是对手又是朋友的共产党挽留了下来。

4月24日，国民党派的专机到达北平，并由行政院特派的迎接代表李民欣带来何应钦23日写给代表团的信：

文白吾兄并转邵、章、李、刘诸兄钧鉴：此次和平谈判，经兄等尽最大之努力，仍未能克底于成，此属国运使然，凡我爱国之士，莫同声悲叹。兹特派专机来平，敬祈与全团同人即日径飞上海为盼。专此敬颂勋安。

弟何应钦敬启四月二十二日

经中共代表团恳切挽留后，南京代表团表示坚决留下。张治中也不再坚持“复命”。他写了一封复信，由留在北平的代表签名：

敬之院长先生：李民欣先生带来二十三日手示奉悉。和谈破裂以后，同

人等正待命南返中，二十二日晚间接奉德公电话，谓于翌日派机来平，当即转告各同仁准备南行，并即函告共方查照。旋由周恩来、林祖涵、李立三诸位分别访问同人等，坚相挽留，并表示随着将来新的形势发展，尚可续为和平努力等语，曾于二十二、二十三两日电并于二十三日晨以电话向南京请示数次，皆未得通。昨闻中央公司今日专机来平，复与共方洽商，中明必须南返理由，冀其同意，然周仍诚意挽留，未肯同意，似此只有暂留静待而已。尚祈亮察。再同人等此行未克达成任务，万蒙李代总统与先生函电相慰，殊深惭汗！并请为转陈德公为禱。专此奉复，敬倾绥。

张治中、邵力子、章士钊、李蒸、刘斐四月二十四日

国民党方面的专机带着这封信于4月25日，空机离开北平。

留在北平的张治中思想上仍很矛盾，也很苦闷。毛泽东、周恩来等亲自与他谈话，帮他解开疙瘩。

周恩来诚恳地对张治中说：“你还是封建道德，为什么只对某些人存幻想，而不为全中国人民着想？为什么不为革命事业着想？”

这些尖锐而又中肯的话对张治中的触动很大，使他逐渐弄通思想，决心与蒋介石决裂，站到人民一边。

国民党的和谈代表一个也没有回返南京，自然让国民党处于尴尬境地，不得不出面作些解释。

6月15日，国民党中央社发出电讯《张治中在平被扣详情》。

6月20日、22日，中央社又发出电讯，说张治中又在北平策动和平，受了中共的“唆使”，离开北平，行踪不明。对此张治中于6月26日发表了经过他深思熟虑而写出的《对时局的声明》。

《声明》说：

……我现在北平所过着的是闲适自在的生活；而且引起一种欣喜安慰的情绪，与日俱增。为什么缘由呢？我居留北平已八十多天了，以我所见所闻的，觉得处处显露出一种新的转变、新的趋向，象征着我们国家民族的前途已显露出新的希望。就是中共以二十多年来的奋斗经验，深得服务人民建设国家的要领，并且具有严格的批评制度，学习精神，和切实、刻苦、稳健的作风。这些优点反映到政府设施的，是有效率的、没有贪污的政府。反映到党的行动的，是简朴、肯干、实事求是的军政干部。尤其中共所倡导的新民主主义，在现阶段看来，实与我革命的三民主义之基本要求相符合。综合说一句，这都不是过去我们国民党所表现于政治设施和党员行动所能做到的……

我们自己既然无能，就应该让给有能的；自己既然无成，应该让给有成的。……目前大局已演变到此，我觉得各地同志们应该惩前毖后，当机立断，毅然决然表示与中共推诚合作，为孙先生的革命三民主义，亦即为中共新民主主义的实现而共同努力。至于我们国民，早就应彻底改造，促进新生，才能适应时代，创造时代，达成我们革命党人应负的历史使命。在目前，我们如果把眼光放远些，心胸放大些，一切为国家民族利益着想，一切为子孙万代幸福着想，我们不但没有悲观的必要，而且还有乐观的理由。国家要求新生，也正在新生；人民要求新生，也正在新生，为什么我们国民党和个人独甘落后，不能新生呢！

张治中的声明在当时产生了强烈反响，对于进一步分化国民党内部，推动各地起义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风雨飘摇的国民党大厦，已经到了即将倾倒的时日了。

## 第六章“总统府”的日历翻不动了

国民党兵败如山倒，美国对代总统的请求表示无能为力，认为蒋介石仍在幕后控制一切。京沪杭警备，总司令汤恩伯吹嘘他的长江防线固若金汤，但却没有有效住人民解放军百万大军横渡长江。军情紧急，匆忙间叶飞将军险人敌阵。凄楚中李宗仁仓惶飞离首都，“总统府”顶上的旗杆上降下了青天白日旗。陈毅在“总统府”给毛泽东打电话：“报告主席，总统府办公室的日历翻不动了！”

美国大使说：这是悲剧，但是我们无力阻止它发生

1949年4月中旬，南京本是春光明媚的时节，但由于和谈失败，战云笼罩，整个城市显得灰沉沉没有生气。人们在失望中等待，感觉到中国正面临一场巨大的变革。

南京西康路甲一号，美国驻华大使馆。

美国大使司徒雷登正在等待中华民国李宗仁代总统的来访。离约定的时间还有一分钟，这位大使便站在露天的坝子边迎候。大使觉得自己欠这位代总统的情。

他很清楚今天李宗仁造访的目的，也同样清楚他不可能满足李宗仁的要求。但以他们过去的情谊，他认为今天他只有言语相慰了。

司徒大使原指望国民党换马后，局势能有点起色，但这种希望很快落空了。

李宗仁为挽救国民党的厄运，进行了一系列外交穿梭，甚至向美国的对头苏联暗送秋波。虽然这是背着美国干的，但司徒雷登还是获悉了李宗仁和苏联暗中来往的实情。

据可靠消息说，李宗仁已与苏联就调停内战达成了三项协议：

- 1、中国将在未来的国际冲突中严守中立；
- 2、尽量消除美国在中国的势力；
- 3、建立一个中苏合作的可靠基础。

3月，李宗仁打算访问莫斯科，以便要求斯大林出面调停中国内战。显然，李宗仁是想把赌注押在苏联人身上，同时，他还可能访问华盛顿和伦敦。

李宗仁没有公开他与苏联的往来，只是把他的访问计划告诉了美国，他是要让美国知道，你不再掏腰包，我就要改换门庭了。却不料美国根本不买帐，美国国务院的态度是，李宗仁的行为是“不可思议”的，即便访问华盛顿，也不会得到美援，而这时斯大林也清楚国民党已是落水之狗，没有必要在这时候与之做任何交易了。

李宗仁鸡飞蛋打，两边没得好。

司徒雷登看着李宗仁的汽车通过两名美国海军陆战队的门卫，驶进了使馆的大门。当轿车行驶到主楼前戛然而止的时候，不待使馆的侍从上来打开车门，李宗仁已自行开门，走出轿车。

司徒雷登迈下台阶，伸出双手，朗声说道：“欢迎你，代总统先生。怎么样，总统这个职位很不轻松吧？”

司徒雷登迎候的礼遇使李宗仁非常感动，他紧握住对方伸过来的手，苦笑着说：“多事之秋，我是没福份享受清福了，看来，人生最大不幸，就是

生逢乱世。”

司徒雷登把李宗仁让进会客厅，虽然两个人都竭力做出轻松的样子，但是他们心里明白，即将开始的会谈，绝不是轻松的。

司徒雷登与李宗仁相交已久。早在抗战结束时，李宗仁就任北平行营主任，是国民党在华北地区的最高军政长官，当时身为燕京大学校长的司徒雷登便是李宗仁行辕中的常客。

李宗仁在国民党高层中，素有开明派之称，而司徒雷登不满于国民党的一党统治，对国民党的腐败深恶痛绝，一心要把美国式的民主搬到中国。因此，两人谈得很投机，从此奠定了他们间的友谊。

国民党在内战中败端已露的时候，司徒雷登便把希望寄托在了李宗仁身上。司徒雷登在给美国国务院的报告中说：“在一般学生心目中，象征国民党统治的蒋介石，其资望已日趋式微，甚至曰之为过去人物者，”“李宗仁将军之资望日高。”

正是在司徒雷登的支持下，李宗仁才以微弱多数击败蒋介石所属意的副总统候选人孙科。

1948年底，桂系大演“逼宫”戏，在国民党内掀起逼蒋下野的浪潮，幕后导演正是司徒雷登。然而，李宗仁没想到，当他登上代总统的宝座时，他在美国政界的行情已一落千丈。短短几个月，精明的美国老板看出，李宗仁是扶不起来的，国民党大势已去，美国要考虑的是如何从中国大陆脱身了。

虽然司徒雷登礼貌周到，但直觉告诉李宗仁，眼前这位老朋友已经离他十分遥远了。

寒暄过后，李宗仁以军人的直率开门见山他说明来意：“老朋友，中国有句俗话，无事不登三宝殿。我今天来，还是重提一个老话题，我希望贵国政府能够借给我的政府十亿美元，至少五亿美元，以帮助制止通货膨胀。”

司徒雷登立刻收起笑容，公事公办他说：“对不起，这一点，国务院已经做了答复，我想我不必重复他们的话了。”

李宗仁当然知道美国国务院的答复是什么。3月，何应钦接替孙科担任行政院长后，要求美国提供紧急援助，以解财政上的燃眉之急。美国国务院对此的答复为：“财政赤字乃内部问题，不能靠外援解决。”

李宗仁几乎哀求他说：“大使先生，你要知道这笔援助对我是多么重要！如果美国不给这笔援助，国民党便无法生存，也无法与共产党谈判。”

司徒雷登耸耸肩，做出为难的样子：“我很同情你，但是，在这件事情上，我实在无能为力。”

一阵沉默之后，李宗仁的脸色也变得难看起来说：“这么说，你们已决定看着我们垮台了？”

司徒雷登痛苦地摇摇头说：“老朋友，你不要再逼我了。我在中国生活了五十年，我把毕生的精力都贡献给了这个国家，你应当知道我对这个国家的感情。可是，局势已经恶化到无法收拾的地步，这是谁的错呢？你叫我有什么办法呢？”

李宗仁哑口无言，他难过地说：“请原谅我的唐突，不过，也请你体谅我此时的心情。”

悲愤交加的李宗仁最后向他的老朋友说：“有一句话，我还是要说出来。如果你们现在拒绝帮助中国来阻止世界共产主义的扩张，今后贵国要在远东做同样的事就要多花一百亿美元，还要使美国青年不得不流血，而且不会有

什么效果。坦率地讲，如果美国不愿在现在采取行动，而愿在今后采取行动，你们只能得到一顶帝国主义的头衔，不会得到别的。”

李宗仁慷慨激昂的最后冲击波并没冲开司徒雷登心理的堤坝。作为大使，他必须执行美国政府的政策。他以无可奈何的口气回答李宗仁说：“代总统先生，恕我直言。现在的问题是，你有其名而无其实，蒋先生仍在幕后操纵一切，政府实权全未更动，不管美国运来多少金银，还不是和以前一样，付诸东流。请原谅我的坦率。”

这番话无异于当面羞辱，饱经沧桑的李宗仁露出了痛苦与羞愧，司徒雷登见之不禁顿生恻隐之情，他叹道：“此事我也无能为力，美国在远东的外交政策已确定，短期内无改变的可能。”

许久，李宗仁又似乎看到了新的希望，以殷切的口吻说：“纵然美国不能从物质上给予我们援助，道义的支持总是可以的吧？我希望能以你的名义为我举行一个茶会，邀请英、法等国大使参加。这个要求，我想不算过分吧？”

对此，美国大使无法再予拒绝了。

在司徒雷登的安排下，英、法、澳大使应邀参加美大使馆举行的茶会。李宗仁首先发言。他从怀里取出一份文件，很激动地说：“各位大使先生，这是共产党提出的和谈条件，这些条件是国民党无法接受的，但是我的同僚们一致认为，既然盟国连道义上支持的表示都没有，我们也只好接受。”

“我不明白，当西方正在建造堤坝阻止赤祸在西方泛滥时，让它在东方自由泛滥是明智的吗？”

“诸位先生，如果中国现政府倒台，我相信整个远东会随着崩溃。没有人应该低估中国内部灾难的严重性，也不应袖手旁观。先生们，我再说一遍，我并不是要贵国政府向我国提供物质援助，我们需要你们尊敬的政府的道义支援。”

李宗仁讲完话，眼睛直盯司徒雷登，他希望得到他的附议。然而，这位大使避而不看李宗仁，他正与旁人搭讪。

英国大使起身发言。稿子是事先商量好的，他对李的处境表示同情，但认为1945年外长会议已有协议，不干涉中国内政，故无能为力，云云。在英大使发言时，司徒雷登始终眼望天花板，一言不发。

最后，李宗仁脸色阴沉地离开了美国大使馆“整个茶会对他来说简直是一场灾难，他明白整个西方世界已经把他的政权抛弃了。当他与司徒雷登握手告别时，他没有一丝愤慨，而只感到绝望悲哀。

“老朋友，我们下次再见面时，不知在什么地方了，我想肯定不是在南京。”

司徒雷登的痛苦是真诚的，他沙哑他说：“这是一幕悲剧，但是现在我们无力阻止它发生。请你相信，我也很难过，我的朋友。”

### 汤恩伯吹嘘他的长江防线固若金汤

1949年4月中旬，正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在长江以北厉兵秣马，而和谈前途又未卜之际，沉默了好几个月的蒋介石突然从溪口来到上海，部署淤沪地区和长江下游的防务。京沪杭警备总司令汤恩伯向蒋介石报告说：“总裁放心，长江防线固若金汤。我们还在长江防线部署了机动部队，如共军由镇江、南京段江面渡江，我军可以突击歼灭之。如不奏效，第一绥靖区各部队，当

由镇江沿公路及铁路逐节抵抗，退至上海，然后以海空军全力协助地面部队，确保淞沪。”

蒋介石满意地点点头，又问道：“对方如由皖南方向渡江呢？”

汤恩伯很自负地回答：“如果不能在江面上阻截，我将命令第七绥靖区和第八兵团部队独立作战，以机动部队反击。万一不奏效，则退出皖南，确保浙赣线。南京以东部队则要求他们确保长江、钱塘江三角地带。不得已时，才退守淞沪。”

蒋介石在地图上比画了一阵，说：“亦只好如此了。长江要守住，上海要确保！”

但深谙军情的李宗仁却知道长江防线是怎样的捉襟见肘。他认为汤恩伯按蒋介石旨意部署的长江防线，是“最不堪想象的愚蠢的部署”。多年后他在回忆录里说：“汤氏把他的三十万精锐悉数调往上海一隅，征集民财，在四郊筑碉防守。南京、镇江、芜湖一线，则以战斗力极为薄弱的部队聊作应付。这种部署无异开门揖盗，共产党自然就更不愿与吾人谈和了。”

蒋介石虽然作了放弃大陆确保台湾的打算，但他还是很看重长江防线。当国共和谈破裂，解放军即将渡江之时，蒋介石在溪口发出的第一道命令是：“告诉汤恩伯，让他给我好好打，一定要守住长江天险！”

当汤恩伯吹嘘的“固若金汤”的长江防线在解放军的猛烈打击下土崩瓦解，前线将领告急的电话一个接一个传到溪口时，蒋介石暴跳如雷，急令国防部长、参谋总长和江防司令，要他们拼命堵截共产党的进攻。他朝电话里吼道：“如果长江守不住，你们要政府往哪里退却？”

实际上，长江守不住，早就在美国军事顾问团和以李宗仁为首的南京政府军政官员的预料之中。

1949年4月，一艘内河炮舰“长泰”号驶离上海吴淞港。码头上，军乐喧嚣，送行的国民党军政要员纷纷向炮舰挥手告别。这是在欢送美军顾问团的琼斯中校和米勒上尉巡视长江防线。自长江局势趋紧以来，国民党高级军政大员不断视察这条防线，在盛传共军要过江之时，美国军事顾问团也不失时机地派出两名军官，视察江防，给国民党军队打气。4月18日，美军顾问视察了江阴附近的二十一军防地，19日视察江阴要塞及驻守扬中的五十一军。20日和21日视察镇江、金山、焦山一线之后，这才打住。

经过三大战役之后，蒋介石赖以发动内战的精锐主力基本被消灭，残存作战部队不足150万，分布在从新疆到台湾漫长的战线上，战略上已无法组织有效防御。七拼八凑建立起长江防线，也是捉襟见肘，破绽百出。其部署是，从九江的湖口以西到宜昌，为华中白崇禧防区；从湖口往东至上海，为京沪杭警备总司令汤恩伯的防区。整个长江防线115个师70万人，在湖口至上海防线共18个军75个师45万人，平均一华里仅300人。湖口以西的防线就更加薄弱。国民党赖以生存的漫漫长江防线是如此的空虚。

稍有军事常识的人一眼就可以看出这种防线的脆弱。

美军顾问团20日夜宿第四军军部，第四军军长王作华设宴款待。席间，江防副总司令李延年酒意微醺，拍着胸脯对王作华说：“王军长，你放心，如果共军在你们当面渡江，我马上调两三个军和两个游动炮团来增援你们，你放心固守好了。”

王作华喜不自禁，副军长李子亮闻言端起一杯酒，向李延年敬酒说：“李副总司令，那两三个军我不敢奢望，果真能派两个炮兵团来，那我们就谢天

谢地了。来来来，我代表全军官兵先敬李副总司令一杯。”

一名美军顾问见李延年和两位军长说得热闹，便问翻译他们在谈些什么，待他明白后，便问李子亮：“你们这个军有炮，有美国炮吗？”

李子亮见美国顾问发问，便如实回答：“只有十二门日本炮，没有美国炮。”

美军顾问大为不解地转脸问李延年：“那么多美国大炮哪里去了？都迁到台湾去了吗？照这个样子能不打败仗吗？”

美军顾问一句话，一盆凉水浇在众人头上。

铜陵至九江四百里的江防是由刘汝明的第八兵团担任的，1月中旬第八兵团从裕溪口渡江，刘汝明以国共和谈、解放军不会过江为由，丢下部队到上海家中同姨太太寻欢作乐。国防部数次催他返回，他都置之不理，直至3月中旬，江防日渐紧张，他才返回任所。

刘汝明回到指挥部青阳后的第一件麻烦事，就是要不要分兵驻守安庆。安庆是长江中游江北重要的据点，原由第七绥靖区夏威部一个师防守，八兵团接过江防后，按理应派兵接守安庆，但由于安庆位于江北，解放军一旦渡江，安庆首当其冲，所以刘汝明说什么也不肯派兵接防。京沪杭警备总司令汤恩伯也莫可奈何，气得蒋介石暴跳如雷。

事情一直拖到月底，安庆防务仍悬而未决，国防部及京沪杭警备总部便派李延年来到青阳，和刘汝明商量解决办法。

刘汝明将李延年客客气气让进自己的司令部，笑着问：“吉公，有什么吩咐拍封电报来不就结了，何必大老远的跑一趟呢？”

李延年没好气他说：“我敢吗？子亮兄现在好生了得呀！”

刘汝明知李延年是为安庆而来，却皱起眉头诉苦说：“吉公，我也是有苦难言呀！八兵团的老底你还不清楚？四百里江防，一里地才能摊上几个兵，我哪还有兵力守安庆？”

李延年摆摆手，以一副公事公办的口吻说：“国防部的意思是把我的九十六军拨给你指挥，一个师守安庆，一个师加强江防守备。”

刘汝明暗言，但脸上却面露难色，说：“吉公，这怎么使得？刘某承受不起呀！”

李延年拖长音调道：“你就不必推托了，共产党过了江，还不是一块儿完蛋！”

片刻，李延年又换了语气，说：“九十六军的部署，虽说汤总有令，但依我之见，还是不宜分割使用。”

刘汝明把胸脯一拍说：“吉公放心，我决不能把我的部队留在江南，把配属的部队派到江北守城。安庆让那帮广西猴子守去吧，我不接防就是。”

李延年脸色终于由阴转晴。

李延年与刘汝明私下达成君子协定，九十六军便由浦口开往青阳，刘汝明命其担任大渡口东西的江防，五十五军和六十八军各让出五十里的江防阵地。

李延年去了一趟青阳，安庆依然如故。

刘汝明敢不接安庆防务，白崇禧却不敢擅自放弃安庆，自从发了“亥敬电”逼宫要蒋介石下野后，他格外小心谨慎，生怕给蒋介石抓住辫子。

刘伯承看准白崇禧想撤出安庆又不敢的心理，命陈赓部攻占麻城，做出在团风渡江的模佯，刘伯承预料，武汉江防吃紧，白崇禧一定会从安庆撤兵。



刘伯承神机妙算，陈赓攻下麻城逼近团风后，白崇禧果然立即命桂系一七四师撤出安庆回防武汉。陈赓部虚晃一枪，见安庆乃一座空城，便挥师东下，集结华阳渡口一带，准备渡江。

第八兵团刘汝明部防区尚且如此，与其毗邻的芜湖地区的守备就更为糟糕。芜湖地区的荻港为八十八军守备，所辖两个师，三一三师是新建师，接守江防时尚未编成，许多新兵连枪都不会放。一四九师也仅仅成立一年多，而且一直在弋山修建营房，根本未进行过认真训练。这两个师均不堪一击。因原驻芜湖以西的二八二师起义，江防线上留下二百里长的空白，八十八军便被调上来填补空缺。当守江的命令传来时，八十八军全军上下笼罩着一片恐惧绝望与怨气。军、师主官根本没到过江边，也没有颁布过守备计划，整个江防工事极为草率。军长马师恭自知前景不妙，带着金条上了南京，在国防部积极活动，终于在渡江战役打响前10天，获准辞职。

尽管长江防线这样糟糕透顶，但无论是坐在溪口的蒋介石，还是武汉的白崇禧、南京的李宗仁，却都指望长江能给国民党带来转机，以期实现“划江而治”的美梦。

### 朱、毛发给邓小平一封密电

面对南京的顽固和蒋介石强硬派的对抗，人民解放军积极进行打过长江的准备。

1949年3月22日，蚌埠以南的弹丸小村孙家圩子，显得异常热闹。从清晨起，几十辆吉普车组成的车队，从四面八方渡过淮河，浩浩荡荡地驶进这个默默无闻的小乡镇。

从战火硝烟中冲杀出来的解放军将领们，在解放了大批中等城市后，仍习惯于在沿交通线的乡村建立指挥部。

淮海战役总前委的全体成员邓小平、刘伯承、陈毅、粟裕、谭震林，和二野、三野兵团司令员们及参谋人员先后到达。中共中央已命令，以邓小平为书记的淮海战役总前委在渡江战役中“照旧行使领导军事及作战的职权”。

中共中央还指定刘伯承、邓小平、张际春、陈赓参加以陈毅、饶漱石为主的中共中央华东局，邓小平为第一书记。渡江前夕，邓小平被授予华东与中原的党、政、军、民大权。

淮海战役结束后，总前委频频开会，需要制定有关渡江作战及渡江后作战的战略方针。部队过江后，将要分布在广阔的江南连续作战，再举行这样的高级会议实属不易。

一间宽敞的民房内，一幅巨大的长江地区战略态势图占了一面墙，刺鼻的烟味和着爆发出的阵阵笑声，从室内弥漫开来。

会议由邓小平主持，首先听取了各兵团渡江战役的训练情况和后勤供给情况的报告。

然后，邓小平向会议报告他亲自起草的《京沪杭战役实施纲要》。熟悉邓小平的人都知道，他的讲话一向语调平稳有力、高度概括、言简意赅。他说：“同志们，渡江战役我军的战役目标将以第二、第三野战军全部，歼灭上海、镇江、南京、芜湖、安庆等地及浙赣线蒋军的全部或大部，占领苏、皖南部和浙江全省，夺取京沪杭，彻底摧毁国民党反动政府的政治、经济中心。”

会议室里立即涌起一股热烈的气氛，生性好说好动的陈毅笑着叫道：“讲得好！同志们哪，加把劲儿哟，等过了长江，可捞不着大仗打喽！”

刘伯承笑着纠正道：“还不能这样说，三野的同志们还有一块硬骨头要啃哩——上海。”

智勇深沉的粟裕笑道：“总不会比淮海战役更难打吧？蒋介石把真正的希望寄托在上海，但是蒋介石的愿望没有一次不是落空的。”

将领们听着这几位统帅风趣的对话，笑得更欢了。

平时不苟言笑的邓小平这时嘴角也显出微微笑意。待会场平静下来，他又继续说道：“总前委统一部署是：刘伯承司令员、张际春副政委、李达参谋长指挥二野的第三、第四、第五兵团及四野的一部，作为西突击集团，从枞阳至望江段渡江作战。三野代司令员代政委粟裕和参谋长张震，率三野统率机构，直接指挥第八、第十兵团为东突击集团，从张黄港至三江营段渡江作战。三野副政委谭震林指挥第七、第九兵团为中集团，从枞阳至裕溪口段渡江作战。三野的两个突击集团由粟、张统一指挥。我和陈毅司令员在安徽肥东县的瑶岗设立大本营，统一指挥渡江战役，主持全局工作。”

停了一下，邓小平继续说：

“只要我军渡江成功，无论敌人采取何种处置，战局的发展都会发生有利于我的变化，并有可能演化成敌人全面混乱的情况。因此党中央要求我们一举渡江成功。”

“在我军渡江成功后，三野的两个突击集团应迅速合围，力求达到全部或大部歼灭敌江防部队的目的，不使其龟缩进上海、杭州，此着是全战役的关键。”

“西突击集团过江后，一个兵团迅速直插浙赣线，割裂汤恩伯与白崇禧的联系，同时，作为战略预备队，做好预防帝国主义可能的军事干涉的准备。其余两个兵团准备东进，进攻南京。”

《京沪杭战役实施纲要》从宏观决策的角度，提出了渡江战役的作战纲领及部署，为渡江战役的胜利指明了方向。

4月上旬，二野、三野百万大军经过两个月的休整和渡江作战的训练，陆续开到长江北岸。

条条大道上滚动着钢铁的洪流，川流不息的饱车、辎重车一眼望不到尽头。

中国的上空，即将被大江上的炮声掀开新的光芒。

宽阔浩森的长江，在历史上多次大动乱的时期都成为民族分裂的界河。这一次，1949年仲春，蒋介石集团仍然希望它成为“划江而治”的天然屏障，但稳操胜券的共产党人却相信，这一次，长江不会再成为民族分裂的界河了！

在国民党和谈代表团到北平以后，毛泽东首先考虑的，仍是如何指挥人民解放军继续前进，打过长江，打到南京去，解放全中国。

有一次，卫士长李银桥和毛泽东一同散步，毛泽东忽然站住脚，问李银桥：“你相信蒋介石吗？”

“不相信！”李银桥立刻回答。

“这就对了。”毛泽东点点头，“这个人尽耍手腕，从来说话不算数！”

果然，4月20日，南京政府拒绝了国共和平协定。

4月21日，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毛泽东、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朱德发布命令：

各野战军全体指挥员战斗员同志们，南方各游击区人民解放军同志们：  
由中国共产党的代表团和南京国民党政府的代表团经过长时间的谈判所拟定的国内和平协定，已被南京国民党政府所拒绝。……拒绝这个协定，就是表示国民党反动派决心将他们发动的反革命战争打到底。拒绝这个协定，就是表示国民党反动派在今年一月一日所提议的和平谈判，不过是企图阻止人民解放军向前推进，以便反动派获得喘息时间，然后卷土重来，扑灭革命势力。拒绝这个协定，就是表示南京李宗仁政府所谓承认中共八个和平条件以为谈判基础是完全虚伪的。……在此种情况下，我们命令你们：

（一）奋勇前进，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歼灭中国境内一切敢于抵抗的国民党反动派，解放全国人民，保卫中国领土主权的独立和完整。

（二）奋勇前进，逮捕一切怙恶不俊的战争罪犯。不管他们逃至何处，均须缉拿归案，依法惩办。特别注意缉拿匪首蒋介石。

（三）向任何国民党地方政府和地方军事集团宣布国内和平协定的最后修正案。对于凡愿停止战争、用和平方法解决问题者，你们即可照此最后修正案的大意和他们签订地方性的协定。

（四）在人民解放军包围南京之后，如果南京李宗仁政府尚未逃散，并愿意在国内和平协定上签字，我们愿意再一次给该政府以签字的机会。

以这个命令为起始，人民解放军几百万大军，在中华大地上，向国民党反动派残余势力展开了一场大追剿的军事行动。

其实，早在1948年12月12日，中央军委就发给邓小平一封密电，将渡江作战方针的初步意见交以邓小平为书记的总前委讨论。

这个电报机密度极高，只发到总前委的刘伯承、陈毅、邓小平三人，并责成邓小平在开会时给粟裕、谭震林一阅。阅后焚毁。

军委的计划是：华东野战军、中原野战军同时休整，同时举行渡江作战；渡江以后，华野、中野协力经营东南，包括皖南、苏南与浙江、福建两省，还有江西的一部分。

12月17日，军委电示：请刘伯承、陈毅两人来中央商议渡江问题。

12月19日，刘、陈北上，到中共中央所在地西柏坡村，随即参加了1949年1月6日至8日举行的中央政治局会议。

会后，刘、陈、邓和总前委以主要精力筹划渡江作战。

1949年2月，根据中央军委1月15日的命令，中原野战军改编为第二野战军，刘伯承任司令员，邓小平任政治委员，张际春任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李达任参谋长，段君毅任后勤部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下辖第三、四、五兵团共9个军和一个特种兵纵队。各兵团的主要领导人分别是：第三兵团司令员陈锡联，“政治委员谢富治；第四兵团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陈赓；第五兵团司令员杨勇，政治委员苏振华。特种兵纵队司令员兼政治委员李达（兼）。各兵团下辖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八军共9个军，另野战军直属五十八军（后又成立十九军）。

同时，华东野战军改编为第三野战军，陈毅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粟裕任副司令员兼第二副政治委员，谭震林任第一副政治委员，张震任参谋长，唐亮任政治部主任，刘瑞龙任后勤部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下辖第七、八、九、十兵团共15个军和一个特种兵纵队。各兵团的主要领导人分别是：第七兵团

司令员王建安，政治委员谭启龙；第八兵团司令员陈士榘，政治委员袁仲贤；第九兵团司令员宋时轮，政治委员郭化若；第十兵团司令员叶飞，政治委员韦国清。特种兵纵队司令员陈锐霆，政治委员张凯。

1949年2月8日，总前委召开会议，具体研究了渡江作战问题，计划采取5个兵团从江阴至扬中、南京东西、芜湖东西、铜陵至贵池、安庆东西等地一线展开、同时渡江的战法。二野的另两个兵团以一个军进至黄梅、宿松、望江段佯动，以5个军作为总预备队紧随最先突破部队渡江钳制。渡江时间初步确定为3月底，即洪水发生之前。

## 打过长江去，活捉蒋介石

3月上、中旬，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在西柏坡召开。

会议期间，毛泽东与陈毅、邓小平、谭震林等人一起研究了渡江作战问题，定于4月10日为发起时间。

根据当时各方面的情况判断，美国在解放军渡江时出兵干涉的可能性较小，但又不可不防“二野、三野并肩直指东南，就是准备在必要时对付美国的干涉。渡江时间越短，消灭敌军就越多，江南解放得就越快，美国出兵的可能性也就越小。

4月1日，邓小平、陈毅率领新组成的精干指挥部，来到合肥东南的瑶岗村，正式实施对渡江作战的领导。各突击集团的指挥部也同时分赴桐城、无为、泰州。

就在这时，南京政府的和谈代表团飞抵北平。根据中央电报，中共代表团与他们的谈判有很大进展，南京政府有签字的可能。

如能和谈成功，武装强渡改为和平渡江，那意义的重大不言而喻。为此，中央军委估计渡江时间将因此推迟半个月左右。

但从部队基层反映上来的情况却十分严峻：

二野的指战员认为：长江水势4月末5月初将迅速上涨，南风大起，雨多流急，渡江会变得非常困难。另外，目前部队的食物已成困难。

三野反映：4月下旬开始雨季，江水日涨，现有船只三分之二为内河船，江中行驶困难；雨季稻田放水，部队展开不易；粮草困难。

总前委亲自调查的情况表明：5月的长江水比7、8月还要大，两岸湖区均会被淹，长江水面极宽，渡江将发生极大困难。现百万大军拥挤江边，著行动过久推迟，将不得不后撤以就粮草。即使签字，也应设想敌人翻脸。

综合上述情况，总前委建议先打过江，然后争取和平接收。中央军委既要考虑政治斗争的需要，又必须顾及渡江客观情况的严峻。

4月15日，中央军委电示总前委：“依谈判情况，我必须决定推迟一星期渡江，即由15日渡江推迟至22日渡江。”“假定政治上有必要，还须准备再推迟7天时间。”

百万大军渡江作战，面临很多很大的困难，其中最现实的问题是，指战员们大多数来自北方，是“旱鸭子”，不习惯水战。一坐上小船，头就发晕。

指战员中很多人对滚滚长江水望而生畏。虽经反复政治动员，思想认识有所提高、战斗意志有所增强，但信心仍不足。

各部队首长研究决定，把部队拉到江边进行演练，通过“谈水”、“看水”、“试水”等各种方法；请南方籍战士和当地居民讲解水性，组织北方

籍战士练习游泳、用船和试制救生圈。

没多久，指战员们就会了跑跳板，在船上坐得住，坐得稳，还能明确在100吨的木船上放些什么武器，在206吨的船上又放什么武器。

经过几十天的苦练，在预定的渡江时间前，部队完成了训练任务。

陈毅高度评价这次练兵说：“这次练兵把北方人变成了南方人，把陆军变成了水兵，把浩浩荡荡的长江变成了平阳大道！”

在开展水上练兵的同时，还进行了渡江工具的筹建工作。

当时，渡江的主要运输工具只能是木帆船，然而，国民党军溃逃时破坏掉了这些船只，或劫持到了长江南岸。这给部队渡江带来极大困难。

参战部队请求地方各级党政领导发动群众解决这一难题。

广大群众千方百计帮助筹集船只。

渡江的困难一个一个地被解决了。

随着时间的推移，军情日益紧迫。

17日凌晨1时，总前委电呈中央军委，提出渡江于22日夜举行的计划。

凌晨3时，中央军委复电，指示总前委“确定于22日渡江不要改变，并必须争取一举成功。”

17日下午15时，总前委又向中央军委报告，提出渡江时间提前改到20日夜，整个渡江部队于20日夜至21日夜发起渡江作战。

18日9时，中央军委复电，表示“完全同意总前委的整个部署”，决定“二野三野各兵团于20日开始攻击，22日实行总攻，一气打到底”，并强调“不得有任何改变”。

4月20日，南京国民党政府拒绝在《国内和平协定》上签字。渡江战役按预定计划进行。

最先发起攻击的是中突击集团。它的总兵力为30万人。

20日中午，突击集团指挥谭震林到第一梯队之一的二十四军，对渡江作战的准备做最后检查，同时再次向突击部队的高级指挥员们传达了中央关于渡江南进的有关指示精神。

中午与军首长会餐时，谭震林举起酒杯祝愿：

“同志们，祝你们首先打到江南去！”

“打过长江去，活捉蒋介石！”指挥员们齐声高呼。

夜幕中，江雾升起，长江水拍击着堤岸。

夜色中，渡江突击部队悄悄从各自隐蔽的地点向江边疾进。千百条战船，出其不意地从预先挖通的河汊港湾迅速进入起渡点。

19时30分，谭震林向中突击集团发出开始攻击的命令。

渡江战斗正式打响。

刹那间，长江北岸万炮齐发，平静的长江波涛汹涌。

中突击集团七、九兵团从预定的裕溪口至枞阳镇一线实施渡江。

此地段江面较窄，是国民党军汤恩伯部与原西北军刘汝明部防区交接地带，空隙较大，防守较弱。中共地下党及其领导下的游击队长期活跃于这个地区，早就做好了迎接大军南下的准备。

承担渡江第一梯队的二十一、二十四、二十五、二十六军先头部队，分别从土桥、姚沟、泥汉镇、姚王庙江段强渡。

各突击部队在北岸猛烈炮火的掩护下，乘风破浪，奋勇前进。最快的船只用15分钟就驶达长江南岸。

随即，二十四军夺取了闻新洲、紫沙洲，全歼守敌一四九师一部，俘敌副师长以下 1500 余人，拂晓突破太平街三夹江。二十七军攻占黑沙洲，在荻港、旧县交界处登陆，歼敌三一三师副师长以下 3000 多人。二十五军攻占鳊鱼洲，在汪家车站、横山桥地区登陆，俘敌 500 余人。二十一军则在贵池以北的长生洲、余水洲登陆。

20 日晚，中突击集团共有 20 多个团渡过长江，在无为沿线一带实施中心突破。

21 日早晨，总前委呈报中央军委及所有参战部队，发出了第一份战报：“截至 21 日 6 时止，我已过江者，计有二十四军全部，二十六军全部（四个师），二十五军七个团，共二十八个团。二十四军三个团正渡三官庙至夹江口段夹口，迫近铜陵。其余各部，均向纵深挺进中。”

21 日，中突击集团先头部队继续猛打猛冲，猛追猛击，迅速占领铜陵、顺安等地沿江南岸重地。

22 日凌晨 1 时，中央军委发来贺电：“庆祝七、九两兵团渡江胜利。”

### 匆忙间，兵团司令叶飞误入敌阵

突击部队渡江进展顺利，但中路总指挥谭震林过江时却遇到危险。

22 日晚，谭震林同王建安等人率领六兵团指挥部，在十多条警卫船的保护下，乘坐木帆船从北岸起渡。

船到江心时，突然遇上从安庆向南京顺流东逃的国民党军舰。敌军舰见有渡江船队，枪炮齐发，弹丸如雨，江中升起了条条水柱。

情况万分危急。

谭震林等人沉着镇定，一面让指挥船上的船老大驾船躲开敌舰，一面指挥警卫船，迅速组织火力，向敌舰还击。

总前委指挥所里的陈毅、邓小平获悉这一紧急情况，担心谭震林一行的安全，多次来电询问。直到确知谭与七兵团指挥所已安全抵达江南坝埂头时，才放心下来。

曾与谭震林同船过江的同志在几十年后回忆当时的情景时，还激动他说：“总前委成员之间休戚与共，相互关心，情同手足，胜似兄弟啊！”

由粟裕率领的八兵团、十兵团共 8 个军、3 个独立旅，5 万人。八兵团除两个军和一个警卫旅在江北负责歼敌，封锁江面，钳制南京、镇江等敌外，主力部队由三江营至口岸地段渡江。十兵团由龙稍港至张黄港地段渡江。

21 日晚 19 时 30 分，十兵团第一梯队二十三、二十八、二十九军在预定地段并肩南渡，首先在天生港、长山等地突破敌防，歼敌一个团大部。紧接着，击退敌五十四、二十一、一二三军从申港、夏港等地进行的多次反击，歼敌五十四军八师一部，俘 8000 多人。22 日中午，进抵百丈、横土、香山、南闸一带，还建立了滩头阵地。这时，因为中共地下党组织的活动，江阴要塞在总台长唐秉琳、流动炮团团团长王德容、守备总队长李云葵、吴广文领导下宣布起义。解放军控制了炮台，封锁了江面。

八兵团也于 21 日晚突破江防，发起强攻。

三十四、三十五军围攻瓜洲、浦口、浦镇，二十军于 21 日晚由龙窝口、永安州段向扬中突击，22 日攻占扬中，23 日进达南岸。

东突击集团的十兵团正准备渡江，而江面上却没有一丝风。

木船渡江，无风就大大影响前进速度。

兵团司令员叶飞急坏了，全体指战员也发愁了。

真是‘天助我也’，谁知，快到启航时间时，北风呼呼刮了起来。

指挥部所有的人都欣喜若狂地跑到外面。

在渡江时，陈毅、粟裕给叶飞个别交待任务，指示他跟着第一队船登岸，担任先头军军长的角色，因为十兵团的作战地段在南京和上海之间，易遭东西两面夹击。让叶飞随第一梯队行进，目的是直接掌握情况，实施强有力的指挥。

渡江时，叶飞站到了第一梯队师的位置。

然而，身边竟没带电台。

“叶飞上船后，发现身边只带了个警卫排，电台留在了兵团部。

他很是恼火：怎么参谋机关连这件事都没安排好，即使轻装，也不能不带电台啊！

渡船一路顺风，拂晓5点过到达长江南岸。

登陆后，前进的预定位置是二十八军军部登陆后占领的一个村。

天还没亮。叶飞与韦国清在路旁，让一个参谋先去联络。

这位参谋人很机灵，他进村后询问哨兵时发现，面前所站的是国民党士兵。他急中主智，三言两语一问，估计这里可能是国民党军的一个团部，于是便对敌兵说：“师长到了。”

说完，他把国民党军的这个哨兵带来见叶飞。

叶飞问：“联络上了没有？二十八军军长怎么没来？”

参谋说：“来了。”

叶飞一看，大吃一惊：怎么是个国民党兵？

审问了哨兵之后，才知道二十八军军部还未占领这个村子，这里驻有国民党的一个团。

叶飞暗忖：好险啦！如果我们糊里糊涂进村，岂不要当俘虏了？即使不当俘虏也要被打得稀里哗啦！

随即，叶飞带领大家朝另一个村子进发，走出一里路，才见到二十八军的先头登陆部队。

十兵团指挥部由参谋长率领渡江。但是，等于22日晚上才渡到南岸。

由于兵团部没及时跟进，身边又无电台，叶飞和总前委失去联络整整一天。

总前委和东集团指挥部急坏了，不知道叶飞到哪里去了，部队进展情况也不清楚。

事后，陈毅查明情况，问叶飞：“你怎么搞的？整天不与我联系，你跑到哪儿去啦？”

叶飞搪塞道：“电台和兵团部第二梯队过江耽误了。”

好在部队顺利过了江，对胜利者就用不着指责了。

由刘伯承、张际春等指挥的西突击集团，由二野的三、四、五兵团，共9个军，35万人，于4月21日夜并列从贵池至马间宽约200里的正面，以安庆东西地段为重点进行渡江作战。

21日下午16时，二野开始炮击。

急风骤雨般的炮弹飞过长江。

17时30分，炮兵转入摧毁性射击。

在安庆上、下游的主要突击地段，几百门大炮一齐猛烈轰击。

五兵团使用 120 榴弹炮射击。铺天盖地的炮火，使长江南岸硝烟弥漫。

五兵团佯攻部队向阜康圩、黄石矶、清节洲一带运动。

17 时 55 分，突击部队离岸驶向江心。

突击部队只用了 30 分钟就登上岩岸，占领了阜康圩南和吉阳西北的山头，以接应友邻和后续部队渡江。三、四兵团同时渡江。由于准备充分，组织严密，三、五兵团第一次航行成功的 6 个步兵团，伤亡不到 10 个人。四兵团十三、十五两军的突击在彭泽上、下游遭到敌六十八军较为顽强的抵抗，伤亡较大。

四兵团司令员陈赓渡江时，还镇静地看着那茫茫江水，吟道：“晨光熹微，鱼贯入船，微风南送，疾驶如飞。”

西突击集团总指挥刘伯承在部队渡江之时，在作战指挥室里度过了一个不眠之夜。他不停地下命令及时了解部队进展情况，计算航速、航次和渡过的兵力。

至 4 月 23 日，西突击集团主力全部渡过长江。

中国人民解放军已经把胜利牢牢攥在手中。

### 代总统仓惶离京，陈毅笑谈总统府

1949 年 4 月 22 日，李宗仁应召携何应钦、白崇禧到杭州，同下野总统蒋介石会谈两个钟头，扫兴而归。

此时，人民解放军的大炮已射进南京城，南京的官员们的状态是“大难临头各自飞”。白崇禧飞回汉口去了，行政院长兼国防部长何应钦也不愿回南京，而是飞去上海避风头，还邀李宗仁一起赴上海。李宗仁说他身为代总统应回南京看看，怕南京撤退时，他如不在场坐镇，兵荒马乱之时难免发生抢劫现象。

4 月 22 日黄昏，李宗仁的座机在南京明故宫机场降落，迎接他的只有稀稀落落几个官员。

一行人凄凄惶惶地向城内驰去，沿途所见都是荒凉和凄惨的景象。街上行人绝迹，只有少数慌慌张张地在作撤退的准备。

刚从南京撤出的孔祥熙的大公子孔令侃跑到溪口，对姨父蒋介石说：

“南京城内乱得一塌糊涂，这些带兵的、吃政界饭的都是饭桶，共军还远在江对面，他们就飞的飞，跑的跑。国防部那些人逃到上海了，听说首都卫戍司令张耀明也甩开司令部逃到杭州来了。他妈的，这些家伙死到临头，还到中央银行去抢钱！从南京到吴兴，一路上翻了不少汽车。共产党还没来，自己倒是乱了，真是兵败如山倒……”

李宗仁回到总统府心情很不好，巨大的失落感和被蒋介石愚弄的烦恼笼罩着他。他召来京沪杭警备总司令汤恩伯，询问战局如何。汤恩伯说敌军已逼近城郊，今晚或许可以平安过去，明天的安全就难保障了。他说，解放军说进城就进城，劝李代总统赶快离开，至迟明天清晨要离开南京，否则，他就不能保证安全。

汤恩伯走后，李宗仁看着桌子上的台历发呆。台历正好翻到“4 月 22 日”，农历己丑年三月二十五，星期五。

正在此时，他派往北平和共产党谈判的代表邵力子、章士钊等人联名来



电，以老朋友的口吻劝他在解放军进城时不必离开南京，如嫌南京不完全，不妨径飞北平，中共当以上宾之礼欢迎，并且在将来的联合政府里安排一个政府副主席的职务。这本是毛泽东、周恩来的好意，借邵力子、章士钊的口传达。而李宗仁却将电文掷进字纸篓，不予理睬。

已是深夜，南京四郊的炮声更骤，机枪声也更密。李宗仁知道解放军正在加紧进攻城外据点，总统府已保不住了。他灭了电灯，在黑暗中迈着沉重的脚步走出总统办公室，回到卧室。一切都已结束，他李宗仁已无力回天。这么一想，心反倒宽松下来，平静地解衣而卧。

次日清晨，李宗仁正欲起床，汤恩伯打来电话，催他即去飞机场，晚了共军会封锁机场。

李宗仁漱洗完，吃了早点，招呼总统府侍卫长李字清备车驰往明故宫飞机场。总统府随员 30 多人乘吉普车随行。

车抵机场，专机马达已轰轰作响，汤恩伯和首都卫戍司令张耀明在机前等候。李宗仁看了一眼空寞的机场，不禁悲从中来。他匆匆与二人交待一句“别毁了南京城”便钻进了座机。

飞机呼啸升空，李宗仁又令飞机在南京上空盘旋转两圈，以仿效当时离京的蒋介石。飞机转完两圈，驾驶员走进机舱请示飞行目标、本应飞往政府临时所在地广州的李宗仁却断然下令先飞桂林。

国民党的南京政府随着李宗仁的仓惶离去，正式宣告完结。

李宗仁前脚一走，中国人民解放军便开进了南京。

对那些打进南京城的解放军士兵们来说，攻占国民党政府的总统府，是最让他们兴奋的事情。

总统府位于南京市黄埔路，往日这里戒备森严，人来人往，热闹非常，如今却人去楼空，无限凄凉。

4 月 24 日凌晨 2 点，渡江后到达南岸的三十五军一四师三一二团政委在下关码头对该团特务连邴连长说：

“你带上两个排，跟保卫股李股长快去占领蒋介石的总统府！”

邴连长听到团政委的这一部署，马上带着队伍跑步前进。

一口气跑到总统府门前，只见大门紧闭，里面静悄悄的。

邴连长简短地向战士们作了布置，派 4 人封锁好大门，随后叫通讯员前去敲门。

森严的大门“吱呀”一声开了。

战士们喝道：“不许动！”端着枪冲了进去。

经过一番紧张搜索，后门、边门、重要通道，全部布置了警戒。

邴连长和李股长走进总统府大院。这时，一个身着长衫的人领着一群人迎了出来。

邴连长命令他们道：

“现在城里打仗，你们不要出去。出去，要有我们连部的条子。”

接着，李股长又给他们讲了解放军的政策。

邴连长穿过大厅，步过长廊，爬上二楼，来到“总统办公室”，只见里面乱七八糟地散落着文件、纸片。一张玻璃台面的大桌子上，日历翻到 4 月 22 日。

邴连长命令把所有办公室锁起来，由文书写好封条，盖上特务连连部的长条子印章，加以贴封，以保存档案资料和物品。

办完这一切，郝连长又回到大门口的院子里。这时天已发亮，他发现院子的中央竖立着一根旗杆。

他灵机一动，和几位战士把连队的战斗红旗，亲手升上旗杆。

这面战旗曾饱经战火的洗礼，如今，它成为南京城头升起的第一面共产党的红旗。

当天，三兵团司令部发出的一份电报，报告总前委、中央军委并告三野，宣告说：“……我军已占领南京……”

电报还说：“三十五军已占南京，即负全责维持秩序，八兵团陈、袁、江应率兵团部之大部赶往南京主持（待交二野）并即任南京谷备司令、政委，仅留一部于镇江，其三十四军即分任镇江、丹阳、金坛等处警备。”

总前委邓小平、陈毅于同日中午致电中央军委：“中央军委：……我们遵命于明日（二十五日）夜到南京；并与伯承同志商定，二野于明日（二十五日）夜移动，二十六日夜可达南京。”

4月27日，第三野战军司令员陈毅进入南京。

一进南京城，他便命令司机直奔总统府，然后以胜利者的姿态大步跨进最后一幢房子的二楼，命令特务连打开“总统办公室。”

大门推开，只见里面一片狼藉。蒋介石久久坐过李宗仁也沾了沾屁股的总统“宝座”出现在眼前。陈毅一屁股坐到“宝座”上，一眼看见桌上台历翻到4月22日。他习惯地伸手想去翻，一转念却停住了。4月22日已成了国民党的历史，象征它22年的反动统治画上了句号。再翻已是人民掌权的历史，得另找一本台历。陈毅兴致勃勃地拿起“总统”办公室的电话，给北平香山双清别墅打过去。

陈毅兴奋他说：“报告主席，我在蒋介石“总统，办公室给您打电话，南京已经解放了，‘总统，办公桌上的台历再也翻不动了……”

毛泽东在那边也风趣他说：“陈老总啊，你在‘总统府’的墙壁上题了‘刘伯承、陈毅到此一游’没有啊？”

陈毅乐呵呵地说：“没有哩，要爱护公物嘛！再说刘老总还没有进南京城。毛主席，我等着听您的指示哩！”

毛泽东对着话筒念了一句正在创作的诗：“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

陈毅赞道：“写得好！我记住了。横渡长江的百万人民解放军正在分路南下，追击穷寇。第三野战军一路过浙皖边境，一路挺进丹阳，插向上海。第二野战军正在向浙赣边境的寿昌等地进军……”

## 横扫千军如卷席

接完陈毅的电话，一夜未眠的毛泽东兴奋得毫无睡意，他在院子里踱着步，嘴里喃喃吟着诗句。

他迈步走上凉亭，坐在椅子上。这时，秘书兴冲冲地走来，递给他一张报纸，说：“主席，南京解放的捷报出来了！”

“噢，这样快！”

毛泽东左手拿着报角，念出了声。

看完南京解放的号外，毛泽东的佳句《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七律一首也吟成了：

钟山风雨起苍黄，百万雄狮过大江。  
虎踞龙盘今胜昔，天翻地覆慨而慷。  
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  
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间正道是沧桑。

南京一夜之间苍黄巨变。昔日的总统府、国防部大楼、行政院飘扬起了红旗，大街小巷里传出阵阵歌声和锣鼓声。

也就在这一天，渡江战役的指挥者邓小平与一位小战士也来到了南京城。他们叫了一辆黄包车，却只是把皮箱放在车上，徒步走上了中山北路。一路上，邓小平与黄包车夫亲切地交谈着。

邓小平步行进南京，充分体现了共产党人的操守和抱负。

威震中外的刘伯承将军以及宋任穷、柯庆施、张霖之等人从前线包了一辆破旧的长途公共汽车赶赴南京。车到南京中华门外就熄了火，司机修理了许久才又发动起来。司机问警卫员：“车往哪儿开？”警卫员向刘伯承请示：“首长，司机问车往哪儿开？”

即将担任南京市市长的刘伯承这时也不知车往哪儿开，他还不知市政府设在哪里？他想了片刻，爽朗地笑着说：

“我就知道有个总统府，直开总统府吧！”刘伯承等人就这样来到了总统府。

1949年4月28日，南京军管会成立，刘伯承、宋任穷就任南京市军管会正副主任，刘伯承兼任南京市长。

南京是江苏省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地处长江下游的丘陵山区，北接辽阔的江淮平原，东连富饶的长江三角洲。境内山地、江河、平原交错，气势磅礴的长江从西滚滚流来，在市区北面向东奔腾而去。

紫金山（钟山），蜿蜒于城区东北，石头山雄跨于大江之滨，山环水抱，形势壮伟。

相传，三国时代的诸葛亮在赤壁之战前夕，曾到南京，驻马石头山。他登高环顾，赞叹道：“钟山龙蟠，石头虎踞，真乃帝王之宅也。”

以后，人们常用“龙蟠虎踞”来赞誉南京。

孙中山在《建国方略》一书中赞美南京城：“其地有高山，有深水，有平原，此三种天工，钟毓一处，在世界中之大都市，诚难觅此佳境也。”

辽阔壮丽的自然风光，风云际会的历史人物，使南京成为中国历史上重要的政治中心、军事重镇和文化名城。

据《建康实录》记载，公元前472年，越王勾践灭吴，命范蠡建筑越城。

公元229年，东吴孙权此地建都，称为建业。东吴在石头山上筑城，故南京又有“石头城”、“石城”之称。

此后，东晋、宋、齐、梁、陈相继建都于此，此为南京古代史上的一个兴盛时期。

公元1368年，朱元璋在此建立大明王朝，并以应天府为南京，“南京”的名称从此开始。

公元1421年，明成祖迁都北京，仍称这里为南京。

公元1853年，太平天国建都于此，改南京为天京，前后达11年之久。

1912年，孙中山在此就任临时大总统，建立中华民国。

1927年，南京被蒋介石确定为国民党统治的中心。

南京不仅是十朝都会，而且人杰地灵。

南朝大科学家祖冲之在这里运算出圆周率在3.1415926和3.1415927之间，在世界上领先了差不多千年之久。

以建康为中心的南朝文学，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明朝的南京国子监学生多达9000人，是15世纪中国规模最大的最高学府。

吴敬梓、袁枚长期居住金陵，写下《儒林外史》、《随园诗话》等文学名著。

1949年4月底，随着蒋家王朝统治的灭亡，南京，进入了一个崭新的时代。

渡江部队奉命扩大战果，向江南广大地区进军。

渡江战役成功后，总前委调整了部署，命令东、中集团向长兴、吴兴疾进，切断宁杭公路，完成战役合围，歼灭镇江、南京、芜湖地区甫逃之敌；中集团九兵团率二十一、二十二、二十四军向杭州挺进；八兵团率三十四、三十五军担任镇江、南京地区的警备任务；十兵团二十九军东取苏州，向上海方向警戒。

根据总前委的部署，第三野战军首长粟裕、张震于4月24日下令各部队迅速追击和阻击敌人，聚歼沿京杭国道向杭州方向逃窜之敌。具体部署为：

“二十军及二十六军，应即沿丹阳、麦溪、延陵、石马桥、薛埠、黄金山、后周镇之线（含）以西，不分昼夜地向南猛进，务须追歼敌人主力（不要为小敌所迷），以配合二十三、二十五、二十六及二十八各军歼灭逃敌。”

“二十三军即由金坛分路，由长荡湖地区迅速向南猛进（其主力以经长荡湖以东为宜），务须于今晚进至溧阳，徐舍镇、戴埠、张诸地区，寻求逃窜之敌而截歼之。”

“二十八军及三十一军应以猛烈果勇之行动，排除太湖西岸敌人抵抗，于占领宜兴后，继续沿蜀山镇、夹沟镇、小城碛之线以西向南猛进，抢占长兴城、吕山桥等处有利阵地，坚决阻住由南京及广德方向向杭州逃窜之敌，以待我主力赶到围歼之。”

“二十五、二十七军沿宣城、广德至吴兴、杭州之公路南北、东进，务求于明（25日）后（26日）赶到天平桥、梅溪镇之线以东，以配合小山镇之二十八军打通联系。如二十八军尚未到达，则两军应继续前进抢占吴兴，以完全封锁敌向杭州之退路，不使逃窜。”

“三十五军已占南京，即负责维持秩序，八兵团陈（士榘）、袁（仲贤）、江（渭清）应率兵团部之大部赶往南京主持（拟待交二野）并即任南京警备司令、政委，仅留一部分于镇江主持，其三十四军即分任镇江、丹阳、金坛等处警备。”

三野各部队接到命令后，立即疾进追敌。东集团取道丹阳、金坛、宜兴向溧阳，在溧阳以西、以南地区歼敌二十八、四、五十一军各一部，俘敌2万多人。

27日，十兵团先头部队攻占吴兴。九、十两兵团在吴兴会师，封闭了合围口。此时，从南京、镇江南逃敌二十八、四十五、六十六、五十一军等，在解放军各路部队的围攻下，不敢沿京杭公路南逃，改由宜兴以西山区南下郎溪、广德，企图从此处突围，直趋杭州。

正巧，解放军追击主力也到达这里，敌军被我军包围于太湖以西的郎溪、广德山区。从4月27日至29日，九、十兵团激战3天，将敌全歼于界牌、独山镇之间地区，共歼敌8万多人。与此同时，十兵团二十九军于27日解放苏州。

郎、广战役后，二十三军于4月30日向杭州疾进。

在渡江作战和郎、广围歼战中，第三野战军共歼敌13.9万余人。

此后，三野九、十兵团除一部逼近上海外，主力集结于太湖地区，从5月3日至10日，先后攻占嘉兴、海宁、桐乡、常熟等城，然后在这些地区休整，待命攻取上海。

七兵团取道泾县、宁国、安吉、武康线向杭州前进。5月3日，解放杭州。

根据总前委的总部署，为抓住时机歼灭逃敌，截断浙赣路，刘伯承、邓小平部署三兵团进击徽州地区之敌，五兵团进击衢州地区之敌，四兵团进击上饶地区之敌，各部于4月26日向攻击目标前进。

从4月23日开始，二野各部对从青阳、彭泽等地向南、向西逃跑之敌五十五、六十八、九十六、一〇六军等4个军，发起追击。

3个兵团在近百里宽的正面上，以歙县、衢州、上饶为目标，多路向南追击，一直追到浙赣、徽杭线，敌人纷纷向金华、衢州、上饶等方向逃窜。

至4月底，二野先后解放了太平、祁门、乐平、景德镇、歙县、屯溪、休宁等城，控制了屯溪、婺源、乐平一线皖浙赣边的广大地区，打破了敌军企图在浙赣线布防的计划。

5月1日，刘伯承、邓小平按照中央军委的指示和部署，命令三兵团向建德、金华、汤溪、龙游进剿分散之敌；五兵团向开化、衢州、江山、玉山、上饶地区进军，寻歼散敌；四兵团向横峰、贵溪、东乡地区进击。到5月6日，3个兵团均到达指定地点，从而控制了从义乌到东乡段长达800里的浙赣线。敌军纷纷向浙赣线以南的浙赣山区逃窜。

5月7日，刘伯承、邓小平命令各兵团轻装前进，向南猛追。三兵团的追击为永康、武义、宣平、松阳地带；五兵团攻击龙泉、浦城、崇安地带；四兵团向松溪、临川地带挺进。

到5月14日，各部分别解放了丽水、青田、古田、南平、南城等闽北、赣中广大地区，并逼近闽江、赣江。

5月12日，第三野战军开始了上海战役。

为防止帝国主义国家可能进行的武装干涉，二野司令部下达了休整、战备训练指示，命令三兵团以金华、江山为中心，五兵团以上饶、太阳为中心，四兵团以鹰潭、东乡为中心，沿浙赣线进行休整各战。

此后，四兵团为配合第四野战军渡江，派一部分兵力进到丰城、樟树一线，准备迎击南撤之敌。5月22日，该兵团解放南昌。23日进占德安，解放永修。随后，在四野四十三军的配合下，控制了南浔路。五兵团一部解放了九江。

二野3个兵团在渡江作战中共歼敌10万人，攻占86座城市，解放了皖南、浙西、闽北、赣中的广大地区。

人民解放军势如破竹，横扫千军如卷席。全中国的解放已经指日可待。

## 第七章 政治大迁徙

中共紧张筹建新中国，作为中国社会精华的知名人士和各党派领袖们通过各种渠道悄然北上，汇聚北平。身在香港的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主席李济深周围杀机四伏，中共地下党派员护送民主人士从香港转赴内地，毛泽东诚邀宋庆龄参加新政协。

### 中共确定“五·一”行动口号

1949年4月3日，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领导人毛泽东、李济深、沈钧儒、章伯钧、黄炎培、马叙伦、谭平山、彭泽民、李章达、蔡廷锴、陈其尤等在北平发表联合声明，反对美、英、法、意、荷、比、挪、丹、冰、加、卢、葡十二国政府签署北大西洋公约，谴责美国政府及其附庸背叛波茨坦协定和其他保障国际和平的协定，背叛联合国组织、背叛各国人民和平愿望的侵略政策。

毛泽东进北平才10天，就与各民主党派领袖联署发表了如此重大的国际事件声明，是很不容易的。几个月前，这些民主党派的领袖还大都分散逃亡在香港等地，他们对美国的态度也不尽相同，是共产党历尽艰难，把他们一批批营救出险地，如今云集北平，共商国是，共同对重大国际问题发表联合声明。

而这一切，都是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长期工作结出的硕果。

1948年4月30日，刘少奇、朱德、周恩来、任弼时从西柏坡村赶到城南庄，参加由毛泽东主持召开的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

会议讨论通过并公布了中共中央庆祝五一劳动节的口号。中共中央在文件中指出：

一、今年的“五一”劳动节，是中国人民走向全国胜利的日子。向中国人民的解放者中国人民解放军全体将士致敬！庆祝各路人民解放军的伟大胜利！

二、今年的“五一”劳动节，是中国人民死敌蒋介石走向灭亡的日子，蒋介石做伪总统，就是他快要上断头台的预兆。打到南京去，活捉伪总统蒋介石！

三、今年的“五一”劳动节，是中国劳动人民和一切被压迫人民的觉悟空前成熟的日子，庆祝全解放区和全国工人阶级的团结！庆祝全解放区和全国农民的土地改革工作的胜利开展！庆祝全国青年和全国知识分子争取自由运动的前进！

四、全国劳动人民团结起来，联合全国知识分子、自由资产阶级、各民主党派、社会贤达和其他爱国分子，巩固与扩大反对一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主义、反对官僚资本主义的统一战线，为着打倒蒋介石，建立新中国而奋斗！

五、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及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

城南庄会议讨论和研究了召开新政协的问题。

会议认为，在解放战争即将进入第三个年度，政治形势和军事形势迅速

发展的情况下，召开没有反动派参加的新的政治协商会议，商筹新中国建国大计的问题理应提到党的议事日程上来。

周恩来在会上说：“提出召开新政协的口号，从形式上看，是恢复了1946年1月政协的名称，但内容和性质都不同了。‘五一’口号是行动口号，不是宣传口号，这是今天形势发展的趋势，是全国人民的要求。会议召开的时间大概不会超过明年，等到北面打成一片后就可以召开。”

身材瘦削、一脸疲惫的刘少奇在会上发言说：“目前，召开新政协的国际国内形势已经成熟，我们先提政协这个口号，可以起号召作用。要争取90%的人，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中国共产党在全国人民中取得50%以上的拥护是没有问题的，其他任何政党都没有我们这个地位。”

城南庄会议还对新政协的阵容、组织形式等问题进行了讨论和研究。

中共中央颁布“五一”口号，发出召开新政协会议，筹建新中国的号召后，毛泽东又于5月1日写信给在香港的著名民主人士李济深和沈钧儒。信中说：

任潮、衡山两先生：

在目前形势下，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加强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相互合作，并拟订民主联合政府的施政纲领，业已成为必要，时机亦已成熟。国内广大民主人士业已有了此种要求，想二兄必有同感。但欲实现这一步骤，必须先邀集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代表开一个会议。在这个会议上，讨论并决定上述问题。此项会议似宜定名为政治协商会议。一切反美帝反蒋党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均可派代表参加。不属于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反美帝反蒋党的社会贤达，亦可被邀参加此项会议。此项会议的决定，必须求得到会各主要民主党派及各人民团体的共同一致，并尽可能求得全体一致。会议的地，点，提议在哈尔滨。会议的时间，提议在今年秋季。并提议由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国民主同盟中央执行委员会、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于本月内发表三党联合声明，以为号召。此项联·196·合声明，弟已拟了一个草案，另件奉陈。以上诸点是否适当，敬请二兄详加考虑，予以指教。三党联合声明内容文字是否适当，抑或限于三党，加入其他民主党派及重要人民团体联署发布，究以何者适宜，统祈赐示。兹托潘汉年同志进谒二兄。二兄有所指示，请交汉年转达，不胜感幸。

谨致

民主革命敬礼

毛泽东  
五月一日

第二天，中共中央就邀请各民主党派代表来解放区协商召开新政协问题给中共上海局发出指示。说：“我党准备邀请各民主党派及重要人民团体的代表来解放区开会讨论：（甲）关于召开人民代表大会并成立民主联合政府问题。（乙）关于在反对美帝国主义侵略及蒋介石卖国政府的斗争中加强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合作及纲领政策问题。”“会议的名称拟称为政治协商会议。”

指示明确指出，为了召开政治协商会议，我党拟邀李济深、冯玉祥、何香凝、李章达、柳亚子、谭平山、沈钧儒、章伯钧、彭泽民、史良、邓初民、

沙千里、郭沫若、茅盾、马叙伦、章乃器、陈嘉庚、简玉阶、施存统、黄炎培、张澜、罗隆基、张东荪、许德珩、吴晗、曾昭伦、符定一、雷洁琼及其他民主人士来解放区开会。其中有被敌人监视不能来者，可派代表。

5月7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了致香港分局、上海局及潘汉年电，要求他们用非正式交换意见的态度，与各真诚反美反蒋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及社会知名人士交换意见。

5月14日，周恩来请胡乔木电告香港分局，应将各地响应中共“五一”口号的电文内容和署名全衔电告中央。

中共中央颁布的“五一”口号，很快通过各种渠道传遍了海内外，引起巨大反响。

香港，这座繁华的城市，自从国民党政府发动全面内战，特别是在它宣布实行“戡乱总动员令”和《戒严法》并强行解散中国民主同盟后，这里便成为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的隐蔽之地。

中共中央的“五一”口号传到香港后，各民主人士奔走相告。

5月5日，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李济深、何香凝，中国民主同盟沈钧儒、章伯钧，中国民主促进会马叙伦、王绍鳌，中国致公党陈其尤，中国农工民主党彭泽民，中国人民救国会李章达，中国国民党民主促进会蔡廷锴，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谭平山，无党派人士郭沫若等，从香港联合致电毛泽东，盛赞中共的“五一”口号。电文说：……南京独裁者窃权卖国，史无前例，近复与美帝国主义互相勾结，欲以伪装民主、欺蒙世界，人民虽未可欺，民心不容假借，当此解放军队所至，浆食集于道途；国土重光，大计亟宜早定。同人等吁衡中外、正欲主张，乃读贵党五一劳动节口号第五项：“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及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适合人民时势之要求，尤符同人等之本旨，易胜钦企，除通电国内外各界暨海外同胞共同策进完成大业外，特此奉达，即希赐教。

同日，他们还通电国内各报馆各团体，表示响应中共“五一”号召，“全国人士自宜迅速集中意志，研讨办法，以期根绝反动，实现民主”。

此后，各民主党派纷纷发表响应中共“五一”号召的声明。

在上海的民主建国会总部得悉香港各民主党派的响应后，马上秘密举行常务理事会，一致决议赞成“五一”号召，并指定章乃器、孙起孟为驻香港代表，向中共驻港负责人表明民建已响应“五一”号召。

同时，在香港的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以策进新政协召开为中心内容，举行各种座谈会、讲演会，展开了广泛的宣传活动。

6月4日，在香港的各界民主人士冯裕芳、柳亚子、茅盾、章乃器、朱蕴山、胡愈之等125人联名发表声明，认为中共的“五一”号召“真太合时了”，“我们愿意表示对这一提议的热烈赞同”；并确信：“新的政协召开之后，中国历史将会翻开灿烂的一页，进一步建立一个统一的真正属于人民的新国家。”

6月，在港妇女界知名人士何香凝、刘王立明、孔德扯、郑坤廉等232人也联名发表宣言，热烈称赞“五一”号召“深深地反映了全国民众和全体妇女的要求”，并代表妇女界表示：“坚决地加紧团结，配合一切民主力量，争取人民的全面胜利，粉碎反动集团的残余力量，来实现‘迅速召开新政协’的口号！”



海外爱国华侨获悉中共的“五一”号召后，也纷纷表示拥护。

5月4日，陈嘉庚代表新加坡华侨致电毛泽东主席，表示响应中共召开新政协和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号召。

5月7日，马来西亚吉灵丹州和霹靂州侨团分别通电响应中共“五一”号召。

5月18日，马来西亚檳城和威斯莱两地65个侨团的百余名代表召开联合会议，代表侨胞10多万人，一致通过否认蒋介石担任总统和通电响应中共“五一”号召的决议。

泰国华侨、旅法参战华工会、加拿大华侨、古巴华侨，也都分别致电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主席，表示热烈响应中共“五一”号召。

中共中央对各方人士表示的积极态度和热烈响应极为重视。

1948年8月1日，毛泽东给李济深、何香凝、沈钧儒、章伯钧、马叙伦、王绍鏊、陈其尤、彭泽民、李章达、蔡廷锴、谭平山、郭沫若等人复电说：

诸先生赞同敝党五月一日关于召集新的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建立民主联合政府一项主张。一切民主力量亟宜加强团结，共同奋斗，以期早日消灭中国反动势力，制止帝国主义的侵略，建立独立、自由、富强和统一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为此目的，实有召集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及无党派民主人士的代表们共同协商的必要。关于召集此项会议的时机、地点、何人召集，参加会议者的范围以及会议应讨论的问题等项，希望诸先生及全国各界民主人士共同研讨，并以卓见见示，曷胜感荷。

8月1日，周恩来为中共中央起草致香港分局及潘汉年电，对其在7月中旬才将各民主党派响应中共“五·一”口号的5月5日通电全文报告中央一事提出批评，同时要求他们在收到毛泽东主席本日给李济深等民主人士的复电后，立即送各民主党派征求意见，并将征询推广到上海、南洋的民主人士中，欢迎他们来解放区商谈和进行准备工作。

### 秘密通道——香港至北平

1948年8月，朝鲜罗津港。一艘名为“波尔塔瓦”号的苏联货轮缓缓离开海岸。

海风轻轻地吹拂着，空气中夹杂着一种咸腥的味儿。

货轮甲板上，一位身着西装，年纪大约40多岁的中年男子，凝视着大海的远方。他便是钱之光，其公开身份是“解放区救济总署特派员”的中共地下工作者，他正肩负着一项艰巨而又光荣的任务。

钱之光曾长期在国统区开展革命工作。抗战时期，他担任中共驻重庆办事处处长。

1945年8月底，毛泽东率中共代表团赴重庆同蒋介石进行谈判。钱之光在周恩来的领导下，对毛泽东在重庆期间的安全警卫、住宿饮食等做了大量工作。

蒋介石和国民党政府发动全面内战后，中共驻重庆、南京、上海等地办事处工作人员撤回解放区。钱之光回到解放区后，又被组织上派到大连，负责与苏联方面的联络工作。

1948年7月31日，周恩来致电中央军委总后勤部部长杨立三：港、沪将有一批党员干部和民主人士经大连来华北，已指定钱之光负责大连的接头、招待事宜；由大连到庙岛以及由庙岛到石家庄，拟由后勤部负责。

8月2日，周恩来又致电钱之光：“以解放区救济总署特派员名义前往香港，会同方方、章汉夫、潘汉年、连贯、夏衍等，接送在港民主人士，进入解放区参加筹备新政协。”

之后，周恩来指派刘昂赴大连，代替钱之光的工作。

接到周恩来的电报后，钱之光马上开始做赴香港的各项准备工作。

钱之光又安排祝华、徐德明和俄文翻译陈兴华等同他一起去香港。等刘昂一到大连，钱之光便启程出发了。

当时由于航道的的原因，还不能从大连直接坐船去香港，必须先到朝鲜平壤的苏联办事机构办理租船手续后，才能行动。

钱之光带着几位同志离开大连，经过丹东，跨过鸭绿江大桥，进入朝鲜境内，来到平壤，并办理了租船手续，安排一艘“波尔塔瓦”号货轮去香港。租好船后，钱之光便在第二天立即赶到201罗津，乘上了“波尔塔瓦”号货轮，开始了香港之行。

从罗津港到香港，要经历漫长的海上航行。沿途要经过朝鲜海峡、东海和台湾海峡。

望着宽阔的海面的钱之光，心头却悬着一块巨石，他必须准备随时应付可能出现的意外情况。

航行途中的一天上午，钱之光等几个人正在甲板上观赏海景，突然空中响起轰隆的飞机声。抬起头来，只见两架飞机正在货轮上空飞行。

开始，大家以为是飞机在航飞时经过货轮上空，没有在意，继续观望海景。

然而，几分钟后，两架飞机仍发着轰隆声盘旋在货轮上空，而且越飞越低，飞机上涂的颜色能看得清清楚楚。

突然有人说：“这是国民党的飞机在监视我们所坐的船。”

钱之光一听，说：“对，肯定是这么一回事，大家要注意。不过，我们船上挂的是苏联国旗，大概国民党的飞机也不敢丢炸弹。”

跟踪监视了一段航程后，两架飞机没有发现船上有可疑之处，便悻悻地往东飞走了。

过了台湾海峡，旅途的风险总算过去了。

船快到香港时，海面上出现许多轮船，船杆上飘着不同国籍的旗帜。

香港当局的缉私快艇，来回穿梭在各轮船之间，搜寻走私目标。

为避免引人注目和猜疑，钱之光改扮成“波尔塔瓦”号货轮上的锅炉工，终于安全地抵达香港。

“波尔塔瓦”号货轮抵达香港后，苏联方面马上派人乘小汽艇来接头。

当时苏联方面在香港设有办事处，与船上有通讯联络。办事处事前就已得知“波尔塔瓦”号到达香港的时间，并通知了“联和公司”。

“联和公司”是中共香港地下党组织设立的一个与外界进行公开联系的办事机构。在“联和公司”工作的有杨琳、彭超俊、刘恕、祝华、王华生、徐德明等人。

钱之光一行上了苏联驻港办事处的小汽艇。

中途，钱之光碰到先期到港、这时前来接人的袁超俊、刘恕两人。

上岸后，袁超俊、刘恕引着钱之光一行先到“联和公司”商量卸货的事宜，布置今后的工作，然后再和设在香港的中共华南分局进行联系。

在钱之光等人启程赴香港后，周恩来于8月9日为中共中央起草了致中共华南分局负责人方方并香港分局的电报。

电报说：“为邀请与欢迎港、沪及南洋民主人士及文化界朋友来解放区，并为他们筹划安全的道路，望指定汉年、夏衍、连贯负责计划，并协商一个名单电告。”

方方接到电报后，立即和潘汉年等人着手安排这项工作。

钱之光到达香港后，马上与方方联系上，并来到方方家中。这时，华南分局负责统战工作和情报工作的领导人潘汉年也正好在方方家中。

钱之光应大家的要求，首先介绍了解放区，尤其是东北解放区的一些情况。钱之光讲得眉飞色舞，方方、潘汉年等人听得津津有味。

喝了一口茶，钱之光又说：“8月初周副主席给我来电报，让我以解放区救济总署特派员的名义来香港和大家一起安排民主人士赴解放区的事宜。大连的接待工作由中央派刘昂从西柏坡赶来接替。我们租了苏联的货船从朝鲜的罗津港出发，沿途遇到了国民党飞机的监视，现在总算平安来到了这里。”

方方说：“老钱长途航行，辛苦了。关于安排民主人士赴解放区一事，我们也于8月10日接到中央的电报。这项工作意义很大，我们必须好好安排计划。”

潘汉年推了推眼镜架，机敏的目光透过眼镜片放射出来。他说：“香港社会复杂，港英当局的巡警密探、国民党特务十分注意民主人士的动向。而安排赴解放区的民主人士，社会影响大，一举一动为人们所关注。所以，这项工作是十分艰巨的，责任很重大，大家要很好地商议筹划，才能把工作做好。”

在议论中，几个人一致认为，在香港的民主人士很多，他们一直与中共常有联系，其中有与华南分局直接联系的，有和香港工委联系的，还有中共其他方面的同志所联系的民主人士，这样，宜分期分批行动。至于每一批安排哪些人走，什么时候开船，必须根据民主人士本人的准备情况、货物的采购装运、香港的政治气候以及联系工作的情况等来决定。

大家认为，为了尽快与中央和大连保持联系，还必须建立专门电台，以便随时向中央和周恩来汇报情况，并通知大连方面。

几天后，电台建起来了，并与西柏坡和大连沟通了联系。

为了尽快安排首批民主人士北上解放区，钱之光、潘汉年等人开始了紧张的准备工作的。

在一家高级旅馆的五层一套客房里。钱之光、潘汉年正在和“联和”的职员们商议着详细具体的行动步骤。

潘汉年对参与联系民主人士北上的同志说：“香港情况复杂，而工作出不得半点差错，所以，我们负责联系的同志，要机智灵活，特别要注意密探的跟踪。对于上船要经过的路线，要调查，熟悉要经过的地段。同时，还要事先约好，要经过哪些街道，什么人去接。还要知道，万一遇上了紧急情况，如何应对和处理……”

经过一番努力，在较短的时间内，基本上做好了第一批民主人士北上的准备工作。

8月底，钱之光向周恩来发出请示电：准备租用苏联货轮运送第一批民主人士经朝鲜到东北解放区。

8月30日，周恩来起草并发出与任弼时、李维汉联名的致钱之光电：同意一批民主人士乘所租的苏联货船开往朝鲜，但须注意绝对秘密，保证安全。出发以后有什么情况，要随时报告。

收到了周恩来等人发来的电报，钱之光与潘汉年便开始确定具体的护送名单。

当时准备进解放区的民主人士很多。因第一批带有试探性，人员不宜安排太多。经过反复考虑和斟酌，安排了沈钧儒、谭平山、蔡廷锴、章伯钧四人。

9月1日，著名的爱国民主人士冯玉祥将军乘船由美国返回途中，在黑海因船起火遇难。

中共中央得知此消息后，十分震惊。由此十分担心，在香港租的苏联货轮旅途中是否安全。

9月7日，周恩来为中央起草致潘汉年并香港分局电：

“民主人士乘苏轮北上一事，望慎重处理。第一，如该轮确无航行保证，以不乘该轮为妥；第二，如该轮有保证，而民主人士表示有顾虑，亦可不乘该轮；第三，如该轮有保证，而民主人士也愿意北上，亦不宜乘一轮，应改为分批前来，此次愈少愈好”。

接到此电报后，潘汉年和钱之光等人对第一批北上的民主人士做了更为慎重而妥贴的安排。

9月下旬的一天下午，钱之光赶到苏联货轮上，迎接民主人士上船。

为了避免可能引起的麻烦，直到黄昏时，几位民主人士才离家上船。

沈钧儒、谭平山、蔡廷锴、章伯钧四人利用黄昏的掩护，打扮成短衫工人模样，在章汉夫的陪同下，乘小舢板登上苏联货轮。

沈钧儒已是70多岁高龄的老人，比起过去他在重庆、上海时要消瘦一些，但仍步履稳健。

谭平山过去在重庆时与钱之光就有往来，现在见面彼此十分高兴。钱之光说：“可能没想到吧，在这里我们又见面了！”

谭平山紧握钱之光的手，连声说：“是呀！是呀！”

这时章伯钧攀扶着软梯爬上货轮。他猛一抬头，突然看见钱之光，感到很惊奇，忙说：“老兄，你也来了！”

两人笑了起来。由于工作的关系，钱之光此次到香港后还未与他见过面。突然相遇，觉得意外。

为护送第一批民主人士，钱之光、潘汉年除了安排章汉夫陪同北上外，又派祝华和徐德明两人护送。

离港后，钱之光立即向党中央和大连方面报告了第一批民主人士出发的情况。

收到钱之光从香港发来的电报后，在西柏坡的周恩来马上起草了中共中央致东北局电：

“第一批来东北解放区的民主人士近日内抵朝鲜罗津，请张闻天、高崇民、朱学范分别代表东北局、东北行政委员会、全国总工会前去迎接。”

中共东北局接电后则建议改派离罗津较近的李富春、朱理治代表东北局前往迎接。中央同意了东北局的建议，重新派李富春等人去迎接第一批民主

人士。

在香港的钱之光、潘汉年等人一直焦急地盼望着民主人士抵达目的地的消息。直到第八天，焦虑不安的钱之光等人才收到大连刘昂发来的电报：

“船已顺利到达朝鲜罗津，中央派李富春同志专程迎接，已前往哈尔滨。”

9月29日，沈钧儒、谭平山、蔡廷锴、章伯钧四人顺利抵达哈尔滨。

为了祝贺第一次完成这项任务，钱之光、潘汉年和其他一些同志在旅馆里举杯痛饮起来。

### 神秘的“华润公司”

第一批民主人士安全北上后，钱之光、潘汉年等人接着又开始着手安排第二批民主人士北上的准备工作。

这次是刘昂直接在大连港租用苏联的货轮，装载着东北解放区出口的大豆、土豆、人参等物资来到香港，然后接回第二批民主人士，带回解放区所需的纸张、西药等物资。

为了利用经济贸易工作作掩护接送民主人士，钱之光、潘汉年对设在香港的“联和公司”进行了改组和扩大。

钱之光提议说：“我想给我们的公司取名为‘华润公司’。华是中华的华，代表中国；润是毛润之的润，代表我们党。这就是说，这个机构是我党办的贸易公司。”

征得大家的同意后，“华润公司”的招牌挂到了香港皇后大道上。

公司开始由杨琳任经理，后来党中央又决定由钱之光任董事长。

10月中旬，刘昂在大连租用的苏联货轮抵达香港。

想不到的是，苏联货轮在到达香港时，与另一艘大船发生了碰撞，搁浅在海湾，必须就地检修。

为了不耽误民主人士北上，钱之光又租了一艘挂挪威国旗的“华中”轮北上解放区。

1948年11月23日，在钱之光等人的精心安排下，郭沫若告别妻子儿女，改名“丁汝常”，登上“华中”轮北上。

与郭沫若一同坐船北上解放区的，还有马叙伦、许广平母子、陈其尤、沙千里、宦乡、曹孟君、韩炼成、冯裕芳、翦伯赞等30多人。

陪同第二批民主人士北上的是连贯。

钱之光专门派王华生随船护送。

旅途中，许广平的儿子周海婴自己装了一台收音机，无意中收到新华社播发的东北解放军解放沈阳的消息。

大家听了这个消息，十分兴奋，高兴得跳起来。

12月1日，“华中”轮抵达丹东（今安东）石城岛。

郭沫若等第二批民主人士改乘小船上岸。

东北局派负责同志把他们迎接到沈阳，住进了铁路宾馆。

圣诞夜，泛海赏月，李济深等人安全离港。

10月以后，这个人来人往的“华润公司”引起了人们的注意，不断有人到“华润公司”摸底。为了安全起见，华润公司除了做生意，再无其他举措。

圣诞之夜，香港一片火树银花。坚尼地道的皇家酒店三楼，高朋满座。

而一群记者也聚集在酒楼内外，窥测酒宴的动静。甚至香港当局也出动警探，布置在酒楼周围。

因为席间有一位引人注目的人物——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主席李济深。沈钧儒等一大批民主人士悄然离港，使滞留在香港的李济深格外引人关注。围绕李济深的去向，各种势力展开了激烈争夺。美国人积极拉拢李济深。桂系为了实现划江而治的企图，极力拉李济深加盟。国民党则千方百计要把李济深扣在香港，如不能达到目的，不惜置他于死地，而港英当局又是倾向国民党的，要达到目的并不困难。

李济深周围，杀机四伏。朋友们都在为李济深的安全担心。

何香凝一针见血地说：“任公，你还是早走的好，一则是形势的需要，二则为了任公你自身的安全。”

李济深闻之怦然心动。

中共对李济深的争取工作也是不遗余力。为了解除他出走香港的后顾之忧，钱之光先对他的家属做了周密妥善安排，同时在安排同行的人员时尽量组织民革中与他亲近的人一起走，以增加他途中的安全感。最后，李济深终于决定秘密北上。

李济深出走的时间定于12月26日夜，圣诞夜，全港放假。如直接出港登上苏联轮船，将会引人注目。为了迷惑外界，钱之光特地安排李济深参加一个宴会，做东道主的名义上是香港名士邓文钊，同时赴宴的有朱蕴山、吴茂敬、梅龚彬、李民欣、陈此生、何香凝。

这次宴会召来的观众不少，但却没有人能接近举行宴会的包间。包间外，两名身强力壮的年轻人剑拔弩张，任何人接近包房的企图，都化成泡影。

李济深难得这样高兴，环顾左右，都是至交好友，多年来忠诚地追随在他的左右，现在，他将带领他们开始一次新的征程。

李济深感慨很深地说：“中共朋友安排得如此周密，可谓煞费苦心了。你我定不负中共朋友的厚望，为新中国的建立贡献绵薄之力。”

最后他对大家说：“诸位，今天晚上，我们就要离开香港了，我的宗祖李白诗曰‘锦城虽云乐，不如早还家’。此一行，对我们来说，是回家。大家风雨同舟这么多年，这一回是真正风雨同舟了，别的，我就不必多说了。来，我请大家一起干了这杯酒，祝我们旅途顺利，早日回到家中。”

大家纷纷起立碰杯。

酒阑意尽，大家纷纷离座而走。新闻记者们蜂拥而上，七嘴八舌地发问：“李先生，你对毛泽东的邀请将持什么态度？”

“李先生有离港的打算吗？”

“李先生是否准备与白崇禧将军合作？”

李济深笑而不语，随行人员从人群中奋力推出一条缝，李济深冲出记者的人墙。记者们失望地瞧着一行人登车而去。仍有些人尾随其后。

李济深一行的车队浩浩荡荡直奔维多利亚海湾，早有几条游艇等在码头上，小艇上有酒有菜，一行人弃岸登舟。近处渔火明灭，远处万家灯火，良辰美景，泛海赏月，记者们眼睁睁望着小艇远去，好生纳闷：时局艰难，李任公还有这等雅兴？

港湾里游艇如梭，李济深的游艇很快混淆其中。

李济深的游艇在港湾中来回巡梭，所有的眼睛都紧张而焦急地在海面上搜寻。在焦急不安的期待中，游艇在海面上飘荡了近一个小时。这时，一条

小艇飞快地向他们冲过来，驶到近前时，按事前的约定发来信号。艇上的人不约而同地长吁一口气，接应人终于盼来了。渐渐地，大家看清小艇的船头立着一个人，海风狂吹着他的长发。

那正是钱之光。

钱之光的小艇在前方不远划了一道弧，然后，调头向东南方驶去，李济深的游艇立即加大马力，紧随其后。

前方出现一艘巨轮——苏联“阿尔丹”号货轮。小艇一驶近货轮，便发出信号，巨轮立即放下软梯。当李济深被搀扶着颤悠悠登上甲板后，定睛一看，四周熟人不少，有茅盾夫妇、章乃器、彭泽民、邓初民、王绍鏊、柳亚子、马寅初、洪琛、翦伯赞、施复亮、孙起孟等人士。他们不是西装革履，便是长袍马褂，一副商人的打扮。

大家见过面，彼此握手寒暄。

钱之光上船，与大家告辞，同时又叮嘱大家：“诸位先生已经顺利登船，但是后面的航程还很长，我们这艘船是跑东北这条线的，所以大家现在都是去东北做生意的，给大家准备的衣服口袋里，都有一份订货单，大家抽空看一看，还要事先准备一套话，以便应付路上的盘查。为了保证航行安全，请大家一定要记住自己新的身份。龚饮冰、卢绪章同志将陪同诸位先生赴东北，另外，徐德明同志随船护送。”最后，钱之光又说：“诸位先生是国家民族的宝贵财富，我们有责任把诸位安全地送到目的地，但是目前在海上，我们的力量有限，我们只有靠机智、勇气和纪律，战胜一切可能出现的困难，在航行过程中，希望大家与陪同同行的同志多联系。”

与此同时，在一家不起眼的小旅馆里，潘汉年、饶彰风和夏衍三个人神色肃穆地候着电话机，紧张地关注着李济深一行人的行踪。在李济深车队所经过的路段，都已事先安排好了人，一旦有事，可立即接应。电话铃声不断，一切都是严格地按着预定的计划运行着。当最后一个电话打来时，报告消息的人几乎抑制不住兴奋：“船开了，‘货’放在大副房间里，‘英姑娘’没有来送行。”

这就是说，一切顺利，英国警察没有察觉。

“阿尔丹”号一声长鸣，缓缓出港。船到青岛海面，遇到逆风又坏了一个引擎，每小时只能走6海里，直到1月7日上午，才到了大连。

中共中央已派李富春、张闻天专程在大连迎接，先期到达解放区的民革中央常委朱学范和中共大连市委负责人也恭候在大连港。

李济深等上岸后，立即被安排到大连最高级的“关东酒家”。

因为当时天气很冷，中共接待人员根据周恩来的嘱咐，给他们送来了事先准备好的貉绒大衣、獭皮帽和皮靴。李济深对此十分感动，连声说：“恩来同志想得真周到，吃、穿、住、行都给我们安排好了，真太感谢了！”

当天中午，李富春、张闻天在关东酒家举行欢迎宴会。

晚上，李济深等人到火车头俱乐部观看苏联海军歌舞团的演出。

次日一早，李济深就把朱学范叫到自己房里了解东北情况。

李济深对中共与民主人士真诚合作的态度很满意，对筹备新政协、成立联合政府、建立新中国十分乐观。

1949年1月12日，李济深等已离开香港半个月，国民党华中军政长官公署长官白崇禧以8万元港币的高价向美国陈纳德的“民航队”包了一架专机，送黄绍竑到香港，请民革主席李济深出来帮忙，以促使和谈。白崇禧很

重视李济深的影响和地位，认为他可能在桂系和中共间起一种缓冲作用。

然而，当黄绍竑到达香港时，李济深已到达沈阳。

黄绍竑空走一趟，白崇禧非常失望。

但黄绍竑通过黄琪翔见到中共在港负责人潘汉年，介绍了武汉和南京的政治情况。

潘汉年表示：“关于武汉、南京的情况我也知道一些，白崇禧可能反蒋，但这样大的事我不能作主，必须打电报给我党中央请示，复电要三四天才能回来，请多候几日吧！”

三天后，潘汉年把党中央的意见转告给黄绍竑：要白崇禧派刘仲容（白崇禧的参议）为代表，由信阳到郑州沿途去找刘伯承接头。

后来在潘汉年等人的多方工作下，黄绍竑本人的态度由“和”转向共产党。

1949年9月，黄绍竑欣然接受周恩来的邀请，赴北平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李济深离港北上三个月后，在潘汉年等人的安排下，著名的民主人士黄炎培及其夫人，还有盛丕华及其儿子盛康年和俞震寰等人作为第四批民主人士离港，到达天津上岸。

从1948年9月至1949年3月，从香港北上参加新政治协商会议的大多数民主党派代表人物和著名进步爱国民主人士，都先后平安到达东北和华北解放区。

### 毛泽东亲笔邀请爱国华侨回国参政

北平和平饭店的112号房间，下榻着一位上穿西装、下穿唐裤、操着一口闽南话的70多岁的老人。他就是著名的南洋华侨领袖陈嘉庚先生。

饭店的114号房间，下榻着一位滴酒不沾却大抽吕宋烟的83岁老人。他便是美洲著名华侨领袖、美洲致公党主席司徒美堂。

两位侨领老人应毛泽东的邀请，不顾高龄和旅途艰辛，于1949年夏秋分别从新加坡和美国赶来北平。

为争取海外华侨对新中国的支持，中共领导人们很费了一番心思。

“五一”口号发出号召后，中共香港工委找到和陈嘉庚关系紧密的庄希泉，请他赴新加坡，联络陈嘉庚。

不久，庄希泉赴新加坡；拜会了陈嘉庚，转达了中共方面的真诚邀请。

陈嘉庚当即表示接受邀请，但却带着顾虑说：“我担心这样一来，新加坡殖民当局会为难我的家人和我在南洋的产业。”

庄希泉解释道：“这不要紧的，你尽管回国内，你可以声明，不是你自己要去，而是国内发表对你的任命，盛情难却。这样，当局考虑到各方面的影响，以及与新中国的关系，不致于采取不明智的态度。”

听了庄希泉这番话，陈嘉庚很高兴，表示愿意回国，并邀庄与他一道行动。

庄希泉说：“请你先走，我还有些事情需要处理。我们会在国内见面的。”

不久，陈嘉庚收到毛泽东于1949年1月20日写给他的亲笔邀请信：

嘉庚先生：



中国人民解放斗争日益接近全国胜利，需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建立民主联合政府，团结全国人民及海外侨胞力量，完成中国人民独立解放事业。为此亟待各民主党派及各界领袖共同商讨。先生南侨硕望，人望所归，谨请命驾北来，参加会议，肃电欢迎，并祈赐复。

毛泽东  
一九四九年一月二十日

接到毛泽东的邀请信后，陈嘉庚立即复电说：“革命大功将告完成，易胜兴奋，严寒后决回国敬贺。”

2月间，他给在槟榔屿的庄明理打电话，告之要回国去，邀庄同行。

宜到4月初，庄明理才到新加坡，得知事情原委。

4月底，陈嘉庚偕庄明理离开新加坡，途经香港再乘船北上。

6月3日，陈嘉庚一行抵达天津。

6月4日，陈嘉庚一行坐火车由天津到北平，受到董必武、林伯渠、叶剑英、李维汉、李济深、沈钧儒的热烈欢迎。

6月7日，周恩来亲自接陈嘉庚到京西香山双清别墅与毛泽东晤谈。会见时，朱德、刘少奇在座。

故人重逢，分外亲切，陈嘉庚在谈话时，兴奋和激动之情，溢于言表。

1950年，陈嘉庚正式回国定居。

当陈嘉庚来到京西香山双清别墅时，美洲桥领司徒美堂还在大洋彼岸的美国。毛泽东给司徒美堂写信，邀其回国参加新政协的时间也是1949年1月20日。这封信的内容如下：

司徒美堂先生：

去年十月二十二日惠书，因交通阻梗，今始获悉。热情卓见，感佩殊深。中国人民解放斗争日接近全国胜利，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建立民主联合政府，团结全国人民及海外侨胞的力量，完全实现中国人民的独立解放事业，实为当务之急。为此，亟待各民主党派各界民主人士共同商讨，至盼先生摒挡公务早日回国，莅临解放区参加会议。如旅途尚需时日，亦将筹备意见先行电示，以利进行。谨电欢迎，并盼赐复。

毛泽东  
一九四九年一月二十日

由于远隔重洋，毛泽东的邀请信件转到司徒美堂手中时，中国的政治形势又发生了巨大变化。人民解放军已打过长江，占领了南京、上海等地，国民党南京政府已宣告灭亡。

毛泽东的邀请信，语气真切，态度诚恳，83岁的司徒美堂读了此信，心情十分激动。

司徒美堂开始准备动身回国。

消息传开后，司徒美堂的朋友们对此议论纷纷。有人支持，有人反对。

定居在美国的四大家族之一、“大财神”孔祥熙亲自拜访司徒美堂，劝他要“慎重考虑”。

致公党和安良堂的弟兄，也有分歧。

司徒美堂力排众议，表示：“忠诚爱国、义气团结、侠义除奸乃我洪门

精神。现今举国民主进步团体及代表会聚北平，与中共共商建国大计，如此国家大事，我洪门焉有逃避不参与之道理？”

8月13日，司徒美堂乘坐的飞机抵达香港启德机场。

83岁的老人拄着同盟会英雄黄兴夫人所赠的特制手杖，走下飞机。

这时，国民党特务在香港的暗杀活动极其猖獗。毛人凤指示特务：对投奔中共的，无论何人，或拘捕或暗杀。特务手段凶狠，先后撞伤了工会领袖朱学范，暗杀了准备赴北平参加新政协的杨杰将军。

国民党特务的活动，急坏了香港殖民当局。港督葛量洪不愿看到司徒美堂这样在海内外有影响的人在香港发生意外，以致引起舆论和世人谴责。他指示香港警方对司徒美堂给以“保护”。

司徒美堂一下飞机，香港当局就派来警车“护卫”。以后住在旅馆或家中，都有密探在周围“站岗”，一出门，就有汽车跟在后面。

直至司徒美堂乘坐太古公司的“岳阳”轮离港北上，警车送到码头，看到轮船启航，葛量洪才松了一口气。

“岳阳轮”北上必须通过台湾海峡。护送人员告诉大家：要作最坏的打算，准备销毁身上的一切身份证明，甚至要冒被国民党战舰拦截拘留到台湾的危险。

司徒美堂对此处之泰然，他很平静地朗诵着民族英雄文天祥两句诗：“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司徒美堂坐在头等舱内。在香港一家报社当记者的司徒丙鹤陪他坐船北上参加新政协。坐在头舱内的还有黄琪翔将军和李承儒教授等人。

6天之后“岳阳”轮平安抵达红旗飘扬、有解放军守卫的塘沽港口。

天津市交际处派人来迎接，随后把客人安置在天津旅店。

第二天早饭后，司徒美堂一行坐火车到北平，受到友好而热烈的欢迎，随即下榻北京饭店。不久，司徒美堂出席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

## 开国大典不能少了宋庆龄

新政权经过紧锣密鼓的筹措，各项准备都已就绪，只是有一件事令毛泽东和周恩来十分遗憾，那就是仍在上海的宋庆龄女士没有函告何时能北上参加新政府。

众所周知，宋庆龄是中国共产党之外的最富代表的杰出女性，而且与毛泽东、周恩来的关系一直相当融洽。宋庆龄对毛泽东早就十分推崇，早年曾与毛泽东等人一起联名发表过讨蒋通电。至于周恩来，早在黄埔时期，她就从孙中山那里知道周恩来的为人与才华，后来又毅然支持周恩来领导的南昌起义；抗战时期，她领导的保卫中国同盟为解放区提供了大量物资支援。她的地位和名望无人能取代，如果开国大典上少了她的身影，那将是一种深深的缺憾，而且还会导致中外舆论的猜测。

为此，毛泽东十分重视宋庆龄北上参加新政府这件事，并多次与周恩来商量过此事。

1949年1月21日，毛泽东、周恩来联名发电邀请宋庆龄参加新政协会议，电文恳切地说：“新的政治协商会议将在华北召开，中国人民革命历尽

艰辛，中山先生遗志迄今始告实现，至祈先生命驾北来，参加此一人民历史伟大的事业，并对于如何建设新中国予以指导，至于如何由沪北上已告梦醒和汉年、仲华切商，总期以安全第一，谨电致意，伫盼回音。”

当时上海还未解放，蒋介石集团还在做垂死挣扎，更加紧了对革命势力的迫害。电报无法直接送达宋庆龄，只好通过地下电台转交，在发出电文时，周恩来再三叮嘱地下电台工作人员：

“要派孙夫人最信任而又最可靠的人送去，并当面致意。要注意：第一必须要秘密，不能冒失；第二必须要孙夫人完全同意，不能稍涉勉强。如有危险，宁可不动。”

廖仲恺、何香凝夫妇的女儿廖梦醒将电文告知宋庆龄时，宋庆龄警惕地告诉廖梦醒：“你也上了黑名单了，赶快走吧。”廖梦醒密电请示周恩来，周恩来指示她立即转移，宋庆龄又让一位外国朋友为廖买了船票，把她送到香港，自己仍留在上海。

5月27日，上海解放后，毛泽东又委派陈毅与其他领导人前去公馆看望宋庆龄，并派警卫部队为她站岗放哨。眼看建国日子临近，而宋庆龄仍未北上，毛泽东和周恩来十分着急。

“我很想亲自去上海将孙夫人接来，可是哪里离得开呀。”周恩来向毛泽东汇报完其他情况，又谈起宋庆龄北上之事。

“还是派一位女同志去接，可能更有共同语言。”毛泽东说。

“那就派邓颖超去吧。”

“她不是身体不好吗？”毛泽东关切地说。

“等做完这件事后再让她休养。”

“我看可以，如顺利成行，将来孙夫人离开时，可以让江青送行。”

“请主席写一封亲笔信，让邓颖超带给孙夫人，这样可能更好些。”周恩来想得十分周到。

毛泽东欣然提笔写信：

庆龄先生：

重庆违教，忽近四年。仰望之诚，与日俱积。兹值全国革命胜利在即，建设大计，亟待商筹，特派邓颖超同志趋前致候，专诚欢迎先生北上。敬希命驾莅平，以便就近请教，至祈勿却为盼！专此。敬颂

大安！

毛泽东

一九四九年六月十九日

中共中央候补委员，全国妇联副主席邓颖超带着毛泽东的亲笔信即将出发，这时，周恩来略一沉吟，又提笔给宋庆龄写了一封信，交邓颖超一并带去。他在信中说：

庆龄先生：

沪滨告别，瞬近三年，每当蒋贼肆虐之际，辄以先生安全为念。今幸解放迅速，先生从此永脱险境，诚人民之大喜，私心亦为之大慰。现全国胜利在即，新中国建设有待于先生指教者正多，敢借颖超专诚迎近之便，谨陈渴望先生北上之情。敬希早日命驾，实为至幸。专上敬颂

大安！

周恩来  
一九四九年六月二十一日

与邓颖超同行的还有已从香港返回北平的廖梦醒。她曾在宋庆龄身边工作多年。到达上海后，邓颖超让廖梦醒先到来庆龄处说明来意。宋庆龄听了廖梦醒的一番说明，十分感伤地说：

“北平是我最伤心之地，我怕到那里去。”孙中山在北平逝世时的种种悲情仿佛历历在目。

廖梦醒又问：“北平将成为红色中国的首都。邓颖超代表中共中央、毛泽东、周恩来等同志，特来迎您，您打算什么时候见她？”

宋庆龄轻轻拍了拍廖梦醒的手说：“让我想想好吗？”

两天后，邓颖超接到宋庆龄宴请她的请柬。几次交谈过后，宋庆龄终于决定北上，并着手准备北上之行。

8月26日，周恩来将此消息告诉毛泽东，毛泽东高兴地说：“邓颖超这次上海之行，出色地完成了党中央交给她的任务。”说完他翻看着日历，计算从上海抵达北平的火车时间。

这时，周恩来建议道：“主席，孙夫人这次能来参加新政协，很不容易。主席能否亲去车站迎接？”

毛泽东想了片刻说：“宋庆龄是一位杰出人物，中国妇女的典型代表，她能与蒋介石决裂，同中国共产党合作，实属不易。我去站迎接，也是应该的。”

两天后的28日下午3点过，毛泽东向工作人员打招呼说，他要去车站迎接孙夫人。他换上皮鞋，穿上平日很少穿的浅色衣服，催着大家出发了。

宋庆龄乘坐的专列，下午4时15分才进站。车刚停稳，毛泽东便走上车厢，迎接孙夫人下车，他握着宋庆龄的手热情地说：“欢迎你，欢迎你，一路上辛苦了！”

在毛泽东的陪伴下，宋庆龄走下列车。她身着黑色拷绸旗袍，配上一条白色纱巾，头上盘着发髻，显得丰采灼人。

周恩来迎上前去握手问候，宋庆龄高兴地说：“感谢你派你的夫人来接我。”周恩来说：“欢迎你来和我们一起领导新中国的建设。”这时，蔡畅向宋庆龄献上花束。

宋庆龄面带微笑与站在月台上的欢迎者一一见面。随后便与何香凝、邓颖超、周恩来同车前去寓所休息。毛泽东等人这时候才乘车离去。

9月，毛泽东与周恩来再一次亲临车站，迎接原国民党湖南省主席、和平起义将领程潜将军。

至此，曾与共产党休戚与共的民主人士和党外朋友大都云集北平，准备与刚刚打下江山的毛泽东领导的党携手并进，建设一个繁荣富强的人民共和国。

## 第八章 事关重大的新政协

毛泽东把宣读参加新政协的单位人选和各项统计资料戏称为“解读天书”。在新政协会议上，毛泽东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程潜功说陈明仁起义成功，成为毛泽东的座上宾；陈仪动员汤恩伯投诚，却成为蒋介石的阶下囚。民主人士接受任命成为共产党政府的京官。毛泽东亲自介绍赛福鼎参加共产党。众领袖铲土为纪念碑奠基。

### 新政协筹备会终于召开

1949年6月15日傍晚，北平的大街小巷已是万家灯火。7时40分，参加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第一次会议的100名代表已在中南海勤政殿的座位上就坐。

毛泽东及其他领导人走进了会场。

毛泽东身着深灰色中山装，面带喜色高兴地向会议代表招手，然后坐在大会主席台右前排101号座位上。

周恩来坐在毛泽东的右边，朱德坐在毛泽东左边。

周恩来任大会的临时主席，并致开幕词，宣布新政协筹备会正式成立和筹备会第一次全体会议开幕。

毛泽东走上主席台。

代表们长时间地欢声雷动。掌声停下后，毛泽东用洪亮的声音发表讲话：“诸位代表先生们：我们的新的政治协商会议的筹备会，今天开幕了。这个筹备会的任务，就是完成各项必要的准备工作，迅速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以便领导全国人民，以最快的速度肃清国民党反动派的残余力量，统一全中国，有系统地和有步骤地在全国范围内进行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和国防的建设工作。我国人民希望我们这样做，我们就应当这样做。”

接着，毛泽东又回忆了发动筹备新政协的过程，并介绍了人民解放战争的形势和统一战线政策和外交政策等，他提醒人们对帝国主义和中国残余反动势力互相勾结，继续破坏中国革命的各种阴谋活动应予以密切的注意。

毛泽东洪亮的声音在勤政殿里久久回荡着：“诸位代表先生们：我们召集新的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一切条件，均已成熟。全中国人民是如此热烈地盼望我们召开会议和成立政府。我们相信，我们现在开始的工作，是能够满足这个希望的，并且不需要多么久的时间就能满足这个希望。”

最后，毛泽东用慷慨激昂、充满信心的语气结束了讲话。他说：“中国人民将会看见，中国的命运已经操在人民自己的手里，中国就将如太阳升起在东方那样，以自己的辉煌的光焰普照大地，迅速地荡涤着反动政府留下来的污泥浊水，治疗战争的创伤，建设起一个崭新的强盛的名副其实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随后，毛泽东高呼：“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民主联合政府万岁！”“各族人民大团结万岁！”会场里响起经久不息的掌声和口号声。

接着，朱德走上主席台说：“今天，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开幕了。经过这个筹备会的工作，将要产生一个真正民主团结的新政治协商会议，并经过这个会议建立一个全国统一的各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人民民主政权。中国

的历史，从此要进入一个新时代。全国人民都要感到万分的兴奋和愉快！”

22年前，朱德率领军官教导团参加了著名的南昌起义，成了这次起义的重要领导之一。从此，中国共产党开始独立掌握武装和领导人民大众进行革命斗争的历程。

朱德仿佛又看到了前方战场飘扬的战旗、弥漫的硝烟，仿佛又听到了战场上激烈的厮杀声。在讲到中国人民的军队时，他意味深长地说：“这支中国人民的武装力量，是在长期的艰苦的斗争中锻炼出来的。它经历过无数次的考验，也遭受过不少的挫折与失败，但是它从来没有在敌人面前屈服。它在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领导下，在全国人民的拥护和支持下，和敌人进行顽强的战斗，夺取了敌人的装备而装备了自己。今天，这支人民武装是空前的壮大起来，成为不可战胜的力量了。”

最后，朱德代表中国人民解放军全体指战员向大家表示：“人民解放军是中国民主运动的最忠实的支持者，现在是新政协及即将成立的民主联合政府的最忠实的支持者和坚定不移的柱石。他预祝新政协筹备会的成功和新政协会议的迅速召开，预祝独立、民主、统一的新中国即将出现于世界。”

勤政殿又响起了雷鸣般的掌声。

民盟中央委员沈钧儒在1946年参加过旧政协，现在又站在新政协筹备会会场的讲台上发言，他感叹说：“从旧的政治协商会议协议被蒋介石彻底撕毁，到今天新的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开幕之日止，足足经过了整整三整年的时间。这三整年的时间，是用千百万人民的血与泪写成的历史，是中国的革命对于反革命进行最后清算斗争的历史，同时也就是四亿七千五百万人民在中国共产党及伟大领袖毛泽东先生领导之下争取彻底解放的历史。”

已是73高龄的老人目睹20世纪上半个世纪中国政坛所发生的一切，深感人民民主政权来之不易。

他充满信心地说：“钧儒和此次民盟出席代表以及全体盟员深深地相信：在中国共产党和英明的人民领袖毛主席领导之下，在筹备会全体同仁的一致努力之下，我们一定能够胜利完成历史所赋予我们的使命。”

郭沫若代表无党派民主人士也走上了讲台，他说：“旧政协是反动派做主体，反动分子占绝大多数；新政协是革命的民主势力作主体，反动分子是一个也不会参加了。

“因此我感觉着，今天的新政协筹备会的开幕，正好像在黑暗中苦斗着的太阳，经过了漫漫长夜的绞心沥血的努力，终于吐着万丈光芒，以雷霆的步伐，冒出地平线上来了。

“我不能不以满怀的热诚，庆贺这新生的太阳出土。我更不能不以满怀的热诚，庆贺这新生的太阳永远上升，永远不会下降。

“这是规模宏大的新民族史诗的篇章，是畸形儿的旧民主主义转换到新民主主义的光荣的开始。”

第二天，新政协筹备会第一次全体会议继续进行，会议通过了参加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的各单位代表名单，筹备会常委名单，还有新政协筹备会各小组名单。

新政协筹备会由新政协原提议人中国共产党与赞成中共1948年“五一”口号之第五项之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等共23个单位的134人组成。

这些单位和人士包括：

中国共产党（7人）：毛泽东、周恩来、林伯渠、董必武、陈云、薄一波、李维汉；

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7人）：李济深、何香凝（女）、李德全（女）、张文、李锡九、陈劭先、梅龚彬。

中国民主同盟（7人）：沈钧儒、章伯钧、张澜、张东荪、周新民、罗隆基、楚图南。

中国民主建国会（5人）：黄炎培、章乃器、胡厥文、施复亮、胡子婴（女）。

无党派民主人士（6人）：郭沫若、马寅初、李达、林砺儒、符定一、吴耀宗。

此外，中国民主促进会有马叙伦等4人，中国农工民主党有彭泽民等5人；中国民主救国会有史良（女）等5人；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有谭平山、陈铭枢等5人；中国国民党民主促进会有蔡廷锴等4人；中国致公党有陈其尤等4人。

在人民团体方面，人民解放军有朱德、彭德怀、林彪、刘伯承、陈毅、聂荣臻、叶剑英7人；中华全国总工会有李立三、朱学范等7人；解放区农民团体有7人；中华全国民主青年联合总会有廖承志、冯文彬、谢雪红（女）、胡乔木、吴晗、钱三强6人；中华全国民主妇女联合会有蔡畅（女）、邓颖超（女）等6人；中华全国学生联合会有谢邦定等4人；上海人民团体联合会有周建人等4人。

另外，作为一个单位参加新政协筹备的还有产业界民主人士陈叔通、李烛尘、吴曼梅等7人；文化界民主人士沈雁冰、叶圣陶、郑振铎、侯外庐、田汉等7人；民主教授张奚若（清华大学）、邓初民（香港达德学院）、许德珩（北京大学）、翦伯赞（燕京大学）、梁希（中央大学）、张志让（复旦大学）、洪琛（厦门大学）等7人；少数民族代表乌兰夫（蒙古族）、张冲（彝族）、天宝（藏族）、朱早观（苗族）、朱德海（东北朝鲜族）等6人；海外华侨民主人士陈嘉庚、司徒美堂、庄明理等7人。

周恩来在会上作了《关于（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组织条例（草案））的解释报告》，指出筹备会的主要任务是：协商确定参加正式会议的各单位和代表人数，决定召开正式会议的时间、地点、议程；拟定新政治协商会议组织条例草案；起草共同纲领和成立政府方案；协商政府人选。

当晚，筹备会常委会举行第一次会议，推选毛泽东为常委会主任；周恩来、李济深、沈钧儒、郭沫若、陈叔通为副主任；李维汉为秘书长，齐燕铭、余心清、周新民、连贯等为副秘书长。

会议决定，设立大会秘书处、庶务处、招待处、新闻处四个工作机构，以梁蔼然为秘书处处长，周子健为庶务处处长，申伯纯为招待处处长，宦乡为新闻处处长。

新政协筹备会第一次全体会议共开了5天。在6月19日的会上，周恩来就无党派民主人士的称谓与实质问题作了说明。他说：“无党派民主人士，是在中国革命的具体历史条件下发展形成的，由于国民党反动统治的严重压迫，许多志士仁人虽没有组织起来，但却在领导和联系着一批民主人士从事民主运动。”

会上，通过了《关于参加新政治协商会议的单位及代表名额的规定》。

为了筹备新政协召开的各项具体工作，筹备会第一次全体会议把参加筹

备工作的代表分为6个工作小组，分别担负拟定参加新政协的单位及名额，起草新政协组织法和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起草共同纲领草案和宣言，拟定国旗、国徽和国歌方案等任务。

会议结束后，各项准备工作全面铺开了。

新政协筹备会常委会以后又召开了7次会议，对筹备过程中的一系列问题进行讨论和决定。

6月21日晚，在勤政殿召开第二次会议，通过五项决议。7月5日，在怀仁堂召开第三次会议，通过《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各党派各团体为纪念“七·七”抗日战争十二周年宣言》及其他会务工作。

8月26日至27日，在勤政殿召开第四次会议，对参加新政协的名单草案、新政协组织法和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草案进行讨论。因筹备会秘书长李维汉脚跌伤住院，其职务由林伯渠代理。

9月13日，召开第五次会议，对人员名单、两个组织法草案和共同纲领草案进行了讨论。

9月16日、17日、20日，在勤政殿相继举行第六、第七、第八次会议，对几项重大的筹备工作进行了最后的讨论和决定，并确定于9月21日晚7点在中南海怀仁堂召开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

9月17日下午3点，在中南海勤政殿举行了新政协筹备会第二次全体会议。

周恩来代表常委会作了关于筹备工作的报告。

会议决定：

批准常委会的筹备工作报告；

基本通过常委会所提出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组织法（草案）》、《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草案）》，并授权常委会提交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讨论。同意由原担任起草大会宣言和拟定国旗、国歌、国徽两项工作的第五小组和第六小组直接向新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主席团提出报告。授权常委会决定召开新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的开幕日期。

会议还通过了常委会所提出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主席团及秘书长名单。

毛泽东也出席了这次会议。他头戴列宁帽，身着灰色军上衣、草青裤子，脚穿黑皮鞋，进入会场时他向与会者频频挥手。但因工作劳累，脸上显出疲劳的神色。

9月18日晚6点，北平党、政、军及各群众团体等20个单位设宴欢迎到达北平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代表。

宴会在瀛台大殿举行。这里曾是“戊戌政变”后光绪皇帝被囚禁的地方。

席间，华北人民政府主席宣必武和华北军区司令员聂荣臻致欢迎词，然后，由郭沫若代表到会全体政协代表致答词。

在宴会上，与毛泽东同坐“第一桌”的，有何香凝、陈嘉庚、司徒美堂、陈叔通、许德珩、郭沫若、李立三等人。

席间，毛泽东谈笑风生，不断为老人们夹菜敬酒。

他说：“我们这一桌什么人都齐了：有无产阶级李立三，有无党派民主人上、文学家郭沫若，有民主教授许德珩，有工商界前清翰林陈叔通，还有妇女界思夫人及华侨两老人。这是统一战线的胜利。”



他又问司徒美堂高寿。司徒美堂回答：“已经 83 岁，在美国生活了 69 年。”

毛泽东说：“好呀，老当益壮，干一杯！”

司徒美堂递给毛泽东一支吕宋烟，毛泽东当场吸起来。烟灭了，又收回放在口袋里。

毛泽东把剩下的烟头放在衣袋里的习惯，是在战争年代艰苦的生活环境里养成的。

### 毛泽东饶有兴味地“解读无书”

中南海丰泽园菊香书屋里，明亮的灯光下，毛泽东饶有兴味地读着一部“天书”——一份长长的名单。

他看得十分专注，偶尔提起笔来增添一个名字。

中共中央统战部把参加新政协的单位人选和各项统计资料，印了一本很厚的表册，呈送中央。毛泽东翻了翻这本精美的表册，风趣地说这是一部“天书”。

此“天书”分为五类：党派代表；区域代表；军队代表；团体代表；特邀代表。前 4 类共 45 个单位，正式代表 510 人，候补代表 77 人。第 5 类特邀代表 75 人。正式代表和候补代表总数共 662 人。

毛泽东对这些名单是很熟悉的，这是根据他的统一战线思想确定的“圣贤榜”。

这份政协名单的代表性十分广泛，包含了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地区、人民解放军、少数民族、国外华侨与宗教界的代表，充分反映了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各阶段共产党人和一切爱国民主力量的大团结；同时还包含了近百年来我国民族民主革命各个历史时期为人民事业作过贡献的知名人士和代表人物。从辛亥革命、北伐战争、五四运动、抗日战争到解放战争，各个革命时期的代表性人物都吸收了，乃至前清末期和北洋时期较有声望以及后来同情革命，并为人民作过好事的人物，也被包纳进来。

1949 年 9 月 7 日，周恩来作了关于中国人民政协几个问题的报告，着重谈到政协名单中特邀代表的产生经过。他对毛泽东审阅和批准的那份“天书”，向政协筹委会做了介绍，他郑重而庄严地说：

“……有了领导力量，同时又照顾各方面，这就是参加人民政协的四十五个单位产生的原因，但单单如此还嫌不够，便又设了一个特邀单位。其中有的是中国四个革命阶段中始终站在正义一面的，如孙夫人及其领导的救济团体。其次，我们也邀请了从事科学研究和工业建设的，因为他们是国家建设人才，如中央研究院陶孟和先生，资源委员会钱昌照先生。第三类是一向或在某时期和我们有某种联系和朋友来往的，虽然后来这种关系被割断了，但是还有正义感，对人民事业有同情心。一旦解放了，便站在我们的一方面。像福建的萨镇冰先生，在福建解放后表示愿意与当地人民一道参加建设工作。第四类是从事民主运动在解放军服务很久的朋友，如陈瑾昆先生。第五，参加这次和平运动有功的，虽然和平未能全面实现，但这个和平运动，在人民中起了作用……这个运动经过上海人民代表团颜惠庆先生北来的努力，以及后来南京和平代表因张治中、邵力子等先生对八项二十四款和平条件的同意，更证明了这个事实。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邀请了他们。程潜先生也是

响应这个号召投到人民方面来的。起义将军我们承认他们，承认他们代表解放军。我们解放军有他们作代表也是光荣的。像吴奇伟将军、曾泽生将军、张转将军。另一方面也有参加到特邀单位中去的，海军、空军的代表也在特邀单位中。

“在这四个阶段的单位不能容纳的代表我们都容纳了下来，起义的将军代表也正是照顾了各个方面。而决定全部代表人选是根据人民民主革命的原则。我们重视由革命战争中锻炼出来的朋友，在土地改革、敌后根据地斗争中锻炼出来的朋友，在国民党统治时期的民主运动中锻炼出来的朋友，脱离反动派阵营起义的朋友，保护器材对国家有功的朋友，使这成为全国人民力量代表集中的大会。”

“天书”产生还很费周折。

确定参加新政协的单位和名单，是一件极缜密、极严肃、极敏感的工作，稍有不慎，稍有纰漏，就会举座不安。提名采用了两个渠道，一是组织或个人推荐，一是本人申请。按新政协筹备会组织条例的规定，对所有提名都进行逐个审查，反复研究。

中央统战部部长李维汉全力以赴抓了三个月，毛泽东、周恩来还时常参加讨论，增添不少名字。

首先考虑的是广泛的代表性，足以体现全国各民族、各民主阶级、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和所有爱国民主力量的大团结。它既要体现无产阶级的领导和以工农联盟为基础，又不能机械地按人口比例来分配名额，要充分照顾各个方面；同时，要慎重掌握敌我界限，防止国民党反动政府系统下的一切反动党派和反动分子混入。

中央统战部确定名单后，报给周恩来审核。周恩来一个名字一个名字地筛选，以他的周全性格和宽容胸怀，几乎把各民主党派领袖和各民主人士无一遗漏地包纳进了“天书”。代表名单初步产生后，又经过筹备会反复协商，征求各方面意见，一共花了3个月，才确定参加新政协的名额和名单。新政协的这一阵容，从组织上充分反映了我国革命从旧民主主义到新民主主义复杂曲折的历程，也充分反映了中共及其领袖吞纳百川的宽阔胸襟。

### 程潜与陈仪的不同命运

第一届全国政协会议开幕前，毛泽东还邀请了一位国民党嫡系将领当代表，他便是长沙起义、谣传被共产党“囚禁”的陈明仁。

作为动员陈明仁本部起义、成为毛泽东的座上宾的程潜，在参加政协会议期间常常想：国民党省主席陈仪先生如今还安在么？他在台湾的监狱日子如何打发呢？

陈仪并不知道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的消息。8个月后，他上了刑场。

如果他动员起义成功，像程潜游说陈明仁一样，那么，上海会成为第二个北平。但这只是假设。

囚于台湾的陈仪和在北平的程潜，他们都曾动员起义，但结局却一悲一喜。

比较起来，陈仪的有利条件要比程潜多得多，他和几乎以父子相称的汤恩伯友谊根深。而程潜同手握湖南省兵权的陈明仁，只能算是萍水相逢。

萍水相逢的程潜一举成功；而友谊极深的陈仪却被出卖，冤死台湾。

抗战胜利后，陈仪出任台湾行政长官兼警备总司令。日军投降后，他决心使台湾经济腾飞，并保留了部分日方技术人员，采取了一系列的力图保持台湾经济相对独立的措施。但是，国民党的各方势力也伸向宝岛，陈仪的措施只是杯水车薪。“二·二八”起义后，陈仪引咎辞职，离开台湾。蒋介石曾把陈仪视为心腹，并聘他为国民政府顾问。1948年夏天，蒋介石的失败已见端倪，他发现他所倚重的将领都不可靠，想采取“家天下”的手段，便在湖南任用程潜，在上海任用陈仪。

陈仪可以说是汤恩伯的再生父母。如果没有陈仪，汤恩伯只是金华的一介书生，而不可能得到中将军衔，成为蒋介石的亲信。汤恩伯这个名字，就是要不忘陈仪提携之恩而改的。他人前人后称他有两个父亲。然而，就是这个自称“孝子”的人出卖了陈仪。曾有朋友告诉陈仪，汤恩伯已不同于过去，而陈仪却不相信汤恩伯会出卖他。

与陈仪接洽起义的地下党员胡允恭按事先商量好的计划，来到上海，准备去见汤恩伯。但通过组织知道了汤恩伯的态度，于是坚决割断了一切联系。

但是，陈仪却依旧对汤恩伯十分信任。

他没想到，汤恩伯已被纳入蒋介石的亲信范围；更没有想到汤恩伯的两手阴谋：一手是原则同意起义，只说时机未到；一手是将陈仪的亲笔信上交蒋介石，以巩固自己在蒋介石心目中的地位。

蒋介石不放心陈仪的念头是从杭州布兵开始的。他多次叫汤恩伯去杭州布防，但陈仪婉言拒绝地说：“只要你们沿江沿海守住，杭州还用得着打仗吗？杭州历来是历史文物重要之地，而不是兵家要地。”“我是沙漠人，在孙传芳时代我就受杭州父老之托，要使杭州免于战火。杭州是国际上著名的风景胜地，无论北伐战争还是抗日战争，都未波及到这座花园城市，难道我今日能忍心杭州的百万乡亲 and 历代名胜古迹付之于炮火中吗？希望你不要再提杭州设兵一事。”

汤恩伯听话地把兵力布于宁波、嘉兴、平湖一带，借保护总统安危抽出一部分驻扎在奉化，以作卫戍部队。

蒋介石接到汤恩伯的密报，差点儿气昏过去，他直骂自己瞎了眼。

陈仪被囚之后，再也没见过汤恩伯。直到蒋介石在台湾公审陈仪，汤恩伯才佩带中将军衔，出庭作证。

程潜和陈明仁的关系远没有陈仪和汤恩伯关系密切，陈明仁投考广州讲武学堂时，被程潜录用。程潜是讲武学堂校长。二人既是同乡，又是师生，仅此关系而已。

陈明仁曾有过比汤恩伯更辉煌的历史，那是他指挥的四平保卫战。四平解围后，陈明仁被提升为第七兵团司令官，蒋介石亲自授予他国民党最高奖赏的青天白日勋章。陈明仁正准备衣锦还乡时，被陈诚告了一个御状。于是，陈明仁被调任南京总统府任了闲职。

陈明仁心碎了，他用美援大米筑工事，便成了罪状。他不禁心灰意冷，眼药自杀未遂。从此，他以赌场为家，直到1949年2月，蒋介石才又重新起用他。

陈明仁赴湖南老家担任程潜的副手。

大起大落的遭遇，使陈明仁急起他同耿飏的一段奇遇。

当时，陈明仁是七十一军军长，驻防四平。兼任北平军调处执行部的中

共代表耿飏率领第二十八停战小组来到四平。

尽管在一个多月前，陈明仁曾软禁过以耿飏为首的军调小组的成员，但这次对他们比较客气，不但宴请他们而且还邀请耿飏与他睡一张床，盖一条毛毯。两个人从政治谈到经济，从军事说到文化，最后谈到中国的前途上。

“我们国民党打了那么多的胜仗，顶多两年，不超过三年，非消灭共产党不可！”陈明仁充满信心地说。

而耿飏却不慌不忙地说：“国民党撕毁停战协议，向解放区发动战争，但是到处碰壁。远的不说，就说四平之战，是我们给予你们沉重打击后主动撤离的，这难道是你们胜了吗？至于内战前途，我敢保证，不出二年，国民党一定失败！”

这时，陈明仁气极了，他从床上蹦起来，扯着嗓子喊道：“你敢跟我打赌吗？”

“行，打赌就打赌。”

两位不同政见的老乡勾了勾小指头。

1950年年初，耿飏出任大使前回了一趟老家，在醴陵碰上正在整编部队的陈明仁。陈明仁第一句话便是：

“你赢了，我输了。”

“不对，应该说我们都赢了。”耿飏幽默地说。

陈明仁笑了。

在长沙起义前几天，蒋介石曾托人捎给陈明仁一份手令，命他死守长沙，否则便向湘西撤退。撤退之前，主张和平人士一律处决。

程潜主张和平，蒋介石心中有数，但他不相信陈明仁会与程潜一条心。

当时，白崇禧的军队退入湘境，力量十分雄厚，对长沙10万守军监视很严密。白崇禧还派专机送来一纸命令：

“立即包围水陆洲，实行兵谏，必要时采取断然措施。”水陆洲便是指程潜驻地。

陈明仁刚到长沙任职，程潜就邀他到卧室叙谈。程潜开门见山地说：

“子良弟，我已思谋良久，打算和共产党合作，走和平之路。这样可以缩短进程，影响大西南，保存国家元气，尤其是可能使家乡避免炮火涂炭。你意如何？”

关于程潜主张和平的风声，陈明仁早就听说，因此对他的话并不感到突然。沉吟片刻，陈明仁说：“我跟您想到一块儿去了。自从我胞弟陈明信被人民解放军俘虏后释放回来，自从蒋介石听信谗言革除我兵权以后，我就不愿意为一个人充当炮灰了。不过，老师您要注意，现在情况复杂，我们既要对付白崇禧，又要对付蒋介石，军警特各类人物面孔千姿百态，可不能书生气啊！”

陈明仁有过被革职的深刻教训，干什么都小心起来。他说：“老师，我只跟你联系，不与任何人发生联系。公开场合我仍唱花脸。这样可以取得蒋介石的信任，减轻武汉方面的压力。”

陈明仁不是汤恩伯。

1949年9月7日，毛泽东亲往火车站迎接前来北平参加一届政协的程潜将军以及陈明仁。在路上，毛泽东和警卫员有一段对话。警卫员问他：“主席，程潜将军和你关系那么好，为什么不在大军渡江时举行起义，来个两面夹攻呢？这样不是作用更大吗？”

“程潜将军虽是湖南省主席兼战区司令，但他手下没有几个兵。陈明仁倒是有兵，但他们不是主力部队，经不起白崇禧反动派的压力。只有我们渡江后，消灭了国民党的主力部队，他们才有可能起义。”

毛泽东又说：“程潜将军是国民党元老派人物，在国民党内有一定的影响。去年在国民党召开的国民选举中，他是候选人之一，结果李宗仁当选了副总统。如果程潜当选上副总统，和谈也许会谈成功。”

火车刚到站，毛泽东就快步迎上去，先握住程潜的双手，说：“颂公，别来无恙，一路上劳累了。你看，你的老朋友、学生们和部下都在恭候你呢。”

程潜连声道：“谢谢，谢谢。”

接着，毛泽东又握住陈明仁的双手，说：“陈将军，你打仗勇敢，和平也勇敢。”

陈明仁被平易近人的毛泽东感动得不断点头。

互相寒暄了几句，毛泽东亲自搀扶程潜上了车，然后自己坐进去。

1949年9月19日，毛泽东邀程潜、李明扬、陈明仁同游天坛，刘伯承、陈毅、粟裕作陪。到祈年殿前，毛泽东特地从人群中召唤陈明仁：“子良将军，来来来，我们两个单独照个相。”

“这……”陈明仁感到意外。

“主席请你，你就莫装斯文罗！”陈毅调侃道，并把陈明仁推到了毛泽东身边。陈明仁恭敬地站在毛泽东右边，照了个双人半身相。

照完相，毛泽东又亲切地对陈明仁说：“子良将军呀，现在外面的谣言很多，说你被我们扣起来了，还说杜聿明、王耀武被我们五马分尸干掉了。我想让你在政协会开过后，去山东济南看看他们，把情况向外介绍解释一下，写些信给你那些还未过来的亲朋故旧，促使他们早些觉醒，及早回来。”

陈明仁爽快地答应：“主席，我一定照办。”

毛泽东又说：“你还可以把这张照片分送给你们黄埔同学，只要送得到的，都送一张，好吗？”<sup>237</sup>

陈明仁也满口答应了：“好，我一定送。”

毛泽东又紧盯一句：“那你打算洗印好多张呢？”

陈明仁伸出两手掌说：“我打算洗10打，120张。”

毛泽东笑道：“不够，不够，至少要洗50打。”

陈明仁说：“50打，50打，我广泛地送。”

毛泽东笑了：“后天是21号，我们的新政治协商会议就要开幕了，各方面的代表人物都有，唯独缺少蒋介石嫡系将领。你来了，代表性就全了。”

## “无书”仍有遗憾

经过周密审慎的寻觅筛选，排出的新政协代表名单应该是万无一失、各方咸宜了吧。但还是出现了“一人向隅，举座为之不安”的遗憾。

问题出在少数民族代表名额上。参加第一届政协会议的名单，在少数民族单位中没安排满族的代表，只在其他单位中有满族代表，如齐燕铭、罗常培等。名单一公布，在满族中引起了强烈反响，北平一些满族人还哭了起来。

事情报到毛泽东那里，他严肃地说：“一个民族没有代表，整个少数民族为之不欢。”后来，召开政协第二届委员会时作了补救。

其实，在拟定代表名单过程中，已意识到少数民族的代表少了些。在代

表总数中，少数民族代表共有 28 位，占百分之四点二三，在一个多民族的国家里比例显然太小，代表面不够广泛。

但客观原因是当时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多数还没有获得解放，情况还不明了，难于准确推荐出代表人物来。李维汉为此还专门与革命队伍内的少数民族代表朱早观、奎璧、杨静仁、天宝等进行座谈讨论，物色到一些人选加以弥补。

但即使是这样，“天书”仍不可避免地留下了遗憾。

参加新政治协商会议的各种名单一公布，党内一些人便有了非议。一长串的名单中，大部分名字是那么陌生，也有熟悉的，却是过去在战场上经常要喊“打倒”、“活捉”的敌方将领。

傅作义、张治中当上了中央政府的委员；程潜、龙云当上国防委员会的委员。

于是在政协开会的时候，一些中共代表不愿接触民主人士，对国民党起义将领更为反感，吃饭也不和这些人同坐一桌，更不愿与他们住在一起。为此，毛泽东、周恩来等人做了大量的工作，并为全党做出了表率。

周恩来深谙治国的要旨，他非常重视对民主人士的权力安排。他所设想的新政权的权力结构中，各民主党派的领袖和少数著名民主人士占着相当比重，在权力金字塔中他们是塔尖的组成部分。他认为，各民主党派的主要人物在政府中都应有所安排。

周恩来是相当细心的人，他知道安排民主人士的阻力主要在党内，他不但要在言行上造成一个尊重民主人士的气氛，也要在行动上做出让民主人士信服的共产党的表率。

1949 年 8 月 13 日，周恩来为怀仁堂的音响问题亲自给总参通信部部长王诤打电话：“现在我们准备召开大型的政治协商会议，地点选在怀仁堂。这次会议是共产党做东道主，请全国的民主人士来北平开会，成立人民自己的国家。这是第一次，一定要搞好，可是现在怀仁堂的音响是个大问题。”

周恩来把这个问题提高到政治问题上：“民主党派对从山沟里打出来的共产党有一种说法，打得了天下，管不了天下，土包子没有管理国家的能力。显然，他们对共产党不那么服气，说政协会议内容再好，人家不知道你说的是什么，这个会议就是失败的会议。因为声音不好而影响会议，这不是技术问题，而是政治问题。”

最后，周恩来变得异常严厉起来：“如果解决不了声音问题，我要杀你脑壳！”

在第一届政协会议前夕，经过专家的努力，怀仁堂音响问题解决了。

中共中央从西柏坡迁来北平的第一次国宴，是给从香港绕道东北赶来北平的民主人士洗尘。

这批民主人士中外闻名，有李济深、沈钧儒、谭平山、章伯钧、蔡廷锴、马叙伦、郭沫若等四五十位，他们都是阅历丰富的老宿巨擘。

周恩来对此极为重视，他挑选了当时北平最好的饭店——旧北京饭店设宴招待，并叫中南海布置科长钟灵前去进行布置工作。距宴会开始还有一个小时，周恩来就赶来了。他走进宴会大厅，掏出一方白手帕，顺手从餐桌上抓起一双筷子擦了几下，两道淡黄的渍痕触目地留在手帕上。周恩来的突然袭击使钟灵十分难堪。他以为北京饭店是一流的大饭店，卫生服务都是过关的，根本没想到周恩来会从筷子上挑了纰漏。

周恩来严肃地说：“不要以为这是单位的事务性工作，这里面有政治。”

钟灵赶紧找到人，重新将碗筷消了毒，洗得干干净净后再放到桌上。

周恩来还以特具的细致周到，让从大洋彼岸美国赶回来参加新政协的华侨领袖司徒美堂感佩不已。司徒老人归途匆匆，来不及准备秋衣，周恩来见老人衣裳单薄，便叫人带他去大栅栏的老字号瑞蚨祥，为他特制了一件极珍贵的水獭领子的狗毛大衣。司徒老人体衰足跛，中南海大殿堂的台阶他已攀登吃力。心细的周恩来看到眼里，叫大会秘书处特制一把藤椅，由两名工作人员像抬轿子一样把老人抬进会场。

司徒美堂十分感动，他用广东话风趣地说：“特赐金銮殿乘舆。”

所有参加新政协会议的民主人士，都受到过周恩来的恩泽。周恩来真诚自然地做着这些事，除了表达他对民主人士的尊重和信任，也为了影响和带动党内干部贯彻统一战线，吸引更多的人来共同执掌刚打下的江山。

### 新年阁让党外人士做大官

待方针确定、气氛造成后，周恩来开始组阁了。

他把“内阁”成员细细过了一遍，锐利的眼睛瞄住傅作义、黄炎培、李书城三个名字。

对傅作义的工作安排，毛泽东在西柏坡曾有过许诺。中央决定成立国防委员会，程潜、张治中、龙云、傅作义都是委员。但毛泽东、周恩来考虑到傅作义将军对和平解放北平有着特殊贡献，一定要给他安排一个部长职位。周恩来便提名他当水利部长，并安排当时的北京市委副书记李葆华到水利部当副部长、党组书记，协助傅作义工作。在酝酿配备水利部班子时，他请傅作义推荐人选，并对李葆华说：“凡是傅作义提的人我们都要用。”

结果，傅作义向周恩来推荐了两位民主人士，一位是张含英，曾是国民党黄河治理委员会负责的技术专家；一位是刘瑶章，曾任国民党河北省党部秘书长。不久，张含英被任命为水利部副部长，刘瑶章被任命为水利部办公厅主任。

而中国民主建国会主任委员黄炎培虽然几十年活跃于社会舞台，却一直不愿做官，不做官成为他的人生信条之一。他不肯从政，一方面是对当时的当政者失望；另一方面也出自于他对高高在上不务实际的官僚的反感，而立志要一生务实，做实事。他几次回绝国民党政府给他的教育总长、省长等官职。

在中南海怀仁堂的宴会上，毛泽东端着酒杯走到他面前攀谈。毛泽东问他：“南京政权有一个时期要你去当教育总长，你为什么不去？”

毛泽东这个问题问得很实在。黄炎培扼要回答后，回到家里犹觉意犹未尽，躺在床上难以入眠，便起身提笔疾书，给毛泽东写信：“我是受过孙中山先生初期领导革命时的洗礼的——1905年，同盟会成立那年，人会誓词是：‘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后来没有完全实践……一般国民党员更是鱼龙混杂了。我认为不是光明所在，始终没有加入国民党……不看清真理，决不盲从的。……但使我认为可能是真理所在，就是1945年的延安之行……”

9月，黄炎培在全国政协会议当选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周恩来还要请他再上台阶。10月11日，周恩来驱车到黄炎培寓所，向他通报和商议政府

组成人选，恳谈两个小时。周说，在由他担任的政务院总理之下准备设四个副总理，有陈云、邓小平、郭沫若，另一名就是黄炎培，同时兼轻工业部部长。

这一安排使黄炎培十分意外，不但要他做官，还要他做大官。他激动得老泪纵横，但却并没有立刻答应。

在1946年春，旧政协协商组织联合政府，内定要民盟的七个人担任国府要员，一人任部长，一人担任不管部的政务委员。大家请黄炎培考虑任职，他却表态说：“1.须绝对光明磊落，如果真正由民众选出，我决不推辞；2.有一班支持我的好友，须尊重这班友好的意见，这是我向来的作风；3.如今还有两个客观条件的限制：一是年纪渐渐老了；一是我还有各种经手的事情还未了结，需要善始善终地处理好。”实际上，他是婉言推托。

1948年，苏渊雷教授曾写信询问他，为何还抱有不作官的宗旨，他在复信中说：“承齿及弟数度不为官，此事不能不加以剖明。民六、民十、民十一，当时实因职教社初成立，若干事业甫经展开，弟对职教确信为能解决人类种种问题的最扼要办法，一迄今犹信。若一行作吏，势须抛弃半途，实违宿愿。其间尤为民十、民十一中华职业学院正陷入最艰苦时期，经济濒于绝境，一经抛弃，立即破产，炎将永远为职业教育罪人，故宁舍彼就此。弟认做官亦是正当职业，如好人不做官，做官者都是坏人，如何得了，故薄官不做，在野鸣高，弟以为不是直理，不可为训，先生以为如何，率臆候教。”

如今，他所钦佩的周恩来亲自上门恳请他做官，他不得不认真考虑了，但他最初的反应还是不做大官。他说，1946年他才68岁，就觉得年纪老了，做不动官了。如今已72岁了，还能做官吗？

周恩来说：“这不同于旧社会的做官，现在是人民政府，不是做官，是做事，是为人民服务。在政治协商会议上，由各党派一起千斟万酌制定共同纲领，就是为人民服务的剧本。我们自己编了剧本，自己怎么能不上台唱呢？”

第二天一早，黄炎培请了几位好友来长谈。大家深明大义，一致建议他接受此项任命。周恩来也不断催促，并再次亲自上府，黄炎培终于痛快地答应了。

1949年10月1日开国大典时，黄炎培即兴赋诗，诗中说：“红场三十万众，赤旗象征赤心，赤心保卫祖国，赤心爱护人民。”10月19日下午，在毛泽东主持的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上，通过了政务院副总理和各部部长的任命。21日举行了就职典礼。

11月1日，黄炎培在轻工业部开始办公，他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自民国三年（1914年）2月辞官以来，35年，不衰老而复为此，但我不认为是做官。”

周恩来亲自提名辛亥老宿李书城当农业部长，大出人们意料之外。

但周恩来有更深远的考虑，他觉得李书城是同盟会的早期会员，辛亥革命首义后在武汉当过黄兴的参谋长，以后又投身讨袁护国战争和护法战争，在旧民主主义革命中起过重要作用。中共“一大”也是在他家召开的，他的弟弟李汉俊是一大代表，早期在中共党内有过贡献。

周恩来派薄一波找李书城谈话，并对薄说：“他有这么一个历史，要照顾这个历史，你去跟他谈谈，说要提他为农业部长。”李书城老先生便这样出任了新中国第一任农业部部长。



在周恩来的细心安排下，各民主党派的主要领袖或社会贤达、知名人士差不多都安排了相当职位。政务院及其下属机构的负责人中，各党派民主人士和无党派民主人士占了相当比重，4个副总理中共产党占2名，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2人；21个政务委员中，共产党员10人，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11人；政务院下属30个机构的负责人93人中，共产党员51人，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42人。民主人士对此十分感动，称赞道：“周总理真不愧为‘周’总理啊！”

除周恩来外，其他共产党领袖人物也非常注意开国之初的统战工作。进北平开会的陈毅给傅作义让房，又送傅作义小汽车，很会做统战。他得知党内代表们有情绪时，便两次召集二野、三野的代表开会，十分严厉地说：“我们有些同志就是不懂统战工作，周副主席作了几次报告，对这个精神还是不理解。外边有个说法：早革命不如晚革命，晚革命不如不革命，不革命不如反革命。这是牢骚话！是很错误的。”他又以傅作义、程潜为例，肯定了他们起义壮举，说他们为和平解放大城市，保护民族文化遗产生立了大功。“如果不这样，敌人伤亡一千，我们伤亡八百，有什么好处？”

为了确保政府人选的通过，参加政协一届会议的共产党建立了统一的党组，由中央书记处直接领导。党组书记是童小鹏，他负责与党员联系，登记编组，过组织生活。

临时党组是由统战部和组织部共同组织的一个班子，主要任务是协助党做工作。

政协正式大会开始前，党组召开了一次党员大会，强调了开会时共产党员应注意的事项。党组要求党员代表服从组织，服从大家制定的共同纲领，党员要保证对非党员的投票选举。党组告诫政协党员代表，非党员参加政协、政府是经过各方面协商的，党员要拥护共同纲领，不要投反对票。党员代表还被告知，政协会上的发言，不能把党员排在前面。会议代表的住宿也作了精心安排，党员非党员交叉着住，便于党内外人士交流沟通，消除隔阂。

当局恩来得知有些党内代表不愿与党外人士尤其是起义将领共桌吃饭时，严肃地告诫党员代表说：“要广交朋友，要和他们同吃住、同学习、同开会。与他们搞好关系，加强团结，这是革命和建设事业的需要。”

由于采取了组织措施，强调了组织纪律，政府人选得以顺利通过。但一些党员代表只是组织上服从了，思想上并没想通，情绪还很大。针对这种情绪，刘少奇、周恩来、陈毅在中南海给全体党员代表作了统一战线的专题报告，使代表们大开眼界。

10月5日，毛泽东在中南海宴请出席会议的原国民党部队的起义有功人员。他客气地对起义有功人员说：“开会期间很忙，没有同大家单独见面。会议结束了，你们也快回去了，今天请大家吃顿便饭。”

他端着酒杯，到各桌同每个人亲切碰杯，一再说：“感谢大家。”他的态度谦恭，诚挚，平易，随和，饭后还执意要出门送大家，使起义有功人员感佩不已，同时也使广大党员得到了教育。

## 济济一堂的政协

1949年9月21日，中南海怀仁堂布置得焕然一新。

主席台上，挂着孙中山、毛泽东的巨幅画像。

画像中间，挂着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会徽。

晚上7点，当毛泽东和中共代表团成员进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会场时，怀仁堂里响起了雷鸣般的掌声，长达两分钟之久。

毛泽东走上主席台，宣布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正式开幕。

乐队奏起了《人民解放军进行曲》。

场外，54门礼炮隆隆齐鸣。

礼炮声和乐曲停止后，毛泽东在暴风雨般的掌声中致开幕词：

“诸位代表先生们：全国人民所渴望的政治协商会议现在开幕了。我们的会议包括600多位代表，代表着全中国所有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人民解放军、各地区、各民族和国外华侨。这就表明，我们的会议是一个全国人民大团结的会议……”

会场里又爆发出热烈的掌声。

“我们的会议之所以称为政治协商会议，是因为三年以前我们曾和蒋介石国民党一道开过一次政治协商会议。那次会议的结果是被蒋介石国民党及其帮凶破坏了，但是已遗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

毛泽东回顾了三年解放战争进程和旧政协召开的经过后，指出：“新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是在全新的基础上召开的，它具有代表全国人民的性质，它获得了人民的信任和拥护。因此，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宣布自己执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

毛泽东的致词透出一个伟大的领袖所具有的远大胸怀和目光。他说：“诸位代表先生们：我们有一个共同的感觉，这就是我们的工作将写在人类的历史上，它将表明：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起来了。”

最后，毛泽东庄严宣布：

“我们团结起来，经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大革命打倒了内外压迫者，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

“我们的民族将从此列入爱好和平自由的世界各民族的大家庭，以勇敢而勤劳的姿态工作着，创造自己的文明和幸福，同时也促进世界的和平和自由。”

“我们的民族将再也不是一个被人侮辱的民族了，我们已经站起来了。”

“让那些内外反动派在我们面前发抖罢，让他们说我们这也不行那也不行罢，中国人民的不屈不挠的努力必将稳步地达到自己的目的。”

这是一个已经站起来的伟大民族的心声。”

代表们又报以长时间的热烈的鼓掌。

接着，刘少奇代表中国共产党在大会上讲话。

他说：“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第一届全体会议，业已开幕了。从此，中国的历史已经进入一个全新的时代——人民民主时代。我代表中国共产党的全体党员，以极端愉快的心情庆祝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开幕，庆祝即将由这个会议产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及其中央人民政府的成立。”

刘少奇强调了全国人民的革命大团结的重要性，他指出：“过去被人讥笑为一盘散沙的四万万七千五百万中国人民，一旦在正确的领导之下团结成为一个统一的力量，它的光芒将照耀全世界，它将迅速地肃清一切残敌，克服一切困难，把落后的中国建设成为独立、民主、和平、统一和富强的新中国。”

最后，刘少奇表示：“中国共产党以一个政党的资格参加人民政治协商

会议，和其他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少数民族、国外华侨及其他爱国民主分子一起，在新民主主义的共同纲领的基础上忠诚合作，来决定中国一切重要问题。凡是中国共产党参加并一道通过的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决议，中国共产党坚决地执行，并为其彻底实现而奋斗。”

当刘少奇讲到这里时，台下的政协委员响起了一阵雷鸣般经久不息的掌声。

第三个在大会上发言的是孙夫人宋庆龄女士。

她是作为特邀代表出席大会并讲话的。她激动地说：“今天，中国是一个巨大的动力，中国的人民在前进，在革命的动力中前进。这是一个历史的跃进，一个建设的巨力，一个新中国的诞生！

“我们达到今天的历史地位，是由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这是唯一拥有人民大众力量的政党。孙中山先生的民族、民主、民生三大主义的胜利实现，因此得到了最可靠的保证。”

作为孙中山最亲密、最忠实的革命战友和生活伴侣的宋庆龄，看到孙中山为之毕生奋斗的革命目标今天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就要实现，她的心情的愉悦可以想象。

宋庆龄讲话之后，民革代表何香凝，民盟主席张澜，解放区代表高岗，人民解放军代表陈毅，民主建国会代表黄炎培，全国总工会副主席李立三，新疆代表团团长赛福鼎，特邀代表程潜、张治中和华侨代表司徒美堂先后讲了话。

何香凝已是70多岁的老人。她在发言中说：“我预祝在我们中央人民政府宣告成立，全国上下在它的领导下一致实现共同纲领之后，我们的政治将走上光明的道路，好像太阳初升似的光辉灿烂，照遍全世界。

“只要我们能实现共同纲领，保持和加强我们的团结，共同向帝国主义作斗争，遵守孙中山先生的亲苏政策与毛主席的建国方针，在毛主席的领导下团结奋斗，那么，我们国家的前途是无限光明的，我们人民的前途是无限幸福的！”

曾被毛泽东面誉为“老成谋国”的张澜，深有感触地说：“今天我站在这个讲演台上，看到这个庄严伟大的会议局面，我立即产生了一个感想。中国今天这个新民主主义的局面，是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主席英明领导的结果，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英勇战斗和全国各民主党派，各民主阶级的民主分子奋斗牺牲的结果。我们今天应首先感谢他们。我个人今天愿首先向中国共产党的毛主席，向中国共产党，向中国人民解放军表示敬意。”

陈毅在讲话时表示：“中国人民解放军400余万指战员，能派遣代表出席人民政协大会，躬逢空前的人民革命盛况，认为是无上光荣。在此，我谨代表中国人民解放军全体指战员表示无条件拥护人民政协大会，愿在大会领导之下将人民革命战争进行到底，保证新中国建设的顺利进行，中国人民解放军随时准备着，听候中央人民政府的调用，为消灭残余敌人和保卫新中国的独立自由而奋斗到底！”

在这次会议上，人民解放军的代表——战斗英雄李国英、魏小堂、魏来国、刘梅村被选入主席团，当他们登上主席台上时，全体代表热烈鼓掌以示欢迎。

民建代表黄炎培在发言中，很恰当贴切地把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比作建一所新的大厦，把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各地区、人民军队、

少数民族、海外华侨和其他爱国民主分子比作大厦的柱子，把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组成的统一战线比作大厦的钢筋水泥，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比作大厦的理论基础。

他说：“这所新的大厦有多大？有九百六十万多平方公里。中间住着多少人？有四万万七千五百万人，连我在内。”

会场里响起一阵笑声，接之而来的是一阵热烈鼓掌。

最后发言的是司徒美堂。他代表美洲华侨出席政协会议，在发言时感叹道：“国外华侨一向热爱祖国，效力革命，但后来得不到祖国真正的爱护，以致在国外受帝国主义的凌辱压迫，回国内便受贪官污吏的剥削欺骗，所以很长时期热望一个独立自由民主统一的新中国的出现。今天，由于中国人民解放军和全国人民的英勇奋斗，这个愿望达到了，使我感到万分的兴奋！”

他又称赞道：“华侨远处异地，国内情势，未能透彻明了，现在我回到解放了的北平一看，觉得中共人员那种刻苦踏实英勇牺牲的精神，对建国大计那种反复协商，尊重各方面意见的优良政治风度，实在值得我们佩服，这就是中国共产党有资格领导全国人民并进而取得彻底胜利的最大因素和保证。”

最后，他代表华侨表示：“我们华侨相信，我们的新政府是为争取广大人民利益的，我们坚决表示拥护！”

### 新政协出现了一位加黑框的代表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印行了一本精美的纪念册，上面收录了大会所有的文件。在第 359 页，有一封罩以黑框的唁电。这是全体代表一致通过的中国共产党代表团的临时决议，由中国人民政协主席团以大会名义，向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和杨杰将军的家属，对中国人民政协代表杨杰将军被国民党暗杀一事致电吊唁：

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台鉴：

惊悉杨杰将军在由滇经港来平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途中，惨遭国民党匪帮用最卑劣的手段加以暗杀。本会议全体同仁，无不痛惜！杨杰将军多年来为民主事业奋斗，久为反动派所深忌，于今竟遭惨死，将会更加激励全国人民，一致努力，把革命进行到底，彻底消灭国民党反动派及其主子美帝国主义在中国的最后残余统治，建立崭新的中国，而安生者谨电致唁！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第一届全体会议申马

杨杰家属礼鉴：

惊闻杨杰将军惨遭国民党反动派杀害，不胜悲愤。尚望节哀，为人民事业努力奋斗。谨此电唁！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第一届全体会议申马

第一届政协委员中，杨杰是唯一加黑框的代表。他曾加入同盟会，参加过北伐，1938 年任驻苏大使，解放战争时期参加爱国活动，在政协开幕前两天在香港被害。

暗杀杨杰可以说是蓄谋已久。蒋介石到台湾，部署好云南战事后，便密令保密局局长毛人凤立即去香港刺杀杨杰。

蒋介石几次布置毛人凤暗盯李宗仁，还准备在李宗仁乘飞机擅自飞出南京时，用战斗机将其击落，如无美国鼎力支持，李宗仁早就成为蒋介石的刀下鬼。

蒋介石说过，他对背叛他的人比恨共产党还要更甚，向来都不见容于党内党外异己，稍有违抗，他就要采用极端手段予以对付。

民主同盟的老前辈张澜也差点遇害。

张澜曾作为晚清秀才被选送到日本学习。日本的维新富强以及中国受侵凌的屈辱史，激发了他的爱国思想，他反对东京留日的中国学生为慈禧祝寿，并建议慈禧退朝，还政光绪变法维新。他的一系列举动被清廷驻日公使视为大逆不道，将他押送回国。

1945年8月10日，张澜发表公开讲话，强调抗战胜利后中国人民面前的是和平民主建国，必须首先争取民主的胜利。张澜抗议蒋介石出尔反尔，断然拒绝参加国民参政会，声明民盟决不参加。他还领衔与郭沫若等各界人士联名致电美国和平委员会，呼吁美国停止协助国民党运兵进行内战。同时，他以民盟的身份倡议国共双方会面。邀请国民党参谋长陈诚来参加商谈避免内战的问题。他的举动受到中国共产党的欢迎，却成为蒋介石的眼中钉。

当民盟中央委员李公朴、闻一多在昆明被特务公开杀害后，张澜在成都主持了各界人士为死难者召开的追悼会。

散会以后，张澜还没走到会场门口，突然遭到特务群起袭击，被打伤了头部。

1949年春末，蒋介石知道自己呆在大陆上的时间已经不多了，他不允许张澜活到共产党时代。于是，武装特务包围了张澜休养的疗养院。该院主持人郑定竹医生以身家性命担保，医护人员也以身家性命担保，特务才勉强允许把张澜软禁在病房里。

但蒋介石还是不罢休，他非杀了张澜不可。

后来，他身边的谋士也觉得蒋介石这招着实不聪明，说：杀了民主人士反落口实，还不如不杀好。

蒋介石终于哑口无言。

## 毛泽东亲自介绍赛福鼎加入中共

政协一届会议期间，招待民主人士的宴会很多，周恩来特意嘱咐厨房要为伊斯兰教和回民专开一席。

新疆代表赛福鼎·艾则孜为此十分激动，在北京期间，他亲身体会到共产党对风俗习惯宗教信仰的尊重。

赛福鼎当时就向毛泽东提出入党要求。因为新疆刚和平解放还没有党组织。

1949年10月23日，毛泽东介绍赛福鼎入了党。

赛福鼎和新疆代表来到北平的第二天，齐燕铭就告诉他们，下午5点一刻，周恩来要来看望他们。

但时间到了，周恩来没到，齐燕铭却来了，他向新疆代表们说：“周副主席有个重要事情正在处理，一会儿就到，请你们谅解。”

10 分钟后，门外走来一个身穿蓝色中山服、脚穿布鞋的人。赛福鼎以为是工作人员，没在意。

“您是赛福鼎吗？”

“我是。”赛福鼎随口答道。

“我是周恩来，来晚了，让你们久等了。”周恩来边说边伸出手来。

赛福鼎立刻从椅子上站起来，与周恩来紧紧地握手。

“欢迎你们到北平来，我没能及时看望你们，很抱歉。”周恩来话题一转，“让我们一起向来北平途中飞机失事遇难的烈士表示哀悼。”

在政协会议结束后，毛泽东在饯行便宴上当着新疆代表的面问：“飞机的情况怎么样？”

“新疆的飞机已经安排好了，飞行员技术也很好。”周恩来说。

“今天夜里组织一个由苏联专家参加的技术检验小组，重新检查一遍飞机。”毛泽东又叮嘱道，然后转身对赛福鼎说：“明天早上你们没有接到恩来的电话不要起飞。”

赛福鼎激动得说不出话来。

次日早上 8 点，周恩来打电话请新疆代表去机场。

赛福鼎他们赶到机场后，一夜未睡的周恩来早就等在那里。他说：“根据主席指示，机场人员连夜对飞机进行了全面检查，飞行安全有保障。我们已经向毛主席报告过了，你们可以起飞。”飞机飞上了蓝天，坐在飞机上的赛福鼎还沉浸在幸福之中。他又想起了刚到北平时与毛泽东见面的情景。那是在怀仁堂看戏时，戏刚一开演，一位身材高大的人从后面走上前来，挡住了赛福鼎的视线。这时，周恩来赶来，介绍说这是毛泽东。

赛福鼎立刻站起来，又惊又喜。

毛泽东一边与他握手一边说：“欢迎你们，先请你们看戏，下次再见。”

以后，毛泽东又多次接见新疆代表，有两次是单独在驻地。

毛泽东说：“维吾尔民族是个具有悠久历史传统的古老民族，有丰富的历史文化遗产，而且对内地也产生过影响。现在解放了，更应该有较大的发展。新疆的自然条件有很多优势，自然资源丰富，只要我们把工作做好，人民是会高兴的，民族经济文化会发展得更快更好。”

毛泽东还询问了新疆少数民族的生产生活情况，指出在新疆最为重要的工作就是要使各民族紧密地团结，首先要加强少数民族人民与汉族人民之间的团结，而这一团结的关键是加强少数民族干部同汉族干部之间的团结。

作为新疆代表的赛福鼎在大会上讲话说，新疆人民从最近几年的斗争经验中，已经了解到只有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胜利，才能有新疆人民解放运动的胜利。

新疆代表把维吾尔族衣帽献给毛泽东。

毛泽东把绒帽戴在头上，赛福鼎帮他披上了绣花披风。

会场上笑声和掌声交织在一起。

## 毛泽东就任中央人民政府主席

9 月 22 日，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继续举行。

大会听取了主席团的报告，通过了主席团关于设立 6 个分组委员会的提议。

6 个分组委员会包括政协组织法草案整理委员会、共同纲领草案整理委员会、政府组织法草案整理委员会、宣言起草委员会、国旗、国徽、国都、纪年方案审查委员会和代表提案审查委员会。

9 月 23 日、24 日、25 日三天，继续举行会议。

9 月 27 日，大会发言结束。

当天，大会讨论并通过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组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都、纪年、国歌、国旗四个议案。

9 月 29 日，政协大会讨论并通过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和全体委员名额、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关于选举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和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的规定、主席团常委会关于代表提案的审查报告等议案。

9 月 30 日，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胜利闭幕。

当天，大会选举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委员 180 人；选举了中央人民政府主席、副主席及全体委员。毛泽东为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朱德、刘少奇、宋庆龄、李济深、张澜、高岗 6 人为副主席，陈毅等 56 人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

大会在选举时极为郑重。当天任会议执行主席的刘少奇、李文三、沙千里、梁希、盛丕华担任选举总监督，另外再由主席团指定 60 人监票。

当选举结果报告给代表时，会场响起雷鸣般的掌声。

当大会执行主席宣告毛泽东当选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主席时，各代表一致起立，热烈鼓掌并欢呼“毛主席万岁”。

在选举完毕、检票人进行检票之时，全体政协代表又一致通过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宣言，通过了给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致敬电，通过了竖立“为国牺牲的人民英雄纪念碑”的决定和纪念碑碑文。

### 人民英雄纪念碑碑文 300 年不变色

在讨论和通过建立人民英雄纪念碑的决定时，周恩来提议：将纪念碑建在天安门广场。

他说，在天安门广场建纪念碑，是因为天安门广场有“五·四”以来的革命传统，同时这里也是全国和世界人民敬仰的地方。

周恩来的提议得到代表们的一致赞同。

下午 6 时，全体政协代表从怀仁堂来到天安门广场，开始举行纪念碑奠基典礼。

在庄严肃穆的气氛中，周恩来代表大会主席团致词：“我们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为号召人民纪念死者，鼓舞生者，特决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首都建一个为国牺牲的人民英雄纪念碑。现在，一九四九年九月三十日，我们全体代表在天安门外举行这个纪念碑的奠基典礼。”

周恩来致词后，全体代表脱帽静默致哀。

哀毕，毛泽东主席宣读纪念碑碑文。

碑文由毛泽东所撰，周恩来手书。

碑文如下：

三年以来，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永垂不朽！  
三十年以来，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永垂不朽！  
由此上溯到一千八百四十年，从那时起，为了反对内外敌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自由幸福，在历次斗争中英勇牺牲的人民英雄永垂不朽！

最后举行奠基仪式。

毛泽东与各单位首席代表执锹铲土，以示他们对烈士们的崇敬。

新中国建立后，北京市政府担负了修建纪念碑的重任。为此，专门成立了“人民英雄纪念碑兴建委员会”，由中央宣传部、文化部、建工部等中央单位和地方 17 个单位组成。彭真任主任委员，建筑专家梁思成、雕塑专家刘开渠和北京市府秘书长薛子正 3 人任副主任委员；梁、刘两人领导整个纪念碑的方案制定工作。经过征集意见、确定方案、采运石料、雕刻安装等程序和近 9 年时间的辛勤劳动，人民英雄纪念碑于 1958 年 4 月 22 日落成，同年五一节举行揭幕仪式。

从此，人民英雄纪念碑以中华民族特有的风采矗立在天安门广场中央，成为世人瞩目的建筑和中外人士瞻仰的场所。

人民英雄纪念碑碑题、碑文以阴文镌刻，以紫铜为胎，采用我国传统的镏金工艺做成金字镶嵌进去。

参与镏金的老工人说，碑文字体能保证 300 年不变颜色。

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于 1949 年 9 月 30 日晚举行闭幕式。

闭幕式由刚选出的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副主席朱德、刘少奇、宋庆龄、李济深、张澜、高岗主持。

当毛泽东主席和其他 6 位副主席登台时，怀仁堂里又响起了长时间的掌声。

毛泽东宣布闭幕式开始，朱德致闭幕词。

最后，全体代表起立，乐队奏国歌《义勇军进行曲》。

鲜艳的五星红旗在主席台上冉冉升起。

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在全体代表的共同努力下，胜利而圆满地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

中国这头睡狮就此醒来，即将向新时代挺进！



## 第九章 国名、国旗、国歌、国徽的诞生

国旗是新中国的第一幅图画。周恩来宴请长者确定国名。张奚若说：我看叫中华人民共和国好，曾联松仰望北斗设计国旗。徐悲鸿为定国歌彻夜难眠，新中国纪年决定采用公元，毛泽东说：“就是耶稣也不坏嘛。”

### 国名中要不要“民主”二字？

建立一个新政权，创建一个新国家，首要问题之一就是，这个国家叫什么名？

在新政协筹委会组织条例中，就已提到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方案。

在历时五天的会议中，无人对国名提出不同看法。直到最后一天讨论最后一份文件时，张奚若先生提出了质疑。

当时任清华大学教授的张奚若先生说“有几位老先生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名字太长，他们说应去掉民主二字，我看叫中华人民共和国好。有人民就可以不要民主二字，焉有人民而不民主哉？且民主一词 Democracy 来自希腊字，原意与人民相同。去掉民主二字从下面的解释也是很容易明白的：是共和而非专制，是民主而非君主，是人民而非布尔乔亚的国家。

雷洁琼发言说，如果国名大长，用时不用全称即得注明是简称。

黄炎培和张念让两位先生就国名问题发表了系统意见，被整理成书面报告，打印 30 份，抄送新政协筹委会主任、副主任、委员和各组长，他们认为：

我国国名似可将原拟中华人民共和国改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简称中华民国或中华民主国。将来进入社会主义阶段即可改称中华社会主义民主国。他们觉得民族和共和无并列之必要。汉语使用共和国一词纯系翻译西文列坡勃立克，这个词与共和二字在我国经典上的原意并无关系。西文一字当初并非不可译为民主国。因为西文的德漠克拉西与列坡勃立克的字面含义原无根本区别。不过前者指民主的政治体制，而后者指民主的国家。这个意见与张奚若先生的意见大同小异。

第四小组把关于国名的意见归纳了三种名称，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董必武关于草拟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的经过及其基本内容有一个报告。他说，第一次小组会广泛交换了意见，因为没有准备，没有参考资料，有漫谈的性质。于是推举张志让等 7 人先准备一个讨论提纲，以便小组全体会上讨论时，可获得若干基本的共同意见。第二次小组会时按提纲起草委员会所提“政府组织法中的基本问题”进行讨论，基本意见趋于一致，有些意见留待起草委员会去斟酌。然后，公推董必武等人起草政府组织法的初步草案。第三次小组会议通过，做文字修改后，提交新政协筹备会作了原则的通过，准备提交政协大会讨论。

关于组织法草案的总纲，董必武说，国家名称问题，本来过去写文章或讲演，许多人都用中华人民共和国；黄炎培、张志让两先生曾写过一个节略，主张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在第四小组第二次全体会议讨论中，张奚若先生以为用中华人民民主国，不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我们现在采用了最后这个名称，因为共和国说明了我们的国体，“人民”二字在今天新民主主义的中国是指工、农、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四个阶级的人，它有确定的解释，

这已经把人民民主专政的意思表达出来，不必再把“民主”二字重复一次了。

政协代表提案第四案是由马叙伦、陈叔通、郭沫若、沙千里、沈雁冰、谭平山、梁希、许德珩、吴耀宗提出来的。

为提议统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名，取消共同纲领和组织法中简称中华民国，另由政府以法令规定。提案请大会公决。

他们的理由是这次新政协筹委会所通过的国名——中华人民共和国，确能代表中国人民革命伟大胜利后实行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及人民。这一个中国历史上划时代的大变革，必须把旧民主时代遗留下来的、本质上不同的；并且为汉奸卖国贼用过的在中国人民中间已没有一点好感的“中华民国”四个字，毫无保留地取消。

否则，在将来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也就是中央人民政府成立的时候，喊起口号来，就会有两种称呼，把已经走向死亡道路的旧中华民国再喊万岁，人民显然是不可接受的。

因此，大多数人提议，主张统一国名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把简称“中华民国”几个字在中国人民政协所有的文件中一律予以取消。

1949年9月25日深夜，司徒美堂收到一封由周恩来和林伯渠联名相邀的午宴请柬，上面写着：“九月二十六日上午十一时半在东交民巷六国饭店举行午宴，并商讨重要问题，务请出席。”

二三十位七旬老翁接到了同样的请柬。

待老人们陆续到达之后，作为东道主的周恩来开门见山他说：“今天请来赴宴的，大多是辛亥革命时期的老前辈。我们国家有句古话，叫做‘就教长者’，今天的会就是专门听取长者的发

“各位在讨论三大文件时，都看见了共同纲领中的国号中华人民共和国之下有一个简称中华民国的括弧。关于这个简称，有两种不同意见，有的说好，有的说不必要。常委会特地叫我来请教老前辈，看看有何高见。老前辈对中华民国这四个字，也许还有旧感情。”

第一位发言的是黄炎培，他曾在江南乡试中举，也曾加入过中国同盟会，参加了辛亥革命和反对袁世凯窃国的斗争。他认为，由于中国老百姓落后，感情上惯用中华民国，一旦改掉，会反感。留个简称，是必要的。稍停，他又补充说，政协会议三年一届，三年后，我们再来除掉，并无不可。

接着，廖仲恺的夫人何香凝老人说，中华民国是孙中山先生革命的一个成果，那是用许多烈士的鲜血换来的。关于改国号问题，我个人认为，如能照旧，用它是好的。如果大家不赞成，我就不坚持自己的意见了。

第三位发言者是辛亥革命后隐居了38年、生平不写民国国号的前清进士周致祥。他说，我反对简称什么中华民国，这是一个祸国殃民的、群众对它深恶痛绝的名称，20多年来已被蒋介石弄得不堪言状了。我主张就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表示两次革命的性质各不相同。

这时，司徒美堂站起来说：“我没有什么学问，我是参加辛亥革命的人，我尊重孙中山先生，但对于中华民国这四个字绝无好感。理由是中华民国与民无涉，多年来被蒋介石与CC派弄得天怒人怨，真是痛心疾首。我们试问，共产党所领导的这次革命是不是跟辛亥革命不同？”

“如果大家都认为不同，那么我们的国号应该叫中华人民共和国，抛掉又臭又坏的中华民国的臭招牌。这国号是一个极其庄严的事情，一改就要改好，为什么要三年以后才改？常道，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令不行。仍

然叫中华民国，何以昭告天下百姓？我们好像偷偷摸摸似的，革命胜利了，连国号也不敢改。我坚决反对什么简称，我坚决主张光明正大地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司徒美堂语音响亮，听者报以热烈的掌声。

人口学家马寅初立即表示拥护司徒美堂的意见，他补充说，简称实在不伦不类。

教育学家车向忱又从教育群众的方面阐述了司徒美堂的观点，说人民一时不能接受的问题，只是宣传教育的事。慢慢地教育，让人民认识我们这个革命的政权的性质，万万不可因噎废食。

张澜和既当过清末翰林又曾留学日本的陈叔通也发表了去掉“中华民国”的意见。

沈钧儒从法律观点解释了简称问题：有些群众还在写中华民国，那是他们的一时之便，我们也不必明令禁止。至于堂堂的政协会议三大文件里加上简称中华民国的括弧，这的确是法律上的一个大漏洞，万万不可如此。遍观世界各国的国号，只有字母的缩写，而没有载之于立国文件上的其他简称。如果一定写上，那么将来在行文上用国家名义与别国订约也不方便。所以我主张不用那个简称。

爱国华侨陈嘉庚操着浓重的厦门话说，大家对中华民国绝无好感。当然，落后的人一时不习惯，过些时候就好了。

最后周恩来说，我要把这些意见综合送主席团常委参考，并由主席团常委作出最后决定。

9月27日，政协一届全体会议第六天的记录写道：简称“中华民国”一去掉，不等于把中华民国过去革命的历史意义一笔抹煞。如辛亥革命、国共合作等都是它的历史意义的。这一点在毛泽东开幕辞中也讲过。同时，“中华民国”这名称，因为在民间已很习惯，所以在目前，也不会禁止使用。在人民中还允许有这样的称呼，正如现在我们所用的阳历，同样也不禁止人民用阴历。其次我们用公元纪年，同样也不禁止用三十八年。慢慢地引导人民在公文上用统一的国名，统一的公元的年号，最好在正式文件上不要有这样的一个法律性的规定。

以后，政协一次会议陆续通过的大会文件，去掉了“中华民国”这四个字。

## 国旗、国徽、国歌大征集

国内各大报都刊登了征集国旗、国徽、国歌、纪年、国都等方案的启事。

1949年6月15日，中国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在北平召开。第二天，周恩来主持召开了筹备会常委会第一次会议。会议决定在常委会领导下设立6个小组。其中第六小组任务是研究草拟国旗、国徽、国歌、纪年、国都等方案，由著名教育家、中国民主促进会负责人马叙伦先生任组长，北平军管会主任叶剑英同志任副组长，不久又增加茅盾任副组长，主持日常工作，成员有张奚若、田汉、马寅初、郑振铎、郭沫若、翦伯赞、钱三强、蔡畅、李立三、张澜、陈嘉庚、欧阳予倩、廖承志等16人。

7月4日下午3时，在中南海勤政殿第一会议室，叶剑英主持召开了第六小组第一次会议。会议决定：（1）以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名义公开向全国人民发表启事，征集对国旗、国徽、国歌的意见和方案，并推选郭沫若、

沈雁冰、郑振铎 3 人草拟征集条例呈送筹委会批准公布。(2) 设立国旗、国徽方案评选委员会及国歌词、谱评选委员会，除组员分别参加外，聘请专家为两组委员。会中推选叶剑英、廖承志、李立三、郑振铎、张奚若、蔡畅、田汉、剪伯赞 8 人组成国旗、国徽初选委员会，叶剑英为召集人。推选郭沫若、田汉、沈雁冰、钱三强、欧阳予倩 5 人组成歌词、谱初选委员会，郭沫若为召集人。

会后拟的征集启事，经周恩来审批，7 月 10 日送交政协筹委常委会批准，7 月 14 日送《人民日报》、《北平解放报》、《新民报》、《大众日报》、《光明日报》、《进步日报》、《天津日报》，从 7 月 15 日至 26 日连续刊登 8 天。

征集启事如下：

一、国旗，应注意：(甲) 中国特征(如地理、民族、历史、文化等)；(乙) 政权特征(工人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丙) 形式为长方形，长阔三与二之比。以庄严简洁为主；(丁) 色彩以红为主，可用其他配色。

二、国徽，应注意：(甲) 中国特征；(乙) 政权特征；(丙) 形式庄严富丽。

三、国歌，(甲) 歌词应注意：(1) 中国特征；(2) 政权特征；(3) 新民主主义；(4) 新中国之远景；(5) 限用语体，不宜过长。(乙) 歌谱于歌词选定后再行征求，但应征国歌歌词者亦可同时附以乐谱(须用五线谱)。

四、应征国旗、国徽图案者须附详细之文字说明。

五、截止日期：八月二十日。

六、收件地点：北平本会。

如此大规模地在报纸上征集国旗、国徽、国歌，不但在中国历史上，就是在世界历史上，可能也是第一次。

征集启事发出后，在全国人民和海外华侨中引起热烈反响。从工厂、矿山到田野，从闹市到前线，工人、农民、战士、教师……都在热烈地谈论这则启事。

国旗、国徽、国歌，象征着国家的主权，是国家的几个主要标志。

许多人在得到征集国旗、国徽、国歌的消息后，立即开始动手，在工余时间着手设计构思。

### 曾联松彻夜设计五星红旗国旗

整个中国都在为征集方案而运转起来。

在成千上万个应征者中，上海一位默默无闻地长期在经济战线工作的人士，脱颖而出，成为国旗的设计者。

他叫曾联松，祖籍浙江再晏。少年时代就喜爱书画，并写得一手好楷体字。

在目睹自己的祖国被外国列强欺凌，人民生活痛苦悲惨之后，他放弃了自己的艺术爱好，去攻读理工科，走上科学救国的道路。后来，他感到原来

的设想难以实现，又改行攻读经济。

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后，曾联松与许多热血青年一起，走上街头，举行游行，抵制日货。1935年，他在南京勇敢地参加了响应北平“一二·九”学生运动的集会游行。从此，他在党组织的教育和引导下，开始走上革命道路。

1949年7月下旬，曾联松反复阅读了报刊登载的国旗、国徽、国歌征集启事，心里再次激起波澜。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人民大众当家作主的新中国即将诞生了，中国历史将翻开崭新一页。国旗、国徽、国歌，是新中国的象征，是中华儿女的寄托，是中国人民的骄傲。

反复思考之后，他决定投身这一具有伟大意义的设计工作中去，用自己灵巧的双手，设计出一副国旗图样，表达自己热爱新中国的心愿。

曾联松苦苦地思考着，一种想法产生了，随即又觉得不合适而放弃，接下来脑子又紧张运转，思考新的方案。

国旗应征日期截止于8月20日，时间一天天过去，曾联松着急了。

夏末的一个夜晚，曾联松一个人走出家门，漫步在大上海街头。

他无意间抬头仰视天空，只见群星闪耀，众星朝着北斗。

突然，一个念头出现在曾联松的脑海里：人们不是常说“盼星星，盼月亮”吗？中国共产党难道不是人民的大救星吗？

对！曾联松兴奋地跑回家中，决定以一颗大五角星象征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以几颗小星象征广大人民，大星引导于前，小星环绕于后，如同众星拱北斗，象征着人民大众紧紧围绕在共产党的周围，从胜利走向胜利。

他又仔细体会了征集启事的要求，按自己的想法，把五角星设计为黄色，这不仅与象征革命的红色很协调，像红霞一片，金光灿灿，色彩简单而显庄重，而且也表达中华儿女黄色人种的民族特征。

色彩确定了，那么环绕大五角星之后的小星应该是几颗呢？

曾联松想到，伟大祖国有着5000多年的辉煌历史和灿烂文化，又想起不久前毛泽东刚发表的《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的论述，即人民在当时包括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于是，他决定以四颗小星象征广大人民。为了突出广大人民紧紧地团结在中国共产党周围，曾联松又决定让每个小星的中心点都通过自己的一个星尖，跟大星的中心点联成一线，这样，就在旗面上显示出中国共产党是全中国人民的领导核心这一历史结论。

那么，五颗金星放在旗面上的什么位置呢？

曾联松开始设想把大星置于旗面的正中，小星环绕在大星的四周。

这种设计看上去旗面显得端庄，但给人的视觉显得呆滞，旗面不开阔。

曾联松很快放弃了这种方案。

他苦苦构思，反复推敲。

时间一天天过去，距截止应征的时间已很近了。

经过了许多不眠之夜，终于在一天晚上，他把五星挪向旗面的左上方，顿感旗面视野开阔，五个金星居高临下，光彩闪耀，使人仿佛置身于星光照耀大地、灿烂辉煌的情景中。

不但如此，五颗金星的结合图形，大小相配，疏密相间，很自然地形成椭圆形。这与中国疆土的几何图形很类似。这样，既体现了中国的地理特征，也显得明朗开阔，兼有恢宏的气势。

在设计过程中，曾联松又不断完善，把大星的一个角尖正向上方，使大星显得庄重安然，四颗小星由于各有一个角尖正对着大星中央，显得错落多变。色彩以红色为底，如同红霞满天。红色象征革命，表现炽热的情感。再配以黄色，显得灿烂光明。

曾联松设计的这幅国旗图案，涵义深远，极具特色。从艺术美学的角度来衡量，有几个特点：

简与繁：五星的构图注意了以简胜繁，以一当十。

大与小：五个金星所形成的椭圆形，寓涵着祖国疆土之意。画面尽管有限，但给人的联想是十分广阔的，做到了古人所描述的“物小蕴大，意趣无穷”。

静与动：五星整个位置若处于旗面的中央，由于绝对均衡，则显得静止呆滞，无动态之感；而置于左上角，从视觉原理看，使人感到昂然起升，静中寓动，使画面活跃，且居高临下，带有向外伸展的气势，视野开阔。

长与宽：曾联松的设想，完全符合“征集启事”的规走，即“开式为长方形，长宽三与二之比”。这种长方形的旗面适合美感的要求。旗面呈长方形，五星组成椭圆形，两者均向左右舒展，取势协调。椭圆形给人以完整与饱满的感觉。在椭圆形中，大星外圆半径和小星外圆半径的比例是三与一之比，使大小比例关系比较协调。大星和小星之间隔有一定的距离和空间，显得虚实结合。

另外，椭圆形仅占旗面的四分之一左右，这样的比例关系使重点集中，旗面开朗。整个旗面上的五角星、椭圆形和长方形互相结合，比例比较协调，构图也比较紧凑，在整体中富于变化，同时又显得统一。

主与宾：五星中的大星与小星，有顾盼呼应协调和谐之态。

红与黄：整个旗面上的色彩也能引起人们的联想和感情的反应。红色为热色或暖色，赤日、红光能表达庄严热的气氛。红色能给人以希望、活跃和喜爱。而黄色也是暖色，能表达优美、温和、珍贵，给人以金光闪闪的感觉。

曾联松设计的这幅国旗图案，给人以多层次、多角度的美感享受，蕴意深刻，生动活泼。

1949年8月中旬，曾联松将自己精心设计的五星红旗图案稿寄给了新政协筹备会。

国旗，在人们的心目，是一个国家直观的象征，所以应征稿件众多，截止日期，已达2992幅。

## 国旗方案之争

在众多的政协代表中，华侨代表陈嘉庚十分关心国旗评选一事。

国民党政府统治时期，他出于爱国之心，积极提出关于设计国旗的建议。

1940年他回国慰问抗日军民之时，就请专家为国民党政府设计了新的国旗方案，印了100多张带到重庆。到重庆后，他看到国民党政府官员傲气专横的态度，心里凉了半截。

当新中国即将诞生的时候，他更关心国旗的设计了。他自愿报名参加了筹备会第六小组的工作。

1949年8月，他从东北参观考察回北平后，专门向筹备会第六小组成员

了解了国旗图案设计的征集情况。

第六小组秘书彭光涵专门向他汇报了第六小组征稿和工作情况。

陈嘉庚说：“我是非常关心国旗制作的。辛亥革命胜利后，孙中山在南京就职，用五色国旗，代表汉满蒙回藏五族，共和立国之义。到蒋介石国民党政府，却把青天白日党旗当国旗，这是我最不满意的。1940年，我到重庆向国民党官员说过，但他们不接受建议。”

接着，他详细谈了自己制作国旗的观点，并把自己设计的国旗图案托彭光涵交第六小组成员和专家研究。

9月17日，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召开第二次会议，就第六小组的工作作出决议：将国旗、国徽、国歌工作移交新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主席团领导。

9月22日，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决议，成立大会国旗、国歌、国徽、国都、纪年方案审查委员会，并委任55人为审查委员，由马叙伦为召集人，彭光涵任审查委员会秘书。

当天，彭光涵将经过大家复选的38幅国旗图案编为一册，取名《国旗图案参考资料》，作为最急件送到新华印刷厂赶印。

新华印刷厂的工程师、技术员和工人连夜加班加点，印出了《国旗图案参考资料》，每幅图上都编了号和草拟的简单说明。其中上海曾联松设计的国旗图案被编为“复字三十二号”，草拟的说明是大五角星代表中国共产党，周围四个小五角星代表工、农、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

9月23日，新政协全体代表600多人分为11个小组讨论国旗、国徽、国歌等方案，平均每组约50至60人。

各小组的讨论都热烈而认真。

但各位代表对原筹备会第六小组挑选的国旗参考图案的看法和评价不一样，选择的图案也下不一致。

开始，代表们倾向于曾联松设计的“复字三十二号”五星红旗的图案，但又觉得四颗小星代表四个阶级的提法不太妥当。

随后，对旗帜上方有一颗大五角星的复字一号图案，中间加一条黄杠代表黄河的复字四号和加两条黄杠代表黄河、长江的复字三号图案，倾向的人增多。但是，反对的人也有一些，而且态度十分坚决。因为当时南方一些地方尚待解放，国旗上带有黄杠，就没有体现祖国统一。

新政协将在9月30日闭幕，意见又不一致，时间显得特别紧。

彭光涵十分着急，他把各小组争论的情况写了个请示报告，交给周恩来。

9月23日晚上，副秘书长齐燕铭和秘书彭光涵正在办公室工作。周恩来来到他们的办公室，问彭光涵：“你接触了那么多国旗图案，到底哪个图案代表意见比较一致？”

彭光涵回答：“一颗大五角星加一条黄杠的图案同意意见较多，但反对的意见也不少，而且很坚决，即使勉强通过了，意见一定很大。大家比较倾向‘复字三十二号’这个五星红旗图案，但有人不赞成用四个五角星代表四个阶级。总的看，五星红旗的图案比较好，容易通过。”

周恩来听了彭光涵的汇报，立即指示：“好！你按这个图案再画一幅大一点的，并做一面大旗明天下午交给我。”

当晚，彭光涵就按周恩来的指示操办起来。

9月25日晚8时，毛泽东、周恩来在中南海丰泽园主持召开关于国旗、

国歌的座谈会。

在毛泽东主持这次座谈会之前，张治中来到毛泽东的住处。交谈中，张治中间毛泽东：“现在大家都在议论国旗图案，你的意见呢？”

毛泽东说：“我同意一颗大五角星加一条黄河的那种，你觉得怎样？”

张治中明确回答：“我反对用这种国旗图案。中间加一条横杠，把红旗劈为两半，不成了分裂国家了吗？而且杠子不能代表河流，在中国人的传统意识中，杠子是‘金箍棒’，国旗中间摆上一根‘金箍棒’干嘛？”

毛泽东听后，感到震惊，也觉得有道理。他说：“这是一个严重问题。不过，不少人主张用这幅，也有其理由。这样吧，我再找几个人座谈一下。”

在9月25日晚的座谈会上，毛泽东说：“过去，我们脑子里老是想要在国旗上标出中国的特征，因此画一条横杠代表黄河。其实，不少国家的国旗也没有带着本国的特征，苏联的斧头镰刀，也不一定代表苏联特征，哪一国都可以有同样的斧头镰刀。英、美等国的国旗也没有什么该国的特征。代表国家特征的东西可以在国徽上表现出来。”

毛泽东拿起一张放大的五星红旗图，说：“大家都说这个图案好，中国革命的胜利就是在共产党领导下以工农为基础，团结了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共同斗争取得的，这是中国革命的历史事实。今后还要共同努力建设社会主义。我看这个图案反映了中国革命的实际，表现了我国革命人民大团结。不但现在要团结，将来也要团结，我看这个图案是较好的图案。”

毛泽东话音刚落，丰泽园里响起热烈的掌声，参加座谈会的代表一致表示赞同。

陈嘉庚站起来谈自己的看法。他说：“我从东北回来，我很关心国旗问题，我完全赞同毛主席讲的‘复字三十二号’国旗图案。”

梁思成也站起来发言说：“我觉得‘复字三十二号’图案很好，多星代表人民大团结，红色代表革命，表示革命人民大团结。”

其他人也纷纷发言赞成“复字三十二号”图案，并鼓掌通过。

曾联松设计的国旗图案，终于以其构思和特色获得大家的认可和推崇。

9月26日下午3时，大会国旗、国徽、国歌、纪年方案审查委员会在北京饭店召开了第一次全体会议。经过大家讨论，一致通过用“复字三十二号”图案作国旗，并提交大会主席团审该，再提交大会讨论。

9月27日，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进行表决。

表决前，由沈雁冰报告了筹备会第六小组讨论国旗的情况，并将制作的五星红旗样品展挂在主席台中间。

看到这面熠熠生辉的五星红旗，代表们心里充满了兴奋和激动之情。

会议进行的第四项表决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为红地五星旗，象征中国人民大团结。

“复字三十二号”国旗图案，终于迎来了激动人心的一刻！

曾联松设计的国旗图案原稿，后来存入政协档案室。

“复字三十二号”图案真正用于国旗制作时，也作了一点修改。

原设计中，大五星中有镰刀斧头，经筹备会第六小组讨论删去。秘书彭光涵在原稿上写有“去镰刀斧头”五个字。图案其他部分未作修改。

关于国旗象征的说明，按毛泽东的讲话记录进行了改写。

至于国旗制法的说明，原稿显得很复杂，周恩来便指示胡乔木、梁思成和彭光涵三人重新写一个制法说明，做到使人一看制法图说明就能制作标准



国旗。

三人讨论后，即由梁思成改写，胡乔木修改定稿。经审查通过后，向全国发出。

在筹备会第六小组成员和专家们中，徐悲鸿、梁思成、翦伯赞、陈嘉庚、张奚若等建议：在国旗制定之后，全国的国旗制作要严肃认真，要规定哪一号颜色，将来由国家指定专门工厂统一生产国旗用的红布，就叫“国旗红”。

陈嘉庚还提议：“应该由国家指定某些工厂专门生产统一规格的国旗。因为手工制作不合标准，又困难，并且比工厂印制的价格要贵。现在虽然不能立即办到，希望将来即可办到。”

国旗图案通过后，周恩来说：关于评选国旗图案，实行公开广泛征集的做法好，所选的国旗方案艺术性比较好，大家也很满意。虽然在讨论中有些争论，但最后大家意见统一了。

关于国旗图案意义的说明，新华社以答读者问的形式于11月15日公开发表：

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的旗面为什么是红色的？旗上的五颗五角星代表什么？为什么星是黄色的？四颗小五角星为什么有一个角尖正对着大五角星的中心点？

答：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旗面的红色象征革命，旗上的五颗五角星及其相互关系象征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人民大团结，五角星用黄色是为着在红地上显出光明，黄色较白色明亮美丽，四颗小五角星各有一尖正对着大星的中心点，这是表示围绕着一个中心而团结，在形式上也显得紧凑美观。……

五星红旗确实显得美丽庄严。一星居中，众星闪烁，普照大地，让人一望便产生人民团结、国家昌盛、革命胜利自豪感。

政协第一次全体会议闭幕后不久，曾联松收到中央人民政府办公厅的来信：

曾联松先生：

你所设计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业已采用，兹赠送人民政府纪念刊一册，人民币五百万元（旧币，相当于现在500元），作为酬谢你对国家的贡献……

次年国庆节，曾联松被邀请登上天安门观礼台。建国30年时，他再一次应邀到北京参加了庆祝活动。

如今，这面象征中国的旗帜不仅使中国人民感到自豪，它也成为国家的象征，飘扬在联合国广场，飘扬在与中国有外交关系的世界每个国家。

### 国徽设计者得到了800斤小米

1950年6月，集体创作的国徽图案得以通过。

国徽，也是一个国家特征的重要表现。

在征集过程中，新政协筹备会共收到国徽稿件112件，图案900幅。

然而，许多投稿者把国徽完全误为国标，因此投稿者绘的都是和国旗一

样的国家标记的所谓国徽图案。

合乎国徽体制的来稿，其中又有图案意味太重、过于纤巧的毛病，比较可供参考选择者只有四五种。于是，征集小组认为国徽非近期内能完成。

朱德总司令请秘书送来了一份他亲自画的国徽草稿，底边四条黄色曲线代表黄河、长江、珠江、黑龙江，上面飘扬着一面红旗，左上方一颗黄星。

政协筹备委员会常委会在解释之前提出了包括国徽图案在内的初步意见，并未做出决定。只是把报告连同附图一齐移交政协一次会议。

会下征求意见，人们普遍认为国徽距离中国特征、政权特征以及庄严等的形式较远。

毛泽东说，国旗决定了，国徽是否可以慢一点？

于是，国徽没有提交政协大会讨论。由原小组继续设计，等将来由政府去裁决。

受中央之托，中央美院的前身国立北平美专成立了国徽设计小组，由张仃、张光宇、周令钊和钟灵4人组成。

张仃和钟灵曾设计了新中国第一套纪念邮票，还设计了政协会议的会徽。

政协会徽是由麦穗齿轮围成的圆形图案，粉红色的中国地图凸现在半个地球上，代表四面八方的四面红旗飘动，上方印有一九四九的字样。这枚政协会徽一直沿用至今。

周恩来很关心国徽的制图情况。为了不误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个国庆节使用，周恩来指示征集小组多吸收一些专家来共同设计国徽。

于是，清华大学营建系也成立了国徽设计组。组长由梁启超先生的儿子、营建系主任梁思成亲自挂帅。组员有建筑学家林徽因、画家李宗津、中国建筑专家莫宗江、建筑设计教师朱畅中、汪国瑜、胡允敬、张昌龄以及研究中国古建筑的学者罗哲文等。按政协国旗、国徽审查小组提出的要求及各界人士提出的意见，并比较了所有的设计方案，两个国徽图案设计组最后确定国徽图案的内容：齿轮麦稻穗五星授带组成大团结的意象；天安门作为国徽的主体表示民族精神。麦稻穗进入国徽还有一个众口皆碑的故事。1942年重庆的冬天，宋庆龄为欢送董必武返回延安，在她的寓所里举办一个隆重而简朴的茶话会，周恩来夫妇应邀到会。宋庆龄特意在茶巢上摆上了两串近郊农民送来的金灿灿的禾穗。“它如金子一般。”有人赞美说。“它比真金宝贵。中国人口中百分之八十是农民，如果年年五谷丰登，人民便可以丰衣足食了。”宋庆龄说。

周恩来抚摸着禾穗，说：“等到国家回到人民手里，我们要把这束金禾画到国徽上。”

两个设计组经过半年努力，参考了我国古代的铜镜、玉璧、玉环等礼仪文物的装饰纹样及工艺效果，又借鉴了各国的国徽图案，各自拿出了一幅最满意的画稿。

两幅草图大同小异，但双方各抒己见，都认为自己的好。

清华大学设计组以建筑师为主，他们设计的天安门是纯粹写实的正立面建筑构图。天安门端端正正地放在国徽中轴线上。中央美院设计组是由美术家组成的，思维呈浪漫型。他们把天安门的大屋顶设计成大斜角。

双方互不退让。

周恩来把两组人员召集起来开了一个会，让他们搞一个统一方案，作为

他们共同设计的。

最后的定稿图以清华大学设计组的方案为主。出现在国徽正中央的是一幅天安门的写实像。

清华设计组还从中国特征这一要求出发，在图案的色彩上使用金红两色。红色喜庆，金色富丽。中央美院的五色土被否定了。1950年6月2日晚，全国政协国徽审查小组最后一次讨论了国徽方案。周恩来主持了讨论。

周恩来认真听取了审查小组全体成员的汇报，又按李四光、张奚若、邵力子等绝大多数委员的意见，最终把国徽确定下来。

6月28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召开第八次会议，讨论通过了政协一届二次会议所提出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图案及对设计图的说明》。

通过的国徽图案是集体智慧的结晶，兼具三个方面的特征：（一）形式和色彩庄严而富丽。

（二）以国旗和天安门为主要内容：国旗既可表示革命和工人阶级领导政权的意义，亦可省写国名；天安门则象征五四运动以来人民的政治斗争和在此宣告诞生的新中国，颇具“中国特色”。

（三）以齿轮和麦稻象征工农，麦稻并用，也寓含着地广物博之意；以缓带紧结齿轮和麦稻象征工农联盟。

国徽图案一经确定，两个设计小组的成员都得到了份稿酬——800斤小米，随后，他们将这份稿酬如数捐给了国家。

开国大典前夕政务院召集各方面专家学者开会讨论国徽图案时，参加国徽设计工作的高庄说，我有一种愿望，就是要使我们的国徽更庄严、更明朗、更健康、更坚强、更程式化、更统一，并赋予更高的民族气魄和时代精神，以冀我们的国徽艺术性达到国际水平，永放光芒。

一年后，平面图变为立体模型的任务交给了高庄。

高庄教授在工艺美术方面造诣根深，木刻和素描很有功力，深得美术大师徐悲鸿先生的赞赏。

高庄本着对国徽的理解，对平面国徽草图进行了仔细研究，发现一些不足之处。如，原图中稻麦杆向外弯曲，比较杂乱，红绶带也理不清来龙去脉，城墙显得不正。高庄认为，组成国徽的素材是由中央集体定了的，如何利用这些素材组成图案，并由它来表现精神形象和艺术效果，则完全看艺术家个体发挥。

高庄赋予稻麦刚柔不同的性格，并且分行并列向上，以此象征中华民族的团结和蒸蒸日上。红绶带改成有规律的穿插与天安门城墙相呼应，给人坚强安定之感。经过高庄修改过的国徽，更庄严、更自然、更美观。

高庄又买了大量的参考资料和一尊佛像、几方秦汉铜镜作为参考。做好国徽的石膏模型后，便把模型和平面图放在一起，让人们评论，不断修改，以求臻于完美。

如今，凝结着无数人心血和智慧的国徽同样成为国家的象征，高悬于天安门、新华门，以及所有代表国家权力的场合。

## 国都定在哪里

首都是一个国家的政治中心，一个新政权建立之后，要首先考虑的问题之一，就是自己的首脑机关设在哪里。

国都的方案，其实大家心里都有数。毛泽东在西柏坡时，就同意了王稼祥定都北平的建议——

1949年元旦刚过，冬天的太阳照耀着西柏坡，整个村庄呈现出暖融融的气氛。从各个根据地来的人不断地到此看望毛泽东，毛泽东也十分乐意接待这些客人，他认为是了解情况，推动全国工作的大好机会。于是，他那座土墙围成的小院里客人络绎不绝。

刚送走了徐向前，小院里又走来了文质彬彬的王稼祥。

王稼祥一进屋，毛泽东立刻起身相迎，十分热情地说：“稼祥，来来来，快坐下，今日我有件大事要向你讨教。”说完递上一支烟，解释道：“这是正宗美国货，骆驼牌，陈毅同志送来的，是战利品。陈毅同志说，美国人不远万里，飘洋过海送到中国，又承蒋介石转送给我们，盛情难却，不抽对不起人喽。”二人同时开怀大笑。

王稼祥给毛泽东点上烟，接着点燃自己的烟。

王稼祥是位知识分子型的革命家，一双聪慧的大眼睛在镜片后一闪一闪，漾出一丝笑意，他专注地望着毛泽东。

“稼祥呀，我现在总在考虑，今后我军作战，夺取敌人的大城市已成为重要的目的，我主张能和平解放的，尽量和平解放，这可是一个大问题呀。”

王稼祥当时担任中共东北局城市工作部部长，毛泽东与他主要是谈城市问题。

“主席考虑得很对，和平解放大城市，意义很重大，不仅能迅速瓦解国民党政权，而且能保护大量工商业，为我们建国后经济建设做准备。”

毛泽东点点头说：“还有一层意义，就是避免中国人流更多的血，中国人民为了自己的解放事业流的血实在太多了。”

“我刚才同徐向前同志谈山西作战问题，看看能不能找到和平解放太原的办法，徐向前同志说，阎锡山很顽固，我们曾采取多种方式争取和平解放太原，还动员阎锡山的老师进太原，做说服工作，结果阎锡山竟不顾师生情谊，把这位八十多岁的老秀才杀了。”说到此，毛泽东的脸色沉下来。

“阎锡山这么顽固，看来太原不打不行了。”王稼祥的声调也有些沉重。

“我想如果全国有一半，或者一半以上的城市和地区能够和平解放，那就会大大减少牺牲……好了，今天我们先不谈这个问题。刚才我说了，正有一件大事要向你讨教呢。”说完毛泽东又点燃一支烟。

王稼祥笑了。

“我们很快要取得全国的胜利了，我想听听你的意见，我们的政府定都何处？”毛泽东说完，抽了几口烟。“历史上，历朝把京城不是定在西安，就是开封，要不就是南京、北平。我们的首都定在哪里最合适呢？中央虽有个考虑，但还没有最后定案。”

王稼祥神情一下子变得严肃起来，他沉思片刻，说：“是不是定在北平？”

毛泽东大感兴趣地说：“噢，谈谈你的理由。”

“依我看，现在国民党的首都南京，虽然自古称虎踞龙盘，地理险要，但是只要翻开历史就会知道，凡建都金陵的王朝，包括国民党都是短命的。这样讲，带有历史宿命论的色彩，我们是共产党人，当然不相信这一套。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看，南京离东南沿海太近，从当前的国际形势看，这是

它的很大缺陷，我们定都，当然不能选在南京。”

毛泽东默默点头。

王稼祥又接着说：“再看西安，它的缺陷是太偏西。现在不是秦汉隋唐时代了，今天中国经济中心是在东部沿海和江南，由此看，西安也不适合。

“黄河沿岸的开封、洛阳等古都，因中原经济落后，而且这种局面不是短期内能够改观的，加之交通以及黄河的水患等问题，也失去了作为京都的地位。

“因此，我认为首都最理想地点是北平。北平位于沿海地区，属于经济发达圈内，而且扼守连结东北与关内的咽喉地带，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可谓今日中国的命脉之所在。同时，它靠近苏蒙，无战争之忧，虽然离海近，但渤海是中国内海，有辽宁、山东两个半岛拱卫，战略上十分安全，一旦国际上有事，不至京师震动。此外，北平是明清两代五百年帝都，从人民群众的心理上，也乐意接受。考虑到这些有利条件，我的意见，我们政府的首都，应选在北平。”

毛泽东听完，哈哈大笑，说：“稼祥，你的分析，正合我意。看来，我们的首都，就定在北平了。蒋介石的政权基础是官僚资本，因此定都南京。我们的政权基础是人民群众，因此我们定都北平。不过，北平现在还在傅作义手中哩。”

王稼祥兴奋地说：“我们的胜利，比预想的要快，我相信，我们很快就会进北平的。”

确立国都，是开国过程中头一件需要解决的大事。

北平雄踞于广阔的华北大平原北端，位于北纬 39 度 56 分和东经 116 度 20 分。

古人形容北平雄伟的地理形势是“北倚山险”，“南控江淮”，“右拥太行”，“左环沧海”。

北平山川富丽，气候宜人。东、北、西三面群山环绕，东南为北平平原。地势西北高耸，东南低缓。城中心的天安门广场海拔 44.4 米。全市最高处为灵山，海拔 2303 米；最低处为通县柴厂屯一带，海拔 8 米。

北平属中纬度暖温带，具有典型温带大陆性季风气候特点。一年四季分明，春季干燥多风，夏季炎热多雨，秋季天高气爽，是一年中最好的季节，冬季寒冷少雪但天气晴朗。

北平不但有众多的文物建筑，而且是文化中心。解放之初，仍有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燕京大学等一批著名的高等学府。

北平和平解放后，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华北局和华北人民政府等首脑机关迁至京城，参与筹备新政协的代表也绝大多数会聚于此。

从这种种条件考虑，新政协筹备会第六小组和专家顾问一致同意北平改北京，作为新中国的首都。

9 月 27 日，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在审议讨论了第六小组关于国都的意见后，一致举手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定都于北平，并从当天开始正式改北平为北京。

北京重立力国都，开始了辉煌而崭新的历史！

毛泽东风趣地说：就是耶稣也不坏嘛

新中国一建立，无可回避地涉及到如何纪年的问题。

关于纪年，筹备会第六小组成员和专家们在讨论和座谈时意见分歧较大。

有人说：采用中华人民共和国纪元。

有人主张：从孙中山建立中华民国开始。

还有人提议：从几千年前黄帝即位开始。

经过一番查阅，发现世界上采用本国纪年的只是少数国家，绝大多数国家采用公元纪年。

经过反复讨论，大家一致同意采用公元纪年，因为这是国际上通用的纪年，既统一，用起来也方便，而且各解放区早就开始使用公元纪年了。

9月25日晚，毛泽东、周恩来在中南海丰泽园召开协商国旗、国歌等问题会议时，大多数人表示同意用公元纪年，但有人反对：“我们采用公元为纪年，老百姓也可能同时采用其他纪年。”

毛泽东发言说：“老百姓要用其他纪年，我们也没有办法。我们不能制定法律去处罚他们。

“过去用中华民国年，老百姓用甲子年，他们学会用了。但是，我们的政府还是要有个决定：采用哪个年号。”

黄炎培发言说：“我同意毛主席的意见。有人说采用公元纪年是以耶稣降生之年为纪元，是基督教国家的年号。据我们调查了解，其实许多非信仰基督教的国家也采用以公元为纪年。现在公元纪年已成为国际习惯通用的年号。少数国家采用本国纪元，但在行文写到本国纪年时，常常还要加注公元多少年，麻烦得很。”

听了黄炎培的话，毛泽东风趣而幽默地插话道：“就是耶稣也不坏嘛！耶稣和今天某些国家借推行基督教进行帝国主义侵略并不一样。”

会上讨论热烈，大家一致鼓掌同意采用世界公元为新中国纪年。

9月27日，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正式表决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纪年采用公元，本年为1949年。

### 徐悲鸿为确定国歌彻夜难眠

世界上每一个主权国家都有自己的国歌。它是一个国家和民族民众共同心声的表达和共同意志的体现，能起到统一人们思想、激发民族爱国情感、催人奋进的巨大作用。但创作或确定能代表一个国家全体民众共同心声的国歌是相当不易的。

在筹备新中国的过程中，确定国歌也经历了一番曲折过程。

新政协筹备会的征稿启事发出后，收到了来自全国各地和海外华侨的国歌歌词、歌谱694首，其中有筹备会成员如郭沫若、马叙伦、欧阳予倩、冯至、柯仲平等知名人士的作品。

第六小组在评审国歌时，选了一部分歌词、歌谱印发给大家，对有的歌谱还组织乐队进行演奏。

遗憾的是，征集来的歌词、歌谱都不太理想。

在讨论时，大家认为在短时间内创作出理想的国歌词、谱是困难的。

商议的结果，倾向于在国歌未制定以前，以《义勇军进行曲》为国歌。

最早建议用《义勇军进行曲》代作国歌的人便是著名画家徐悲鸿。

新政协筹备会党委会接到的马叙伦和沈雁冰关于国歌选评情况的报告称：“经本组慎重研讨，认为国歌征集之稿，足以应选者尚少。必须再有计划地征集一次，将选取者制曲试演，向群众中广求反应后再行提请决定，非最近时期可以完成。”

然而，没有国歌的开国典礼，至少会使大典的气氛和人们的心情受到影响。常委们十分着急。

毛泽东亲自去到勤政殿，召集常委成员、第六小组成员和有关专家顾问以及各界人士座谈国歌之事。

座谈会一开始，出现冷场，无人发言。

大家都在思考。

国歌既要有大众性，又必须具有庄严性，如此雅俗共赏的歌曲创作实属不易。而且，国歌是代表一个国家，尤其是代表人民当家做主的新中国的歌。

身材瘦弱的徐悲鸿站起来说：“用《义勇军进行曲》代国歌怎么样？”

在去中南海开座谈会之前，徐悲鸿已经为国歌的事情几度夜难安寐，辗转反侧了。他对夫人廖静文说：“我准备建议用《义勇军进行曲》作为代国歌。”

“那怎么可以，歌词里不是有一句‘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这不好吧？”廖静文说。

“你知道法国的《马赛曲》吗？那就是一支很悲壮的歌曲。”徐悲鸿在法国巴黎留学期间，对这首法国国歌印象根深。他为廖静文唱了一遍：

前进！前进！祖国的儿郎，  
那光荣的时刻已来临！  
专制暴政在压迫着我们，  
我们的祖国鲜血遍地，  
我们的祖国鲜血遍地。  
你可知道部凶狠的兵士，  
到处在残杀人民，  
他们从你的怀抱里，  
杀死你的妻子和儿女。  
公民们，武装起来！  
公民们，投入战斗！  
前进前进！万众一心  
把敌人消灭净……

“你看，这歌词的味道和《义勇军进行曲》差不多呢。”徐悲鸿说，“抗日战争中《义勇军进行曲》唤起了千千万万的中华儿女。今天，它仍将鼓舞人民以昂扬的精神继续前进。”

廖静文终于点了点头。

徐悲鸿的建议立即得到周恩来的响应。周恩来发言说，这支歌曲雄壮豪迈，有革命气概而且节奏鲜明，适于演奏。

建筑学家梁思成说，我记得在美国时，有一次上街，听见有人用口哨吹《义勇军进行曲》，回头一看，原来是一个美国青年。这说明这支歌受到很多人的喜爱。我看就这支歌吧。

刚从国外回来的宗教界代表刘良模说：“国歌是一个国家的歌，它的产生应该有历史背景，如法国的马赛曲，还有国际歌。这些歌曲在法国大革命、苏联十月革命中唤起了广大人民。《义勇军进行曲》产生于抗战时期，唤起民众向日本侵略者进行了保卫祖国的神圣战斗。还有，这支歌可以用来纪念中国新音乐运动的创始人聂耳。另外，在国际间这支歌也建立了它的地位。兄弟在美国，同美国最勇敢的黑人歌手罗伯逊见面时，他说他爱唱《义勇军进行曲》。美国的中学生、小学生从广播电台和电影中学会了这支歌，无论在娱乐场所还是朋友间都唱。罗伯逊问，这是不是你们的国歌？我说，不是，我们的国歌是丧歌。当然，那是指国民党时期。这样看，《义勇军进行曲》在国际上确已建立起伟大的历史地位。按一个歌曲本身讲，好坏不靠几位音乐专家评判，而是需要广大人民去下判断。《义勇军进行曲》在国内国外人民中博得了一定的颂扬，所以按它本身价值，也应采用作国歌。歌词可以按新的国内外情况编拟，这是兄弟本着在国外作宣传工作的经验，提供的一点意见。兄弟希望能采用聂耳的歌谱，歌词另拟。”

但也有人表示不同意见，认为新中国即将成立了，中华民族已经作为一个伟大的民族屹立在世界东方，而这首歌当中还有“到了最危险的时候”这样的句子，是不是过时了？

周恩来回答说：这首歌在历史上起过巨大的作用，尽管现在新中国成立了，但今后还可能有战争，还要居安思危啊。

在座人士一个接一个表态同意《义勇军进行曲》作为代国歌。

最后，毛泽东总结说：“既然大家都认为《义勇军进行曲》作国歌最好，我看就这样定下来吧。歌词不要改。‘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这句歌词过时了吗？我看没有。我国人民经过艰苦斗争终于胜利了，但是还是受春帝国主义的包围，不能忘记帝国主义对我们的压迫。我们要争取中国完全独立解放，还要进行艰苦卓绝的斗争，所以，还是原词好。”

大家对毛泽东的讲话以鼓掌表示同意。

接着，毛泽东综合了座谈会上众人的意见，宣布通过了徐悲鸿的建议。

这首在仓促中写在香烟衬纸上的歌词和聂耳的谱曲同样受到了政协一届代表的喜爱，全体代表一致同意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歌未正式制定之前，以《义勇军进行曲》为代国歌。

《义勇军进行曲》诞生在血与火的年代。

“七·七”事变后，日本侵略者的铁蹄践踏到肥沃的华北平原，中华民族危在旦夕。共产党员田汉为了躲避搜捕，搬到上海法租界。他发现音乐界的一些人，或写靡靡之音，或写艺术歌曲，仿佛生存在桃花源中。也有一些人写救亡歌曲，但因为思想感情的原因，这些歌曲无力在民众中流传。

田汉决定要写一些能唤起民众、鼓舞人民斗志的歌曲。此时，他正在为上海电通影业公司编写《风云儿女》的梗概。这是一部以抗日救亡为主题的电影，反映了国民党统治区知识分子从苦闷、彷徨中勇敢走向抗日前线的事迹。剧本着重描写了从东北流亡到上海的男青年的遭遇。田汉为影片的主人公诗人辛白华设计了一节诗稿：

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  
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  
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



每个人被迫着发出最后的吼声，  
起来，起来，起来，  
我们万众一心，  
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

田汉写出歌词不久，就被投入铁窗之中。夏衍接手他未完的剧作，把梗概改编成电影，歌词交给共产党员聂耳。

正在华联公司搞音乐的聂耳和田汉既是同志又是朋友，而且田汉是聂耳的入党介绍人。他们常在一起谈论国事，并多次合作歌曲。

聂耳拿到田汉歌词的时候，也得到敌人即将逮捕他的消息，上海地下党决定让聂耳出国暂避一段。出国前，聂耳连夜突击拿出了曲谱。这支歌的每个音符都充满了强烈的战斗气氛，铿锵有力，浑然一体。前奏曲像嘹亮的进军号，连着三个“起来”，把音调推向高潮。结尾不但坚定有力，而且有绕梁不绝之感。

1935年7月，田汉由南京宪兵司令部获释出狱的当天，适逢《风云儿女》首映式。作为电影主题歌的《义勇军进行曲》第一次问世。但曲作者聂耳再也听不到这支昂扬向上的进行曲了。年仅24岁的聂耳，不幸殁于日本藤泽市海滨的波涛中。《义勇军进行曲》成为他的绝唱。

然而，这支歌很快唱遍了上海，随着“一二·九”运动的兴起，又唱遍烽火遍野的中国大地。

美国朋友斯雷尔·爱泼斯坦写过一篇题为《反抗的歌声》，谈他30年代在天津，第一次听到人们演唱《义勇军进行曲》的动人场面。大约是1938年5月，他路过天津青年会堂体育馆时，远远听到一阵有力的歌声，原来是天津青年会的秘书刘良模在教普通老百姓唱《义勇军进行曲》。爱泼斯坦觉得，歌曲的每一句都是一个口号。他在文中写道：“这种类型的歌曲只要听到一次就会终生难忘。它的急促而充满胜利的信心的词句，像是一位紧张得喉咙沙哑的指挥员在战斗打响之前作动员报告。”

聂耳死后，郭沫若亲笔手书“人民音乐家聂耳之墓”，并撰写墓志铭，全文是：“聂耳同志，中国革命之号角、人民解放之鼙鼓也，其所谱《义勇军进行曲》已被选为代用国歌。闻其声莫不油然而兴爱国之思，壮然而宏志士之志，毅然而趣于共同之鹄的。聂耳乎，巍巍然其与民族并寿而永垂不朽乎！”

1959年，上海电影制片厂拍摄《聂耳》时，结尾处理为聂耳站在甲板上，轮船向远方航行。周恩来看完样片，建议结尾改成群众在天安门广场边行进边唱《义勇军进行曲》的镜头。周恩来说，应该唱到天安门。

艺术的各门类是相通的，徐悲鸿不仅凭艺术感觉，更凭他一生中的磨难，真正认识了《义勇军进行曲》这首非凡的歌曲。开国大典时，徐悲鸿作为政协代表登上了天安门城楼，听到了那庄严的乐曲。

4年后徐悲鸿病逝。他当然不会知道他提议的代国歌在1978年五届人大一次会议通过修改国歌歌词。全国人大许多代表、宪法修改委员会许多委员和各界人士都建议恢复国歌原词。

五届人大五次会议通过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的决议，恢复《义勇军进行曲》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昂扬的歌曲响彻山川湖滨。天安门城楼前，每天迎着曙光都要升起庄严

的国旗，响起雄壮的国歌。它早已成为全中国人民奋进的号角，与中国的民族精神浑然凝为一体！

## 第十章 载入史册的大典

1949年10月1日下午3时，毛泽东从容地登上天安门的一百级台阶，宣告一个共和国的诞生。“首都兵团”受命举行阅兵式，朱德担任阅兵司令。此时北京垃圾遍地，全城清扫垃圾20万吨。天安门也重新美容，巨型宫灯出自两位日本人之手。开国大典之际，秘书忽然发现毛泽东的代表证丢了。陈毅面对万众欢呼，感叹不枉此生。

### 周恩来终于决定在天安门广场举行开国大典阅兵式

北京城南起永定门，北至钟鼓楼，在长达7800米的中轴线上的中段，有一座广场和城楼。它是老北京城的中心地点和市区街道的枢纽，这便是天安门广场和天安门城楼。

天安门广场北端的天安门城楼，坐北朝南，古朴壮丽，气势宏伟。从结构上看，它与我国古代其他城楼一样，都是由台、楼两部分组成。但是，它的规模与气势之大，堪称天下第一。

城楼竖立于城台上，西部分加在一起高达35米。

巨大的红色圆柱，金黄色的琉璃瓦，空飞檐，成排斗拱与金龙等多种图案彩绘。天安门前有金水河，河上的七座石桥由汉白玉构筑而成，河畔有石狮两对。

辛亥革命推翻清王朝后，天安门前的宫廷广场这块禁地被冲开，成为贯通东西两城的交通中心。广场以南正阳门的瓮城被拆除，并开辟了东西侧城上的出入口，便利了从墙城直达天安门广场的交通。

于是，天安门广场的中心地位显得更加突出，成为北京城广大群众举行政治集会的主要场所。

1919年5月4日，轰轰烈烈的“五·四”爱国运动在这里爆发；

1926年3月18日，北京群众在这里举行了反对北洋军阀段祺瑞的斗争；

1935年12月9日，震动全国的“一二·九”抗日爱国运动在这里燃起熊熊烈火；

解放战争时期，北平的反饥饿反内战反美军暴行的学生运动，也以天安门为中心。

1949年6月初的一天，一辆军用吉普车驶到了中南海周恩来办公室门前。

从车上走下来一位英武刚毅的高级军事指挥员，他便是华北人民解放军二十兵团司令员杨成武。

正与华北军区司令员聂荣臻交谈的周恩来，见杨成武来到，马上起身与他亲切握手、并向他简要询问了部队的情况。接着，又对二十兵团的任务作了安排。

周恩来说：“你们二十兵团的任务，就是保卫北平、天津以及所处的渤海湾方向，准备随时粉碎敌人的袭击。”

周恩来又兴奋地对杨成武说：“我们很快就要召开全国政治协商会议，要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共和国的首都将要定在北平，北平以后叫北京。你们二十兵团的任务，就是保卫人民国家的首都。这很光荣，很重要。”

杨成武认真记下了周恩来的指示。

聂荣臻也指示说：“你们尽快部署，尽快拟订出防御计划，然后我们再向周副主席作一次汇报。”

离开中南海，杨成武立即与政委李天焕研究具体部署，给驻扎在山西大同的部队发出东进的命令。

很快，二十兵团部队进驻到渤海湾一线，警卫着平、津、秦（皇岛）、唐（山）、塘（沽）等地。

就这样，二十兵团以后被人们称为“首都兵团”。

1949年“七·一”过后，中共中央成立了以周恩来为主任，彭真、聂荣臻、林伯渠、李维汉等人为副主任的开国大典筹备委员会，拟定的开国大典方案包括三个大项目：

-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典礼；
- （二）中国人民解放军阅兵仪式；
- （三）人民群众游行活动。

朱德总司令兼任阅兵司令员。聂荣臻代总参谋长任阅兵总指挥，杨成武、唐延杰（华北军区司令部参谋长）、唐永健（华北军区司令部作战处处长）、刘仁（中共北京市委副书记）、肖明（北京市总工会主席）、肖松（共青团北京市委书记）等人为副总指挥。下设阅兵指挥所，杨成武兼任指挥所主任，唐延杰兼任副主任。

杨成武与唐延杰受命后，着手进行的第一项工作，就是在中央军委的直接指导下，主持起草《阅兵典礼方案》。

方案很快拿出来了，内容包括受阅部队的选调、编组，阅兵程序，阅兵礼乐以及受阅前的训练等。

阅兵式分为检阅式和分列式两个部分。

检阅式是指受阅部队在静止状态下，接受阅兵司令员的检阅；分列式则是指受阅部队在行进状态下，接受党和国家领导人、各界人民代表的检阅。

《阅兵典礼方案》拟出后，毛泽东、朱德、周恩来、任弼时等中央领导人，在中南海怀仁堂接见了负责阅兵事宜的有关人员。他们听取了聂荣臻关于阅兵仪式的基本设想，还有杨成武对阅兵方案中主要内容的汇报。

在座的中央领导人先后作了指示。

阅兵典礼方案顺利通过，开国阅兵的地点，却考虑了一段时间。

华北军区司令部拟定了两套阅兵方案。

第一方案，是天安门广场举行，受阅部队成检阅式队列立于天安门东西两侧。第二方案，是在西苑机场阅兵。两套方案均附有一张部队位置及阅兵行进路线的详图。

天安门阅兵的优点是：它地处市中心，领袖、军队和群众水乳交融，场面可以搞得轰轰烈烈。最主要的是阅兵台可采用天然地形——天安门城楼，上面可容纳全体政协委员，而且天安门周围的公路四通八达，容易集中分散。阅兵结束后，军队可以迅速从市区消失。

但天安门阅兵也有缺陷，那就是当日的城市交通要断绝四小时以上，而且长安街根本不能按照正规阅兵行进分列式，只能允许横排通过步兵的十二路纵队、骑兵的三路纵队和装甲车的两路纵队。

西苑机场阅兵则可避开天安门的缺陷，那里跑道宽，没有阻断交通的后顾之忧。但是，在此阅兵的不妥之处是没有检阅台，要举行开国盛会就必须

搭三两个坚固高大的看台，工程大，而且场面无论如何赶不上天安门壮观。另外，西苑机场距市区较远，数十万群众来回困难，不易参加。

从华北军区上送的报告中可以看出，论证者的天平明显倾斜于第一方案。

开国大典的日子一天一天接近，周恩来权衡再三，终于下决心，他用毛笔签署了意见：

毛主席、总司令、少奇同志阅：

日期在闭幕后政府成立之日。阅兵地点以天安门前为好，时间到时再定。检门指挥员由聂（荣臻）担任，阅兵司令员请朱德同志担任。

周 九、二

刘少奇在这份意见的自己名下画了一个松子般的圆圈，毛泽东和朱德只是口头上听取了周恩来的说明。

于是，开国大典的场地就这么定了下来。

### 天安门的鸽粪袋了几大卡车

早在天安门被确定为阅兵仪式的地点之前，对天安门城楼及广场的清理和修饰工作就已经开始。

首先是垃圾清扫工作。

刚解放时，北平城里不少地方垃圾成山，据估计，市区堆存的垃圾多达60多万吨。

当接管人员来到天安门前时，只见高高的城楼显得十分破旧，杂草在风中摇曳，一群野鸽子扑啦啦地在城楼上飞着。通向城楼的石梯，堆积着一层厚厚的、已经风干的鸽子粪，人踩上去，一股霉臭味扑鼻而来。

垃圾，不但阻塞了交通，也污染了空气和环境，损害了人民的健康。

1949年3月，市政府号召党、政、军、民、学、商各界，成立清运委员会。市长叶剑英在清运会上动员说：“清运工作，即为为人民服务。人民政府除了使人民的生活有保障，并且有机会把肥运到郊外，还要保证减少人民的死亡率。”

于是，全市开展了大规模的清运工作。

1949年3月24日至4月18日，为清户、清巷阶段。

4月26日至6月30日，为清除储运场及大街和重点地区。

前后历时91天，共清除垃圾29280公方，折合重量为201638吨。

北京市清运垃圾的运动，一直延续到1949年底，终于彻底将市区各户屋内、房顶、院落、寺角打扫得干干净净。

天安门广场和城楼的垃圾清扫干净后，随之而来的是对城楼进行整修。

北平解放时，天安门城楼已年久失修，一派破旧不堪的样子。朱红色的墙皮，在大自然神力的侵蚀下，一片一片地脱掉，如同一个全身长满了烂疮的病人。瓦缝间长着一簇簇狗尾巴草，门楼堞上丛生着荆棘。

1949年8月9日至14日，北平市第一届各界代表会议召开。会议通过了修整天安门的决议。

修整工程包括：在天安门前东西三座门之间，清除地面障碍物，开辟一

个能容纳 6 万人的大广场；修缮天安门城楼作为主席台，安装 22.5 米高的电力控制大旗杆一座；补修沥青石潭路面 1626 平方米。此外，还要进行植树，种花、种草等绿化美化工作。

这项工程工期短、任务急。

在市委、市政府的领导下，在各方面的密切配合下，一个能容纳近 20 万人的广场开辟出来了。

天安门城楼油漆一新。

沥青石潭路面铺好了。

花、草、绿树也种上了。

北京城和天安门以其崭新的姿态，迎接着新中国的诞生。

### 八盏巨型宫灯出自两位日本艺术家之手

1949 年 9 月 30 日，北京一家大报这样报道说：“天安门城楼顶上金碧辉煌，栋梁也粉刷一新，栋梁中间分悬着 8 个巨大的红灯。”

实际上，这篇现场报道叙述得很不够。

在天安门城楼上悬吊着的八盏大红宫灯，每一盏都至少需要 3 个大人环抱才能搂抱过来。每盏宫灯在飘荡的黄色流苏衬映下，显得十分红人。

但人们却很难想到，这八盏宫灯的设计竟出自两位日本艺术家之手。

当时，城楼的布置装饰任务是由华北军区政治部宣传部负责的。宣传部长张致祥亲自到天安门考察了一番，又把这项任务的设计工作交给华北军区政治部文工团的舞美队。

这个文工团的前身是晋察冀军区的抗敌剧社，建国后改名为战友文工团。

舞美队长苏凡从张致祥部长那里接受任务时，距开国大典只有 20 多天的时间了。张致祥感到时间很累，问苏凡有什么困难。苏凡却似乎早有准备，成竹在胸。原来他手下有两个“才子”。他们都是日本人，一个叫肖野、40 多岁，一个叫森茂，才 30 岁。他们都是日本美术专科学校毕业的学生。

张致祥和苏凡拿出大皮尺测量着天安门的各种数据，肖野和森茂用心构思。为保证设计的准确性，两位日本艺术家提出要亲自测量一下。

天安门里面的西厢房，成了肖野和森茂的设计室。各种数据资料都堆积在这里。

不久，两位日本艺术家设计出 20 幅各式各样的绘画草图。

张致祥把它们连夜亲自送到周恩来办公室。

深夜的灯光下，周恩来一眼就看中了 8 盏太阳般宫灯的设计，眉宇间露出赞美的表情。张致祥心中悬着的一块石头顿时落地。

周恩来拿起笔，在设计图上对一些局部地方作了些删改。他一边抹去金水桥栏上扎满彩球的设计，一边对张致祥说：“把城楼突出表现出来就行了，其他地方不要搞得大花哨。大会会场的设计，一定要保持一种既喜庆欢乐又严肃庄重的气氛。”

八个大红宫灯一经确定，周恩来要求在庆祝大会前两天张挂起来。

然而要找这么巨大的宫灯却不是易事，北平城压根没有见过这么大的宫灯。

只剩 10 天了。张致祥急得直上火。

年长的肖野冷静地想了想，说：“北平城里不是有做宫灯的吗？找一个扎灯艺人来，我们自己干。”

这话提醒了苏凡。

明清两代的京都云集了全国各地的能工巧匠，尤其是结扎宫灯的技术堪称绝活。故宫的档案里，对这些精湛的手艺人都有详细记载。

舞美队长苏凡直奔故宫。

故宫的工作人员大都是留用的，他们很愿意为解放军做些事情。但是一听宫灯的尺寸，他们都连连摇头。

最后他们又找到了一个70多岁的老艺人。

老艺人第一次见到如此大胆如此豪放的设计图。他一言不发地到天安门城楼上转了三圈儿。

“你们知道，这么大的宫灯我这辈子别说做，见也没见过。让我做可以，不过有个条件你们要答应。”老艺人不慌不忙地说。

苏凡爽快地点头。

“这几个宫灯，我可以找我的徒弟来一块儿做。但是，这么巨大的宫灯做成了也抬不上去，因此，只能在天安门城楼上做。”老人一口气说完后便望着苏凡。

苏凡一口答应下来。

于是，老艺人叫来他的两个徒弟，又招呼苏凡去买绿竹、红布、黑钉、黄穗。两位日本美术家便负责美化宫灯的云头和制做黄金般的流苏。

整整三天三夜，老艺人和日本朋友没下城楼一步。

张致祥每天都爬上城楼转几圈，看着一天比一天多的一米高的大宫灯，他舒了一口气，脸上堆满笑容。

离庆祝大会还有一天，八个大宫灯竣工了。

张致祥调来一队战士，搬来几架梯子，折腾了好一阵，才把它们送到十根廊柱之间。

但是，小小的钉子不能固定沉重的灯身，肖野扭头望望粗胖的灯宠，又抬头望望几枚小钉子，有了主意。

“把灯拴在横梁上，两旁砸两个铁环辅助一下就行了。”

众人七手八脚地帮助宫灯各就各位。

大会筹委会决定美术组留一个负责人在天安门上值班，城楼上已布置就绪，要保证不出问题。苏凡自告奋勇留下了。

那时，苏凡与著名演员田华新婚不久，为了守候那八盏蕴含着美好传说的宫灯，他填好了审查表，呈报市公安局批准、领回了天安门城楼的出入证。

周恩来对这八盏推陈出新、既有民间风味又有宫廷式华丽的大红宫灯特别满意。

开国大典那一天，肖野和森茂站在广场上，向站在天安门城楼上的苏凡使劲挥手。苏凡高举两个胳膊，向他的两位日本朋友致敬。

事隔20多年后的1972年，田华出访日本，还特意去拜访了肖野和森茂两位老战友，田华是抗敌剧社的老演员，年轻的一代从他们热烈的交谈中第一次听到天安门的故事。

从此，田华夫妇与两位日本美术家鸿雁传书，像亲戚一样越走越近。

两位老人十分怀念中国。森茂看完《骆驼祥子》，说：“又回到熟悉的者地方了，西直门、西四白塔、胡同、四合院……”在北京的日子又活在他

的脑海中。

1977年，森茂怀着无限的思念给苏凡夫妇写了一封信。

亲爱的想念的苏凡、田华先生：

你们好！去年十一月刚刚见到田华，然而一月八日又收到你给我们的来信，后天可能是会见汪洋！真想不到，我感到非常高兴！

我平常忧虑着你们的祖国变化大大，痛苦的事情很多。这次得到你们的好消息，我的不安解消而放了心！

虽然已经过去了二十七年的日子，你给我们信里说的那样亲热，我深深地感谢你们。我一夜睡不着，因为过去的事情一切好像走马灯似地走来走去，而感动得流泪！与你们老朋友般一起过日子的光景，好像电影一样照出来！回忆到往事，或紧张或愉快。多么有意义的生活！我这已经是六十六岁的老头儿，我平常对我妻子和女儿说，我的生涯中最幸福最有价值的时间，比得过高贵的宝石！但是我那时候，工作上、生活上、态度上不大好，所以你领导上挂了多多的麻烦，对不起你们了。可是我决不能忘，思想上、工作上你们那高高烈烈的火焰，坚决地战斗精神，我必须学习你们。

壮阔美丽的天安门大宫灯的红光，在我脑子里还在不断地往来往来……

森茂盼望再有机会去中国。

肖野也写了一封信。他说：“我们的战斗友谊在世界上是稀有的，它是超时间的友谊，时间是无法计算我们的友情的。但是二十七年的时间还是显得太长了。”

田华从日本访问回国后，聂荣臻元帅邀请田华夫妇来家中做客。苏凡和田华把肖野和森茂的情况告诉了聂帅。苏凡说：“人家为我们开国大典立下了汗马功劳，我们应当表示感谢，能不能请两位日本朋友来一下。”

“你们写个报告，我批给王炳南。”军委副主席聂荣臻同意了。

王炳南当时是对外文委的负责人，主持日常工作。

苏凡和田华左商量右商量，觉得难以下笔。“我们两个算什么，怎么能起草邀请报告？”以后，苏凡又把这事几与原北影厂长汪洋谈过，也与战友文工团的老团长刘佳谈过。但是重返中国对于两位日本老人来说，无论财力无论体力都不能支持。

生活总是存在着遗憾。

### 开国大典的《入场须知》

在开国大典的方案中，既有阅兵典礼，也有群众队伍游行。随着大典的一天天临近，军队在加紧训练，参加大会游行的群众也演练了几次。

第一次演练时，几十万人聚集在天安门。由于夜晚光线很弱，虽然广场已安装了三排24盏普通灯，围墙的几个门洞也装上了吊灯和马灯，甚至还有探照灯，但几十万人一练，队形很快就乱了套，人与人乱挤在一起，谁也无法找到自己的位置。

担任阅兵总指挥的聂荣臻看到这种局面，对负责组织群众游行的肖松说：“这样太乱了，不行，还要另想办法才行。”

肖松感到图纸上设计的队形只能纸上谈兵，拿来一用就乱。于是有人出了个主意：用石灰浆规划场地，编上号码，确定哪支队伍站在哪一号，按号



入座。

从此，天安门广场上的方砖都编上了号码。

为了游行时指挥的便利，广场上设有三个学生分指挥站、三个工人分指挥站和一个市民分指挥站。各站都有电话通向总指挥部。

大会总指挥部则设在天安门前面的东侧。

在天安门西侧则专门设有学生机关工人联合分指挥部。

整个会场的指挥系统十分严密。

参加游行的各单位还推选出领队一人，副领队若干人。领队和副领队的左臂上佩带着红色袖章。

领队还要填一张简单的表格，写上单位名称，参加大会的人数和领队本人的姓名，在进入会场时，把表格交给人口指挥部。

经统计，参加开国大典的人达30万。

为了保证这30万人在广场上能秩序井然，有条不紊，总指挥部制订了一份《入场须知》，共规定了5条，应当说考虑得很周到了。

然而，考虑得再周到的事往往也会有疏漏之处。

北平第一任市委书记彭真在考虑开国大典群众游行问题时，发现了一个漏洞。

那是在开国大典前夕，天安门城楼上的休息厅里正在召开一个各方代表大会，讨论参加庆祝的各单位人数、成几路队形等问题，也研究了入场须知。

会议快结束时；彭真突然提出一个问题：“如果游行队伍走过天安门后，在西三座门那里散了摊子，怎么处理？”

大家一听彭真的话，真感到这是一个大问题，如果前面的人把路堵死了，后面的人走不动，都拥挤在天安门，岂不把整个开国大典弄得乱了套了吗？

这时，彭真打了个手势，说：“我们应该这么办，即在东西两侧三座门要分别派人把守。特别是西三座门，要派责任心强的人。队伍一出西三座门，就要督促他们跑步疏散。”

彭真讲完后，立即把这个任务交给华北军区司令部参谋长唐延杰。唐延杰则委派作训处副处长王文治带一个参谋去承担此项任务。

开国大典那天，果然发生了彭真所预料的情况。因事先有准备，队伍没有出现混乱。

### 这成了越南国旗嘛，赶快去拆下来

10月1日凌晨，已是一夜未睡的周恩来敲开了值班室的门，想再了解一下开国大典的准备工作情况。

突然惊醒的值班员睁着一双惺松的眼睛，没有把一个问题讲清楚。

周恩来看到值班员的这副神态，皱皱眉头，没再说什么，抓起电话直接打到天安门城楼，口气很严肃。

天刚蒙蒙亮，周恩来又登上天安门城楼，见是苏凡在上面值班。他问了苏凡几句话，又在城楼上转了一圈，然后走下石阶，来到天安门广场，从远处观察天安门城楼布置的效果。

突然，周恩来问工作人员：“城楼上挂的哪国国旗？”

工作人员愣住了，一时不知如何回答。

周恩来说：“这成了越南国旗嘛，你们赶快去拆下来。”

原来，天安门城楼的正面休息厅用了八面缕空的大屏风装点门面。日本美术家肖野觉得原来的背景封建气味太明显，就设计出一套方案，把主席台背后的八面大屏风用大木框罩住其中六面，只留中间两面当门。大木框正中放一颗金色大五星，用20匹红布显出长方形光芒。

周恩来审查过这个设计方案，但谁也没料到红布的光芒会融成一片。

景布好后，众人从近处看，连声称赞，没想到从远处看，因20匹红布的光大浓艳，给人的视觉是合成了一片红光，像一片红布中央缀着一颗五星，成了一面越南国旗。

周恩来主动承担责任说：“这是我的疏忽，不怪你们。”工作人员赶快跑上城楼，把木框拆了下来。

但是，当天报纸还按原来的样子进行了报道：“城楼正中有巨大金星，下面烘托了巨幅红布褶成的光芒，红黄交织。”

事实上，这个红黄交织的方案已经遭到否决，城楼上的装饰也拆掉了。

由于周恩来的细心，避免了可能在国际间造成的不良影响。

### 毛泽东的代表证丢了

1949年10月1日，这个在中国历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庄严日子，终于来到了。

中南海菊香书屋里的毛泽东，仍保留着上午休息、晚上通宵办公的生活习惯。

10月1日早上6点，天已大亮，毛泽东还在办公室俯案办公。这时，周恩来打电话到毛泽东的卫士值班室，关切地问：“主席睡觉了吗？”

正在值班的卫士长李银桥回答说：“还没有啊。”

周恩来在电话中急切地说：“你们要催促他休息么，下午2点还要开会，3点还要上天安门，你们要想办法劝他早些休息。”李银桥走进烟味很浓的毛泽东办公室，轻声地把周恩来讲的话报告给他，劝道：“主席，早点休息吧。”

毛泽东没有马上答应，直到把文件批阅完毕，才立起身子，走到院子里散步，活动一下筋骨。

10分钟后，毛泽东上床入睡，交待李银桥说：“下午1点钟叫我起床。”

下午1点，卫士们叫醒毛泽东，并准备好了毛泽东参加开国大典的礼服。

下午2时整，毛泽东步行来到勤政殿。

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张澜、李济深、宋庆龄等领导人和其他委员都已在此集合。

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召开。主席、副主席和各位委员宣布就职。会议一致决议：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接受《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为本政府的施政方针。

在这次会议上，51岁的周恩来被任命为新中国的第一任政府首脑——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长。

下午2时50分，中央人民政府主席、副主席和委员们分别上车。车队从勤政殿门口出发，出中南海东门，5分钟后便到了天安门城楼后面的空地上。

心情舒畅的代表们下车后，又说又笑，气氛很是热烈。毛泽东作为中央人民政府主席，走到最前面，朱德、刘少奇等依序跟上。

从楼下要爬 100 个石台阶，才能到达天安门城楼上。

毛泽东在卫士的搀扶下，沿着城楼西头的楼梯，一步一步地往上走。途中，毛泽东不时停下来，等着后边比他年纪大的领导人。

这时，毛泽东的秘书叶子龙突然发现，应该由毛泽东别在胸前的烫金红绸条找不到了。这红绸条就是代表证。

每位登上天安门的政协委员胸前都别有红绸条，上面印有佩带者的名字。毛泽东主席和其他六位副主席的红绸条上的名字是用金粉印上去的。

此时，各位副主席胸前的红绸条都端端正正地别着，而毛泽东胸前却是光光的。

开国大典专门请了苏联摄影师来拍彩色影片，如果出现毛泽东没有代表证的镜头，其政治影响可想而知。

叶子龙感到了问题的严重性。

叶子龙马上找到中南海布置科长钟灵，让他赶紧补一个代表证给主席戴上。

钟灵受命，立即跳上一辆吉普车，返回中南海的工作室，在一张红绸条上手写“毛泽东”三个仿宋字，又迅速给三个字喷上金粉。没等墨迹干透他就跳上汽车，赶到天安门城楼时，毛泽东已走了一大半台阶了。

钟灵二话没说，风风火火地跑了上去，把小绸条交给叶子龙。叶子龙急忙上前帮助毛泽东把绸条别在胸前。

如今出现在人们眼前的毛泽东在开国大典上的影片和照片，他胸前的红绸代表证非常醒目。很少有人知道，这是大典前的最后一刻才匆忙补戴上去的。

## 庄严时刻

重新别上代表证的毛泽东望着还未走完的台阶，禁不住思绪万千。

李自成甚至更远的陈胜、吴广，出现在他的眼前，中国农民起义，由轰轰烈烈到烟消云散。毛泽东一向认为，陈胜、吴广的失败，一是功成忘本，二是任用坏人，偏听偏信。

他又想到了曾取得成功的农民起义领袖刘邦。在西柏坡时，他曾向高级干部讲过刘邦得天下的典故。

汉高祖刘邦在洛阳南宫摆酒宴，席间叫诸将坦率直言，说说他为什么能得天下。大臣高起、王陵便说：“陛下使人攻城略地，因以与之，与天下同其利；项羽则不然，有功者害之，贤者疑之，此其未取天下之由也。”刘邦却说：“你们只知其一，不知其二。‘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夫不如子房（张良）；理国家，扶百姓，给晌饷，不绝粮道，夫不如萧何；连百万之众，战必胜，攻必取，夫不如韩信。三者皆人杰，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者也。’项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此所以为我禽（擒）也。”“善用者得天下”，毛泽东当然知道这一点。

毛泽东思虑重重地拾级而上，脚步很慢，也很沉重。古老的台阶已到了尽头，天安门广场的欢呼声一阵高过一阵。他微微一笑，迈上了最后一级台阶。

可以乘坐电梯的毛泽东一步一步走上了天安门城楼。

天安门广场上红旗飘扬，升国旗的仪式就要开始了，主持大会的林伯渠

大声宣布：

“请毛主席升旗。”这时，他身边的工作人员小声提醒着他。

“请毛主席升国旗。”林伯渠又大声宣布了一次，增补了一个“国”字。

接着，活筒里传出焦急的问话：“升旗的机关在哪里？在哪里？你说呢？”

天安门城楼上的人们不知道他们的自言自语通过转播电台扩散到空中，然后从全中国第一台打开的收音机里播放出来。中共领导人第一次在大城市举行声势浩大的庆典，还没有经验。

如果他们知道在他们西侧的露天转播台上，那灵敏的钢丝录音带会捕捉到他们小声的只言片语，他们一定会缄口不言。

终于到了那一个庄严的时刻。

毛泽东用力地按动了电钮。

巨大的国旗缓缓地升上天空，定格在 22 米高的白色铁杆上。

国旗顺利升上天空，大会指挥部办公室副主任唐水建深深地呼出了一口气，因为用电钮升旗的点子，是他想出来的。

在计划毛主席升旗问题的时候人们就想过，毛泽东不可能从天安门上走下来，一下一下地拉动绳子升旗；如由工作人员代升，又失去意义，第一面五星红旗应由中央人民政府的主席毛泽东亲手升起来。

可使用电钮升旗在中国还是第一次。

开国大典前一天夜里，寂静的天安门广场上，工作人员正在预演升旗。国旗慢慢地走到中途就不动了。那天晚上有点小风，但是任凭小风拍打，巨大的红旗仍飘扬不起来。

时间似乎凝固了。

猛然，有人醒悟起来。几个小时前，国旗的正南方，毛泽东主席铲下了第一锹土，为人民英雄纪念碑奠基。这面有灵气的国旗在它第一次升起时，自动在半旗位置上向先烈半旗致哀。

为防万一，举行开国大典之时，旗杆下站着几名工作人员，他们预备着：如果电钮失灵，就用人工把旗子送上去。

然而，国旗准确地到达了预定位置。

1949 年 10 月 2 日《人民日报》第一版上，登载着新华社记者李普采写的报道开国大典的文章。见报前，分管新华社的胡乔木审查了一遍，对李普说：“电钮升旗的那句，要加上一根电线连着的细节，否则虽然你懂我也懂，但有些读者可能不明白，这是怎么回事呢？”

于是，人们从《人民日报》上看到：“毛主席亲自开动有电线通往广场中央国旗旗杆的电钮，使这一面新国旗在新中国首都徐徐上升。”

那天 22 米的高空有些许微风。中央电影局的摄影师罗光达站在天安门中间的门洞处，连续拍摄了许多升旗的镜头。

1949 年 10 月 1 日下午 3 时整，丁一岚站在天安门城楼西侧的露天播音台前，用响亮的声音对着人民解说：

“参加大会的 30 万人民一齐肃立致敬，目视着人民祖国的庄严美丽的五星红旗徐徐升起。部队带队指挥员行举手礼，在队列中间的干部战士以及执行勤务的人员都肃然立正。”

诗一般的解说词，激动着亿万人民的心。之后，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收到无数的听众来信，没机会参加开国大典的人来信抱怨播音员讲得太少了。

他们不知道，大部分播音稿是新华社记者当场写成的。当时的国家出版局副局长梅益坐在城楼一个不显眼的角落里，一张一张地看稿子，认为没有问题的就当场送交播音员。有三两张稿子梅益请示了胡乔木，做了修改。观礼台上不少人也打开收音机，一边听解说一边看行进的队伍，解说错了怎么行。

现写现播，因此梅益尽管在天安门城楼上，但他连一限也没看游行队伍。40年后记者去采访他时，他说只记得不停地忙。

而播音员丁一岚对40年前的那一刻却记得很清楚。

离正式转播还有一小时，丁一岚与齐越就在麦克风前等候。那时没有录音棚，条件很简陋，他们在不知不觉中站了7个小时。

周总理很早就来了，他询问了每一个岗位上的准备情况。

“你们怎么样？”周总理问。

“总理放心，全准备好了。”丁一岚信心百倍。当时她参加播音已4年了。

丁一岚当播音员也是机遇。

在日本投降的前夕，晋察冀日报社接到朱德总司令下达反攻命令的新闻电讯稿。当时还没有广播电台，报社连夜组织宣传队去附近领导机关宣读。

那天晚上，没有星星，人们把秫秸点燃，举在手中，围着站在高脚架上的丁一岚。

“我的普通话不错，将来进城到广播电台工作吧。”丁一岚读完电稿，同志们跟她打趣，丁一岚便笑着说。

张家口解放后，丁一岚真的成了播音员，从那时到离休，她整整干了40年。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星星火炬”节目采制了一盘建国34周年升旗主题会的录音带。齐越和丁一岚都在升旗仪式上讲了话。

关于开国大典的解说，当时的文字稿一份也没留下，只有现场录音带保留了下来。

“大会全体人员，不要喊！注意！注意！注意！”

今天是首都全体各界民众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大会，现在准备开会。请中央人民政府秘书长林伯渠同志宣布开会。”

40年后的丁一岚，认为这段开场白很像聂帅的声音，但无把握。

为了对历史负责，丁一岚把这盘磁带捎给了聂帅办公室秘书周均伦，请他鉴别。周秘书在聂帅身边工作了儿十年，他只听了一遍，就肯定地说：“这段话是老总说的。”

周秘书还特意给丁一岚写了一封短信。

丁一岚同志：

感谢您赠送的邓拓同志墨宝，开国大典录音带的开头的一段话是聂帅讲的，肯定无疑。

敬祝冬安！

聂帅秘书周均伦  
一九八八年十二月五日

开国大典那天下午2点，丁一岚就见到了聂荣臻。丁一岚与邓拓结婚也是聂司令员批准的。邓拓在报告里说，自己长期参加革命，在生活中遇见丁一岚，相信我们能彼此支持，更好地为党工作。邓拓的结婚报告很生动，丁一岚一直精心保存着，却不想“文革”中邓拓第一个被揪出来，她只得把那张纸烧了。

邓拓自杀后，丁一岚并未丧失信心。他们全家被赶到一间平房里。当飞行员的儿子停飞，女儿也失学，一家人忧愤难当。

1978年底，“文革”中著名的“六十一人叛徒案”酝酿平反，丁一岚找到邓拓的老单位人民日报社，送交了申诉材料。

人民日报社把丁一岚的申诉材料登在内参上，中央政治局人手一份。政治局责成北京市委复查。在即将平反前夕，《人民日报》刊登了丁一岚回忆邓拓的文章。

40年的风风雨雨，使丁一岚非常珍视开国大典时她亲口播出的一段话：

“国旗已上升到旗杆的顶点，开始在人民首都的上空迎风招展。她象征着中国的历史已经走入一个新的时代。我们的国旗——五星红旗将永远飘扬在人民祖国的大地上。”

开国大典是一个新生国家迈出的第一步，当然要热烈隆重。为此，鸣放礼炮成为一项重要内容。

礼炮群坐落在前门一侧的南城墙根上，背向天安门。炮手们早就把炮搬来，并固定好了位置。

开国大典礼炮队是从华北军区炮兵中选出来的。

毛泽东说：“开国大典的礼炮要放28响。”

政协会上有人提出质疑。

毛泽东便叫大会筹委会的唐永建起草个说明，但毛泽东没具体说，唐永建也没多问。

唐永建觉得28响就是28响，没有问为什么。而毛泽东说鸣28响是有深刻含义的，因为中国共产党横空出世至今，刚满28岁。

28响礼炮是对28年党支的礼赞。报告送上去，毛泽东二话没说，签上他的大名，材料下发了。

开国大典礼炮队共由108门山炮组成，分为两组。所以习惯上说54门礼炮。

礼炮队的训练是很苦的，每位炮手和装填手都进行了强化训练。

鸣礼炮时，站在观礼台上的华北军区文工团团长刘佳与身边的几位代表兴致勃勃地数着礼炮。40年后他说，不够28响，有时两发之间的距离很远，有漏响的。

但负责组织礼炮工作的特种兵司令员高存信说，不可能漏响。瞎炮肯定有，但不可能54发炮弹一起哑巴。

礼炮队员们十分自豪，因为全中国全世界的人民都听到了他们代表新中国发出的呐喊。

## 巨人的声音

升旗和礼炮响过之后，毛泽东主席宣读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公告：

自蒋介石国民党反动政府背叛祖国，勾结帝国主义，发动反革命战争以来，全国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幸赖我人民解放军在全国人民援助之下，为保卫祖国的领土主权，为保卫人民的生命财产，为解除人民的痛苦和争取人民的权利，奋不顾身，英勇作战，得以消灭反动军队，推翻国民党政府的反动统治。现在人民解放战争业已取得基本的胜利，全国大多数人民业已获得解放。在此基础上，由全国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人民解放军、各地区、各民族、国外华侨及其他爱国民主分子的代表们所组成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业已集会，代表全国人民的意志，判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并决定北京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首都。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于本日在首都就职，一致决议：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的成立，接受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为本政府的施政方针，选举林伯渠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秘书长，任命周恩来为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长，毛泽东为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朱德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沈钧儒为中央人民政府最高人民法院院长，罗荣桓为中央人民政府最高人民检察署检察长，并责成他们从速组成各项政府机关，推动各项政府工作。同时决议：向各国政府宣布，本政府为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的唯一合法政府。凡愿遵守平等、互利及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等项原则的任何外国政府，本政府均愿与之建立外交关系。特此公告。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  
人民政府主席  
毛泽东  
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

公告宣读完毕，林伯渠秘书长宣布阅兵典礼开始。

阅兵式结束后，已是黄昏时分，天色暗了下来。

欢腾的群众游行队伍通过天安门前。

灯笼火把燃了起来，很快由星星点点变成一片灯海。整个广场和城楼下一片通明。

游行队伍分东西两个方向，向外行进。

呈现出五颜六色的游行队伍蜿蜒蜒蜒，交互环绕，像一幅巨大的活动的织锦，按自己的方向走出会场。游行的群众唱着歌，高喊着“毛主席万岁”的口号。

看着这壮观、热烈的场面，毛泽东脸上始终露着微笑，焕发出慈祥的光辉。

当游行群众喊“毛主席万岁”时，毛泽东情不自禁地面对麦克风高呼：“同志们万岁！”“人民万岁！”

已退场的群众发现他们心爱的领袖仍在他们之中，听到了领袖那亲切感人的话语，便改变了原来向东西分走的路线，潮水般涌向天安门，挤在金水桥上，狂热地、拼命地呼喊：

“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岁！”……

毛泽东在城楼上一遍又一遍地呼喊：“同志们万岁！”“人民万岁！”……  
城楼上下，领袖与群众，水乳交融。

看着这热烈狂欢的场面，很多参加大典的老人感慨地说：“啊，总算活到这一天，见到了！”

天安门城楼上的上海市市长陈毅，此时也激动地大声说：“看了这，总算是不虚此生了！”

随着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的召开和开国大典的举行，共和国大厦宣告建立并巍然地耸立在古老的华夏大地上。

1949年10月9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召开第三次会议，宣布了中央人民政府各机构的人员任命名单。随后，各机构很快组建而成，正式开始运转和工作。

从此，中国历史翻开了崭新的一页，中华民族以全新的姿态做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人民共和国如巨人耸立于世界的东方，中国人民过去遭侵略受欺凌的悲惨日子一去不复返了。



## 第十一章 蒋介石在大陆的最后日子

蒋介石决心与共产党最后一战，从南京“总统府”到浙江溪口老家，再由上海到福建、广东，再退川康，连战连败，最后从川康逃到台北。辗转之中，蒋介石想起自己曾悬赏 25 万块光洋买毛泽东首级，而如今他却成为毛泽东宣布的头号战犯。凄风苦雨中，蒋介石从成都起飞，永远告别大陆。

### 蒋介石布置与共军的最后一战

蒋介石于 1949 年 1 月 21 日宣布下野的当天，即乘飞机离开南京，下榻于杭州览桥航空学校宿舍。

第二天，从杭州乘飞机到宁波，然后换乘防弹轿车，回到故乡奉化溪口。

这次下野，已是他第三次松开权柄，但却是蒋介石最难受的一次。前两次，不过是以退为进的一种策略，而这一次，面对的是国民党政权的风雨飘摇。

蒋介石回到溪口后，表面上装得像闲云野鹤，游山赏水，实际上则紧紧控制着国民党的军政财大权。

蒋介石在溪口架设了七座无线电台，昼夜不断地作情报联络，继续进行军政遥控指挥。国民党内部人人都知道，溪口已经取代了南京，成为溃败中的国民党的政治中心。

而季宗仁名为代总统，实际上是一具傀儡，要不到钱，调不动兵，命令出不了南京城。

正当毛泽东进北平的时候，溪口的蒋介石仍在做着大一统的美梦。

1949 年 3 月 24 日，蒋介石在溪口紧急召见总揽台湾军政大权的省政府主席陈诚。

蒋介石对他说：“辞修，在台湾要做最坏的打算与万一的准备，使台湾成为复兴民族的基地，担负复兴中华民族的使命。”

陈诚恭敬地连连称是。接着，蒋介石又给他打气说：“国家还是有希望的，革命是不会失败的。纵使一时失败，亦可以从头做起，最后一定成功。抗战胜利后，曾经是统一中国的极好机会、我们错过了，招致了失败，如今我们在台湾卧薪尝胆，未始不可成为复兴中华民族的堡垒。”

蒋介石在安排国民党的退路时曾有多种打算。一是将国民党军队转到西康，建立以西昌为中心，以西南广大地区为依托的“根据地”，在大陆上继续同中共顽抗到底；二是将国民党军队撤到海南岛并以此为中心，以东南沿海地区为依托，作为国民党最后坚守的阵地；三是将国民党撤退到台湾，以台湾作为存身之地，进而建设“反攻大陆、复兴党国”的基地。经过再三斟酌、反复比较，以及后来战局发展的影响，使蒋介石在定海举行的重要军事会议上，最后确定了第三个方案——把国民党的落脚点定在台湾。

选择台湾为最后落脚点，是蒋介石充分认识和估计了台湾地位重要性之后作出的。

早在全国内战爆发不久的 1946 年 10 月，蒋介石就与宋美龄一起到台湾视察。在察看了台湾的情况后，他十分感慨地说：“台湾尚未被共党分子所渗透，可视为一片净土，今后应积极加以建设，使之成为一模范省，则俄、共虽狡诈百出，必欲亡我国家而甘心者，其将无如我何乎！”

台湾是中国沿海的最大岛屿，气候宜人，物产丰富。日本帝国主义长期霸占台湾，使台湾经济脱离大陆独立存在，自成系统。加上 1100 多公里宽的海峡，没有现代化的海空军是极难横渡的。此次台湾之行使蒋介石萌发了一旦在大陆失败便将台湾作为理想的内战后方基地的意念。

到了 1949 年初，国内政治、军事形势急转直下，迫使蒋介石在作最后抉择时，更坚定了把台湾建成“反共基地”的想法。

他曾说：“当时我下野还有一个重要的考虑，就是台湾地位的重要。在俄帝集团侵略下，宁可失了整个大陆，而台湾是不能不保的。如果我不下野，死守南京，那台湾就不能兼顾，亦就不能成为反共抗俄的坚强堡垒。1947 年我到台湾看了以后，在日记上曾经记着这样的一句话，只要有了台湾，共产党就无奈我何，就算是整个大陆被共产党拿去了，只要保着台湾，我就可以用来恢复大陆，因此，我就不顾一切，毅然决然的下野。”

他的长期合作者李宗仁曾说过，“蒋先生在决定引退前，即已准备放弃大陆退保台湾，以贯彻其改造党的政策，成为三位一体的心愿，维持一个清一色的小朝廷，他更深信大陆放弃之后，国际形势必益恶化，第三次世界大战亦必随之爆发，即可因人成事，回大陆重演接收政权的美梦。”

为了确保台湾“反共基地”的稳固，蒋介石制订了“建设台湾、闽粤，控制两广，开辟川滇”的计划，并设想建立一个“北连青岛、长山列岛，中段为舟山群岛，南到台湾、海南岛”的海上锁链，使其成为封锁、包围乃至反攻大陆的基地。

对此，蒋介石首先对退守台湾做了周密的军事部署。他把国民党海空军实力逐渐南移，以台湾为中心，将经营重点放在上海、福建沿海及西南地区。蒋介石在上海集中了 40 多万大军，由心腹爱将汤恩伯率领，作最后顽抗。蒋介石如此安排的目的，是为了“一旦中国大陆万一发生意外，可有一支可靠的军队随政府迁来台湾、免使台湾受到亲共阴谋的威胁，而以该省作为政府最后坚守与力图复兴之基地。”蒋介石十分重视福建及东南沿海的防务，他在福建视察时强调：“台湾是党国复兴基地，台湾是头颅，福建就是手足，无福建即无以确保台湾。”后来他将福建防务不力的朱绍良撤职，让从上海逃出来的汤恩伯任福建省主席，并把在广东的嫡系胡璉部调往金门、马祖和潮汕一带，加强对福建及沿海岛屿的防守。

1949 年 4 月 5 日清明节，蒋介石带着蒋经国夫妇和孙儿孙女，到白岩山鱼鳞祭扫母墓、祈祷，又到桃杭山祭扫了父兄之墓。不久又与蒋经国到附近祭祖拜宗。

1949 年 4 月 22 日，蒋介石电约李宗仁、何应钦、白崇禧、顾祝同、张群、汤恩伯、朱家骅、徐水昌、吴忠信、王世杰、童冠贤、王宠惠、黄少谷、程思远等人在杭州笕桥航校举行会议，针对战局发展在军、政方面作重新部署，以决定“最后一战的全面计划”。

## 蒋介石永别祖屋

但时局已经不以蒋介石的意志为转移了。就在国民党的各位大员商讨“最后一战”之际，解放军第三野战军七兵团由浙皖边境分兵入浙，5 月 3 日杭州解放。16 日三野七兵团在浙东纵队配合下，一路东进宁波，一路经嵊县至新昌。

当 24 日清晨蒋在“慈庵”刚起身时，侍卫长俞济时向蒋报告解放军已占领慈谿，前哨逼近宁波。蒋介石一听吃惊不小，于中午下令宁波守军把所有船只连同浮动码头全部拖走，以防解放军封住镇海出口，俞济时中午又报告说解放军先遣部队已到新都。蒋介石禁不住哀声长叹，吩咐蒋经国等亲眷携孙儿孙女爱伦（孝文）、爱民（孝章）一同到鱼鳞向母墓辞别，然后，无可奈何地离别溪口。那天深夜，解放军七兵团一部分同浙东人民武装进入宁波市区，宁波从此解放；当蒋得悉南京与宁波相继“陷井”易手消息后，惊恐万分，如热锅上的蚂蚁，蒋氏一家只好急忙打点行装起程。

蒋介石从自身安全考虑，行程分为两路进行。他不搭飞机，也不走绕经江口到奉化城内的行车路径；将大部分随员所携行装、物品由汽车经江口装运汇合奉化城；而蒋则是小股轻装精锐人员，选由溪口乘人力双人抬竹舆翻山越岭，途经月岭，出至奉化县城锦屏风麓山脚，县公共体育场下轿。

蒋介石一行抵达奉化县城时已是下午一二点钟光景。人们闻讯而出，前呼后拥，齐集一场，夹道相观，大家的注意力多集中在蒋介石一人身上。蒋介石这时面容消瘦，身上所穿服装是玄色长袍马褂，手持西式礼帽，臂弯上挽一拐杖，面上毫无笑容，沉默下语，只是一边走，一边挥动礼帽向人们致意。霎时间其随从人员燃响一派鞭炮，高呼“万岁”，场面相当混乱。

紧随蒋介石身后的是宋美龄、蒋经国、蒋方良、蒋纬国及其妻小儿女幼孙，接着有宋子文、孔祥熙、陈立夫、张群、何应钦、阎锡山、张道藩、谷正纲、翁文灏、黄少谷、沈昌焕、张其昀、王世和、周宏溥、朱孔阳、俞济时、俞济民、范景孝、应海明、杨学房、于豪章、周菊村、石祖德、楼秉国、夏功权、赵志华、刘廉一等党政军人员一行计五六十人，专程随同，从北门至县府，旋即向中山公园，出公园顺道在孔圣殿郑重其事地祭了孔夫子神像。

拜完孔夫子神像，已是下午三四点钟光景，正遇港汛处于低潮时刻，蒋内心万分焦急，惶恐不安，如楚霸王临乌江，路穷途未，犹同遇天涯海角的绝壁境界。这位“基督信徒”，此时认为上帝者天下帮忙，口里不断发出哀叹声，迫不及待想一步登船出海，但又担心解放军追击与包抄，在松岙码头狮子口处封港，截住出路。他急忙催促电讯随员急电发报，传呼海上军舰及时到来，在军舰未到岸之前，眼看宁波县团村至西垫路段没有公路，他只好匆匆又改乘轿子回到团村。

当蒋介石一行抵村时，早已有当地保长、甲长等二十人迎接等候在村前头江口侮塘边。因海滩潮水浅，船只不能直放，只能乘竹排离岸，蒋所乘的竹排排旧放了门板，板上再放坐椅，蒋介石、蒋经国、俞济时等 5 人是坐同一排上，在该条排的前后各由一名甲长撑送。竹排撑行一里后，即靠登等候在港中的汽艇，汽艇约行三里后，才登上泊在江上的“泰康号”兵舰。

蒋介石这一次乘轿出海，颇有点“流窜的味道”……历史的巨轮辗过 14 年之后，无情地颠倒过来了。

他苦涩地想起 1934 年 10 月，他率大军在江苏对红军的中央根据地第五次“围剿”得手，中央社以特大喜讯的口吻报道，称“朱毛匪留在瑞金溃败后，从赣南向湘粤边界一路流窜”。

他曾经悬赏 25 万块光洋，要买毛泽东的那颗脑袋。

而这一次，毛泽东把他列为追捕的第一号战犯。

夜海茫茫，“泰康号”舰成了一只黑色的幽灵。蒋介石一次次反省他江山得失的教训。

## 蒋介石：我们为什么会失败

蒋介石登上“泰康”舰后，舰长黎玉玺不知驶向何处，前来询问航向。

蒋介石阴沉地一声：“到上海去！”

夜海茫茫中，“泰康”号像一只黑色的幽灵，在彼谷浪峰间踽踽前行。

蒋介石不顾海上风大浪急，在甲板上来回踱步。蒋经国寸步不离左右。

“父亲，还是回舱去吧，晚上风大，当心着凉。”在蒋经国的再三劝解下，蒋介石才在儿子搀扶下，回到舱内。

这几天发生的事情给他的刺激大强烈了，他的悲伤与激愤达到顶点。

蒋介石怔怔地想着心事。

“父亲，早些休息吧，你太累了。”蒋经国轻声道。

蒋介石摆摆手，劈头就问：

“经国，你说说看，我们失败的原因在哪里呢？”

听到父亲的问话，蒋经国脑海里倏地闪显出“上海打虎”那一幕，那件事给他的印象大深刻了，始终耿耿于怀，他真想反问一句：当初若是把上海滩的“虎”打了，还会有今日吗？当然，他不敢问，一时语塞。

蒋介石沉痛而冷静他说道：“主要原因，我以为，在于我们用的人腐化了，穿皮鞋的斗穿草鞋的！千秋大业，一朝瓦解，确实叫人痛心。现在，人家把我们的力量消灭得差不多了，这也好，常言道，旧的下去，新的不来，我们可以另起炉灶，重新训练干部。我们一定要训练这样的干部，他们要能够严格执行纪纲，提高组织尊严，而且还能深入社会各阶层，组织基层群众。”

蒋经国听了感到十分兴奋，他在苏联学过政工，而且有赣南的经验，在父亲的重振国民党的计划中，他将大有作为。

蒋介石仍顺着自己的思路说下去，情绪十分激昂：“干部腐化，是因为没有力量监督各级官员，共产党骂我独裁，可是我却无力监督下属。只有另辟溪径，要以群众力量来维护党纪，使每一个党员都服从革命的领导，执行革命的政纲。铲除空言不实、因循敷衍、询情任私、麻木不仁的官僚作风，而代之以实事求是、急公尚义、严正下苛、是非分明、赏罚公允的新作风。”

蒋经国语调也变得轻快了，他说：“父亲，您的话给了我信心，我相信我们是有希望的。”

蒋介石点点头，随手递给长子一个本子，蒋经国知道那是父亲的日记本，在打开的那一页纸上，写有这样的一段话：

“以定海、普陀、厦门和台湾为训练干部之地区；建设则以台湾为立足之起点。实行训练干部、编组民众、计口授粮、积极开垦。在社会上不许有一个无业游民。实行二五减租，保障佃户；施行利得税、遗产税、筹办社会保险、推动劳动福利、推广合作事业；实行平均地权，节制资本。以民生主义社会建设及其政策实施为要务。更拟推动土地债券，士兵与工人的保险制度。”

蒋经国明白，这是父亲草拟的国民党未来的施政纲领，其中包含了他从惨痛的失败教训中得出的新的认识与新的决心。父亲的刚毅与顽强令他感动。同时，他也深明父亲对他讲这番话的用意。他颤声道：“父亲，我一定按你说的去做，重振党国！”

蒋介石看了儿子一眼，遂把目光通过圆形的统窗投向沉沉的夜海，一字

一顿他说：“共党是绝不会成功的！但我们本身能否成功，要看我们自己的做法。”

4月26日上午，“泰康”号进入吴淞口，下午1时，抵达上海黄浦江边的复兴岛，蒋介石住进岛上仅有的一幢西式洋楼。

4月27日，蒋介石感到住在复兴岛上离市区太远，不利于接见国民党军政要员，便让蒋经国到市区找一住处。

蒋经国大为惊讶，他劝道：“时局已经这样严重和紧张，市区内危险万分，怎么还可以搬进市区去住呢？”

俞济时和一些侍卫也来劝阻。

蒋介石板起面孔说：“危险，你们知道，难道我就不知道？”

蒋经国见父亲的态度坚决，感到不好违旨，便在市区金神父路的国民党励志社找了一处认为比较安全的住所。

4月28日，蒋介石在汤恩伯的陪同下，亲自巡视了上海市，街头，以便为守卫上海的陆海空三军官兵鼓气，稳定一下上海混乱的局面。当然，更重要的原因是，上海还有大量的物资没有转移到台湾。

蒋介石深知，若在台湾建立自己的小朝廷，没有物资基础作保证是万万不行的。在把大量的黄金抢运到台湾去后，又授意任命原联勤总部军需署署长陈良正式担任上海市市长，今其将上海的大批机器、原料、药品、棉纱等物资和一批技术专家弄到台湾去。

他召见陈良，问：“共匪濒临上海附近，估计不到半个月就得有大的军事行动，不知上海的待运物资还剩多少？”

陈良回答说：“目前各中央机关存放在上海的物资为数不少，但交通运输工具又不够使。没有一个月的时间，恐怕难以将物资运完。”

陈良递给蒋介石一份已运走和待运物资清册报告。从报告中可以看出，各机关上报的5万多吨物资疏运计划，已运走的数量不到万吨，已装妥等运的为4000余吨，候运的物资尚有4万吨。没运走的物资又十分重要，必须在近日内启运。如共军控制了吴淞，阻塞了通道，那疏运计划大半要落空。

蒋介石心里着急了，忙召来汤恩伯问：“在上海坚守一个月，把握如何？”

汤恩伯报告说：“从最新情报看，共军可能于5月上旬就对上海发起攻击。上海守一个月，困难比较大。我特别害怕的是出现江阴要塞叛变那样的事件……”

蒋介石发怒道：“一定要想办法守住一个月。通知毛人凤、毛森他们，加紧对上海地下共党活动的侦破，把共党分子和叛变分子统统杀光！”

5月6日，蒋介石在上海筹划一番后，深感上海局势之危急，便与蒋经国一起逃上了“江静”轮，晚上就睡在轮上。

次日早晨6时，“江静”轮由复兴岛启航，驶出吴淞口外，载着蒋氏父子逃出上海。

“江静”轮向舟山群岛驶去。5月9日，抵达大穿山口外的大树山，在北渡灯塔附近停泊下来。蒋经国护侍着父亲在关帝亭登陆，然后登高望远，人寺见僧。然后，乘“江静”轮至岑港、沥港一带，参观涂船张网捕鱼实况。

10日，蒋氏父子乘船到普陀山附近，未登陆，只在船舷上眺望。11日上午，海上大风突起，蒋介石爬上普陀山，似乎把烦恼抛置脑后。

12日，蒋氏父子由普陀山登轮启航，经珞珈山、朱家尖、登步岛、桃花岛、暇崎岛和大小尖仓山，抵舟山定海下锚。

正当蒋介石游戈于浙东沿海各岛，沉浸于设计未来“美好计划”时，一个军事失利的消息接二连三地传来。

上海，自5月13日起，人民解放军开始发起攻击，战斗激烈，攻势凌厉。

武汉，白崇禧于5月15日逃退，旋即为解放军所占领。

西安，胡宗南部于5月20日逃离。

……

5月历日上午，蒋介石派蒋经国到上海督战。

京沪杭警备司令汤恩伯对前来督战的“太子”说：“共匪攻势厉害。浦东方面没有把握，社会秩序将是否变为紊乱，亦夫可逆料。本职唯有尽心尽力而已。”

蒋经国参加了汤恩伯召集的军事会议，听取了各指挥官的报告，他特意交代淞沪警备司令部作战处处长工之师：在战争中不得轻易使用青年军，必要时要请示总裁，同时上海有名的建筑物要尽可能保护。

5月16日上午，蒋经国坐专机离开江湾机场，前往定海向蒋介石汇报上海军情，然而，他没想到，这是与上海的最后告别。

当他5月22日乘飞机想降落在江湾机场时，接到地面指挥部的紧急情报；江湾机场已经落下共军的炮弹，不可降落。飞机只好折回台湾嘉义机场。从此，他再也没踏上过上海的土地。

蒋介石听到共军已进入上海市区的消息，大吃一惊。

在1月下旬下野之时，蒋介石计划第一步去溪口老家，第二步搬迁到福州的鼓岭，第三步迁往厦门的鼓浪屿，最后才迁至台湾的草山或澎湖的马公岛。

为此，他在下野前，在南京黄埔路官邸召见第一编练司令部副司令李以动时嘱咐：“福建非常重要，没有福建就没有台湾。你所带的独立第五十师是战略预备师，全副美械装备，要好好训练，作为防卫福建的有生力量。”

现在，京沪杭军情迅速变化，蒋介石被迫放弃原定计划，直接去了马公岛。

他一面命令汤恩伯将上海的嫡系部队迅速撤出，一面布置防守福建事宜。

5月24日，汤恩伯组织嫡系各军逐次向吴淞口撤退上船。

汤恩伯、陈大庆、石觉及其各自的指挥总部也于5月24日下午在吴淞上船逃走。

解放军于5月25日开进上海的时候，蒋介石还在舟山群岛及台湾海峡漂泊。

6月1日，蒋介石抵达台湾高雄要塞，过了个凄凉的端午节。

### 台湾是头颅，福建是手足，福州必须死守

“江静”号军舰驶离吴淞口外的洋面。

6月20日，蒋介石专门召集国民党在台高级官员，研究了在台湾整军、防备、军政等问题。蒋介石主张把国民党海、空军实力逐渐南移，以台湾为中心，把防守的重心放在东南沿海一带，特别重视与台湾最近的福建的防备。

蒋介石对福建下放下，有两条原因。其一，长江防线各路败兵退入福建，俱无斗志，凡溃军过处，借粮征草，拉夫派工，骚扰百姓，闹得鸡犬不宁，

民怨鼎沸，亟需整编；其二，福州绥靖总署主任朱绍良，资格老，是同盟会员，参加过武昌起义，还跟过蒋介石的恩师陈其美，因而对蒋并非俯首听命。蒋介石逃离上海前在海峡里漂泊时，就曾三番几次电告朱绍良，要他在福州附近构筑一个半永久性的防御工事。但是，朱绍良阳奉阴违。他受解甲寓居的两个“闽籍上将”萨镇冰和陈绍宽的影响，不肯让自己的部队在福州决战，以免在炮火中毁于一旦；朱绍良认为大上海的钢筋水泥纵深防线还守不住，福州南临江，东面海，背水之阵，何能困守？同时，福州市市长何震也陈述：福州大穷，征工征料十分艰难，对死守福州，毫无信心。

尽管蒋介石三令五申，连连电催，但朱绍良始终未动手，最后实在没有办法，只好派独立五十师师长李以勳去构筑一线野战工事，算是搪塞应付一下。

蒋介石要到福建视察还有一层不便明说的原因，就是朱绍良和李宗仁的关系过分密切。蒋介石从情报部门获悉：上海丢失后，李宗仁同朱绍良的电信交往更为频繁。朱绍良视李宗仁作后台，李宗仁拉朱绍良这股势力，把福建作为退身之地。蒋介石还得悉，李宗仁想在6月底或7月初来福州走一遭，他当然想要在李宗仁到来之前，失去福建作一番布置。

6月21日上午8时，“美龄号”座机从台北松山机场起飞。

“美龄”号总统座机飞越台湾海峡只用了一个钟头，上午9时便降落在福州南郊机场。朱绍良早已率领在福建的党政要员在机场迎候。朱绍良深知蒋介石的为人，对他的突然大驾光临，心存恐惧，因而吩咐手下全城动员，要搞一个隆重的欢迎仪式——福州市座座高楼到处升起青天白日旗，墙面上张挂着蒋介石的标准像，街道张灯结彩，几条大街上挂着“欢迎委员长莅临榕城视察”的大幅标语。在这个临战而人心惶惶的省城，这种喧闹因反常而显得不协调。

蒋介石在握手寒暄之后，被当地官员簇拥步出机场。机场门口已停着一长列车队。朱绍良恭身对蒋介石说：

“总裁，请上车。福州全体市民已挥旗夹道欢迎您进城。”

蒋介石点了点头，却一动也不动，他前后左右逡巡地望了下，忽而转头对俞济时说：“我看就不必进城去惊动市民大众了吧！要开的会就改在机场的办公大楼开吧。”

蒋介石突然提出不进城，使在场迎接的官员惊愕不止，面面相觑。朱绍良苦笑笑了笑，只好从命。

9时半，一个为蒋介石临时召开的军事会议在南郊机场办公大楼举行，在听取了朱绍良、汤恩伯及一些将领汇报之后，蒋介石开始训话：

“现在，我是以国民党总裁身份来和大家见面、来和大家共安危的。我是一个下野的总统，论理不应再问国事，一切由李代总统来处理危局与共军作战，但想起孙总理生前的托咐，勉以‘安危他日终须伏，甘苦来时共尝’的遗言，现正是我党危难关头，所以我以党的总裁地位来领导大家和共产党作殊死战。个人引退半年来，没有片刻忘怀久经患难的袍泽，希望大家协力同心，争取最后的胜利。”

蒋介石讲话时痛心疾首，几乎要掉下泪来。在场的官员们寂静无声，蒋介石一口气讲到下午2点多：

“守长江下游及驻浙江的部队退到福建，是在5月上旬。当时陈毅主力正在攻上海，只有刘伯承一部跟踪入闽。所幸敌人摸不清福州底细，所以没

有长驱直入。如果敌人洞悉你们的狼狈状态，一个团就可以占领福州了。你们任兵团、绥区司令的，只顾逃命，丢盔弃甲，沿途扰民，来到福建。我姑念前劳，未令国防部严加追究。现在各部队士气不振，军纪废弛。据报：当师长、团长、营长的仍想南逃，有些未经批准，就擅自去台湾。对福建这兵要之地失去信心，良可浩叹！大家应当知道：台湾是党国复兴基地，它的地位异常重要，比方台湾是头颅，福建就是手足，无福建即无以确保台湾。”

吃罢午饭，他又指名道姓自下朱绍良、汤恩伯、李延年、王修身、李以勳等九个人。蒋介石与他们轮番逐个单独谈话，目的是要大家死守福建。

据机要秘书曹圣芬记录，蒋介石对李以勳谈话的时间最长。李以勳是黄埔军校学生，对蒋以“校长”相称。

蒋介石对李核实自己得到的有关福建的情报，了解朱绍良及福州市长何震、福州绥署副主任吴石等人的真实思想动态，对“闽人治闽”及“联省抗台”的活动特别警惕。李以勳觉得此次与蒋的谈话十分融洽，觉得总裁对自己很信任，因而在谈话将结束，蒋介石问“有什么困难和意见”时，他斗胆进言说。

“校长不是说：‘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吗？目前共军正在休整，这是他们作战的惯例，一个大战役之后，一定有一段休整时间。我们守闽江以北的部队有8万之众，如果我们在陈毅主力尚未入闽之前，有计划地将主力撤过闽江这一条非常不利的地障，撤至闽南，这对持久战有利，对巩固台湾外围有更实际的效果。我向校长直言，并非我怕死，而是为大局着想呐！”

蒋介石望了望李以勳，仰天长叹，说出了自己的心里话：

“你是我的学生，难道不知道‘先制之利’、‘先发制人’、‘先声压人’、‘安定人心’的重要性吗？没有军队还有国家吗？保全兵力是重要的，但福州过早落入共军千里，其政治影响很大。台湾人半数祖上原籍福建，对故乡十分关怀。现南洋一带的侨胞，也是福建籍占多数，如果福州失守，他们就会认为国民党已彻底失败。这种心理上的变化，就会使我们必须死守。希望你体会我的苦心，放胆去做，只要将领有必胜信心，处绝境可以复生。有我教导你们，有台湾在，即使大陆失尽，也可复兴。”

蒋介石与李以勳谈完话，已是下午4点。

办公楼外停机坪上，“美龄”号的马达已隆隆发动。朱绍良率领参加这次南郊机场军事会议的军长、师长们，列队欢送蒋介石登上飞机。

在“美龄”号腾空而去的时候，军官们散队离去，一个师长咕哝了一句：

“叫我们死守福州，他连宿一晚都不敢！”

蒋介石此次到福州，只逗留了7个小时，连机场都没出。福州是他不能不来，又不能久留的地方。

自从他下野后，福建地方人士看到共产党势不可挡，对国民党已失去信心；加上这块地方，千百年来传统的排外心理，随着时局恶化而日趋严重。福建地方参议会主张“闽人治闽”，公然反对征兵。早年任过清朝北洋海军提督及北洋军阀政府海军总长的福建上将萨镇冰，闲居福州，对福建很有影响，他对蒋介石的独裁统治一向不满。1933年他曾赞助李济深在福州搞“闽变”，成立“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萨镇冰说：“民国以来福建受外省人统治已30余年，蒋上台以来的20余年中更加厉害。”

令蒋介石忌讳的另一个福建上将是陈绍宽，他是中国旧海军耆宿，任过国民党海军部长、海军总司令，抗战胜利代表中国海军在“密苏里”战舰受



降。陈绍宽被陈诚排挤，解甲归田回到福建也是满腹牢骚，他的部下李世军说过的话传到蒋的耳朵，十分刺耳。李世军说，“福建人在共产党方面还出了一个邓子恢任中原政府主席，在国民党中则空空如也，连本省主席也要外人来当，真是……”

蒋介石到福州后不到两个月，人民解放军就于8月17日攻占了福州，砍断了蒋介石的“手足”。

当时，国民党内部流传着一种说法：只要是蒋总裁去过的地方，没有几天就被共产党解放了。

1949年的蒋介石，在人们心目中成为一个“丧门星”。

### 张发奎建议李宗仁学张学良扣押蒋介石

南京失守后，李宗仁回到桂林。

蒋介石派居正、吴忠信到桂林劝驾，并带来一封亲笔信，信中指责李说：“现在党国处在危急存亡的最后关头，你身为代理总统，对党国、对人民负有不可旁贷的责任，岂能儿戏视之一走了事。”接着又说，“我是国民党的总裁，就处境和地位说，理应党存你存、你存我存。只有党存在，你存在，我才能存在。也只有你有前途，我自己才有前途，此外别无任何出路，决没有不全力支持你的道理。”

蒋介石最后表示，只要李到广州来负责，一切军、政、财权都可归李掌握，一定要使李要钱有钱，要人有人，要军队有军队，决不背后掣肘云云。

蒋介石的信使李宗仁动心了，他由桂林飞到广州。对此，刘斐当面讥讽李宗仁说：“你像那个童话故事里的那只猴子了。有只猴子蹲在树上，有个捉猴的人想把它捉住，但没有办法捉到手，后来他想了主意，从怀中取出一只苹果来，向猴子再三诱惑，示意要把苹果给它，那猴子看见了苹果，果然垂涎三尺，跳来跳去，终于经不起诱惑，下树来取那只苹果，刚想把苹果抓上，却被捉猴子的人一把抓住，套上了锁链。”

李宗仁到广州后，立即与何应钦、白崇禧商议。拟对全国军队重新部署，以便对解放军做有计划的长期作战。

“健生，华中情况怎样？”李宗仁首先关切地向白崇禧询问。

白崇禧说：“武汉失守后，我重新调整了部署，我拟以张淦、陈明仁、黄杰等兵团守武长路正面，以徐启明兵团守赣西为右翼，宋希濂部守常德、芷江一线为左翼。”

李宗仁、何应钦对这个部署没有异议。接下来，自西北战场开始，三个人对全国的兵力部署进行研讨。李宗仁望着宽大的军用地图，分析了双方的态势，一个宏大的战略构想了然于胸。他说：“虽然共军来势凶猛，但从纯军事角度讲，我方防线自宁夏、甘肃、西安，经鄂北、汀北、南昌，至粤北、闽南，一字长蛇，未始不可与共军作最后的周旋。如运用得宜，美援及时而至，将来鹿死谁手，犹未可预卜。”

何应钦、白崇禧全笑了。何应钦说：“只要德公有信心，这个仗就好打了。”

李宗仁谦逊地一笑：“哪里，哪里，敬之兄言重了。”

部署在常德、蓝江一线的宋希濂兵团奉蒋介石之命突然离开防地，撤到鄂、川边境的恩施。这件事，不但李宗仁、白崇禧蒙在鼓里，时任行政院长

的何应钦也一无所知。

蒋介石的用心很清楚，架空白崇禧，把华中军队夹在东西两翼的蒋军嫡系当中，不予方便，更不予支持，任其自生自灭。

何应钦于1949年3月上台组阁，勉强维持了两个月，5月便忿然辞职。

何应钦走后，白崇禧也回去做紧急处置，连夜回衡阳，官邸里显得冷清与空落。

入夜，下起小雨，浙浙沥沥的雨声中，李宗仁想起刘裴讲的那个猴子上当的故事，他不禁狠狠骂道：“流氓！”

这时，副官蹑手蹑脚走进来，轻声报告：“陆军总司令张发奎有紧急事情求见。”

李宗仁披衣而起，说：“快让到书房。”

“德公，深夜打搅，抱歉，抱歉。”张发奎歉然道。

“哪里，哪里。反正也睡不着，你来了，正好聊聊。”李宗仁心里明白，张发奎深夜造访，决不是找他聊天。

“我也是睡不着啊。”张发奎长叹一声说：“德公，我有一句话，一直憋在心里，老蒋背后处处掣肘，广东已岌岌可危，难道我们就束手待毙不成？”

李宗仁问：“依你之见，我们又当如何呢？”

张发奎郑重道：“趁蒋介石来穗之际，将其扣留，一如当初张学良、杨虎城之所为。你是代总统，居于合法地位，蒋介石纵使幕后操纵一切，但兵败如山倒之际，他的嫡系部属未必还那么尽忠于他。这是挽狂澜于既倒的最后办法。德公，你干还是不干？”

李宗仁坐不住了，站起来急促踱步，张发奎的目光跟着他来回转。

许久，李宗仁坐下，慢慢他说出一番话：

“向华，这是徒招恶名，无朴实际的莽事。”

张发奎大失所望，连声道：“德公，你胆子太小！胆子太小！”

李宗仁微微一笑，道：“你不在其位，可以幻想。你如在我的位置，你也不会干的。”

他看了一眼情绪激动的张发奎，继续道：“今日之下，我们所需要的，第一是兵，第二是钱。蒋先生把兵调走，把钱存在台湾，我们纵然把蒋扣起来，第一不能把兵调回，第二不能把钱取出，则扣蒋又有何用？因然，这老蒋接二连三施拖垮两广局面的毒汁，是罪无可逭，把他扣起来宣其罪状于天下，可以泄一时之愤但我觉得处理国家大事，应以国计民生为出发点，不可徒为泄一时之愤。现在失败的大局已定，不必于败亡前夕作无补于大局之事，为天下人笑。”

张发奎无可奈何道：“德公，你虽有宁人负我，我不负人之德，可人家未必须你的情。当断不断，反受其害！”

但李宗仁却说：“终归是要失败，最后维持一点失败的光荣不是更好吗？”

正是因为李宗仁怀有的妇人之仁，蒋介石才依旧在台北和广州间飞来飞去。但他对粤籍将领的不满还是有所察觉，他在黄埔召见余汉谋、薛岳等粤籍将领，大发雷霆：“你们以为你们可以反对我咯？谁反对我，我就叫谁死在我之前！”

蒋介石的流氓腔在广州激起一片冷笑与轻蔑。

蒋介石在广州最喜欢住黄埔。黄埔是他发祥之地，他正是通过控制黄埔军校抓住了军权，最后一步登天，坐上民国的龙椅。因此他对黄埔有一种特殊的感情。

9月底，蒋介石决定离粤回台。

一天，李宗仁打电话约蒋介石单独谈。

李宗仁坐车穿过市区来到梅花村。

蒋介石下榻的私宅以前是陈济棠的公馆，是一幢大洋楼，四周有围墙环绕。

李宗仁进楼后，蒋介石引着他走进一间大客厅。侍卫端上茶后，退了下去。

两人坐定后，李宗仁开口便说：“蒋先生，今天我是以国家元首的地位来对你谈话。”

听了李宗仁的开场白，蒋介石大吃一惊，他忍住怒气，静坐默听起来。

接着，李宗仁开始数落蒋介石：“蒋先生，因为国事已至不可收拾的地步，今天不得不把话说明白。

“蒋先生过去每一次把事情弄糟了，总是把责任和过失推到别人身上。例如东北剿共的失败，徐蚌会战全军覆灭，你把原因说成了军队不听你指挥。又比如，发行金圆券，引起全国经济恐慌，人民破产，自杀成群，你不躬身反省，反责备人民不拥护你的经济政策，再如，你纵容特务，滥捕学生及爱国人士，引起舆论指责，你不自疚，反说是本党同志不听你的话才如此，凡此种种，真不胜枚举！”

李宗仁喝了一口水，说：“你主政20几年，贪赃在法之风甚于北洋政府时代，舆论曾讥讽我们为‘军事北伐，政治南伐’。其实，此种评语还只是一种恕辞，类北洋官僚政客对舆论尚有所畏惧，而我国民政府则以革命旗帜为护符，凡讥评时政的，一律诬为‘反动分子’，以致人人缄口，不敢因片言惹祸，你对此情形竟亦熟视无睹，明知故纵！”

这时的蒋介石脸上略显尴尬神色。

李宗仁见自己的话引起蒋介石的震动，又说：“记得在南京时，魏德迈特使曾在国府饯行宴席上痛诋中国官员贪污无能。他以一外国官员公开侮辱我政府，实不成体统，当时参加会议的人中，竟有当场感动掉泪的。不知你对此知道不知道，知道了又作何感想？”

然后，李宗仁异常愤怒他说：“蒋先生，你此次是第三次引退，引退之时，你对张治中、居正、阎锡山、吴忠信等人一再声明，五年之内决不过问政治。你这样说，无非是在暗示我可放手去做，改弦更张，不受你的牵制。然而事实上又怎么样呢？你的所作所为与你说的完全相反。

“你不仅在老家奉化溪口架设七座无线电台，擅自指挥军队，而且密令京沪卫戍司令汤恩伯亲至杭州逮捕浙江省主席陈仪，并擅派周岩接替。以后到台湾后，你又命汤恩伯到福州挟持福建省主席朱绍良离闽，擅派汤氏代理福建省主席兼绥靖主任。凡此种种，皆是自毁诺言、目无政府的荒唐行为！”

这时，蒋介石面色更加难看。

李宗仁指斥道：“蒋先生，即使不从国家角度讲，而专从你的自私心而言，你宠信汤恩伯也是宠非其人。

“汤恩伯曾受过我指挥，我知之甚详，论品论才，汤氏任一师长已嫌过分，又怎么能指挥一个方面的大军？汤的为人，性情暴戾，矫揉造作，上行

下效，所率部队军纪荡然。抗战期间，河南民谣曾有这样的话：‘宁愿敌军来烧杀，不愿汤军来驻扎’。

“我举个小例，说明汤氏的暴戾，抗战时，有次汤氏自河南叶县乘汽车往界首视察。当时天下雨，便从洛河改乘小轮船往东驶去。船启碇时，船身碰上囤船，摇晃了一下，这也是常有的，没想到汤氏竟大发雷霆，派人将该船公司经理叫来责询。在大骂一阵奸商之后，汤氏竟拔出手枪将该经理当场打死。这件事当时远近传遍，大家都叹为怪事。当时我驻防老河口，也听到有人在讲这件事，还以为汤氏纵然暴戾，也不至于任性乱为到如此地步，然而，讲述这件事的人对我说，当时汤氏的总参议沈克在旁目击，可作证明。后来，我在北平行辕任上，有一次沈克便道来访，我偶尔想起这件事，便问沈克。沈克叹了一口气说，他那时以为汤总司令不过装模作样，侍枪恐吓而已，谁知他竟真的开枪，轰然一声，对方已应声倒地。沈克想抢前劝阻，已来不及了。沈克还对我说，在抗战期间他随追汤氏数年，像这样任性杀人之事已是家常便饭，不足为奇。沈克对我说时感叹万千。蒋先生，像汤恩伯这样的人，你也倚为心腹，能不坏事？”

当听到李宗仁大讲汤恩伯的过失时，蒋介石面色极为紧张、尴尬。一会儿后，面色才和缓起来。

李宗仁开始以为，以老蒋的个性与历史，在受到他的严厉训斥之下，必定与他大闹一番，却没想到在听完他的责备之后，蒋介石却问沈克现在何处。李宗仁回答说：“事已几年了，我也不知沈克的下落。”

最后，蒋介石竟若无其事地面带笑容，向李宗仁道歉道：“德邻弟，关于撤销福建省主席朱绍良一事，是我的错误，请你原谅。”

李宗仁只好说：“事情已经过去，不必再去记忆吧。”

李宗仁见蒋介石低首认错，也就不再多说什么，起身告辞。

蒋介石跟随下楼，一直把李宗仁送上车，两人扬手而别。

蒋介石、李宗仁的“金兰之盟”，从此画上了句号。

10月1日，是中华民族历史上一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日子。

此时，国民党总裁蒋介石正神情黯然地呆在广州梅花村里。当他从收音机里听到毛泽东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声音时，他恼恨得一阵头晕。

两天后，他匆匆离开广州城。他得到消息，由陈赓将军统一指挥的人民解放军第四兵团和第十五兵团已跨越粤北险关，向广州挺进。

10月6日，解放军进占重镇曲江。大军兵分两路，直奔广州城，形成钳形夹击之势。

此时，广州城内的“国府”要员们，一个个犹惊弓之鸟，惶惶不可终日。

10月10日，“代总统”李宗仁宣布：国民党“政府”“迁都”重庆。

一架又一架飞机从天河机场起飞，载着官员们逃往重庆。

一艘艘轮船沿西江向柳州驶去，车上装满了各种笨重物件，然后从柳州车运到重庆。

昔日耀武扬威的官员们，此时如丧家之犬。

昔日热闹繁华的市区，一下子变得寂静萧条。

“代总统”李宗仁决心在广州坚守到最后一刻。

10月9日，程恩远、邱昌焕从香港九龙乘飞机赶到广州，来到迎宾馆。

程恩远对李宗仁说：“顾孟余先生向德公提出了这样一个建议：德公不要去重庆，应改往柳州或南宁‘组府’，务必同蒋介石划清界线，另搞一套。”

李宗仁回答说：“如果我下去重庆，白崇禧的30万兵就没有饭吃。”

10月11日晚，程思远离开李宗仁坐“龙门”轮赴香港。

10月13日，广州城已能听到枪炮声。李宗仁慌了，带着“总统府”随员匆匆离开广州城，坐飞机往桂林而去。

10月14日，人民解放军进驻广州这座具有光荣革命历史的城市。

## 悲壮的全门之役

人民解放军华东野战军第十兵团在解放了上海后，很快撤出了上海，集结于苏州、常熟、嘉兴一带短暂休息，进行紧张的人闽作战准备。

此前，毛泽东在中央军委就根据国民党兵力的部署情况，认为解放台湾，首先需要解决两大问题：一是迅速建立一支近期可以使用的空军；二是扫清屏护台湾的外围，占领攻击出发阵地。

于是，扫清台湾的外围，占领攻击出发阵地的任务落到了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第十兵团身上。

第十兵团由叶飞任司令员，韦国清任政委，入闽前，中央又派张鼎丞任省委书记兼兵团政委。

8月13日，解放军第十兵团乘敌处于欲守无心、欲逃不准的尴尬境地，以3个军分左、右、中路向福州发起包抄进攻。只经过5天的战斗，就于8月17日解放了福州。随后经过一周的追击，共围歼国民党军第六兵团部的5个军部、14个师共计5万余人，其中毙伤国民党军2000余人，俘虏国民党军4万余人，而解放军的伤亡不到500人。

福州战役的胜利，使福建的国民党地方部队大部溃散为匪，其主力第八、第二十二兵团攀部约8万余人退守平潭、漳州、厦门和金门地区，其中以厦门、金门为固守的重点。

随后，经第三野战军提议，中央军委批准，我军于8月8日开始了解放舟山的战斗。8月19日，第二十二军首攻大榭岛成功，歼灭国民党守军一个团。

9月中旬，第十兵团二十八军，几乎未经激烈的战斗，就解放了福建沿海最大的岛屿平潭岛以及大小练岛、南日岛、湄州岛，歼灭守岛的国民党残兵9000余人。

9月19日，解放军发起对漳州的攻势。战斗刚开始，守漳州的第八兵团刘汝明部逃向海边。9月19日，漳州解放，解放军乘胜追击，跟踪猛进，将第八兵团大部俘获，只有约4000人在刘汝明的率领下乘船逃走。至9月28日，我军第十兵团已解放厦门、金门对岸的全部沿海地区。歼灭国民党第八兵团约1.2万人。但刘汝明的第八兵团司令部与第五十五军逃到厦门。

9月21日，解放军向厦门以北的集美镇发起攻击。国民党军的一个团利用集美镇北面的调和镇内的建筑群，构成支撑点式的防御体系。担负攻击任务的解放军第二十九军第八十五师第二五三团严格执行中央军委的“宁可多流血，也要避免使用火炮”的命令，只使用手中的步兵轻武器逐个消灭敌军的支撑点。经过两昼夜激战，于9月23日下午占领集美镇。集美镇的解放，为下一步渡海攻厦门提供了条件。

10月15日，第十兵团开始渡海攻击厦门。守敌为汤恩伯集团第五十五军全部，一六六师及六十八军从漳州方向逃来的余部，总兵力近3万人。具体

部署为：以七十四师三个团守厦门北半岛，以一八一师守东南面，以二十九师一个团和要塞守备队、六十八军残部等守厦门市，以二十九师两个团守鼓浪屿。解放军第十兵团以三十军的九十一师并以九十三师一个加强团攻鼓浪屿，以二十九军八十五师、八十六师和三十一军九十二师在集美强大的炮兵群的人力支援下，从西、北、东北登船，向厦门发起攻击。经过近 40 个小时的浴血激战，除汤恩伯、刘汝明等率领兵团 3 万余人和军、师部乘船逃脱外，其第八兵团的第五十五军三个师、第六十八军残部和第一六六师共 2.7 万余人被解放军歼灭。

厦门大捷，对第十兵团特别是叶飞司令员是一次巨大鼓舞。叶飞司令员应厦门市委的请求，命令第十兵团部队由同安渡海进驻厦门，协助厦门市委主持接管工作，并命令兵团后勤部在 10 月底以前，筹措大米 400 万斤，柴草 600 万斤，以保证部队和厦门市民的生活供应。

### 攻打全门的任务捉到了议亭日程上

进攻金门的任务由第十兵团的二十八军八十二师全部、八十四师二五一团、二十九军二五三团及八十六师二五九团共 6 个团的兵力执行。第十兵团按原定计划要求以上部队迅速攻占金门，以完成漳厦金战役。

当时部队充满乐观情绪，认为人闽后陆路和渡海作战都是一帆风顺，攻占金门毫无问题。第三野战军领导也判断，攻厦成功后金门之敌可能拼命逃跑，即使不逃，只要我军一登陆成功，守岛之敌便会一触即溃。

第十兵团下达的攻击金门的命令要求是：“为肃清沿海残敌，解放全福建，并建立尔后攻台之基地，决定乘厦门胜利余威及金门敌防御部署紊乱之际，以二十八军一个加强师为主，附近二十九师、八十五师全部，发起对金门之攻击。”

从人民解放军当时具备的各种条件看，在陆战中要全歼国民党的任何军队确实是毫无问题的，但进行渡海作战却十分困难，连渡海作战的基本条件——海空军掩护都没具备。而国民党陆军虽已一败涂地，但其海空军还大部完整，拥有 10 万余吨位的作战舰艇和 200 多架作战飞机，并在福建沿海的金门等岛屿上建立了陆海空三军配合的立体防御。

人闽的第十兵团不仅全无海空军配合掩护，连木帆船都严重不足。而且，第十兵团的部队过去无渡海经验，又无时间进行渡海作战的训练，从上到下，对于岛屿作战都是外行。另外，被胜利激励着的部队也没有对渡海作战的困难进行充分的论证。更为严重的是，指战员们不了解潮汐等知识。

金门岛过去是一个并不很知名的岛屿，大金门面积为 124 平方公里，小金门为 15 平方公里，周围还有大担、二担几个小岛。大金门位于厦门以东约 10 公里，北距大陆约 9 公里。岛长 20 公里，宽为 14 公里，形以哑铃，分东西两部。东半部多高山，西半部多丘陵。北岸琼森至古宁头段大部分为沙质硬滩，礁石较少，易于登陆。

大小金门守敌原有李良荣的第二十二兵团的第五军与第二十五军以及刚从台湾调来的第二一师，共 8 个团 2 万人。除第五军防守小金门外，大部分兵力守备大金门。此外，金门岛还有一支装甲部队，即国民党战车第三团第一营，该营拥有重 15 吨、配置一门 37 厘米炮的美制 M5A1 坦克 21 辆，是反登陆作战的强大力量。

第十兵团战前分析认为，国民党在厦门刚失败，胆战心惊，而且在大金门和小金门约2万人的驻军中大多是新兵，只有二一师和战车营是较有战斗力的部队。当时，金门岛上虽然抢修工事，但这些工事的防御能力并不强，多是一线配置的支战土木工事。

根据这一情况，接受攻金任务的第二十八军开始了渡海作战的准备工作。然而，由于国民党从大陆沿海撤退时，对渔民的船只进行大肆的破坏和掠夺，所剩无几，加上部分渔民将船只藏了起来，使我军准备渡海作战的船只发生困难，直到10月24日才搜集到一次要航渡约三个团的船只。

距离10月18日下达的进攻金门作战部署命令的时间10月20日已推迟了4天。由于无法筹措到一次性渡运6个团兵力的船只，第二十八军前指作出过于理想化的预想：第一梯队登陆三个团，纵使部分损失，船只返回时第二梯队、第三梯队还可以再航渡三团，这样总共可有6个团大约1.3万人登陆。

这个近于理想化的方案未考虑敌情和海情的变化，也没有考虑敌人随时可能的增援，更没有考虑国民党海、空军较为强大的作战能力。在厦门之战结束前，金门守军已得到胡璉兵团第十八军的增援，岛上的国民党军总兵力达3万以上。解放军第十兵团司令员叶飞在胡璉的十二兵团已到达金门岛时，仍以为胡璉兵团还在海上徘徊，认为此刻发起登陆作战是一个战机，于是，在未审核二十八军作战方案的情况下，召集兵团作战处长和福建省有关人员，凭二十八军的一纸电报进行研究，仓促地批准了第二十八军于24日晚攻击金门的战斗。

10月24日晚7时，二十八军第一梯队登船完毕后，“前指”曾一度犹豫，再次向兵团请示，是否按原计划行动？而怀着捕捉战机心理的兵团领导方面传来不容变动的指示：决心不变！

24日深夜涨潮之时，由二十八军八十二师二四四团、八十四师二五一团和二十九军八十五师二五三团组成的进攻金门第一梯队分别从莲河、大橙岛、后村等地启航，参战官兵摩拳擦掌，跃跃欲试，向预定目标扑去。

由于整个登陆作战中没有一名师以上的指挥员，原先计划中的八十二师指挥所也因船少而未参加第一梯队的登陆作战，加之渡海前各部队也没有进行协同演练，所以，登陆船队一离开码头，即同上级指挥部失去联系，并且在航渡中遭到国民党炮火拦截时，登陆船队又缺乏协同作战的经验，一些船队在航渡中被打散。

尽管如此，第一梯队的三支登岛部队在25日凌晨2点分别登陆成功，左翼二四四团在金门岛峰腰部北岸的琼林、兰厝间登陆成功，抓获国民党官兵100多人，占领了敌人10多个碉堡；中路的二五一团先头营在金门西北部的安歧以北、林厝以东顺利登陆后，后续营的登陆却遭到敌炮火的猛烈袭击，伤亡近三分之一；右翼二五三团在西北角的古宁头、林厝间顺利登陆后，随即向敌发起进攻，于拂晓前攻占了古宁头滩头阵地。

但令人遗憾的是，三支登陆部队竟没有能有效组织登陆船只返航接运第二梯队跟进，也没有先巩固滩头阵地，除了右翼的二五三团留下一个营巩固古宁头滩头阵地外，三支登陆部队没有统一指挥，没有按照作战前兵团司令叶飞交代的方案行动，而是向纵深处狠打，向料罗湾方向追击敌人。

这时，胡璉在蒋介石的严令下，已在料罗湾集结。解放军登陆部队脱离古宁头阵地10余公里。胡璉得知这些情况，下死命令将该兵团的第十八军加

入战斗，来个反包围，又派迂回部队占领了古宁头滩头阵地，切断我军后路。我人民解放军一贯采用的“诱敌深入、集中优势兵力围而歼之”的战术在这里反被胡璉用了个正着。

人民解放军登陆部队使用的船只因潮水退落，不幸在海滩上搁浅，被敌人全部击毁。25日晨，敌人第二一师、四十五师及胡璉兵团的第十九军等部，在飞机、军舰火力支援及坦克伴随下，向解放军登陆部队实施连续反击。

25日上午6时，肖副军长、八十五师师长兼政委朱云谦等心急如焚，指挥员们隔海看到了敌军轰炸的炮火中燃烧的船只，原定运送1.1万人登岛作战的第二、第三梯队计划已难以实现。无奈之中，他们请求兵团领导给予援助，请求派船支援，可哪里还有船只。

登陆部队的强大进攻，给国民党守军以极大的杀伤。为了保住台湾的前沿阵地，为了给台湾岛留下一个屏障，蒋介石决定不惜一切代价“挫败共军之行动”。在严令胡璉兵团进入金门岛的同时，又于24日凌晨4点命令国民党海防第二舰队司令黎玉堃少将亲率旗舰“太平”号自澎湖基地开往金门岛增援。金门守军增至4万人以上，由汤恩伯和他的顾问——日本侵华重要战犯、原日军华北方面军司令官根本博统一指挥。

登陆部队英勇苦战，26日晨仍在双乳山、乳山激战。最后，三支登陆部队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只好冲破敌人包围，会合至古宁头与敌激战。

人民解放军第十兵团部为解登陆部队之危，下令紧急动员船只，但毕竟由于时间太紧，老百姓手中的船只大小，26日3时，运送四个连于湖尾乡登陆，歼敌一部，后向双乳山一线推进，并积极与第一梯队取得了联系。但因众寡悬殊，遭敌包围，在团长孙玉勰的带领下，突破了敌人的封锁，来到古宁头，与第一梯队汇合，不过，由于第二梯队增援人数实在太少，众寡悬殊且四面受敌而无法改变战局。人民解放军第十兵团司令员在后来回忆录中写道：“我们手中一条船也没有了，只好徒呼奈何！眼睁睁地看着部队在敌众我寡的情况下奋力坚持而又束手无策，当时的沉痛心情真是难以描述！”

26日是进攻金门将士极为悲壮的一天。天亮后，岛上的情况急剧恶化，经过休整的国民党驻岛主力部队再次在海空军的掩护下向古宁头、林厝、埔头一带猛烈反扑。据当天上午接到登陆部队传来报告称，二五一团、二五三团现存人数已不过100人。

26日上午，国民党第十二兵团司令胡璉赶到金门，与汤恩伯等人一起到前线督战。国民党步兵对古宁头久攻不克，胡璉、汤恩伯等要求台湾派飞机对村中建筑猛烈轰炸，再用坦克炮和火箭筒逐一抵近民房射击，即使如此，在解放军顽强的巷战、肉搏战坚持下，敌3个师的兵力经过整整一天的反复冲击，也未能冲破解放军的阻击。

26日深夜，早已弹尽粮绝、两昼夜未进粒米的登陆部队难以支持了。这时，登陆的10个营已伤亡5000多人，已没有完整的连和营。几位团长和教导员在山沟里举行了临时作战会议，决定将所存部队分散打游击。

这时，二十八军前指与登陆部队的联系逐步中断了。27日凌晨，二五三团团团长徐博来电说，该团一营600多官兵已在古宁头全部牺牲，全团剩下的150多人和二四四团的70多人正准备到海边找船，这是二五三团的最后一次来电，之后便杳无音信了。二五一团团团长刘天祥最后一次与军前指通电话说：“我的生命不长了，为了革命没二话，祝首长好。新中国万岁！共产党万岁”说完自爆而死。



28日上午，二四六团团长沙玉彪带领的最后一批官兵不幸又在沙头附近被包围，在突围无望的情况下，孙玉彪团长负伤后自尽，其余战士全部被俘。二四四团团长沙永生负重伤后被俘，不久牺牲。

到28日下午3点，岛上的枪声平息下来。

金门之战的失利，引起全军、全国的震动，这次失利在我军战史上也是极为罕见的。过去战史上的几次失利如长征中的湘江之战、红军西路军的失败及皖南事变损失的人数不少，但却没有一次全军覆没，而这一次，却损失了全部投入作战的3个团9000余人，除部分被俘外，大都壮烈牺牲。

金门的国民党军也损失惨重，据台湾报纸透露，伤亡人数至少在9000人以上。蒋经国战后上金门“慰劳蒋军将士”，也不禁哀叹：“俯瞰全岛，触目凄凉，车至汤总部途中，尸横遍野，血肉模糊。”

金门失利之后，毛泽东下令把解放海南岛作为下一个目标。

1949年12月18日，毛泽东在出访苏联途中亲自起草了给第四野战军司令员林彪的电报，对解放海南岛作了部署。

从1950年3月5日到5月1日，历时57天的海南岛战役结束。

1950年6月6日至9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了七届三中全会。全会上毛泽东代表中央提出了“为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基本好转而斗争”的总任务，同时提出“解放台湾、西藏，跟帝国主义斗争到底”的任务，在全会上，解放军代总参谋长聂荣臻作了关于军事工作的报告，华东军区副司令员粟裕也汇报了解放台湾各项准备工作情况。粟裕请求由中央军委直接组织指挥台湾战役，毛泽东却决定这一战役仍由粟裕指挥。中央军委、毛泽东作出这一决定，是国为粟裕在解放战争的多数时间里实际担负了华东战场的主要指挥责任，1948年陈毅调任中原军区第一副司令员后，粟裕又担任了华东野战军代司令员，在华东战争中显出高超的指挥才能。

正当中央军委忙于调兵遣将，积极准备渡海攻台之时，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美国政府以此为借口出兵台湾。6月27日，杜鲁门宣布，派第六舰队驶向台湾，阻止共产党从大陆进攻台湾。

8月11日中共中央军委致电华东军区司令员陈毅，指示：决定1951年不打台湾，待1952年看情况再作决定。金门可决定在1951年4月以前不打，4月以后待命再打，随后，人民解放军停止了攻击金门和沿海其他岛屿。

海峡之间从此横卧了一只“拦路虎”。

## 蒋介石永别大陆

国民党李宗仁政权由广州迁往重庆后不久，李宗仁以赴美治疗胃病为由从桂林到了香港，由香港转机赴美。

蒋介石见“代总统”溜走，暴跳如雷，大骂不休：“娘希匹。德邻出国，既不辞职，亦不表示退意，仍以代总统而向美求援，如求援不遂，即留居国外不返，而置党国存亡于不顾，此为谋个人利害打算，其所作所为，实卑劣无耻极矣！”

而李宗仁并不感到难为情，他自有自己的一番说辞：

“窃思国事至此，我回天无力。我纵不顾个人的健康留于国内，亦属于事无补。一旦国亡身死，此种牺牲实轻于鸿毛，倒不如先行医治夙疾，如留得一命，则将来未始没有为国效死的机会，因此我便决定赴美就医。”

11月28日，阎锡山率国民党“政府”机关人员由重庆逃迁成都。

12月7日，国民政府迁往台北。

12月9日，云南省主席卢汉起义，并致电西康省主席刘文辉，要刘会同四川将领，扣留蒋介石，成为“成都政府的第一功臣”。12月10日，刘文辉、邓锡侯，潘文华在四川彭县宣布起义。

1949年12月10日。

成都凤凰山军用机场，戒备森严。

阵阵寒风掠过枯草，苍凉的气氛笼罩着整个机场。

2点过，几辆军车保护一辆小轿车急驰而来，戛然停在轰然作响的飞机旁。

身着戎装的蒋介石匆忙打开车门，又迅速地钻进了飞机。

很快，专机轰鸣着冲向天空。

这时，解放军的炮弹落到尘埃未定的机场上。

机舱内，中国国民党总裁蒋介石看了看硝烟中的飞机场，长吁一口气，艰难地合上了眼睛。

两行浊泪涌出他的双眼。坐在一旁的蒋经国见此情景，也是鼻子一酸，满脸愁云。

经过与共产党28年的生死相搏，他们败阵了，落荒而逃，他们要飞往台湾——那个经营了数年的“复兴基地”。

1950年3月1日，蒋介石在台湾重新上台，再度行使总统职权。

直至1975年4月5日，蒋介石在台湾病逝。

## 第十二章 新中国的外交政策

斯大林一度不了解中国国情。罗斯福总统曾劝蒋介石搞改革，赫尔利却拼命扶植蒋政权。中国革命胜利前夕，斯大林派米高扬来华听我党领导人意见，随后亲自向毛泽东道歉。中国共产党外交政策决定一边倒，毛泽东亲赴苏联向斯大林祝寿，两国友好条约令全世界瞩目。

### 斯大林认为中共是“人造奶油”

毛泽东入主中南海前后，一个十分急切而又必须面对的问题是外交。

中国共产党在成立后的相当长时期内，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而共产国际的领导一度给中国革命的发展带来了一定损失。

1938年底中共派周恩来率代表团赴共产国际汇报工作，对中国的特殊情况作了科学、合理的分析。而共产国际则发表了一份措辞十分笼统的决议，表示对中国问题以后只是指导而不再直接干预。

1941年底至1942年初，在延安的中共中央经过努力又与共产国际重新建立了通信联系，毛泽东给共产国际和斯大林发去了长达万言的文章，他分析了中国的抗战局面，认为对国民党不应存幻想，共产党人必须依靠人民、领导人民进行抗战，对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活动必须作坚决的斗争。

尽管毛泽东的阐述人情人理，但莫斯科就是理解不了。斯大林坚持认为，中国共产党不应与国民党进行斗争。

1942年底，斯大林曾派人到延安要求中国共产党派毛泽东的俄文翻译去莫斯科向他汇报工作，毛泽东出于种种考虑拒绝了，这加重了斯大林对毛泽东和他领导下的中国共产党的疑虑。1943年共产国际解散时，过了很长时间中国共产党才收到有关通知。

1944年6月10日，美国驻苏大使哈里曼求见斯大林与莫洛托夫，双方就中国问题进行会谈。当哈里曼开始回顾罗斯福曾在德黑兰说的，即蒋介石是唯一能把中国合在一起的人时，斯大林立即表示同意。

他说：“在目前情况下，蒋介石是最恰当的人，因而必须给予支持。”

在谈到中国共产党时，斯大林笑了：“中国共产党人不是真正的共产党人，他们不过是些‘人造奶油’共产党人而已。”但他也承认，中共是真正的爱国者，他们跟日本人作战是坚决的。

1945年4月15日，美国国务卿赫尔利在与斯大林会晤时也谈到了中国问题。

赫尔利说：“中共事实上并非共产党，他们的目标在于获得他们视为中国必须但适当的改革，我看得出来，苏联并不支持中共，你们不愿中国内部因意见分歧而发生内战。”

斯大林表示，他愿意和英美合作，完成对中国军队的统一。他称蒋介石“是一个爱国志士”。

1945年5月26日，对罗斯福总统的外交政策有很大影响的霍普金斯与斯大林谈到了中国的统一问题。斯大林说，苏联人民不会是一个以任何方式阻挠中国统一的因素，相反，帮助中国取得统一是苏联的愿望。至于蒋介石这个人，斯大林说，他对任何中国领导人都不太了解，但是他觉得蒋介石是中国领导人中最好的，统一中国的人将是蒋介石。他说：“我看不到其他可

能成为全中国领袖的人，我不相信中共的领袖们有蒋介石那样好，也不相信他们有能力完成中国的统一。”

斯大林对毛泽东仅有的那点了解来自于王明等人向他灌输的错误汇报，而毛泽东在二战期间又不肯让他手下的军队听从斯大林的调遣，没有按斯大林的指示调兵长城附近减缓日本对苏联边境的压力，种种因素使斯大林对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形成了错误的认识。

中国8年艰苦抗战，终于取得胜利。

和平建国是中国人民的共同愿望。然而，一直将中国共产党看成眼中钉的蒋介石开始了紧锣密鼓的内战准备。在此情况下，对中国革命实际情况缺乏足够了解的斯大林做出了令中国共产党人非常被动的举动：

日本投降签字前夕，蒋介石国民党政府的代表宋子文、蒋经国等人来到莫斯科，同斯大林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

蒋介石一向将苏联人看作中国共产党的后台，有了这个条约，他颇觉踌躇满志。因为要打要和，他是站在主动地位的，然后他给延安发了一封电报，邀毛泽东到重庆谈判。

蒋介石打着如意算盘：如毛泽东拒绝来渝谈判，那么就把破坏和平建国的帽子扣在毛泽东的头上，如他肯来，也可以操纵谈判，利用这段时间做好内战的准备。

斯大林的电报也到了延安。一副命令的语气：

中国不能再打内战，否则中华民族就有毁灭危险。

“究竟是谁想打内战？”毛泽东接到电报，气愤地一把将电报扔到桌上。

斯大林因为低估中国共产党的力量，过高估计当时垄断着原子武器的美帝国主义及国民党的力量，在美、蒋大搞和谈阴谋、争取时间、运送军队、扑灭中国革命时，他不仅遵守雅尔塔秘密协定、1945年《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及其他协议，居然还支持中国共产党与美、蒋和谈，要毛泽东与蒋介石达成协议，支出军队。他还以苏共中央的名义致电中国共产党，要中共向国民党妥协。

中国共产党很快就给斯大林回了电报，阐述了对中国局势的看法。

不久，斯大林又拍第二封电报：

世界要和平，中国也要和平，尽管蒋介石挑衅打内战消灭你们，但他已再三邀请毛泽东同志去重庆协调和平建国事宜，在此情况下如果一味拒绝，国内国际各方面就不能理解了。如果打起内战，战争的责任由谁来承担？我建议毛泽东同志到重庆去参加会谈，他的安全由苏美两家负责。

毛泽东接到电报，不断地吸着香烟，半晌没有说话。

一会儿，毛泽东猛地把烟蒂往地上一扔：“去！”

几天后，毛泽东在延安机场向当地军民告别，飞赴重庆参加谈判。

毛泽东和蒋介石的谈判进行得十分艰苦。为了国家和和平，毛泽东作了必要的但不损害人民根本利益的让步，与蒋介石签订了“双十协定”。

然而“双十协定”墨迹未干，蒋介石便指挥军队向共产党控制区发动了频频进攻。毛泽东对斯大林不准中国共产党反击的意见置之不理，对蒋介石采取了“针锋相对，寸土必争”方针，狠狠地回击了蒋介石的进攻。

## 中国共产党一度希望得到美国的理解支持

抗战后期，为了建设一个光明的中国，中国共产党除了在内部加强人民力量外，在外交上也进行了艰苦的努力。有中、苏、美、英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通力合作的背景，中国共产党开始的确是真诚希望各抗日盟国，尤其是美国能够帮助中国避免内战，而美国当时出于对日作战的军事考虑，也需要与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根据地和武装力量进行合作，于1944年7月向延安派出军事观察组“迪克西使团”。中国共产党利用这一契机，开始了与美国政府间的正式交往。

1944年8月15日，当时的中共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发表了经毛泽东亲自修改审定的题为《欢迎美军观察组的战友们》的社论。8月18日，中共中央还专门作了《关于外交工作的指示》，要求各地各级组织应把观察组的到来看作是“我们在国际间统一战线的开展，是我们外交工作的开始。”

中国共产党人的外交工作，便是从与这个美军观察组打交道开始的。

借此机会，经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领导人与观察组的包瑞德、谢伟恩等人进行了多次长谈，希望美国敦促国民党结束一党专政，把援华物资公平地分给共产党军队，消弭内战基础；如国民党拒不实行改革，则希望美国对共产党采取一项正确的决策，并希望美国积极援助战后中国的和平建设；在延安建立领事馆继续对延安进行考察。对此，谢伟恩向美国国务院报告说：

我相信，中共现在真心诚意地寻求在美国支持基础上的中国统一。这并不排除他们再转向苏联，如果他们在美国援助的国民党进攻下而不得不这样做的话。

诚恳而坦率的交谈，使中国共产党和迪克西使团的关系迅速地密切起来。

然而在蒋介石的强烈反对下，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却公然采取了单方面援蒋和反共的政策。

在得到美国援助后，蒋介石更加肆无忌惮，变本加厉地抢占地盘，造成抗战后中国空前的内战危机。

仅从1946年3月至6月间，驻华美国海军就帮助国民党运送8个军到东北和华北，蒋介石终于在1946年6月底挑起全面内战。

内战爆发前夕，中国共产党一直没放弃同美国建立友好合作的愿望。1945年初，中国共产党还打算派一个非正式的代表团到美国访问，就中国问题与罗斯福总统直接商谈。1945年12月，毛泽东对美国国务卿马歇尔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他说，美国有许多方面值得我们学习，一是华盛顿时代的民族独立精神；二是林肯时代的民治、民有精神和罗斯福的四大自由精神；三是美国的农业改革和国家的工业化。1946年1月31日，周恩来在向马歇尔转达毛泽东的信件时还说：“如果美国能在处理中国问题上持完全公正的态度，中国共产党人准备在这个基础上同美国进行合作。”

为了打消马歇尔对双方意识形态对抗的顾虑，周恩来强调说，我们在理论上主张实行社会主义，但目前不打算将其付诸实现，所以要学习美国的民主与科学，要使中国能进行农业改革，工业化，使企业自由发展个性，进而建成一个独立、自由、富强的国家。

然而从赫尔利到马歇尔，实际上都想把中国所有的军事力量和政治集团统一到蒋介石的领导下，保存现有的国民党政权，由所谓少数党和武装集团

组成并无实权的松散联盟从属于国民党政权。

美国人帮助国民党抢占地盘，从根本上辜负了中国共产党在外交上的诚意。

虽然罗斯福曾劝说蒋介石在政治上进行一些民主改革，建立一个包括共产党在内的联合政府，但是，他最终采纳了赫尔利扶蒋反共的下策，支持蒋介石发动内战。

抗日战争时期，美国政府的对华政策一直在不断变化。抗战初期，美国推行“不承认主义”和“不干涉”政策，一方面拒不承认日本法西斯侵占中国大片领土，另一方面对日妥协，企图以牺牲中国为前提条件，把祸水引向北面，挑起日苏战争。继而又采取以华制日的政策，1941年12月8日珍珠港事件的爆发，才促使美国与中国结成同盟。

为了共同对付日本法西斯，美英在军事上设立了“中国战区”，给国民党政府大量军用物资和经济援助，主动放弃过去不平等条约给予美国的在华特权，在国际提出中国为世界四强之一的大国地位。不过，罗斯福当时采取扶蒋政策，不但是为了联蒋抗日，也是为了战后通过蒋介石政府控制中国，遏止苏联。以后随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武装力量的不断发展壮大，罗斯福越来越重视对共产党问题的处理。

1943年10月，罗斯福试图同延安建立联系，命令战略情报局开始在共产党控制区收集情报。2月，罗斯福在开罗会议期间，曾劝说蒋介石在政治上进行一些民主改革，建立一个包括共产党在内的联合政府。

从1943年下半年开始，美国对华政策，从单纯扶蒋演变成扶蒋又联共的两面性政策，这样既可以把国共两党的军事力量都集中起来打击日本人，又可以防止共产党倒向苏联，以达到战后控制中国遏止苏联的目的。

1944年5月，美国国务院发表的一份文件宣称，“美国并未承担在任何情况下都支持国民党政府的义务”。同年7月10日，美国副总统华莱士在访华后给罗斯福的报告中说：国民党政府“是由一个地主、军阀和银行家支持的落后无知的政府”，蒋介石本人“并没有治理战后中国的智慧和政治力量”，因此美国“对蒋介石充其量不过是一项短期的投资”。他预言，“战后中国的领袖将在政治演变或革命中涌现出来”。

由于国民党军队抗战不力、蒋介石又向美国讨价还价索取大量物资援助，引起当时担任蒋介石参谋长的史迪威和罗斯福的反感。有人提出“我们必须限制我们与国民党的牵涉，而开始与注定将控制中国的力量——共产党进行某些合作”。

滇缅战役爆发后，由于蒋介石军队的腐败无能，罗斯福对蒋已失去信任，1944年7月7日，他打电报要蒋介石把军事指挥权交给史迪威上将。而蒋介石则用拖延应付的办法抵制罗斯福。他在给罗斯福的回电中表示，原则上同意交出军权，但要罗斯福派一位私人代表来华。于是罗斯福在征得蒋介石同意后，于8月18日委派赫尔利赴华。

临行前，罗斯福告诉赫尔利：其来华的直接使命有二：一是调解蒋介石与史迪威之间的紧张关系，设法使蒋介石交出军事指挥权；二是调解国共关系，促成两党合作，执行美国政府扶蒋联共的对华政策。

在调解蒋介石与史迪威关系的问题上，赫尔利向罗斯福建议，不能再支持史迪威了，否则“将失去蒋介石”，“并且还会连同失去中国”。于是，罗斯福决定由魏德迈来接史迪威的职务。

在调解国共关系的问题上，赫尔利开始是相当卖力的。直到 1944 年 11 月赫尔利延安之行，与毛泽东共同签订“五项协议”，都看不出他与他的同胞高恩大使、华莱士副总统、以及谢伟恩等人有什么区别和矛盾。然而，当蒋介石坚决反对延安“五项协议”时，赫尔利完全站到了蒋介石一边，开始推行他的扶蒋反共政策，并与谢伟思等大多数美国在华人员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和斗争，谢伟思与赫尔利之间的分歧与斗争，如当时延安《解放日报》在一篇时事述评中概括的那样，“是美国对华政策两条不同路线”的争论：“一条路线承认中国人民的伟大民主力量和这个力量的中坚——中国解放区、八路军、新四军，因而主张和这个力量合作，反对中国反动派利用美援来打内战，愿意以美国的影响促进中国的民主团结，以加速抗日战争的胜利，增进中美两大国家的反法西斯事业的真正友谊”；“另外一条路线”，“不承认中国人民的伟大力量，而只承认‘反民主的而又不是中国人民代表的’国民党政府及其蒋介石”，认为“他就是中国……因而采取支持中国反动派的方针，实际上助长了中国的内战危机，妨碍了对日抗战的共同事业”。

由于在执行罗斯福调解国共关系，促成联合政府的过程中，出现了谢伟思与赫尔利为代表的两种主张的分歧、争论、斗争，因此，当时美国政府对华政策中出现了矛盾、对立和反反复复的复杂情况。毛泽东在和谢伟思等美军观察组成员交谈中，在与赫尔利打交道过程中，得到的是友好、合作和敌视、不断施加压力两种绝然不同的态度，以至于他对谢伟思表示：“美国最近在中国所显示的政策仍是一个谜。”

1944 年底，赫尔利公然撕毁他签过字的延安“五项协议”，支持蒋介石的三项“反建议”，并拒绝周恩来提出的“讨论军事合作问题”的建议。至此，赫尔利成为中国战后和平统一的障碍。

对于赫尔利这种企图把美国和蒋介石挂在一起的作法，引起美国大多数在华人员的强烈不满。当时美国财政部驻华代表爱德华，在写给财政部长摩根索的信中说，赫尔利“完全误解了和歪曲了现实。极需要华盛顿施加压力的，不是共产党而是国民党人。”爱德华希望摩根索能促使罗斯福约束一下赫尔利，否则赫尔利“铸下的大错误很可能导致内战，使共产党人完全同美国疏远，并使中国变成苏美冲突的焦点。”

1945 年 2 月 28 日，美国驻华使馆全体官员，趁赫尔利回国述职之际，联名打电报给国务卿，指出“赫尔利大使的行动已经损害了中国和平统一的任何机会”，现在“避免内战的唯一希望在于表明美国愿意和延安合作，并迫使蒋介石和中共分享权力。”

面对着这些尖锐的批评，赫尔利联合了一切反动势力开展反共活动。再加上由蒋介石集团和一批美国右翼政界核心人物组成的“院外援华集团”，也在发出鼓噪。这时候，罗斯福只能听到赞扬蒋介石的消息，这使他原来厌恶蒋介石的看法发生了动摇，反而认为自己并不了解蒋介石，希望能听听赫尔利对蒋介石的看法。

最终，罗斯福接受了赫尔利的主张，认为美国对中国共产党的直接援助将会同时招致苏联武器进入中国。这将破坏他战后控制中国的计划，并将遭到国内的攻击，说他帮助中国建立共产主义政权。

1945 年 4 月 2 日，赫尔利在华盛顿发表谈话，表示美国政府只支持国民党，不支持共产党，把共产党拥有的武装力量指责为阻碍中国和平统一的主要障碍。

到此，标志着美国政府由扶蒋联共的两面性政策，转变成为扶蒋反共的政策。

罗斯福是一位卓越的富有远见的资产阶级政治家，在第二次世界反法西斯的斗争中，是他力主打破思想意识的界限，和社会主义苏联结成联盟。毛泽东曾对他寄予希望，表示要耐心等待他连任总统后，能对国民党施加“直接影响”，来促进中国的战后和平民主。

毛泽东认为，没有罗斯福的指示，赫尔利是不会到延安签订“五项协议”的。然而，由于历史的、阶级的原因，罗斯福在逝世前夕，改变了原来与共产党友好合作的打算，支持并赞扬了赫尔利的主张。

由于罗斯福的支持，赫尔利扶蒋反共的政策得以确立，谢伟思等 11 人以“亲共”嫌疑遭逮捕，美国对华政策两种主张的争论、斗争到此结束。从此美国完全走上了反对中国共产党的道路。

### 斯大林对中国共产党表示的亲态度和反应冷淡

1946 年 6 月，美国国务院向国会提出 10 年军事援蒋法案，中国共产党对美国的态度也开始转向强硬。

6 月 25 日，《解放日报》发表题为《要求美国改变政策》的社论。但社论中依然重申“中国人民爱好和平，既不反苏也不反美”的立场。但美国支持下的蒋介石军队凭借精良的武器装备，恶狠狠向共产党扑来。内战初期，共产党指挥下的军队难以抵挡蒋介石的凶猛进攻，采取了战略防御的对策。面对蒋介石的猖狂进攻，中国共产党不得不接受国际形势所能容许的选择，放弃中立，转而寻求苏联的支持。

1946 年 8 月，毛泽东曾与安娜·路易斯·斯特朗谈到：“美国和苏联中间隔着极其辽阔的地带，那里有欧、亚、非三洲的和许多资本主义国家和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美国反动派在没有压服这些国家之前，是谈不到进攻苏联的，许多国家是直接站在反帝斗争前线的独立的民主势力，它与苏联是相互同情和声援的关系，既非军事同盟，也不是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

1947 年 9 月，苏共第二号人物日丹诺夫在欧洲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成立大会上指出，世界已分裂为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阵营和以苏联为首的民主阵营。

此时，中国内战的形势已发生了重大变化，中国人民解放军已转入战略反攻阶段。为明确中国共产党反对美帝国主义的态度，毛泽东在 1947 年 12 月举行的中央会议上作了《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报告，第一次将世界政治格局划分为帝国主义阵营和反帝国主义阵营，并明确指出中国共产党所属的第二阵营以苏联为首。这样，中国共产党从理论上彻底否定了中立的可能性，改为依靠苏联。

到了 1948 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在各个战场上完全掌握了主动权，并频频发起攻势，人民解放战争的彻底胜利指日可待。

1948 年 4 月，中共中央部分领导在毛泽东主席的率领下来到河北省阜平县城南庄。在这里，毛泽东正酝酿一个秘密：他准备赴苏联面见斯大林！

苏联方面收到中共中央为此征求意见的电报后，很快给毛泽东回电。

斯大林的意思是，目前中国革命处于紧要关头，毛泽东作为最高统帅，不宜离岗位太远。如果有什么重大问题，苏方可派一名高级领导人，来中国



听取毛泽东的意见，并希望中国同志和毛泽东主席能慎重考虑。

经过深思熟虑，毛泽东决定采纳斯大林的建议，暂不出国，而是请苏联派人来。

6月28日，铁托领导下的南斯拉夫共产党因为坚持走独立自主道路而与斯大林发生顶撞，被开除出共产党情报局，毛泽东为了表明中国共产党的态度，立即召集中央会议作出了《关于南共问题的决议》，表示完全同意共产党情报局对南共的处理意见。

然而，斯大林对中国共产党表示出的亲和态度反应十分冷淡。

8月，苏联外交部给中共中央转来国民党政府写给苏联领导人的一封信。国民党当时已处于被动的军事地位，他们要求苏联出面压一压中共，“不要再同室操戈”。苏联人将信原封不动地转给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未置评论。

周恩来看了看信，发现信是由国民党外交部长王世杰亲笔写的。

毛泽东听秘书念罢，一言不发。

苏联人的做法虽巧妙，但毛泽东的反应更高明：你不发表评论，我也来个不予理睬。

这时的斯大林还不肯公开表示支持中共。

为了进一步向斯大林表明诚意，同年11月，为庆祝十月革命31周年，毛泽东撰写了《全世界革命力量团结起来，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一文，其中有这样一段话：

“31年的历史难道还没有证明：一切既不满意帝国主义，又不满意苏联的人们，一切企图站在帝国主义的反革命战线和反对帝国主义及其各国的走狗的人民的革命路线之间的所谓‘中间路线’、‘第三道路’的虚伪和彻底破产吗？”

文中，毛泽东还强调了苏共对中国革命的积极影响：

“既要革命，就要建立一个列宁、斯大林式的革命党。……中国共产党就是依照苏联共产党的榜样建立和发展起来的一个党。”

刘少奇也发表文章指出：“不站在这一边，又不站在那一边，而实行中立，则是不可能的。”

1949年1月，人民解放军包围北平。

这天，毛泽东的俄文翻译师哲和中央警卫队领导人一起来到石家庄，将任弼时的一封亲笔信交给聂荣臻，向他说明中共中央要使用石家庄飞机场。

聂荣臻马上派兵整理好机场并加强警戒。

### 米高扬抵达西柏坡，但他只是带着耳朵来的

1949年1月31日，北平和平解放。

当中国人民解放军举行隆重的入城仪式的时候，一架苏军飞机在石家庄机场降落。

斯大林的使者米高扬，顺利抵达石家庄。米高扬下飞机后，在汪东兴、师哲陪同下到达西柏坡。

米高扬化名安德列夫。他在西柏坡逗留了一周。其间于2月1日、2日、3日与中共中央书记处的五大书记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任弼时一共会谈了3个整天。主要由毛泽东一人谈，其余同志偶尔插几句。

米高扬转达了斯大林与苏共中央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问候和祝愿，接着

呈上斯大林赠送给毛泽东的一块毛料作为礼品。

之后，米高扬介绍了自己的来意。他说，斯大林欢迎毛泽东去苏联，但当前中国革命形势迅速发展，正处在关键时刻，毛泽东同志不宜离开指挥岗位。另外还要考虑到中国境内要通过敌人的封锁线，这样怕不安全，还怕影响毛泽东同志的身体健康。因此，斯大林不主张毛泽东在这时去苏联，派我来听取中国同志的意见，回国后向斯大林汇报，任何事都由斯大林决定。

开始交谈时，米高扬按国际惯例行事，由他带来的翻译柯瓦廖夫负责俄译中，师哲负责中译俄。但柯瓦廖夫中文的口语不行，于是改让他担任中译俄，但他几乎听不懂一句中国话，更听不懂毛泽东的湖南口音，米高扬又再三催促，急得他满脸通红，汗流浹背，慌乱之中，更是听不懂，讲不出。

米高扬还一个劲地催他说：“柯瓦廖夫，你怎么成了哑巴？”“要是在别的场合，今天我一定要捶你一顿。”

师哲赶快为他的同行柯瓦廖夫打圆场。他说：“他可能听不懂湖南口音，方言难懂些，这是可以原谅的。”然后只好由师哲担任会谈中的全部翻译工作。

初步交谈后，周恩来说：“米高扬同志，你们远道而来，乘坐汽车，路又不好走，他们都疲劳了，就不要多谈了。现在就吃饭，晚上你们早点休息，明天下午再谈怎么样？”

米高扬表示同意，接着开始吃饭。

餐桌上十分丰盛。有滹沱河里的鲜鱼做的红烧鱼、溜鱼片，有烧里脊、炖鸡块、扣肉，还有凉菜。西餐有猪排、牛排、肝子肉、煎鸡蛋、沙拉子等，还有黄油和面包，以及事先从石家庄买来的汾酒和葡萄酒。

大家入座后，毛泽东以东道主的身份首先举杯向米高扬等客人敬酒。他说：“对你们远道而来表示欢迎，同时也表示感谢。”

刘少奇也向米高扬等敬酒，表示对他们的欢迎。

周恩来说：“我不敢像米高扬等同志那样喝那么多的酒。我可以代朱老总和任弼时同志向你们敬酒，他们两位一老一少，朱老总有喉炎，不能喝酒，任弼时同志虽然在我们几个当中最年轻，但他有高血压，也不能喝酒。只好我代表他们二位敬你一杯，干杯。”

米高扬等人对汾酒很感兴趣，夸这种酒好喝，而毛泽东只喝一点葡萄酒，刘少奇喝点白酒，也不多。喝了一会酒后，便开始吃饭。米高扬夸奖中国的饭菜好吃，可就是不会做。他说将来中国革命胜利了，要派人来学做中国的菜肴……

饭后，周恩来把客人们送到西柏坡的后沟休息。

次日下午3时，会谈继续进行。

会谈中，毛泽东首先谈到胜利后我们所要建立的新政权的性质、形式、组成等问题。

毛泽东对米高扬说，这个政权的性质简要地说就是：在工农联盟基础上的人民民主专政，而究其实质就是无产阶级专政。不过对我们这个国家来说，称人民民主专政更为合适、更为合情合理。

关于这个政权的组成及其成员问题，毛泽东申明它必须是联合政府，名义上不这样叫，而实际上必须是联合的，有各党各派、社会知名人士参加的联合政府。他说，各民主党派已同我们合作多年了，他们在知识界、海外侨胞中都有一定的影响。我们准备继续团结他们，照顾他们，给他们在政府部

门的各个岗位上留下一定的位置。但国家政权的领导权是在中国共产党手里，这是确定不移的，丝毫不能动摇的。

毛泽东又强调：总之，将来政府的组成大概就是这样的，中国共产党是核心，是骨干。这样的新政权建立后，需要不断加强和扩展统战工作。

毛泽东还与米高扬谈到了革命胜利后恢复生产和经济建设的问题。他说，我们一取得胜利、国家一解放，接踵而来的任务就是恢复生产和经济建设。中国连年战争，经济遭到破坏，人民生活痛苦，战争一旦结束，我们不但要恢复生产，而且要建设崭新的现代化的、强大的国民经济……

关于革命成功后将要实行的对外政策问题，毛泽东打了一个形象的比方，就是“把屋子打扫干净，再请客人进屋”。

他说，如果把我们的国家比作一个家，那么现在它的屋内是太脏了，柴草、垃圾、尘土、跳蚤、臭虫、虱子什么都有。解放后，我们必须认真清理我们的屋子，从内到外，从各个角落以至门窗缝里，把那些脏东西通通打扫一番，好好加以整顿。等清洁了，陈设好了，再请客人进来。朋友们走进我们的门，建立友好关系，这是正常的，也是需要的。但那些向我们探头探脑，想把他们的脚踏进我们屋里的人是有的，我们暂时还不能理睬他们。至于帝国主义分子，他们抱着不可告人的目的来混水摸鱼，我们则不欢迎这样的人进来。

关于建国后如何对待民族资产阶级的问題，毛泽东指出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是很软弱的，他们虽属于剥削阶层，但同时也受外国资本家的压迫和剥削，而且在政治上软弱无力，甚至受压抑和排挤。对这部分人我们要采取联合、利用、改造的方针，使其为祖国建设服务。他们也是乐于接受这个政策的。我们利用了他们的积极性，也给了他们施展才能的机会，参与国事的权利和应有的社会地位。总之，在恢复和发展生产中，必须发挥和利用民族资产阶级的积极性。当然也要防止出现消极现象。

毛泽东还向客人谈到中国共产党的民族政策问题。他说，中国是多民族的国家，有几十个民族。我们在民族政策上主要是反对大汉族主义，同时也要反对地方民族主义。民族政策必须端正，民族压迫必须取缔，民族间纠纷必须妥善排解。我们提倡各民族互相团结、互相友爱、互相合作、共同建国。

米高扬对毛泽东连续三天的宏论表示钦佩。他认为毛泽东有远大的眼光、高明的策略，是一位了不起的领袖。

由于毛泽东对未来新中国的模式已有过认真思考，因此谈起来严谨周到、引人入胜，客人对此十分满意。

在谈到人民群众的强大力量和由此涉及的工、青、妇问题时，毛泽东说，中国的青年，这个几乎占全国近半数人口的群众，除青年团那样的组织形式外，恐怕还得建立发展其他类型的组织，如学生联合会或其他青年组织形式等。

这时，米高扬插话说，成立几个不同的青年组织是否会分散、甚至分裂青年层的力量，是否会引起青年工作中的矛盾和磨擦？为了便于对青年们的组织和领导，是否只要一个共青团组织就行了？

毛泽东听了米高扬的插话，不高兴地说，中国青年人口总数有两亿多，怎么可以用一个组织把他们圈起来？圈起来怎么做工作？对青年工作的形式和方法应该是恰当的、灵活的。自然，也要保证它们能发挥自己应有的作用。

这时，米高扬急忙声明，他只是带耳朵来，没有权利发表意见。从此以后，米高扬再也没有插过话，也没有提出过什么新的问题，只是静听而已。

会谈结束后，米高扬要回国了。2月7日凌晨，朱德、任弼时陪同客人乘车抵达石家庄，乘车游览市区，之后米高扬就登机回国了。

毛泽东对米高扬的这次来访总的来看是比较满意的。毛泽东对新中国政权的性质、组成形式等重大问题的解释打消了苏联领导人的顾虑，可说是基本达到了目的。不过，毛泽东对米高扬有些不满，说他来西柏坡“好神气，摆架子，像老子对待儿子”。

## 刘少奇秘密访苏

1949年2月10日，斯大林召集保加利亚共产党领袖季米特洛夫和南共卡德尔等在莫斯科举行三党会议，讨论巴尔干联盟和希腊革命问题。在会谈中，斯大林严厉批评了保共和南共支持希腊起义后，坦率承认在中国革命问题上犯了错误。

他说：“战后，我不相信中国共产党人能取胜。我那时认为美国人将会全力以赴地扑灭中国的起义。我曾劝说毛泽东，最好是与蒋介石和解，与蒋介石建立某种联合政府……但是毛泽东开始发动了一场大攻势，最后取得了胜利。你们看，我也会犯错误。”

在中国革命的胜利已成为既成事实的情况下，斯大林采取了承认现实的立场。5月30日，他召回驻国民党广州政府的大使罗申，完全放弃对国民党残余政权的支持和利用。

这的确是一件十分有趣的事情。解放军攻占南京之际，苏联大使是唯一随国民党政府迁到广州的外国使节，而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各国的使节都留在南京。而新中国建立之后，又是苏联首先承认中共新政权，而美国，直至70年代末才承认新中国。

为了争取苏联及东欧各国对即将诞生的新中国的支持，1949年5月，中共中央决定派秘密代表团访苏。

受毛泽东的委托，刘少奇接受了这一重大历史使命。1949年7月2日，代表团秘密启程。

临行前，毛泽东再三嘱咐代表团，对于苏联党和同志一定要尊重友好，特别是对斯大林同志的意见一定要认真听取，珍惜中苏人民和中苏两党之间长期结成的战斗友谊。如遇到苏联同志有什么考虑欠周到的地方，千万不要计较，要尽最大可能地做到“虚心、友好、学习”。

出乎中国代表团意外的是，斯大林对刘少奇的秘密来访表现出极高的热情和相当友好的态度，无论是接待安排还是会晤规格层次都是很高的。

苏共中央对外联络部负责接待中共代表团，刘少奇一行被安置在奥斯特洛夫斯卡娅大街8号公寓。这所公寓原是沙皇时代一个女歌星的住宅，十月革命成功后收归国有，成为苏共中央的招待所，专门接待中国、朝鲜党的高级领导人。

刘少奇一行在8号公寓稍稍休息后，斯大林便邀中共代表团到孔策沃别墅去做客。

孔策沃别墅很大，院子里绿树成荫，并有花园、果园、菜园、鱼塘、小溪、小型运动场，环境优雅。

斯大林、伏罗希洛夫、莫洛托夫、马林科夫、布尔加宁、贝利亚、卡冈诺维奇、米高扬等苏联党和国家领导人依次站在门口迎候中国客人。宾主握

手问候后，斯大林设宴为中共代表团接风洗尘。双方边吃边谈。

宴会结束后，中共代表团回到公寓，刘少奇立即召开会议，他说：“国内的同志为了消灭国民党残余，建立新中国，正忙得不可开交。我们到苏联来，不是为了游山玩水，大家抓紧时间，把今天和苏联同志的谈话回忆一下，理出头绪，拟定下一次会谈的主要内容。”

王稼祥建议说：“少奇同志，我们是否可以把要谈的东西写成一个报告，把问题讲透，使苏联同志对中国问题有个较全面、正确的了解。同时也使双方会谈时有所依循，不致于遗漏什么。”

刘少奇点点头，说：“好，好，这是一个好主意。”

刘少奇决定，由大家分头起草报告。

组织以刘少奇为首的中共代表团访问苏联，是在5月份定下来的事。为了使这次访问准备得周密，中共中央特意把王稼祥从东北调到北平，做出访前的准备工作，并派邓力群、戈宝权协助王稼祥整理资料。王稼祥曾在苏联学习，并担任过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对苏联的情况比较熟悉。

由于在国内准备得很充分，他们很快就拟出了书面报告。

报告分四个部分，第一部分介绍中国革命的目前形势，介绍了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土地改革方面的经验；第二部分是关于新的政治协商会议和中央人民政府，提出中央人民政府将以毛泽东为主席，周恩来为总理；第三部分是关于新中国的外交问题，介绍了新中国的外交原则；第四部分是中苏关系问题，提出如何处理苏联和国民党签订的苏中友好同盟条约、苏联在旅顺的驻军、蒙古独立等问题，要求迅速办理新中国与苏联的通邮、通电、通航等问题，并希望苏联帮助培养新中国建设人才，派遣专家到中国，等等。

这份报告在正式会谈前交到了斯大林手中。

1949年7月11日10时，中共与苏共双方的高级会谈在克里姆林宫苏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室开始举行。苏方出席的有斯大林、莫洛托夫、马林科夫、贝利亚、米高扬、卡冈诺维奇、布尔加宁、什维尔尼克，列席的有军事方面的领导人及陪同中共代表团来苏的柯瓦廖夫。

由斯大林主持会议。他说，这次会议是按中国同志的愿望召开的。由于中共代表团提供的报告涉及战争和军事的问题较多，所以，我邀请了苏联元帅们列席，也让他们了解一下有关情况。刘少奇同志的报告把要商谈的问题写得很清楚，我已转交有关方面人士看过。

简短的开场白过后，斯大林走入正题。

他说，中国共产党与民族资产阶级合作，并吸收他们参加新的中国政府的决定是正确的。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和东欧各国及德国的资产阶级不同，中国共产党利用民族资产阶级反对美国和蒋介石，与他们建立长期合作的政策是正确的。为了使民族资产阶级站在反对帝国主义的阵营年，这是需要的。这就要制定一种对民族资产阶级有利的政策，例如关税保护政策。劳资间的矛盾是客观存在的，我向中国同志建议：为使工人斗争不致破坏我们与资产阶级的合作，应当要资本家与工人订立合同，在合同上使工人利益得到保障，使人们与资产阶级的合作能够比较长期继续下去。

斯大林肯定了中国人民民主专政的政体及各项外交原则。他提醒中国同志，要注意不要把买办资产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混淆起来。他建议不忙没收各帝国主义国家在中国的企业，通过要各国企业严格实行劳动法的办法来和他们斗争，可以先与各帝国主义国家做生意，再谈承认新中国的问题。

关于中苏关系，斯大林答应，只要新中国一成立，苏联立即给予承认。1945年苏联政府同国民党政府签订的中苏条约是不平等的，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同志即可来苏联访问，待毛泽东同志来莫斯科后再解决这个问题。他还解释说，苏联在旅顺港的驻军可以抵制美蒋武装力量，既保护苏联的利益，又保护中国革命的利益。

关于如何处理兄弟党之间的关系，他说，各国共产党都要向自己本国人民负责，有问题互相协商解决，有困难互相帮助，加强团结，不要搞一个党服从另一个党。

斯大林最后说，我讲了不少，不要光我一个讲，中国同志也要谈谈自己的意见，我们可以讨论和争论嘛。

听了斯大林的话，刘少奇说：“尊敬的斯大林同志，您刚才的讲话使我们很受启发。您的不少建议和意见对我们新中国的建设有很大的作用。斯大林同志、我们还请您解答几个问题。”

斯大林笑着问：“什么问题？你们尽管说，我会尽量地回答的。”

刘少奇说：“是这样的，斯大林同志，我们中国同志非常关心这几个问题：会不会爆发第三次世界大战？国际局势和前景是朝着什么方向发展？国际共运和工运形势如何？防止战争和争取和平建设的可能性有哪些？”

斯大林分析道，近期发生世界大战的可能性很小。因为各国人民刚从法西斯战争的灾难中摆脱出来，战争造成的创伤还没有得到医治，不会发生战争的。只要各国人民不愿意打仗，战争就打不起来。他指出，我们应当发动人民反对战争，维护和平。只要人民不受骗、反对战争，战争狂人是很难得逞的。国际间的互助合作是重要的。各国人民团结起来，友好合作，相互配合，相互支持，是维护和平与安全的重要条件之一。

他还说，你们应努力争取20年或更长的和平建设时期，利用战争的间隙，大力发展和搞好经济建设，发展生产，建设国防。我们的力量愈强大，战争的可能性就愈小。因为弱者、穷者总是受到别国的欺侮。

会议决定组织一个友好条约共同起草委员会，苏共方面由米高扬、柯瓦廖夫参加，中共方面由刘少奇、王稼祥、高岗参加。为有利于公开活动，由高岗代表东北政府签字，苏联报纸上发表高岗率东北商业代表团来莫斯科访问的消息。双方商定，苏联在旅顺帮助中共办一所海军学校，帮助中共建立海防。苏联还答应帮助从蒙古乌兰巴托到中国张家口修一条铁路。

中苏两党在第一次会谈之后，又相继举行了几次会谈。

在会谈中，斯大林谈到了宪法问题。他向中共代表团建议：现在可用共同纲领，但应准备宪法。

刘少奇问：斯大林同志，您所说的宪法是否指社会主义性质的？”

斯大林摇摇头说：“不，不是，我指的是现阶段的宪法。帝国主义和蒋介石会用两种说法向人民群众进行宣传，对你们进行攻击，一种是说你们没有进行普选，政府不是选举产生的；另一种是说国家没有宪法。政协代表不是选举的，敌人可以攻击你们用武力控制了代表席位，是自封的；共同纲领不是全民代表通过的，而是由一党提出，其他党派予以同意的东西。你们应把敌人攻击你们的武器拿掉。我同意你们的意见，把共同纲领变成国家的根本大法。宪法的内容包括：全民普选；承认企业主、农家的私有财产；承认外国在中国的企业的租让权，我建议，你们可在1954年进行选举和通过宪法。”

在会谈过程中，中苏两党还就尽快解放新疆交换了意见。苏方向中方提供了帝国主义插手新疆、企图把新疆从中国分裂出去的情报。刘少奇对苏方提供的情报十分重视，迅速通知国内。

在会谈的过程中，斯大林对中共代表团进行了认真的观察。他发现，中国同志目光敏锐，看问题深刻而有远见，显得很成熟，并且很有礼貌，也很谦虚。这使斯大林不由得对中国同志产生了一种敬意。同时，也使斯大林认为，中国的未来很有希望。

在会谈中，斯大林想寻找适当机会，向中共代表团作自我批评，对苏联、共产国际过去的失误表示歉意。

7月27日，斯大林在孔策沃别墅设宴招待中共代表团。

这天斯大林兴致很高，谈话风趣幽默，并劝刘少奇等人尝尝格鲁吉亚风味的羊肉汤、红菜汤及烤羊肉串。

席间，大家纷纷向斯大林敬酒，祝他身体健康。

斯大林对刘少奇说：“中国共产党已度过了它的幼年 and 青年时期，现在已是成年了。它在斗争中成长起来，在政治上已经是成熟的党了！看来，中国共产党主要的成就是有了在实际斗争锻炼中培养出来的干部，他们经过了实践考验，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说完后，斯大林端着酒杯离开餐桌，到宴会厅的另一角，来回踱了几步。忽然，他又转回中共代表团成员身边，神情略带伤感地说：“苏中两党是两兄弟，两兄弟之间的团结友好是最重要的，对世界革命是具有重大意义的。斯大林活着的时候，两国人民应该是团结的；斯大林一旦不在世的时候，仍然应该是团结的。我们之间的团结，是与世界革命和人类的命运息息相关的。是具有重大意义的。”

中共代表团成员听了斯大林的话、异口同声地说：“斯大林同志，愿您永远健康！”

“谢谢中国同志的良好祝愿！但人总是要死的，斯大林也不例外。”斯大林激动地说，“刚才，我说中国共产党成熟了，并不是客气话。西欧人由于骄傲，在马克思、恩格斯逝世之后，他们就落后了。革命的中心由西方移到了东方。你们在半殖民地的国家取得了胜利，是很了不起的。苏联人和欧洲人要向你们学习。”

斯大林又提议：“刘少奇同志，在今后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苏中两家都应多承担些义务。希望中国今后多担负些对殖民地、半殖民地、附属国的民族民主革命运动方面的帮助，因为中国革命本身和革命经验会对他们产生较大的影响，会被他们学习和吸取。在这方面，苏联就不如中国。我们对西方多承担些义务，多做些工作。苏中两家分工合作。”

斯大林还说：“中国同志把马克思主义的一般原则应用于实际斗争中去，许多经验值得我们苏联人学习。你们称我们为老大哥，我希望弟弟能赶上和超过老大哥。这不仅是我个人的愿望，也是我们大家的愿望，而且也是合乎发展规律的，后来者居上。”

他环顾大厅，大声说：“同志们，举起酒杯，为弟弟超过老大哥，加速进步而干杯！”

斯大林的提议得到马林科夫、贝利亚等人的赞同。

面对赞扬，刘少奇的脑子十分冷静。中国革命即将取得全国性的胜利，但正像毛泽东主席所说的那样，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前边的路还更

远更长。中国革命胜利后，要恢复经济，走向社会主义，需要苏联的援助和帮助。因此，在苏联同志面前，要保持谦虚、谨慎，千万不要骄傲自满。

想到此，刘少奇诚恳地对斯大林说：“斯大林同志，苏联给中国共产党很大的支持和帮助，对此，中国共产党非常感激。新中国成立后，我们仍需要苏联党和人民像老大哥一样的支持和援助。苏联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方面，取得了辉煌的成就，积累了宝贵的经验，我们要永远向老大哥学习！”

后来，斯大林还与刘少奇交换了其他方面的情况和看法。斯大林谈到了欧洲情报局，刘少奇则谈了中国革命的一些斗争过程和经验。

斯大林在听的时候，不时插话，并对过去自己的失误作了自我批评。他认为，在中国革命的斗争中，由于苏联对中国的情况不了解，曾出了一些错误的主意，妨碍了中国革命。而中国同志总是很客气、讲究礼貌，虽然对苏联同志有意见，但不肯说出来。不过，如果我们什么地方讲得不对，你们还是说出来好，我们会注意到的。

中共代表团对斯大林的话感到很意外。对于苏联和共产国际指导中国革命的失误，中国党内确实有意见。但是，从中苏两党团结的愿望出发，中共从未向苏共提出过批评意见，也没要求他们承担什么责任。斯大林这次主动向中共代表团作自我批评，表现了一个伟大的宽阔的胸怀。

7月底，中苏两党进行最后一次会谈。斯大林在会谈中，根据苏联建设中所积累的经验，向中共代表团提出一些参考性的建议。

他说，中国党在目前要动员一切力量恢复遭到战争破坏的国民经济，不管过去的底子如何薄，如何不平衡、不配套，但它是国家过去赖以生存的经济基础，恢复了，社会才能稳定，新的人民政权才能巩固。发展经济必须从现实的基础上起步，踏踏实实地稳步前进。如果超越了现阶段的基础，把步子迈得过大，会使比例失调，把国民经济搞乱。经济发展有自己的规律。

他还说，经济建设是很复杂的工作，牵涉到社会的方方面面。不但涉及到资源、技术、机器设备，更重要的是要有管理人才和技术人才。他向中共代表建议：要利用旧社会留下的专家和技术人员为经济建设服务；要发挥他们的积极性，就要制订一套正确的政策。

刘少奇要求苏联向中国派一些专家和技术人员，帮助中国恢复国民经济工作，并研究新建项目。

斯大林答应向中国派专家，但要求中方保证为苏联专家提供优厚的工作、生活条件；到中国工作的专家家属的生活费用，也必须由中方承担；苏联专家如果犯了错误，一律由苏联方面来处理，中方无须过问。

对于斯大林所提的条件，刘少奇一口答应了。

为了向苏联学到更多的东西，刘少奇在逗留莫斯科期间，还访问了苏联外交部、国家计委、国家经委、财政部、国家银行、外贸部、化工部等，并同这些部委的负责人进行了交谈，了解了国际形势和外交斗争、苏联的经济计划工作和经营管理工作，以及各部门的职能和作用等。

离开莫斯科前，斯大林再次邀请刘少奇到孔策沃别墅做客。

好客的斯大林，亲自领着刘少奇浏览了别墅全景。

斯大林指着一片结满又大又红的番茄的土地，说：“看，这是我种的。”

刘少奇赞道：“斯大林同志，想不到您这方面也是行家里手呀！”

斯大林风趣地说：“谁让我是农民的儿子呢？”

所有的人都笑了。



斯大林吩咐工作人员：“拣大个的多摘一些，让刘少奇同志尝尝我亲手种的番茄。”

“谢谢您，能吃到您亲自种的番茄我们太荣幸了！”刘少奇连忙道谢。

斯大林又领着刘少奇到一片谷子地边，说：“这些谷子的种子是从中国引进的，可惜它们现在还是小苗。要是你们赶上收获的季节，用香喷喷的小米款待你们，那该多好哟！”说着，斯大林脸上充满遗憾的表情。

“斯大林同志，由于国内的工作很忙，我们得赶快回国了。苏联给我们很大的支援，中国人民永远也不会忘记，中苏两国人民的友谊永存！”刘少奇激动地说。

参观完毕，斯大林留刘少奇一块进餐。宾主边吃边谈，斯大林问刘少奇：“你们准备在什么时候成立中央政府？”

刘少奇答：“目前我们正集中力量解放华南各省，打算在1950年1月1日成立中央政府。”

斯大林听了思索了一会儿后说：“国民党政权实际上已不复存在了，你们已解放了绝大多数的土地，具备了掌握政权的一切条件。解决重大问题时要注意把握时机，千万不要错过时机，要警惕帝国主义可能会利用所谓‘无政府状态，对中国进行干涉。”

斯大林的话引起了刘少奇的注意，这个问题大家过去没有考虑过。回到公寓后，刘少奇立即以电报的形式，向中共中央、毛泽东作了汇报。

8月14日，刘少奇圆满结束访问，从莫斯科乘火车回国。

刘少奇这次访苏，是中国共产党在建国前夕的一次重大外交活动。这次访苏，使苏共领导人对中国革命有了更进一步的了解。得到了苏联对中国的支持和援助，并从苏联那里学到了不少宝贵的建设经验。

### 毛泽东出国为斯大林祝寿

新中国建立之初，百废待兴，党和国家领导人工作千头万绪，作为中央人民政府主席的毛泽东更是日理万机。

但是为了巩固新中国与苏联的关系，加强中国在世界上的外交地位，毛泽东决定，趁斯大林寿辰到来之际，前往莫斯科给斯大林祝寿，同时交换对两国关系和世界局势的看法。

列车向着东北方飞驰着，寒流使车窗挂上霜花。

毛泽东点燃了一支烟，望着窗外的雪原。

他十分清楚，直到自己赴苏前夕，斯大林仍怀疑中国共产党会不会走“南斯拉夫式的道路”。并且，斯大林对自己让中国的一些民主党派人士和无党派人士参加新政府也深表忧虑，担心这样可能使新政府选择一条亲英美的西方路线。虽然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从当时的时局与世界革命的大局出发，断然采取了“一边倒”的外交政策，但斯大林却是一位多疑的领袖。

12月16日，毛泽东乘坐的专列顺利抵达莫斯科车站。“克里姆林宫的大钟敲响十二下，钟声回荡在莫斯科上空。”

莫洛托夫、布尔加宁、孟希科夫等一批苏联高级领导人在站台上迎接毛泽东。

毛泽东匆匆检阅了仪仗队后便由莫洛托夫陪同前往下榻处。

毛泽东被安置在莫斯科郊外一座舒适的别墅里，斯大林在卫国战争时期

曾住在这里。

安顿好后，莫洛托夫招呼毛泽东好好休息，并转告他：“下午6点整斯大林同志约毛主席到克里姆林宫会面。”

下午，警卫人员准时将毛泽东送到克里姆林官斯大林的会客室。斯大林的秘书请毛泽东到他屋里休息一下，便去向斯大林通报。

一会儿，秘书出来说：“斯大林同志请毛主席进去。”

门开了，以斯大林为首，莫洛托夫、马林科夫、贝利亚、布尔加宁、卡冈诺维奇、维辛斯基等在斯大林身后排成一字形。

当毛泽东一跨进门，斯大林就微笑着伸出双手迎上去，毛泽东的双手也伸了过去，两位世界上最伟大的共产党领袖的手，紧握在一起。

斯大林端详着毛泽东高大的身材，红润的面容，赞道：“你还很年轻嘛！很健康嘛！容光焕发，很了不起！”

接着斯大林把莫洛托夫等人介绍给毛泽东。

斯大林与毛泽东在桌边坐了下来。

斯大林激动地对毛泽东说：“伟大，真伟大！你对中国人民的贡献很大，你是中国人民的好儿子！我们祝你健康！”

而毛泽东却意味深长地说：“这么多年来，我真要向你诉苦啊！我可是长期受打击，受排挤的人喔，有话无处说……”

斯大林接过话茬说：“胜利者是不受谴责的。不能谴责胜利者，这是一般公理。你们取得了伟大的胜利，而中国革命的胜利就是最好的回答呀！”

毛泽东发出了笑声。

寒暄之后，会谈进入正题。斯大林的语气严肃起来，他说：“中国革命的全面胜利在望，中国人民将获得彻底解放，共产党的力量是不可战胜的。中国革命的胜利改变了世界的天平，加重了国际革命的砝码。恢复经济和建设国家将是你们头等重要而又艰巨的任务，但你们有最宝贵、最丰裕的资本——人力，这是取得最后胜利和向前发展的最可靠的保障和力量。你们获得全面胜利是无疑的。敌人并不会甘心，也是无疑的。然而今天敌人在你们面前是无能为力的。我们全心全意地祝愿你们的胜利，期望你们取得更大的胜利！”

“我代表中国人民衷心感谢苏联人民长期以来给予我们的支持和帮助，中国人民是不会忘记朋友的。”毛泽东十分诚恳地说。

会见中，斯大林再三问毛泽东：“你来一趟是不容易的，那么我们这次应该帮些什么？你有些什么想法或愿望？”

“这次来，一是为斯大林同志70寿辰祝贺；二是看一看苏联，从南到北，从东到西，都想看一看。”

“你这次远道而来，不能空手回去。咱们要不要搞个什么东西？”

毛泽东沉思片刻后，十分巧妙地说：“恐怕是要经过双方协商搞个什么东西，这个东西应该是既好看又好吃。”

师哲在翻译时说。

“好看就是形式好看，要做给世界上的人看，冠冕堂皇；好吃，就是内容，有味道，实实在在。”

然而苏联人仍没明白所指为何，全部怔住了，只有贝利亚笑出声来。斯大林沉着地体会毛泽东话里的含意。

毛泽东没有直接去回答斯大林的话，只是说：“我想叫周恩来总理来

一趟。”

斯大林惊讶地反问：“如果我们不能确定要完成什么事情，为什么还叫他来，他来干什么？”

毛泽东平静地说：“周恩来到了就可以商量这件事了。”接着他岔开了话题。

斯大林与毛泽东都没猜透对方的意图。斯大林认为过去在中国革命问题上犯过错误，不便把自己的想法抛出来，但内心认为不管中苏双方签订什么样的条约，都应由他同毛泽东亲自签署。但毛泽东却一心想把总理兼外交部长的周恩来请到莫斯科来完成此任务。

斯大林忧心忡忡，派莫洛托夫、罗申等到毛泽东的住处拜访、交谈，想摸清毛泽东的想法。

他还亲自给毛泽东打电话，问他是否有新考虑、但毛泽东没有明说。

一天，柯瓦廖夫与费德林到别墅交谈时，毛泽东对柯瓦廖夫大发脾气：“你们把我叫到莫斯科来，什么事也不办，我是干什么来的？难道我来这里就是为天天吃饭、拉屎、睡觉吗？”

费德林回去后向斯大林反映了情况。之后，王稼祥也以大使身份到苏联外交部点明毛泽东的意图：“中苏之间应搞个政治文件。”

苏方终于明白了，他们同意签文件。随后，周恩来赶来莫斯科，达成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这个“既好看，又好吃”的东西。

斯大林在克里姆林宫设宴招待毛泽东。中方驻苏大使王稼祥的夫人朱仲丽正好坐在赫鲁晓夫和米高扬的中间。

“你是大学生吗？”米高扬问朱仲丽。

“我已经是一个医生了，”

“噢，博士！你多大了？”赫鲁晓夫接过话茬。

“35岁了。”朱仲丽以矜持的口吻对坐在左边的赫鲁晓夫说。

“哟！我以为你20岁呢！”米高扬惊奇地说。

“你为什么这样的窈窕？你看你这身材。”赫鲁晓夫打趣道。

朱仲丽听不懂窈窕的俄语，怔住了。

“你看，就是这样。”米高扬用手比划着，画了一个S形。

“不，不是这样！”赫鲁晓夫争辩道，并用两手划了两个相反的S形。

朱仲丽终于明白了，几个人全都大笑起来。

“你们中国是不是只有地主婆才是胖子？”赫鲁晓夫好奇地问。

“她们吃得好，睡得足，当然长得胖啰！”

“那你这么窈窕又是……”

“并不是胖子都是地主婆嘛！我可是从小参加革命的！”朱仲丽十分自豪地说。

斯大林与毛泽东的会晤总是深夜，并常常是在莫斯科近郊的孔策沃别墅进行。而毛泽东也喜欢夜间工作。

斯大林通常坐在长桌的顶头，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照惯例就座。毛泽东的座位紧靠斯大林。

会谈开始前照例是贝利亚代表斯大林向大家祝酒。他用犀利的目光扫视大家一眼，看看是否斟满白兰地，然后站起来，讲几句祝酒词，劝大家干杯。

谈话几乎是在毛泽东与斯大林两人之间进行的，其他人都静静地听。

有一次毛泽东谈到自己的军队被国民党包围，指挥员号召战士们“不畏

艰险，视死如归”时，苏方翻译费德林不知如何解释。他请毛泽东写下这八个字，这时斯大林像嗅出什么异味，不高兴地对翻译费德林说：“您打算长时间地在这儿搞秘密活动吗？”

“不……不……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我对这句话的理解发生了困难。”

“可您的困难拖得太久了些吧。”斯大林目光十分威严。

“马上……马上，我完全弄清楚了再给您说。”

“那好吧，请继续搞秘密活动吧！”斯大林头也没回地说。

贝利亚的头也转向费德林，用敏锐的眼睛审视着他。把这位苏联翻译吓得心惊胆颤。

“就按字面意思翻译吧！”斯大林又逼视着费德林命令道。

费德林再次转向毛泽东，请求他作一番解释。

毛泽东侃侃而谈，他说，这是12世纪古代中国的一位著名统帅岳飞使用过一种说法，岳飞以抗击女真人入侵而出名，杭州市保留着这位有代表性的英雄的陵墓，这座陵墓以加害岳飞的叛徒的下跪形象而驰名。“中国字‘归’”，毛泽东解释道，“在这里不是通常的‘回来’、‘再来’的意思，在历史上，‘归’的意思是‘回到原来状态’。虽然在中国有许多人知道岳飞的名字，但远不是任何一个中国人都知道这个成语的真正涵义。在此，这个成语应当这样理解：“藐视一切困难和痛苦，像看待自己回到原来状态一样看待死亡。”

斯大林耐心听完对毛泽东解释的翻译后，说：“看来这是一位天才的统帅，表现出大无畏的精神和雄才大略。”

费德林心里的石块终于落地了，暗地里舒了一口气。

以后，毛泽东与斯大林又在莫斯科郊外进行了几次神秘的夜间会谈。

有一次，毛泽东小声地问坐在身边的费德林：

“斯大林同志为什么把红葡萄酒和白葡萄酒掺到一起，而其余的同志却不这样做呢？”

“毛泽东同志，这很难解释，你最好问斯大林同志。”

“不，这样很不礼貌。”毛泽东说。

“你们在那儿秘密地小声交谈些什么，要背着谁？”斯大林的声音响起了。费德林害怕地把脸转向了斯大林。

“是这么回事……”费德林小心地谨慎地说。

“是的，是有点事！斯大林打断了他的话，盯着他。

“是这样……毛泽东同志问，你为什么把各种酒掺起来而其他同志为什么不这样做？”费德林解释说。

这时毛泽东也平静地看着斯大林。

斯大林问翻译：“那您为什么不问问我呢？”

费德林此时发现贝利亚的眼光也紧盯自己，忙解释道：“请原谅，是毛泽东同志坚持不让我这么做，他认为，这样问您有一点不礼貌。”

“唔。”斯大林点点头，又问费德林：“而您觉得在这儿应该听准的呢？”

斯大林说完，便笑着向毛泽东解释他为什么把各种酒掺起来。

“你知道吗？这是我早已形成的习惯。每一种葡萄酒，特别是格鲁吉亚葡萄酒都有自己的味道和香味。我用红白葡萄酒混合起来增加酒的味道，就像是用草原上不同气味的香花扎个花束。”

“那您喜欢什么呢，斯大林同志，是红葡萄酒还是白葡萄酒？”毛泽东

又问道。

“我经常饮白葡萄酒，但是，我相信红葡萄酒，我早就开始饮这种酒。还在流放时，我得了一种伤寒病，一个狱中善良的医生悄悄给我用少量的红葡萄酒，似乎是西班牙酒，从死亡边缘救了我。从那时起，我就深信葡萄酒可作药用。”斯大林说。

“这就是你喜欢红白葡萄酒一起喝的原因了吧！”毛泽东听完这话，笑了起来。

在与斯大林的会谈中，毛泽东有时也并不掩饰自己在某些问题上与斯大林相反的观点。

有一次，斯大林突然问毛泽东在蒋介石的军队已失去了对上海的防守能力，为什么不马上去夺取它。

“毛泽东同志，我真不明白，那时的机会这么有利，而你们为什么下马上夺取上海？”

毛泽东轻松地回答：

“是的，是这样，但为什么我们一定要马上就夺取呢？我们的力量还有限，如果马上占领这座城市，我们就得负担起 600 多万居民吃饭的责任，就得背起大包袱。这个包袱蒋介石继续背去有什么不好呢？”

斯大林暗道：“不占领中心城市，怕解决城里人的吃饭问题，这是马克思主义的态度吗？”

毛泽东看出斯大林内心在想什么，独自笑了。

在斯大林的内心深处，他始终错误地认为毛泽东有狭隘的农民意识，在这一点上毛泽东与他有截然相反的立场。毛泽东认为，革命的理论必须与各国的具体情况相结合。在中国，要取得革命的胜利，首要的问题是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

但斯大林不这样认为，他曾把毛泽东的回答告诉了赫鲁晓夫等人，说：“真不理解毛泽东是什么样的人？他说他是一位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可他为什么又不按马克思主义理论中依靠工人阶级进行斗争的理论去做呢？这些马克思主义最基本的真理难道毛泽东真的不懂吗？”

有一次两人在交谈中突然对讨论语言和思维的问题发生了浓厚兴趣。

斯大林总是本着他那部著名的语言学著作的精神反复陈述意见：

“我认为语言作为一种表达思想的工具，是不带有阶级性的。你认为对吗？毛泽东同志。”

而毛泽东则说：“各民族的文化 and 各民族的语言有共同之处。汉字和汉语尽管不易掌握，但实际上是所有人都能学会的，任何一个人都可以学。只要愿意学和不断提高就可以掌握它，在这里是不分社会地位和阶级的。”

毛泽东的一席话使费德林产生了极大兴趣，他注视着毛泽东，手中的笔停下了。

“费德林同志。”斯大林大叫一声，接着命令道：“拿着您的盘子到我这儿来！”

费德林感到莫名其妙，但他还是拿起桌上自己面前的那只盘子，走到斯大林跟前。

斯大林说：“把这道菜拿去！这是难得的菜，您可能是第一次品尝它吧？”费德林一时不知如何是好。

“请拿去！”斯大林十分平静地说，“常言道，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

费德林对最高统帅的盛情表示感谢，但却感到担忧。他刚才亲眼看到，女服务员上菜时，曾对斯大林耳语了几句什么，之后，女服务员没把这道菜放在斯大林面前，而放在了他的旁边。

费德林硬着头皮吃了这道菜。

“费德林同志，您喜欢这个菜吗？”斯大林问道。

“斯大林同志，请原谅，我刚才耽搁了一会儿……”费德林结结巴巴地说，“这道菜……这道菜的味道好极了。”

“那您干嘛不早说呢？”斯大林鼓励费德林继续说下去。

毛泽东与中国同志也笑了起来。

一天，费德林接到政府打来的紧急电话，让他立刻赶到克里姆林宫。费德林匆匆赶到那里。

“毛泽东的私人中国厨师给我们制造了一个不大不小的麻烦，他说我们运来的鱼不新鲜，他们拒绝接受。”特别警卫队的上校见到费德林说。

米高扬代表苏共中央与斯大林秘密来到西柏坡时，毛泽东用鲜鱼做了红烧鱼招待苏联客人。席间，一位苏联客人用叉子指在红烧鱼上方问：“这鱼新鲜吗？是活鱼吗？”得到肯定答复后他才将肉叉入嘴里。

毛泽东望了他一眼，没说什么。但一年以后，在出访莫斯科前，他向随行的中餐厨师严格下令：“你们只能给我做活鱼吃，他们要是送来死鱼，就给他们扔回去。”

苏联人送鱼来了，送来的，是死鱼。厨师遵照毛泽东的命令“扔回”。特别警卫队的上校慌了，因语言不通，只好向费德林求救。

“你们准备的是什么鱼？”费德林问。

“就是经常用来招待客人的那种鲤鱼。”

费德林找到中国厨师。

“鱼已经死了。不知道是什么时候死的。毛泽东同志严格指示我只能给他做活鱼。”厨师用北京话说。

“您说什么？难道就这么简单吗？”上校松一口气。“那么，我们马上逮一条活鱼来。”

在莫斯科期间，为了调节毛泽东的生活，师哲特意找到几十部俄国和欧洲的历史人物传记影片给他放映，如《彼得大帝》、《拿破仑》、《库图佐夫》、《涅夫斯基》等等。斯大林对师哲说：“毛泽东真聪明，有空就看人物传记片，这是了解历史的最简捷的办法。”

毛泽东访问苏联，是新中国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与苏联党和政府最高领导人的第一次直接会晤，引起了国际舆论的高度重视。十几天以来，苏联新闻机构很少报道毛泽东的活动和行踪。一天，工作人员把一则“毛泽东已被斯大林扣留”的西方报道拿给毛泽东看。毛泽东笑着放下报纸说：“随人家去说吧，古往今来总有好事者的，”

而苏方却慌了，斯大林问毛泽东要不要去外地走走？毛泽东同意了。他在去外地参观前，苏联外交部发表了一个公告，说毛泽东去列宁格勒参观访问。同时，王稼祥提出以毛泽东答塔斯社记者问的形式，在报上公布毛泽东主席到苏联的目的。

1950年1月2日，《答记者问》见报了。

在《答记者问》中，毛泽东说：“我逗留苏联时间的长短，部分地决定于解决中华人民共和国利益的各项问题所需要的时间。”“在这些问题当中，

首先是现有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问题，苏联对中华人民共和国贷款问题，我们两国贸易协定问题以及其他问题。”“我还打算访问苏联的几个地方和城市，以便更加了解苏维埃国家的经济和文化建设。”

1月21日，毛泽东应邀参加列宁逝世26周年纪念大会。中午举行使宴。这一次斯大林的话不多，似乎正在琢磨什么。

斯大林对谁来签约的问题仍没有得到毛泽东的答复，他接连几次把电话打到毛泽东下榻的地方，又把师哲找去，询问毛泽东的打算及愿望。毛泽东的回答是：“我没有意见，有意见都在周恩来那里，周恩来不是正在克里姆林宫里谈吗？”

“这位毛泽东比我斯大林还更让人难以捉摸！”斯大林暗道，把目光投向毛泽东。

毛泽东没说什么。

“我们都争先恐后地想到中国去看看，何时能实现我们这个愿望？”贝利亚说。

“我代表全中国人民表示欢迎。”毛泽东笑着说。

“这个回答可够我们揣摸思索的了。”贝利亚睁大眼睛。

“如果你不拒绝，我们就依次排号到中国去旅游。”马林科夫说。

“欢迎你们都到中国去看看，我们中国人是热情好客的。”毛泽东又说。

“我们把德国的格罗提渥请到这来。”莫洛托夫提出建议。

“欧洲人离不开老婆，请他就得请夫人，一个女的参加到这个场合，说话不方便。”斯大林表示反对。

1950年1月12日，美国国务卿艾奇逊到国会新闻俱乐部发表长篇讲话，挑拨苏中、苏蒙关系。当时苏方提出社会主义各国都发表声明，予以驳斥，这些国家都同意了，但由于未明确什么叫“官方的”，结果，苏联与蒙古都以外交部部长的名义发表声明，中方只是以新闻署长的名义发表声明，内容均是驳斥艾奇逊的。苏方疑虑重重。

1月下旬的一天，苏方郑重其事地派人说：斯大林邀请毛泽东、周恩来到克里姆林宫会面，无须再邀别人，而主人方面也只有斯大林和莫洛托夫二人参加，翻译只有师哲一人。毛泽东、周恩来、师哲到了斯大林的会客室，发现的确只有斯大林与莫洛托夫。

斯大林说：“今天请你们来，只想在这个范围内谈一个问题，莫洛托夫有些话要说。”

稍停他又问：“关于驳斥艾奇逊的造谣，中国政府发了声明否？”

“是用胡乔木的名义发表的。”毛泽东回答。

斯大林又问：“胡是什么人？”

“他是新闻总署署长，也是用这个身份发表声明的。”

斯大林说：“按西方的习惯，任何新闻记者都可以对任何问题发表自己的意见和评论，但他们并不代表官方的立场和观点，他们怎么说都可以，也不必对自己的话负责，所以他们的话是一文不值的。”

莫洛托夫说：“上次我们谈定，关于艾奇逊的谈话，我们应该分别各自发表一项正式声明，驳斥艾奇逊的胡说八道。本来我们谈定用官方名义发表的，而你们却用新闻总署名义讲话。新闻总署并不是权威，它代表不了政府，而且新闻记者的谈话也绝代表不了官方的观点和意见。”

斯大林说：“这么一来，我们的步调就乱了，各行其是，会减弱我们的

力量。我们认为我们都应该信守诺言，紧密配合，步调一致，这样才会更有力量。来日方长，今后互相协作，相互配合的机会和场合是很多的。把这次作为前车之鉴吧！吸取经验教训，加强今后的合作，是我们应该做的事情。这次事情虽然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但没按原定方针做，乱了步伐，削弱了战斗力，给敌人留了可钻的空子。只有信守诺言，步调一致，才能显示出斗争力量。”

毛泽东沉默不语，周恩来则解释了几句。

为了缓和气氛，斯大林又安排前去他的别墅，说他组织了一个夜宴，请大家欢聚一番。他特地把毛泽东和周恩来请到他的车子上，并让他们坐在后排座位上，他与师哲坐在中座上。师哲为了打破僵局，先同斯大林谈了几句闲话：

“你不是答应过要到我们代表团的住处去作客吗？”

“我是说过的，而现在也没有放弃这个愿望……”斯大林答。

“你同他说什么？不要请他到我们那里去作客！”没等斯大林讲完，毛泽东问师哲。

“我谈的正是这个问题。”师哲回答。

“把话收回了，不请他了！”毛泽东怒气未消。

斯大林从毛泽东的语气中猜到点什么，便问道：“他说什么？”

“噢，没什么，是我们之间的话。”

气氛又变得沉重起来，一直到宴会结束。

“你们看。”斯大林拿出自己收藏的艺术品，想改善气氛。

“这是盛世才送给我的，”斯大林指着墙上挂的湘绣“鹰”，“对了，上面绣的几个字是什么意思？”

他听了解释后，非常高兴。他又去开留声机，请大家跳舞，但仍未改变沉闷空气。几个人死拉硬拽，把周恩来与师哲拖下了舞池。但他们轮番去拉毛泽东，却未成功。

一次，毛泽东、周恩来与斯大林会谈，斯大林提出不允许第三国居民进入和在中国东北新疆地区居留的问题。周恩来随即反问：

“东北住有很多朝鲜族的居民，他们算不算第三国公民。更不用说外来的蒙古人了。”

斯大林哑口无言。“关于蒙古人民共和国的独立地位，中国准备发表一项声明。”周恩来转开话题。

斯大林愣了一下，说：“蒙古问题不是早已解决了，并不存在问题，有什么要声明的？再说，蒙古同商不在，我们谈蒙古干什么？我们有什么权力谈论人家的命运？”

周恩来耐心解释说：“我们政府必须有个声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我们宣布旧中国的一切国际协定、条约一概不予承认。蒙古独立是国民党经手办的。国内的民主人士提出来，既然国民党签订的一切国际协定、条约都不予承认，那蒙古独立的问题，你们承认不承认？我们必须表明态度。”

斯大林松了一口气，说：“我们两国都可以发表声明，还是中国政府先发表，苏联政府支持中国的声明，蒙古政府也表个态。”

最后决定以两国公告的方式解决问题。

毛泽东让斯大林打破了他一生恪守的信条



2月8日，在工作人员拟定条约与协定时，毛泽东同周恩来来到克里姆林宫拜访了斯大林。由于已经达成一致意见，双方会谈十分投机。

当斯大林了解到毛泽东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著述丰富时，他严肃地说：“毛泽东同志，为了总结中国革命的经验，我建议你应该把自己所有的文章、文件等尽快整理出来，编辑出版，这可是件意义重大的事情。”

毛泽东回答说：“我也正有这个意思，把我写的那些东西整理出来，也好为将来建设所用。”停了一会儿，毛泽东又说：“如果斯大林同志能派人帮助一下，我将十分感谢。”

“那您需要什么样的人呢？”斯大林又问。

“如果能派一位理论上强的、精通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同志协助完成这项工作那就太好了。”毛泽东十分坦率地说。

“噢，我就派尤金同志去协助你，他可是我们苏联有名的哲学理论家。”斯大林说。

“非常感谢您，斯大林同志。”毛泽东表示感谢。

毛泽东看了斯大林一眼，又提出一个新问题：“斯大林同志，条约签订后，我们准备举行一个小型招待会。”

“那很好”，斯大林说，“在什么地方举行呢？”

“什么地方都可以，”毛泽东说，“但不在我下榻的克里姆林宫，而在另外的地方，比如大都会饭店。”

“斯大林同志，你要明白，克里姆林宫是苏联政府举行国宴的地方，对于我们这个主权国家来说不完全合适……”毛泽东态度相当坚决。

斯大林不高兴地说：“是的，只是我从来没有出席过在饭店或是外国领事馆举行的宴会，从来没有……”

斯大林还想使毛泽东改变意见，但毛泽东坚持说：“斯大林同志，我们的宴会要是没您出席……那简直是不可想象的。”

斯大林没有急于回答。

“斯大林同志，我们请您，殷切地请您务必同意。”毛泽东进一步请求说道。

“好吧，毛泽东同志，如果您这样希望，我去参加。”斯大林终于同意了。

斯大林打破了他一生恪守的信条。

1950年2月14日上午，《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签字仪式在克里姆林宫举行。中国代表团被请到克里姆林宫。毛泽东、周恩来和斯大林、马林科夫、贝利亚、维辛斯基等聚集在斯大林办公室的一间客厅里。

代表双方签字的是周恩来和维辛斯基。

仪式开始了，当要签订贸易协定时，条约文本迟迟未送到，斯大林问：“这到底是怎么搞的，条约文本都到哪儿去了？”

“斯大林同志，是这样，中文的文本还没有准备好，他们正在忙呢！”有人小声说。

“忙！忙！忙！怎么忙的？”他突然转过身，不高兴地对师哲说：“你们的翻译工作没有做好，耽误了贸易协定文本的印制。否则，今天在这里可以同时签署贸易协定，那多好哇！”

“斯大林同志说什么？”毛泽东问师哲。

“他让我告诉您，说我们的翻译工作做得不好，影响了条约签字。”

毛泽东也很不高兴地说：“缺点和错误总是中国人的！算了，算了，总而言之，一切错误都在中国人身上好啦！”毛泽东不再言语了。

“他说什么？”斯大林听到后敏感地问师哲。

“没什么，这只是我们个人之间的私话。”

原来中苏贸易协定，是苏联对外贸易部在苏联外交部协助下，与中国贸易代表团合作准备的。当时苏方还未准备好，苏方有关人员怕斯大林斥责，就称中方未准备好该协定的中文本。

毛泽东一眼看穿了这件事的本质。直到文本送来后，气氛才缓和下来。

签字仪式结束后，全体人员合影留念。毛泽东、斯大林站在最中间。

2月14日，大都会饭店中国党政代表团访苏结束的宴会在举行。这是以王稼祥大使夫妇的名义举行的酒会，邀请了斯大林在内的500位客人，其中有苏联党政军领导人、备人民民主国家驻苏大使及苏联知名人士、各国记者。

下午6点过，中国东道主和客人聚集在大都会饭店的宴会大厅。大多数人担心斯大林不能践约出席。

当人们议论纷纷时，一位身穿便服的外交官走到费德林身边用神秘的声调说：“你应当在前厅迎接斯大林，把他接到这里来。”

“请问，难道这是我的特权吗？像平时一样，您做这件事不是更好吗？”费德林不满地对上校说。

“关于特权的事，我们最好暂且别议论它，让我们改日再谈，现在，我们是把您看作汉语专家来要求的，难道您不明白吗？”上校以命令的口吻说。他拉着费德林的手把他带到了前厅，让他在指定位置上站好，说：“要目不转睛地盯着门口。”

9点刚过，斯大林率领苏共政治局全体成员终于前来赴宴了。当前厅大门打开，成严的斯大林出现在门口时，大厅里响起了热烈的掌声和“斯大林万岁”的欢呼声。

斯大林很快地扫视了前厅一眼，发现费德林在场后，不慌不忙地朝他走去。快到存衣处时，他开始解扣子脱大衣，存衣处的服务员急忙向他走去并说：“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请允许我帮您...”

斯大林看了看他，幽默地说：“谢谢，看来这点事我还会做。”他说完便与费德林走进宴会大厅，向站在“主宾席”长桌后面的毛泽东走去，毛泽东微笑着伸出双手同斯大林握握手，请他在自己旁边坐下来。

“斯大林同志，您好！非常欢迎您参加我们的宴会。”

“来参加中国同志的宴会，我实在是太高兴了！”斯大林和蔼地说。

敬酒开始了，所有祝酒的人都目不转睛地望着并排站在用玻璃板壁隔成小间内的斯大林和毛泽东。两位领袖在小间内交谈着各种问题。

酒会继续进行着，周恩来致祝酒词，由费德林任翻译。周恩来临场未拿讲稿，2000余字的祝酒词说得与原稿一字不差。他说，中苏两国所签署的条约和协定，将使两国的关系更加紧密，将使新中国人民不会感到自己孤立，而且将有利于中国生产经济的恢复与发展，有利手世界和平。中苏友谊要世世代代传下去。周恩来的祝词赢得阵阵的掌声。

之后，斯大林打了一个手势说：“请注意，我要讲话了。”

他首先为毛泽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就举杯祝贺，他说：“中苏友好、兄弟情谊要保持下去，周恩来都说了，也代表了我的意思。社会主义阵

营也应该像周恩来讲的那样，要团结起来，可惜今天与会者中间少了南斯拉夫的同志，我感到很惋惜……”最后，他放下酒杯，高呼：“团结就是力量！”宴会一直持续至午夜才尽欢而散。

2月16日，斯大林在克里姆林宫盛宴招待毛泽东、周恩来与中国代表团全体人员，苏联党政军领导人几乎全体参加。

“毛泽东同志，你觉得莫斯科的天气怎么样呀？”斯大林突然问道。

“天气是有点冷，但是我在这儿却处处感受到温暖，你们苏联朋友待我们太热情了，我深表感谢！”毛泽东回答。

“都是社会主义兄弟嘛！我们要互相帮助、要团结！”斯大林说。

“其实我已经适应了莫斯科的严冬，只可惜……”毛泽东又回到刚才那个话题上。

“只可惜明天就要与莫斯科分别了？”斯大林注视着毛泽东问。

毛泽东没说话，只是朝斯大林笑了笑。

席间，越南领袖胡志明十分羡慕中苏签订的条约，他对斯大林说：“斯大林同志，我也要向你请示。”

“你怎么能向我请示，我是部长会议主席，你是国家主席，官比我大，我应该向你请示。”斯大林笑道。

“你们同中国同志订了个条约，趁我在这里，咱们也订个条约吧！”胡志明开玩笑似地说。

“你是秘密来的，怎么同你订约？否则人家可要问你是从哪儿冒出来的呢！”

“这很简单，你派架飞机把我送到天上去转一圈，然后再派些人到机场迎接我，在报上发个消息不就行了，然后我们两国就签订条约嘛。”

斯大林摆摆手说：“你们东方人想象力太丰富了。”

《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缔结对保障中苏双方的安全，维护远东及世界的和平，加强中苏人民的友谊和促进两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有着十分重大的意义。

毛泽东后来曾说：“1950年我在莫斯科与斯大林争论达两个月之久，双方就互助条约、中东铁路、联合股份公司和边界问题采取了两种态度：一种是当我们对建议不同意时要进行讨论；另一种是如果对方绝对坚持的话，我们就接受他们的建议，这是出于对社会主义利益的考虑。”

协议规定，“不迟于1952年末，苏联军队即自共同使用的旅顺口海军根据地撤退，并将该地区的设备移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而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偿付苏联自1945年对上述设备之恢复与建设的费用。”而实际上，苏军直到1955年5月31日才撤离旅顺口。

中苏双方还协议将苏联在东北从日本获得的财产及苏联过去在北京的兵营的营房产等全部无偿移交中国。但实际上苏联军队在撤离东北时，已将所有能卸运走的机器设备和器材物资等，几乎全部搬到苏联去了。

而最令中国共产党感到不愉快的是确定人民币与卢布的比值这个问题。按国际惯例，只要根据双方几种主要产品的价格，综合起来作个平衡，得出指数，与对方的指数作比较，算出差距，就可定出双方货币的比值。但苏联人却自恃强大，将自己的卢布比值定得很高，而将中国的人民币比值压得极低。中方谈判人员对此提出了不同意见，但他们仍坚持自己的立场，双方出现争执，最后伍修权等人在请示国内并得到同意后，只得作出让步。

伍修权后来说：“苏联后来成为富有侵略扩张性的超级大国，在国际上推行霸权主义，不是偶然的，在斯大林时期就存在了这种苗头。”

50年代初期，常常发生的不愉快的事，为两国关系的破裂埋下了种子。

当时中苏关系总的来说是平等互利，但是友好中也有矛盾。

斯大林是格鲁吉亚人，他之所以在这次中苏签约的过程中表现出大国沙文主义倾向，除了与他本人专横的性格有关外，还有一个原因是他想讨好俄罗斯民族，使国内人们看到他是在为俄罗斯人民的利益着想。

对此，毛泽东十分不满。

应该说，斯大林对毛泽东的态度，总的来看是尊重、真诚和热情的。斯大林曾多次说过，中国这个东方民族100年来一直经受着外国的欺侮和帝国主义的压迫。他对中国是很同情的。而他对毛泽东的尊重也反映了他对中苏两党、两国友好关系的重视。在毛泽东一行的这次出访过程中，虽然发生一些小小的误会及不愉快，但总的来说双方都取得了重要的收获。毛泽东加深了对苏联领导人的了解。而苏联领导人对中共领导人有了比较深入的了解。斯大林认为，中国领导人是世界一流的，因而在以后处理中苏关系时，斯大林就比以往小心谨慎得多，而且在一些尽管不太重要的问题上也小心翼翼地先征求一下中国的意见。

2月17日，毛泽东一行离开莫斯科。临开车时，别墅里的服务员们泣不成声。一位管食堂卫生的老太太一再说毛泽东十分理解她们，随手关灯，从不浪费，而且还总是自己整理床铺、房间。很多服务员对代表团成员说，她们觉得毛泽东比斯大林亲切。

工作人员们帮助中国贵宾把要带物品搬上汽车，并把毛泽东、周恩来等人一直送上汽车。她们连大衣都没来得及穿，站在冰雪地里目送毛泽东、周恩来离去，脸上挂着泪珠。

汽车驶进城后，离火车开动的的时间还早，于是车队又到市中心区绕了几个广场才到达车站。在车站举行了热烈欢送仪式，毛泽东发表了告别讲话。

莫洛托夫向毛泽东转达了斯大林的美好祝愿。

列车徐徐开动，毛泽东向车站送行的人们频频挥手。

在回国的旅程中，毛泽东每到一个大站，都要下车参观。毛泽东所到之处受到了隆重的欢迎和热情的款待。

23日是苏联红军建军节，毛泽东在旅途中致电斯大林元帅，向他表示诚挚的祝贺和衷心的感谢。

车停在沈阳时，毛泽东没有像以往那样在市内参观游览，而是一吃完早饭，便坐车去看望苏联专家。毛泽东风趣地对他们说：“现在，我们头上的问题解决了，而脚下的问题还没解决。”

师哲解释说：“头上的问题是指我们推翻了压在我们头上的三座大山，打倒了蒋介石国民党反动统治；脚下的问题是指建设好我们的国家，造福于人民。”

3月4日晚，毛泽东一行结束了为期长达近3个月的赴苏访问，回到了祖国首都北京，回到了熟悉的中南海。

太阳依然从东方升起，新中国的大地一片阳光。

## 后 记

毛泽东入主中南海,是 20 世纪的列车在四五十年代交替的接轨处发出的最强音。在 20 世纪的脚步匆匆向世纪末走去之际,回顾 1949 发生的一系列惊天动地的大事,犹有其深远的意义。

1949 年,对所有的中国人而言——不管是大陆的,还是海外的,都是一个不能忘怀的年头。这一年的历史举足轻重,它是沟通本世纪下半叶的桥梁,是连结整个世界 50 年代变化的纽带。青天白日旗从南京总统府的下落和五星红旗在天安门的上升,标志着 20 世纪中两大阵营态势的最后定格。这无论对中国,还是对整个世界而言,都是一件大事。而毛泽东,作为一位世纪巨人,在中国的历史演变中扮演了一个十分重要的角色。

俄国文学家赫尔岑在研究历史时有一句极富哲理的话:“每一个时代都是崭新的,它充满自己的希望,包含自己的幸福和悲哀。”我们在探寻 1949 年发生在中国的一系列大事的时候,时常想起赫尔岑的这句话。

本书在写作的准备和过程中,收集和利用了大量原始档案资料,查阅和参考了当年和其后的一些报刊资料和一些当事人的回忆材料,同时也吸收和利用了一些党史和现代史研究成果。所有资料都是公开出版发行的。其中主要的,我们已在附录中列出,而更多的,未便一一列出。在此,向有关作者和编者表示诚挚的谢意。

原 非 张 庆  
1996 年 12 月 29 日

## 本书主要参考书目

1. 开国纪事 舒云 著  
中国经济出版社 1991
2. 建国秘录 曹英 余敏毅 编  
团结出版社 1993
3. 在毛泽东身边十五年 李银桥 著  
河北人民出版社 1991
4. 中南海秘闻 舒云 著  
长征出版社 1996
5. 1949：中国历史大转折（丛书）  
广西人民出版社 1996
6. 开国沧桑 郭文韬 郭晨 著  
解放军出版社 1993
7. 梦幻中国：大事变内幕 余文 曹华 编  
团结出版社 1993
8. 中华人民共和国演义 张涛之 著  
作家出版社 1996
9. 潮涨潮落 地久 克锋 等 编著  
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 1996
10. 东方巨人毛泽东 李捷 于俊道 主编  
解放军出版社 1996
11. 中国外交演义 李连庆 主编  
世界知识出版社 1995
12. 北戴河国事风云 金岩 编著  
中国档案出版社 1995
  
13. 刘伯承与邓小平 田如 著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94
14. 祖国兴庆 松林 蕴 著  
中国青年出版社 1993
15. 草山残梦 唐人 著  
华文出版社 1992
16. 邓小平的历程  
毛泽东的历程  
周恩来的历程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1996
17. 毛泽东 R·特里金著  
河北人民出版社 1993
18. 毛泽东与蒋介石 陈敦德 著  
八一出版社 1993
19. 蒋经国传 江南 著  
中国文联出版公司 1987
20. 蒋李斗争内幕 梁开 著

- 香港亚联出版社 1954
21. 在历史巨人身边 师哲 著  
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1
22. 蒋介石在大陆的最后日子 泰 罗宏 著
23. 蒋介石 [美]布赖恩·克罗特著  
内蒙人民出版社 1987
24. 李宗仁回忆录  
广西人民出版社 1988
25. 叶飞回忆录  
解放军出版社 1988
26. 美中关系四十年 资中筠、河迪编  
人民出版社 1991
27. 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 费正清 主编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0
28. 风云七十年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1991
29. 蒋介石传 杨树标 著  
团结出版社 1996
30. 最后大决战 陈宇 著  
黄河出版社 1993
31. 毛泽东在重大历史关头 宫力等著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93
32. 平津战役亲历记  
中国文史出版社 1996
33. 傅作义将军  
中国文史出版社 1993
34. 谁主沉浮  
太白文艺出版社 1995

